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3/8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学者风采

罗时进 1956年生，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人文社科处处长、敬文书院院长等。现任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唐代文学卷》副主编、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江苏省江南文脉研究工程学术专家、《苏州全书》编委会副主任等。已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首席专家。出版《唐诗演进论》《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地域·家族·文学》等学术专著1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50多篇，其中50多篇为《新华文摘》等二次文献转载。研究成果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3/8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奎 邓伟志 刘国光 江平 李君如 吴敬琏
冷溶 迟福林 张首映 袁行霈 葛剑雄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承哲

副主任 李同新 王玲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万银峰 王建国 王承哲 王玲杰 闫德亮
阮金泉 李同新 吴宏亮 余丽 谷建全 完世伟
张昆 张宝明 张宝锋 张富禄 陈宝良 苗连营
徐正英 高卫星 曹明

主编 王承哲

社长 闫德亮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杨 楹 / 5

党建热点

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逻辑基点、伟大实践及经验启示

王廷国 / 13

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发生学考察

邹庆国 / 22

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应然、实然与必然

徐佳佳 刘 锋 / 31

经济理论与实践

长三角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历史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策略

高丽娜 蒋伏心 / 36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钱正元 秦兴方 / 43

三农问题聚焦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张立冬 李 丹 / 49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程传兴 廖富洲 / 57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时代文化建设研究”专题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胡守勇 / 65

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李银兵 / 74

文化认知视域下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研究

管云波 / 83

伦理与道德

实践理性之刚柔辩证:儒家勇毅的现代义理

张方玉 / 90

哲学研究

“儒家养生哲学研究”专题

儒家养生心法

——以孟子心学为中心

黄玉顺 / 98

理学养生之道

——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赵 薇 / 110

历史研究

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与官方的动物保护

纪昌兰 / 121

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孟姝芳 / 128

文学与艺术研究

“唐诗之路研究”专题

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罗时进 陈家愉 / 138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李芳民 / 144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海派话剧图景

尹 诗 / 154

试析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阮 梅 / 160

新闻与传播

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价值、指标及流程

刘永红 / 165

“可视化+出版”:数智时代学术出版发展的新模式

张诗瑶 沈 阳 / 171

· 本刊声明 ·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在以上数据库中被收录,或不同意在本刊微信号中被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MAIN CONTENTS

- The Methodology, Cont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 *Yang Ying*(5)
- The Logical Basis, Grea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Party Promoting Its Self-revolu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ang Tingguo*(13)
- A Genetic Study of the CPC's Two Answers to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 *Zou Qingguo*(22)
- Historical Logic,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Action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 Level
Open Patter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Gao Lina, Jiang Fuxin*(36)
- The Theoretical Basis,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y *Qian Zhengyuan, Qin Xingfang*(43)
- Research on the Policy Connection Between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piration *Zhang Lidong, Li Dan*(49)
-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u Shouyong*(65)
- Cultural Nostalgia and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 *Li Yinbing*(74)
- Hardness and Softness Dialectic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On the Modern Meaning of Confucian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Zhang Fangyu*(90)
- Confucian Mental Method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 Centered on Mencius' Philosophy *Huang Yushun*(98)
- The Way of Neo-Confucianism in Health Preservation
— Focus on Zhu Xi'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Cultivation *Zhao Wei*(110)
- The Strict System and the Adjusted Imperial Power; the Research of Wang Shuchang Case and Official
Punishment in Jiaqing Reign of Qing Dynasty *Meng Shufang*(128)
- Journey, Life, and Experienc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ang Poetry Path
..... *Luo Shijin, Chen Jiayu*(138)
- From Weicheng, *A Farewell Song in Weicheng* to *Painting of Yangguan*; The Gener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a Parting Image on the Poetic Road *Li Fangmin*(144)
-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Value, Index and Process
..... *Liu Yonghong*(165)
- Visualization+Publishing; A New Model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Era
..... *Zhang Shiyao, Shen Yang*(171)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杨 楹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观念自觉。为此,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为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遵循理论建构的原则和方法论,厘清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群,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命题群,揭示各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样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鲜明特质。如此,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活动予以理论总结与提炼,是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模式、展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增强中国人民自主自信的重要方式,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方法论;范畴;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05-08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和业已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之旨意,就是从学理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予以梳理、阐发和总结,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照应的理论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合法性与实践优越性。同时,表征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要深刻地回答“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从而彰显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担当。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前提确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18} 对此,不能仅从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维度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还必须从现代化之类型学和建设与发展之“道”的高度加以剥离,才能从根本上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别的类型的现代化之别,进而真切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式”所内蕴的独特实践品格、价值旨趣与理论逻辑。唯有如此,才能确认、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支撑,从而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从时间维度和实践范式来看,“现代化”在中国一百多年,历经了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经济建设方略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政治建设方案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为总体构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新时

收稿日期:2023-06-03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A02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当代价值研究”(SC22ZDYC30)。

作者简介: 杨楹,男,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1130)。

代“中国式现代化”几个时期。如此,现代化在中国,呈现出“中国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中国式”的实践与认识的不断展开、不断深化与不断超越的历史逻辑。以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载着“中国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自觉自强的精神主旨,而且更鲜明地在深化自觉自强的基础上,彰显着自信自立的精神气度,由此铸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

从类型学和“道”的高度,从现代化发生的历史语境、动力、目标以及遵循的价值原则和实践策略等诸维度或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予以深度透析,将更为清晰地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迥然不同的“个性”。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论断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时所指出的:“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直言之,正是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⁷⁴。

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资产阶级因“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⁴⁰⁵,所以它作为新的历史主体所开启的以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为动力的现代化运动,可谓一骑绝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从而彻底碾压一切传统的阶级,成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作为具有历史先进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⁴⁰⁴,由此“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从而“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⁴⁰⁴。这样,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运动塑造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的奴役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为运作机制,以资本为纽带、以利益为轴心、以利润为尺度的价值体系,以及渐次形成了“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⁴⁰⁵的世界体系。由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生成与构造出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向,铸成以“商品”生产而衍生的物象景观、以“资

本”“交换价值”“利润”为纽带和目的的价值指向,重置人类的时空坐标与价值规训原则,进而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维度彰显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秩序、结构与嬗变的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

在新形成的这个世界体系中,尽管“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①,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⁴¹⁵。“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5]因为在这个体系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6]。“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7]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深度展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以及“两个积累”,也就是其必然结果。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现代化内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对立与对抗,这不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化,而且使“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8]。

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就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所面向的世界境况、所具有的条件、所要解决的问题、领导力量和所依靠的力量、所遵循的价值原则、所要达成的目标及其客观上所产生的历史效果,都有着诸多质的差异。就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则分野,诚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追问:“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9]由此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实践道路、实践模式和价值逻辑。

然而,更进一步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处的历史语境、所面向的世界境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始终绕不开经过了二百年现代化历程而得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曾使“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0],致使中国的现代化流产。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以一种对立或反制的力量在场,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客观环境变得尤为复杂,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艰难重重。同时,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38},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3]38},这不仅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基础,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客观基点”^{[3]38}。这一客观基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立意就在于以自己的实践范式,现实地超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指示的“卡夫丁峡谷”,从而现实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2]76}的历史真理。如此,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所选择的道路、所持守的原则、所实施的发展战略、所要破解的一系列难题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铸成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实践样态、理论风格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之“式”的深刻而丰富的内蕴。这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自觉的历史与现实境况。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法论

理论建构,是在反映实践、观照现实基础上的创造,是对具体经验事实的理论升华,从而超越经验的直观性与具体性,揭示与呈现实践的本质与内在规律。要完成这一内在的认识、观念和思想的质变,就必须持守一定的原则,遵循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方法乃为内容的灵魂,方法论的确定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如此,只有确定与明

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方可深度透析中国式现代化系列范畴和命题、原理的价值真谛与实践旨趣,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引领与价值定位。

1.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3]57}新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遵循与运用。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论,总的来说,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的六个“必须坚持”,每一个坚持侧重于从某一维度深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根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遵循与贯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价值立场,从而“形成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16},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能武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主体的人民,真正掌握人民,进而促使“思想武器”、理论力量变成“物质武器”、物质力量。

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即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1]16},以此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内持坚定信仰和自信自立为前提,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手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指向,从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及其方式内具更为丰富的现实性和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

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要求“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17},在坚持三个“不动摇”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生成,以此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具有明锐而清晰的问题意识,具体落实求真务实精神,由此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所体现的

现实性和问题针对性,由此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承载着理论的根本任务,从而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张力。

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系统观念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贯彻和体现“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要求所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整体性品质。

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坚持胸怀天下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要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¹⁸这一根本特质,由此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超越其地域、阶级、党派、国家的狭隘性和偏执性,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视野与情怀。

2.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在坚持以上原则的基础上,从操作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需运用以下诸方法。

第一,历史语境方法。遵循历史语境方法,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置于全球化、世界史和人类史宏阔的历史语境中,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实践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具体体现“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内涵,凸显“现代化之问”的主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问题逻辑、实践方案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廓清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所承载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自觉。这是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问题域、理论命题、价值旨趣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首先确证的历史坐标。

第二,理论谱系法。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谱系中,从历史语境、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制度保障、实践逻辑、价值立场、追求的目的和历史效应等维度予以比较,在比较的视域中彰显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独具的特色与优势,真正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独特个性。

第三,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系统方法。范畴、命题或原理是构成理论体系的“单元”,理论体系就是按照命题或原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命题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必须首先确定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系列重要范畴,凝练

出该理论的诸命题或原理,在此基础上,遵循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第四,关键词方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总体关键词,同时,关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斗争、和谐等一系列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层级不同的范畴。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必须遵循这些范畴与主题词的内在逻辑关系,充分体现各范畴的所指与能指,从而建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第五,文本解释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涉及众多实践文本、理论文本、政策文本,为此,需按照各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遵循文本解释学的原则对诸多文本予以深度解读,即遵循说明—理解—解释的推进逻辑,依据客观性与主观性、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原则,力求对文本予以多维度、多视角的“会诊”,以达视界融合,从而准确把握各文本的内涵、意义及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深厚文本支撑。

第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从感性的具体升华至理性的具体方可防止理论建构的外在性、抽象性,这就必须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从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理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对此,恰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在现实中是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1]从操作层面来看,亦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文明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²¹⁻²²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要求从整体性上充分把握范畴的内涵、命题的本质及命题的逻辑,切实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丰富规定性,充分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遵循的原则与方法论以及理论建构的操作方法,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具有合法性、正确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前提,

也是真切而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从而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本特征的重要途径。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法论,具有理论建构所必须遵循的价值立场、思维原则和思维操作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主要内容

遵循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首先确立指称或表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范畴、命题,进而确定主要内容,最后依据范畴、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凝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1.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必须确证能真切地反映、表达和标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范畴。这些从多维度、多层面表征和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丰富内涵与本质特征的基本范畴,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件。

如果说私有制、交换价值、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利润、依附、剥削、垄断、殖民地、世界市场等范畴可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机理,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等范畴可表征其政治现代化特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文明优越等范畴可表征其文化价值现代化取向,对立、对抗、两极分化、系统性危机、不平等、殖民地等范畴可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那么,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斗争、和谐、团结、全过程人民民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全人类共同价值、开放合作、独立自主、自我革命、创新、协调发展等诸范畴则构成表征、标识中国式现代化一个个具象的抽象载体,真切地传达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构成洞悉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规定、多维内涵与具体特征的视窗。对此,有学者指出:“从经济视角来看,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政治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法治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依法治国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文化视角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社会视角来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生态视角来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从人类视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融合发展中形成的重要命题范畴。”^[12]

如此,这些基本范畴以及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理论命题和话语体系,不仅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丰富而独特的内容,而且表征着、传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旨;不仅重塑了对现代化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对现代化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在超越对现代化旧有认知框架的基础上,现代化范式被重置、被扬弃,使具有新范式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获得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法性,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不断催生与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在此,还必须注意,表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崭新范畴,从多维度、多层面具体标识、凸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之“式”;同时,这些范畴本身,不仅具有领域之别,还有其层级之差。由此,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结构中,确定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和派生性范畴,即厘清诸范畴的内在关系。

2.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展现的显著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安排等加以系统性、理论性的归纳、概括和总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论、领导力量论、本质内涵论、内生动力论、价值目标论、战略实践论和发展经验论等一系列命题,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¹⁴由此表明,基于“两个结合”而形成的科学指导思想,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根本思想遵循。指导思想论指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观念引领、价值导航和发展战略的

科学性、真理性,表征着对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坚守和贯彻的系列原则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自觉,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真切现实性、可行性和正当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理论自信。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论。此论旨在凸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13]4}“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因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11]4}，“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13]5}，“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13]6}，和“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13]7}。如此,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现实根基。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导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顺利进行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根本保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论。此论重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进而由其社会主义性质推进至中国式现代化具备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等诸多显著特征与其本质密切相关联的丰富而独特内涵,全方位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或传统苏联现代化之间的根本差异。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论。此论意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引领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力、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驱力、最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力以及国家稳定安全的条件保障力。此“五力”并驱、相互作用,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论。此论重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实践目的与实践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实践论。此论旨在从实践论的角度再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战略实践和实践过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根植于中国社会实践,其理论的实践性、科学性、战略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交相辉映、得以彰显。在战略安排方面,坚持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在战略布局方面,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战略指引方面,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系列战略部署构成战略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第七,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论。此论重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中的重要经验遵循,力图为其他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提供借鉴经验。主要经验包括始终坚持先进革命性政党的一贯领导、始终将本国国情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合作相协调、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国际斗争相统一、始终高举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道义大旗等诸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论集中承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世界意义。

指导思想论、领导力量论、本质内涵论、内生动力论、价值目标论、战略实践论和发展经验论,从七个维度具体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

3.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

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七大核心命题,各命题既存在着不同的功能性分工,彼此之间又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融贯性的理论整体。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指导论是该理论体系的前提。基于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其他论断才有根本方向的指引和思想遵循。由此,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指导论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和根本的价值原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理。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量论是该理论体系的基础。领导力量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能否得以推进的根基所在。坚强的领导力量是贯彻指导思想、主导与汇集各种力量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实践的根本保证。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第一原理。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论是该理论体系的主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内容与形式的理论化凝练与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集中凸显中国“式”的根本内容,是中国式现

代化理论建构成果的核心呈现,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论成为该理论体系的主干。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论和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论为该理论体系的关键。内生动力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形式,其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具有关键作用。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实践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论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终归宿。理论源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战略实践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征,发展经验论是其对于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当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其实践的全面性,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高度的内在统合性,以集中回答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进而体现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这一科学思想的全局来领会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当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生命力。对这一伟大的实践活动予以理论总结与提炼,是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模式、展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增强中国人民自主自信的重要方式,其深刻而丰富的当代价值亟待深度开掘。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建构,以“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3]73}对“现代化之问”做出创造性的回答,破解(突破)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道路)唯一论,不仅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3]76},而且以实践的方式和成功的现实有力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3]76},从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主体性,表现了中华民

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表明“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3]75}。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建构,具有深度重塑、增强百年来中华民族自信心之伟力,再次坚定“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3]78}的信念。

第二,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思维、观念的自觉。如此,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能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出现的诸多发展难题提供具体关切,从而为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的持续推进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有助于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有效提升话语权,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性成就正名、发声,依据科学理论建构和显著实践成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说服力、社会引领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关注度、美誉度、支持度的提升,为我国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现实助益。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能更加雄辩地证伪“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诸多论调,夯实“四个自信”的理论根基。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对文明创新的揭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益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西方诸多现代化理论和文明发展路径相比较具有本质差别,对人类文明内涵具有极大丰富和创新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恰恰有助于揭示这样的意义,特别有助于论证和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以物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以少数人利益为中心(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机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主客体对立的个体主义倾向,以及真善美缺失、现实与价值对立的片面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倾向的超越机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赢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的独霸式现代化的超越机理。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对世界发展具有文明借鉴意义,从文明维度彰显现代化道路的民族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总结实践成效、整合理论元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对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逻辑和对外殖民侵略扩张逻辑的坚决摒弃,有助于揭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驱动自身发展并凝聚

全球共识的初衷及其具有的真实性、建构性、团结性、正义性和未来性等内涵,有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情怀和中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人类现代化理论谱系,拓展和扩充人类现代化实践版图,超越以西方式现代化为母版的价值观念体系,开掘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全新思路,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宽了路径选择范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3]¹²⁹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方案、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可以为世界上其他既希望保持独立自主又希求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可资借鉴的选择,为世界发展转型贡献更多东方智慧和大国力量。

注释

①在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他指出:“它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

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6.
-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7-58.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
- [9]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9):4-6.
- [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1.
- [12] 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5):1-9.
- [13]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求是,2023(11):4-7.

The Methodology, Content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Yang Ying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ws the Chinese chapter of Marxism and fully embodies the contemporary vitalit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the concept consciousness of realiz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ust follow the methodology and principle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larify the category group mark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on this basis, extract the proposition group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each proposition, so as to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patter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refore, theoretical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ell China's story well, highlight China's model, show China's wisdom, contribute China's plan, and enhance the independence and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has profound and rich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category; theory; value

责任编辑:思 齐

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逻辑基点、伟大实践及经验启示

王廷国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逐步探索出一条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七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思想建党、坚持制度治党、坚持组织建设、坚持正风肃纪、坚持反腐肃贪等八个方面。新征程上,我们不能有歇歇脚、喘喘气的念头,必须牢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深刻汲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继续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切实以党的自我革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伟大成就;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13-0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积极主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十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为何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如何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等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一、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逻辑基点

习近平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

造出来的。”^[1]⁵⁴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站在时代前沿,以前所未有的定力和决心,通过“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去腐生肌”等一系列革命性锻造,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课题,以此增强自身免疫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为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和全力克服“四种危险”,科学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1.着力解决“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本质要求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本质规定,也是其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马克思深刻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这深刻表明,自我革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政党,一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发生改变,党的根本属性就会变质,其

收稿日期:2023-02-24

基金项目:贵州省党校(行政学院、讲师团)系统课题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23SWDXKTZD03)。

作者简介:王廷国,男,中共贵州省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室编审(贵州贵阳 550028)。

红色基因和初心使命就会变色,党的优良传统和清正廉洁就会变味。因此,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只有在自我革命中进行革命性锻造,才能抛掉自身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3]列宁也曾表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4]。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根本目的就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体现了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必然逻辑^[5]。显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就要敢于同弱化党的先进性和损害党的纯洁性的一切因素作坚决斗争,这不仅能够有效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变质、变色、变味,而且能够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着力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要求

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回答来访民主人士黄炎培就如何解决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等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能够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6]。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样的新路,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守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解决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总会随着时代变迁、环境变化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此,如何不断开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其意义更大、要求更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深刻总结治党治国经验教训,从他律和自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政治逻辑,鲜明地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战略思想。习近平也深刻意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如果我们党不推进自我革命,就会重演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因此,我们党必须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清除体内一切“肮脏的东西”和侵蚀健康肌体的“病毒”,提高我们党的政治免疫力,构筑起能够长期执政的“免疫系统”和“钢铁长城”,以防祸起萧墙,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

3.着力解决“党长期执政、接续辉煌”的价值要求

习近平指出,能否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以及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接续辉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认真回答好和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⁴³⁶。中国共产党既是世界第一大党,也是百年大党。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执政,就容易忽略自身存在的缺陷,急于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而陷入“革他人命易、革自己命难”的历史困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亡政息”,更遑论“永久辉煌”。这就需要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有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勇于推进自我革命,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有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坚持自我革命使党永葆青春活力。”^[7]坚持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成功密码,亦是其在新时代长期执政、接续辉煌的内在动力,推进自我革命是新征程上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接续辉煌的价值遵循。

二、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针对问题、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进行了一系列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逐步探索出一条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1.政治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指明正确方向

习近平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8]这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指明了根本政治方向。

第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把党的各项事业向前推进。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正是通过旗帜鲜明讲政治,有效解决人心涣散、斗志丧失、弊病丛生等问题,并及时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使得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充满生机活力,党风政风持续向好,党员干部逐步树立政治理想、站稳

政治立场,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自我革命全过程。

第二,自觉践行“四个意识”。践行“四个意识”,不能只看表态,更要看行动,关键看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严格践行“四个意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落实问题,始终坚守政治原则、保持政治定力、锤炼政治品格、强化责任担当,真正做到了对党忠诚、为党尽责。

第三,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9]党员干部做到始终坚定“四个自信”,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自觉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苦干实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不断经受各种诱惑,在顺境中不骄傲、不懈怠,不断经受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在逆境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第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政治实践在于:有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可以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员干部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确保全党同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步调一致向前进,是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和最大的实践创新。

第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0]⁴⁸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乎全面从严治党质量,是我们党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动力源泉。因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严格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部署,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切实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着力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问题。

2. 思想建设: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凝聚思想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常规性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不断提高解

决各种困难和问题能力,进一步筑牢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思想基础。

第一,强化思想理论武装,练就金刚之“身”。习近平指出:“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10]⁶¹理论清醒才能思想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着力引导教育党员干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如利用中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课”、集中宣讲、学习培训等形式,全面系统、及时跟进、联系实际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

第二,抓好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得“软骨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针对一些党员理想模糊、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等问题,坚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干部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坚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育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如利用主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注重把理想信念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引导党员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苦干实干。

第三,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把稳思想之“舵”。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些党员干部意识淡化、党性弱化等问题,我们党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如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党通过开展一系列“常”与“长”相结合的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

3. 组织建设:锻造敢于斗争的干部队伍,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夯实组织基础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主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只有锻造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才能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大力选拔培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自我革命精神、能够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干部,把严的基调贯彻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取

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确立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如何选人,选什么样的人,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问题。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1]。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提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12]45},这实际上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提要求。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培养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四个铁一般”干部队伍^{[12]417}。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383}。从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现实性、针对性都很强的要求。这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为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二,加大教育培养力度,着力锻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好干部。教育培养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为强化干部政治素质、提高干部专业素养、提升实际工作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开展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学习培训、专题研讨、理论研修等,并积极搭建干部成长锻炼平台,有计划选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学习等,促进干部在实践中砥砺品格、在实践中踔厉奋发,增强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才干本领。

第三,强化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从事业发展需要出发,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创新推荐考察方式,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龄、不唯生产总值,不搞“海选”“海推”,大力整治庸政、懒政、怠政及为官不为等现象,严厉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积极探索容错纠错机制;制定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构建起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机制,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夯实组织基础。

第四,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吏要求,强化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干部

出问题,总是从小问题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把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作为一项常规性、长期性工作。如出台制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等行为;出台制定《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等政策法规,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这些实践举措,从最具体、最现实的日常管理监督入手,强化了领导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使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

4. 作风建设:持之以恒加强作风转变,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营造清朗空间

作风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之一,事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坚持以上率下,锲而不舍、扭住不放,着力解决了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从抓“舌尖上的浪费”到抓“楼堂馆所的豪华”,从推进基层减负到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剑指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明显好转,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第一,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党中央把贯彻执行工作紧紧抓在手上,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整治,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查处,串点成线、由线及面,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铺张”,治理“会所里的歪风”,整治“节日中的腐败”。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13]。随着一个个问题的突破解决,全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净化,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密切,切实推进了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第二,驰而不息整顿纠治“四风”问题。“四风”问题是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大多是由于“四风”问题引起的。“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等特征,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影响党的群众基础,破坏党的政治基础和执政地位,毒化社会政治生态,必须毫不手软、驰而不息地加以整顿纠治。整顿纠治“四风”,是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自我革命

的应然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上率下,敢于向作风顽疾“亮剑”,敢于动真碰硬、迎难而上,以积极鲜明的态度、务实有效的举措,注重抓长、抓细、抓小、抓常,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的同时加大整治力度,使得党风政风明显好转、政治生态持续净化。

5. 纪律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纪律保障

纪律是党的生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建设,一体推进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建设,切实用铁的纪律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第一,建立健全党规党纪,实现有纪可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党章为基本遵循,坚持依规依纪治党,曾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制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第二,严明党的纪律规矩,增强政治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维护党的纪律建设优先位置,规范和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行为规则,要求全体党员自觉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做起,按照“五个必须”标准要求自己,坚决杜绝“七个有之”,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勇于担当,敢于与破坏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第三,坚持用好“四种形态”,严管厚爱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坚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关口前移、防患未然;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日常监督和管理,既防止敷衍塞责、欺骗组织和尺度不准、畸轻畸重现象,又坚持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惩治极少数与教育大多数的统一,实现了由“管少数”向“管全体”、由“被动查”向“主动防”的转变。

6. 制度建设:完善管党治党制度体系,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支撑

习近平指出:“加强党内监督和纪律建设,必须

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14]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而且需要有规范科学、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为其保驾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推进自我革命全过程,不断强化党内法规建设,不断完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第一,形成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量之多、制定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前所未有,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的笼子。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6月,中央制定修订了党内法规共156部,占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70.5%,仅准则、条例就有45部,占现行有效准则、条例的90%^[13]。

第二,强化各项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好制度,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度,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一手抓制度的制定完善,一手抓制度的贯彻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执行过程中坚决不开“天窗”、不留“暗门”,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党员干部坚决查处,以此产生震慑效果,防止“破窗效应”。这不仅增强了制度的权威性,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也树牢了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制度意识,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落实提供了支撑保障。

第三,推进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的作用。这既强化了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又通过各类监督同向发力,使群众意见不仅在事后惩戒中得到很好体现,而且对事前预防、事中制约起到明显效果。

第四,着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权力监督的重大制度创新,事关国家改革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中国历史和世情国情党情出发,积极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探索对所有公职人员实施监察全覆盖的法治化路径,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位一体的

全覆盖监督格局,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监察道路,对协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7. 反腐败斗争: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坚决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为工作重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坚持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以“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刮骨疗毒”的毅力,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为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按照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工作思路,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强化总体把握,把惩处、监督、教育融合起来,切实做到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时发力。一是推进不敢腐是前提。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的刚性,让意欲腐败者在“带电的高压线”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形成“不敢腐”的震慑。二是推进不能腐是关键。加强监督制约、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让胆敢腐败者无机可乘,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三是推进不想腐是根本。加强警示教育,坚持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坚守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家风家教,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筑牢“不想腐”的堤坝。

第二,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一招。一是坚持在反腐败斗争面前全体党员一律平等,没有例外。党纪国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涉及谁,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二是坚决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党中央在严肃查处高级干部贪腐的同时,对“蝇”贪也毫不手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三是织密国际追逃“天网”。加快与国际组织建立反腐败合作机制,推进“猎狐”行动顺利实施,既让腐败分子在国内无容身之地,也切断了其在境外的后路。

第三,一体构建“四责协同”常态化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强化管党治党意识,把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横向协同协作与纵向压力传导结合起来、一

体推进,构建主体明晰、有机协同、层层传导、问责有力的从严反腐常态化机制,形成全党动手一起抓反腐工作的局面。同时,我们党还通过“一案双查”,使党委、纪委和有关部门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承担相应责任,不管涉及谁,都追究责任,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履责指数”换取群众的“满意指数”,从而实现有错必究、有责必问的反腐常态化。

第四,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巡视巡察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凝聚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理论、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巡视巡察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坚持全国巡视巡察一盘棋思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统筹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老虎”“苍蝇”一个都不放过,实现监督无死角、无盲点;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和创新巡视巡察方式,打好“组合拳”,既提高了发现问题的精准度,又不断消除了潜在的漏洞。

三、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等方面一体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新征程上,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不能有歇歇脚、喘喘气的念头,必须牢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为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动力源泉。

1.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脉和根本,事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命运,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正确抉择。习近平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5]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这样的领导地位,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不掩饰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从不文过饰非,而是在实践中敢于坚持真理、吸取教训,修正错误、矫正偏差。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历史和实践经验总结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也是最宝贵的成功经验。因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从根子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彻底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强化各级党组织对各领域的领导,从严从实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全党共同意志,强化自我革命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着力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切实以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2. 坚持人民至上, 坚守自我革命的价值导向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地位。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其根本目的就是牢记初心使命,其最终落脚点就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百年奋斗重大历程充分证明,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并已经凝练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依靠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开辟了百年大党新境界。毋庸置疑,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最终价值旨归。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的执政成绩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哪个领导说了算,而是由人民来评判。因此,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始终把赢得人民的拥护、赞成和满意作为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追求,切实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推进自我革命的首要任务。二是始终坚持以党的初心使命为动力源泉,锤炼党员干部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意志品格。三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自觉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充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畅通人民监督渠

道,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最终评判者。

3.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自我革命的目标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回避问题,而是在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回答时代问题的进程中乘风破浪、勇毅前行。我们党在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痼疾、检视自身,主动变革、察势而谋,通过着眼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将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作为百年大党的方法论汇聚,‘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结晶,在新时代中终将会被人类的实践所继续证明、运用和发展。”^[1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推进自我革命,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自我革命淬炼自己,解决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三个不纯”“七个有之”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目标为导向,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对过去、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出科学分析和精准研判,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在解决自身的突出问题中不断强化管党治党的历史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此拓展自我革命的目标途径。

4. 坚持思想建党, 淬炼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经验。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就确立了思想建党的战略,认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18],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党性修养,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不断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开展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筑牢全党理想信念,统一全党意志力量,增强管党治党思想自觉,

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实现由思想自觉向行动自律的转化。

5. 坚持制度治党,健全自我革命的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四自”制度规范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征和宝贵经验,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的高度统一,推动了自我革命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坚持以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不断把管党治党成功做法和新鲜经验提炼集成、固化深化,形成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既是开辟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的新要求、新实践,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19]因此,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我们要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谨慎,不断完善和优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用制度来确保管党治党“全面”的彻底性、“从严”的持久性、“治党”的正义性,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伟大战略中,充分发挥制度的引领保障作用。

6. 坚持组织建设,锻造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

锻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干部队伍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0]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一系列正确的组织路线,培养锻造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才确保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成功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选人用人上突出政治标准和政治功能,着力解决组织的弱化、虚化、边缘化,注重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提高党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切实将党员干部锻造成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的自觉践行者和监督者。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作为后盾,需要干部的率先垂范。新征程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增强政治组织功能,强化组织领导和政治把关,精准科学选人用人,锻造一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引导他们“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21]66}。

7. 持续正风肃纪,丰富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

如果说严明的纪律是党提高战斗力的有力保障的话,那么,党的作风则是党性的外在表现,是观察党和人民关系的“晴雨表”,它不仅关系党的形象、党员人格力量,还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牢牢抓住中央八项规定这条“硬杠杠”,坚决纠治“四风”这个“牛鼻子”,强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通过一系列强力措施,整顿纠治了一批多年来没有根除的顽瘴痼疾,营造了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使党风政风得到了历史性和全局性的转变,彰显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进正风肃纪,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动真碰硬,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做起,聚焦“四风”问题,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以此强基固本、补钙壮骨,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途径。

8. 坚持反腐肃贪,廓清自我革命的顽瘴痼疾

腐败是世界性顽疾,关系党心民心、关系人心向背。建设廉洁政治是每个政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精神赢得历史主动,为坚决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1]69}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决惩治腐败,切实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忍小痛、成大谋,破“潜规则”、立“明规矩”,筑牢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切实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扫清障碍。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目标突出、成就显著、效果明显,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思想堤坝更加牢固,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加强大,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风政风持续向好,党员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我们党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积极应对国内外一切不利因素,不断带领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就应汲取十八大以来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继续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永葆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中国共产党使命在肩、初心如磐。新征程上,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困难更加艰巨,任务更加繁重,使命更加伟大,我们不能有任何喘喘气、歇歇脚的念头,而是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加快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开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体制机制,切实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巍巍巨轮披荆斩棘、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3.
 [5] 余湘.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8):75-86.

- [6] 黄炎培.延安归来[M].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61.
 [7] 吕薇洲.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成功密码与接续辉煌的内在动力[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2(3):5-11.
 [8] 习近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J].求是,2021(16):4-12.
 [9]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2.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 孙少龙,张妍.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述评[J].瞭望,2022(36):10-13.
 [14]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8.
 [15]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7.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
 [17] 徐子明,关锋.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问题意识”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四维呈现[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2(4):29-37.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19] 冯留建,谢良卿.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理路[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3(4):5-14.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The Logical Basis, Great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Party Promoting Its Self-revolu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ang Tingguo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major theme of the era of “self-revolution”, which ha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o the depth, and gradually explored a successful path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with self-revolution.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the CPC has made historic and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s and formed a series of effective basic experiences. The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style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The series of basic and effective experience mainly includes eight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adhering to problem orientation, adhering to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dhering to rectification of conduct and discipline, and adhering to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nd embezzlement. On the new journey, we must not have the idea of resting our feet and taking a breath, but keep in mind that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is always on the way. We must deeply learn from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in promoting self revolu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continue to forge the Party into a stronger party, always maintain the progressiveness and purity of the Party, ensure that the Party does not deteriorate, change color, and maintain its flavor,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Key words: self-revolution;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Party building; great achievements; basic experience

责任编辑:思 齐

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发生学考察

邹庆国

摘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课题,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饱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深远政治预见,“甲申对话”“窑洞对话”“赶考对话”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形成了第一个答案的逻辑框架。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是探寻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四个不容易”体现出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呈现出两个答案之间的逻辑承接关系。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要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民主新路;自我革命;发生机理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22-09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历史底蕴厚重、思想含量丰富、探讨空间广阔,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话题。对于这一命题的持续思考和接力解答,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深刻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¹⁴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标识出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历史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始终做到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场景、命题提出、时空条件、发生机制、政治价值等方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学理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价值共识,诠释“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的深层密码,保持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自觉,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切实增强以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个内含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政治课题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话”,成为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佳话。这次著名对话中所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课题,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主体的成败得失为本土经验资源,归纳出的一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展现出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

1. 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提出

黄炎培提出的“窑洞之问”,是运用传统文化的话语和表意逻辑,对近代以来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尤

收稿日期:2023-0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17BDJ030);聊城大学横向课题“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履职机制创新研究——以聊城莘县为例”(R23WD04)。

作者简介:邹庆国,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建设与孔繁森精神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聊城 252000)。

其是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共产党的光明前景进行对比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

既往的研究中,一些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相关著述往往采取选择性引用方式,这会导致诠释不到位或过度解读的不良倾向。发生学视角的研究,必须严格从文本入手。按照黄炎培的记述,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文本全貌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2]60-61}这段论述,具有严谨的叙述逻辑和层次结构,需要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和逻辑考察,发掘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意蕴。

2.“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历史周期率意蕴的核心表达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原文为:“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基本含义是说,贤明的君主大禹和商汤在遇到问题 and 困难时往往从自身找原因,因此迅速兴盛起来;昏庸的君主夏桀和殷纣则往往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推诿过失于他人,因此他们的政权灭亡迅速。从典籍记载来看,表达出两组对比性的因果关系。黄炎培则直接引用了两种结果的表述,建构起二者之间的连贯性关系,赋予其更为生动的表意旨趣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蕴,要义在于从“其兴也勃焉”到“其亡也忽焉”的退化性转变。这种转变在历史场景之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很多政权表现出从无到有、从兴到衰、从强到弱、从存到亡的蜕变现象,表现为“很多政权在开始之时励精图治、欣欣向荣,很快取代旧政权;但是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迁,很快就蜕变、腐朽,从而导致衰亡,被新的政权所取代”^[3]。这种转变并不是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律”,而是一种具有或然性、可能性、循环性特点的历史效应。故而,称之为历史周期率(此处的“率”理解为“效

应”更为达意)。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跳出历史周期率”“周期率的支配力”之说。

3.超越并深化对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分析

黄炎培超越《左传》中原典意义上的“罪己”和“罪人”,即把君主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作为政权兴衰主要原因的解释,结合自己的所见与所悟作出新的诠释。一是“其兴也勃焉”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初期往往环境艰苦,困难重重,时时面临九死一生的危险,在生存压力倒逼的情势下,组织成员能够保持昂扬的进取精神和执着踏实的作风,事事尽心,人人尽力,带来事业的繁荣兴盛。二是“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环境的不断优越,组织成员的精神逐渐懈怠。这种精神懈怠,诱发两个方面的风险:从历时的维度来看,会产生惰性,并由少数人的偶发行为蔓延成为群体性、顽固性的不良习气,导致积重难返,流弊横生,严重危及政权巩固;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对于自然发展的情况,黄炎培未作评论。他着重强调的是另一种情况,即随着治理区域及范围的扩大,因功业欲驱使而违背客观规律去强求发展,就会导致人才匮乏、能力弱化,出现治理危机,进而上演历史周期率悲剧。

4.归纳历史周期率的三种呈现状态

黄炎培归纳列举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三种情形,无论话语还是表意,均具有悠长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一是“政怠宦成”。这句话的主要文本渊源有西汉杂史小说集《说苑·敬慎》中的“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以及清代诗句“政怠宦成方默警”。依据黄炎培所讲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描述,“政怠宦成”的语义逻辑应当是“政怠于宦成”。所表达的道理就是,无论政治集团还是官员个人,往往都会懈怠、蜕变于有所成就之时。实质上揭示出的就是谦受益、满招损之理。二是“人亡政息”。此语源自《礼记·中庸》中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本意是指执政者在其位,他的政治举措就得以实行;执政者离世或下台,其所行的善政就被废止。后人将“人亡政息”作为一个成语,引申其意为:为政在于得人,得贤德之人则政行,不得贤德之人则政废。这也正是黄炎培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所要表达的意思。三是“求荣取辱”。这一说法的文本渊源主要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述的“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讲:“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4]686}这些表述与黄炎培所讲的

“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是相通的,就是指一味地追求名誉和荣耀,结果反遭屈辱,反映出一种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社会历史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无视、违背客观规律。

5. 跳出历史周期率话题表达着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基本共识

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时刻,黄炎培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绝非偶然。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着一种基本的政治预设或共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缔造者是共产党。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到延安长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5]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1940年,“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重庆到延安考察。他眼中的重庆,“交际应酬,互相征逐……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6]¹⁸⁷。在延安,他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局部执政所带来的“十个没有”的社会新风:“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7]⁷¹⁸通过对比“重庆作风”和“延安作风”,他认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出于对延安精神的渴慕、珍惜和厚望,他提出了著名的“陈嘉庚之问”：“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6]¹⁸⁸从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历史情势来看,一方面,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集中表达着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的政治作为和政党形象的积极评价,以及对共产党将成为未来新政权缔造者和领导者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此命题也隐含着一种政治忧患——共产党人能否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保持政权不蜕化、不变质,坚守初心、慎终如始,进而实现政权的长期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也正是黄炎培提出“窑洞之问”的核心目标及对共产党人的殷切期待——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历史周期率问题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由黄炎培正式提出,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现象,早就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注意并有诸多述及。总体而言,尽管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于“气数”或“天意”的宿命论或唯心观,然而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相关思考及论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窑洞对话”结合新的历史场景和政治实践,对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主题概括和价值阐发,赋予其全新政治意蕴,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范畴。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 深远政治预见

作为话语意义上的历史周期率,虽然是由黄炎培正式提出的,但其所反映的理念和原理则早已进入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党史典故是“窑洞对话”之前的“甲申对话”。众所周知,毛泽东饱读中国历代史书典籍,深谙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对于“周期率的支配力”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出现转折之际,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开始思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不重蹈骄傲后失败的覆辙。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反思明朝灭亡和明末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年的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突出表达了戒骄和防腐的历史洞见。毛泽东认为此文对于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指示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同年5月开始的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主题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²²⁷这次著名的“甲申对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戒骄戒躁,避免“胜利—骄傲—失败”周期性循环的历史悲剧。同年,他又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9]⁹⁴⁷并提出告诫:“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⁹⁴⁸在此,毛泽东结合党的历史来阐述“甲申对话”中所蕴含的戒骄戒躁、居安思危问

题,是共产党人对如何“不做李自成”的初步回答。

由此可以说,“窑洞对话”实际上是“甲申对话”的主题延续和认识深化。“窑洞对话”的主题从防范党员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进一步提升到治乱兴衰的政权建设规律的高度。黄炎培对寄予厚望的共产党人提出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历史之问,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61}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明末农民起义军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悲剧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案例。以“民主新路”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表达出党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结论。

第一,这一答案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属性。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从被压迫者翻身成为国家主人作为根本使命,实现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体双重意义上的民主与解放。“共产党把我当人看”——来自底层民众对于民主理解的朴素表达,和“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阐释,二者达成了对民主的认知与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有效实现党际、群际、派际的民主协商,创造出协商民主的典范样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开辟出依靠先进政党领导,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崭新路径。

第二,这一答案立基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执政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党没有获得全国执政地位,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民主政权中,“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743}。在文盲半文盲占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实现了元典形态的真实、广泛、彻底的民主,探索出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民主新路,奠定了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实践基础。

第三,这一答案强化于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窑洞对话”发生在党的七大胜利闭幕不足一个月的历史时刻。经过24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机制,都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解把握,认识到全党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

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7]529}。党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清晰透射出党内民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的重要价值。党的七大创造了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内团结的典范,毛泽东称之为“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9]1101}。从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答案的自信与坚定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党内民主的温度和力量。

第四,这一答案标识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基本路径。对于尚未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一种政治预判。这种民主超越资产阶级旧的民主形态,是在新型政党领导之下,适应新型政权建设的全新样态的民主。这一答案中提出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通过让人民监督政府,防范“政怠宦成”;二是通过人人起来负责,防范“人亡政息”,标识出运用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模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具体路径。这也契合黄炎培在延安所亲眼看到的“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政治新风。后来,黄炎培对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评价,也是从这两个方面作出回应的:“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2]61-62}

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对历史周期率的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在黄炎培的记载中似乎未见毛泽东的回应^[3]。实际上,历史周期率的呈现形式是复杂多元的,归纳出的三种情形也是相互交叉的。尤其需要注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持续深入的。随着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毛泽东更加注重从警惕党内风险的角度来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实现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0]1438}针对这样的风险,他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0]1438-1439}。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还作出“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

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是经过党中央的大力倡导,成为共产党人的铁规矩,奠定了做到“两个务必”的重要制度保障。“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均蕴含着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等风险隐患的清醒预判,可视为对防范历史周期率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的深刻省思和郑重回答。

“赶考对话”是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又一次重要回答。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1]469。“赶考对话”是对“甲申对话”的回应、对“窑洞对话”的续答。“甲申对话”的主题是防范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情绪,做到慎终如始;“窑洞对话”的主题是如何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做到初心不改、永不懈怠;“赶考对话”则侧重于如何防止腐化堕落,实现长治久安。这三次历史性对话,基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对防范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三种情形作出了系统回答,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本逻辑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表达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强烈 历史主动和坚定历史自信

历史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跳出历史周期率没有止境,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对历史周期率问题作出突破性探索,成功找到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表达出强烈的历史主动和坚定的历史自信。

1.“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自身建设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重要判断,铺垫起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

第一,在应对改革开放考验和反思苏东剧变教

训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冷战”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能经受住考验,导致变质变色变味,最终丧失政权,重演历史周期率的悲剧。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警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2]380-381“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12]380-381进入新时代,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13]这一论述,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夺取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得与失的新视角,审视和诠释历史周期率问题,深化了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命题的思考。

第二,在经受市场经济考验中始终保持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侵蚀风险的高度清醒。党的十四大作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引发了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的综合性变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主要有三个风险点:一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固有的利益驱动逻辑,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滋生的“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向党内生活传导渗透的风险;二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原则存在着向政治领域、党内生活传导的风险,与党性原则产生冲突,影响着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三是在对外开放环境下,市场经济原发性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作风,会从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渗透到党内生活之中,并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腐蚀文化根基。这三个风险点贯穿起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公正性诉求为根本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与以利益追逐为核心驱动力的市场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始终存在。如何有效缓解二者之间的张力,防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生活渗透蔓延,构成了从严治党的一条逻辑主线。习近平深刻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4]99坚持

党性原则至上,有效缓解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成为从严管党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面临的一个亟待突破的新课题。

第三,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使命担当中深化对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思考。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新定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又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党长期执政”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政治使命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一种新型政党执政体制的现实合理性。在此政治语境中,实现长期执政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终目的,“一党”则是根本前提。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15]531}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其中的道理,他进一步阐释说:“我们是共产党执政。很多规矩是共产党立的,执行也是共产党去执行。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在体制机制层面加大监督力度。”^{[16]392}如何克服外部监督不足的风险,通过解决自身问题实现一党长期执政使命,成为新时代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的重要基点。

2.从“四种危险”到“四个不容易”: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党所面临的“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体现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面临主要风险的深刻自警。进入新时代以来,结合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习近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意蕴进行了新阐释。2018年1月,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他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

第一,在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探究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理。习近平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13]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秦末农民起义,从“文景之治”、汉武帝称雄到汉末三国纷争、天下动乱,从“开元盛世”到唐末的衰落,从“康乾盛世”到清代后期的国势衰微,历代王朝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

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13]。这一论述揭示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内部危机—社会危机—统治危机—改朝换代的演变逻辑,“自身出问题”则是源头所在。

第二,在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反思中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历史发展中起到重大进步作用,同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省。早在2013年12月,习近平就强调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17]701}2018年1月,习近平在讲话中又专门分析了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在领导起义军初期,由于军纪严明、体恤民心,因而能够快速攻占北京;进京后,起义军骄傲自满、沉迷享乐,最终人心涣散、土崩瓦解。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很多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13]。这实质上就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当年“甲申对话”和“赶考对话”政治意蕴的新揭示,确立起“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主基调,体现出永葆“赶考”的清醒与坚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三,提出“四个不容易”的重要论断,对历史周期率命题作出新阐发。基于对历代封建王朝兴替循环历史悲剧和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分析,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13]封建政权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王朝更替并未改变政权性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无法彻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实现根本性政治革命。封建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的失败结局是历史周期率的经验来源和生发依据,但是社会主义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着不能进行简单化对比、机械化套用,“四个不容易”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新诠释。这一诠释,从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一般过程出发,总体上划分出功成名就之时、执掌政权之后、承平时期和重大变革关头四个阶段,对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透视与经典概括,对历史周

期率的呈现形式进行了新阐发。“四个不容易”是历史发展规律与现代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相结合、直面时代课题与破解历史难题相结合的典范,奠定了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新答案的认知基础。

3.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接续回答与丰富完善

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8]541}在尚未全面掌握国家政权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预见和历史前瞻,那么,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则是从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现长期执政使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角度,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的新思考和新概括。

第一,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主体自觉的新升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观点及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实践,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认知基础和逻辑依据。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是主体自觉自醒的表现。其要义在于通过外部监督的压力激发内在动力,保持生命活力,最终消除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条件,阻断其发生通道。但是,在执掌政权后,从可能性上讲,党员干部就具备了依靠权力规避甚至拒绝外部监督的能力和条件,历史周期率发生的风险不是减少了,甚至比执政之前增加了。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18]543}即使是由衷的感恩赞扬和真诚的鲜花掌声,也同样会带来潜在风险——弱化甚至丧失革命精神和奋进斗志,进而就会萌生得过且过、贪图享乐、安于现状的不良心态。因此,必须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主体自觉。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19]591}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样态,以防范骄傲自满、解决执政党自身问题为切入点,在彻底的“主体革命”语境中,深度建构

起工人阶级政党之无私性、正义性、真实性和进步性的政治品格;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逻辑理路中,体现出对立统一规律在政党自身建设中的生动运用,揭示出保持政党活力的不竭源泉,以“中国共产党之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体现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主体理性的真正统一。

第二,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跳出历史周期率主体素质的新拓展。1949年,在即将取得执政地位之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政治警告,初步开辟出通过党的自身建设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新路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1-2}“三个务必”是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政治保障,体现出对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进程中主体素质的内涵完善和路径拓展。一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状态。古往今来,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个人来说,功成名就、实现目标之后的精神懈怠问题,都是一个与人性本身弱点有着密切关联的无法彻底克服的难题,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思想源头。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习近平曾提出警告:“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15]541}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成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制度化的工作要求。这是从思想源头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重要探索成果。在历史周期率面前,所有的历史活动主体都是平等且无一例外的,核心目标是坚守初心,保持本色。信仰信念和使命担当的坚定与执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法宝;崇高的党性原则,是克服人性弱点的思想武器。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追求,能够构筑起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思想堤坝。二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品格。历史的教训一再表明,随着环境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个体性、偶发性的骄傲自满、享乐奢靡现象,很容易扩散传染,演化为破坏力极强的歪风陋习,成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诱因。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奠定了防范上述风险的深厚基础。但是经验也表明,歪风邪气易于反弹回潮,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特点,必须常抓不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在获取执政地位前夕提出的作风要求。在新时代,面对伟

大成就和辉煌业绩,能否做到自豪而不自满、自信而不自傲,牢记古今中外政治实践中那些安于现状停顿不前、居功自傲追求享乐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能力素质。迈向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各种长期斗争、重大斗争、复杂斗争,均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26}为此,迫切需要强化全党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能力。我们党就是在培育敢于斗争的勇气,磨砺善于斗争的本领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为经受风险考验,实现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的能力支撑。

第三,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跳出历史周期率作风导向的新标识。中外历史的教训表明,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特权思想,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资源条件进行腐化蜕变,进而出现上行下效、恶性传染现象,逐渐形成流弊横生、积重难返的不良风气,是历史周期率的普遍性发生机制。因此,政治组织或执政团体高层的率先垂范尤为关键,是良好作风的鲜明导向和核心标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开创了从高层做起,立规矩戒涵养新风的历史典范。实践表明,一些看似“小节”的作风问题的频现,不仅会透支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还会累积凝结成“亚文化”形态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党内生活中传播,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环境。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鲜明表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治不良作风的坚定决心。八项规定颁布之后,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规则细化,政治效应比较明显的莫过于对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方面的严格限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化、宽泛化,而且由于工作性质与内容不同,同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实际需求上有很大差别,在“就高不就低”的趋利心理作用之下,很多待遇演化为饱受公众质疑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领导权威和政治公信力造成了损害。各地对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严格规定,貌似“小节”问题,然而其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导向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如果前冷后热或时冷时热,前紧后松或时紧时松,均会功亏一

篑。厉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践表明,制度执行力才是最根本的内驱性净化力量,锻造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作风利器。

第四,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跳出历史周期率政治自信的再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毛泽东就高度警惕党内出现的腐化堕落问题,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及时惩治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他还分析归纳了干部蜕化变质的“五部曲”——懒、馋、占、贪、变,深化了对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腐败发生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腐败问题与历史周期率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20]5}因此,“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1]47}。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反腐败斗争的态势把握与风险预判为逻辑起点,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的归宿,以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为立场表达,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为原则遵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以纪检领导体制与巡视制度改革为体制保障,以“权力入笼”为治本之策,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为基本方式,以体现“常”“长”特点的生态净化机制为成效保证,取得并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理念升级与模式创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1]69}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政权易手、政党垮台、人亡政息历史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本诱因。中国共产党人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依靠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魄力以及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彰显出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党优势和政治自信。

第五,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重要命题。对于有志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自我革命没有止境,

探寻历史周期率的破解路径也没有止境。我们党既要勇于自我革命,更要善于自我革命,依靠成功解决现实问题,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历史周期率具有复杂的生发机理和演变机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一党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将会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和困境。推进自我革命的进程,就是要不断发现并解决自身存在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普遍难题和独有难题,防范显性风险和潜在风险、现实性挑战和可能性挑战,在总结并遵循自我革命规律中不断增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能力。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22]“六个如何始终”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清醒认识并着力解决的深层次难题的经典概括和系统阐明,可称之为“自我革命之问”。解决这六个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实践、丰富自我革命内涵、拓展自我革命领域、完善自我革命路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黄炎培.延安归来[M].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
 [3] 冯务中.“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文本之辨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3):114-121.
 [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
 [5]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6]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4-15.
 [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6]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0]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2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2]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N].人民日报,2023-01-10(1).

A Genetic Study of the CPC's Two Answers to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Zou Qingguo

Abstract: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is a political topic with meta narrative significance. It is full of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oth in text discourse and expression logic. Democracy is the first answer to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which condenses the Party's profound political foresight on taking power and self construction. The "Jiashen Conversation", "Cave Conversation", and "Catch-up Examination Conversation" have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cycle from different angles, form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first answer. Self-reform is the second answer to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It is easier to breach a fortress from within" is the thinking basis; "Four Difficulties" reflec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periodicity; From "People's Supervision" to "Self-Reform", from "Two Musts" to "Three Musts", from "Six Provisions" to "Eight Provisions", and from the struggles against the "Three Evils" to "resolutely win the prolonged battle against corrupti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swers has been presented. There is no single and one-size-fits-all answer,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ways to break the historical cycle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e unique problems of the major party".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democratic new road, self-reform, occurrence mechanism

责任编辑:思 齐

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应然、实然与必然

徐佳佳 刘 锋

摘要: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处于应然与实然的张力状态之中。从应然目标来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要以明大德为首要目标,锤炼坚强党性;以守公德为核心目标,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以严私德为基础目标,注重修身律己;以强考核为现实要求,健全德性考核机制。就实然现状而言,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面临永葆初心使命的独有难题,以及重“名利”轻“奉献”、认知偏差化与政德行为失范、政德建设机制尚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为此,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要做到“两个维护”,凝聚政德共识;探索创新方式方法,培养政德心理;坚守人民评判标准,内化政德价值;坚持约束与激励齐抓,健全伦理保障。

关键词: 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31-05

政德建设关乎党的形象和政治生态,关乎政府公信力和社会道德风尚、价值风向,对夯实领导干部个人的从政之基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其核心就是要促使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促进新时代领导干部讲政德立政德养政德提供了实践遵循,也必将为提高全文明程度、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应然目标是什么样的,实然现状又面临怎样的时代境遇,如何破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应然目标与实然现状之间的内在张力矛盾,进而纵深推进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围绕这些问题,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重要论述、中外政德建设比较等多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现有成果对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

的应然目标分析的深度不够,尤其是对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然现状的把握不够全面、精准,以至于对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必然路径的分析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鉴于此,需要在审视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应然与实然张力状态的基础上,遵循应然目标—实然现状—必然路径的逻辑理路,对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进行深层次的、整体性的学理探究。

一、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应然目标

作为政治品质的大德、职业道德的公德、个人品德的私德,“三德”同源、互联共促,共同构成了领导干部政德构造的道德谱图,彰显了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这一新时代政德规范的内在统一。此外,从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目标要求来看,健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视野中延安时期党性修养对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启示”(2021CKS055)。

作者简介:徐佳佳,女,哲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河南郑州 450018)。刘锋,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北京 100124)。

全德性考核机制是引导领导干部崇德向善、修德力行的重要保障。

1.大德为本:以明大德为首要目标,锤炼坚强党性

大德是凸显领导干部理念信念、坚定立场和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德,是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首要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2]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把政德建设问题提升到领导干部信念、立场和党性的高度,对领导干部的政德问题进行了升华式的政治定位。“明大德”具体包括明忠于国家之德、忠于党之德以及忠于人民之德。是否忠诚成为衡量领导干部践行政德规范的首要标准。当前,“明大德”内在地要求领导干部要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入手,锤炼坚强党性,注重发挥党的自我革命的自律效应,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公德为要:以守公德为核心目标,坚守人民至上理念

公德是强化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与执政为民理念的核心价值目标,是调控公共权力运行与规范领导干部用权行为的职业道德。“公德蕴含人民性、公共性、服务性的价值要求。”^[3]“人民性、公共性、服务性”这一公德的内在特性,决定了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必须恪守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党和人民委托的一种公共性权力,必须以服务人民、为民谋幸福为旨归。领导干部是否恪守公德、是否坚守人民至上,直接影响民心向背和党的长期执政。当前,“守公德”本质上要求领导干部不仅从道德内化上做到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切实认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意涵要求与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要从道德外化上勇于担当、勤政务实,用实际行动践行坚守人民至上的理念和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

3.私德为基:以严私德为基础目标,注重修身律己

私德即个人品德,对领导干部而言,其实质上是领导干部个人在日常生活和执政为民实践中的操守与品德,是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基础性目标。习近平强调要严私德,具体指的是领导干部要戒贪止欲、廉洁齐家、克己奉公,进而把人民赋予的公共性权力服务和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优良的道德操守与端正的道德品行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同时,从现实情况来看,家风

不正往往成为部分领导干部滑向腐败堕落泥潭的首要根源。“领导干部作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有义务在家庭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做家庭建设的表率”^[4],夯实严修身、砺人格、强修养的坚实之基。当前,严私德,要求领导干部从生活作风、生活情趣等“小事小节”上入手,注重修身律己与锤炼党性,强化高尚道德情操的塑造与涵育,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堕落的导火索。

4.考核为锚:以强考核为现实要求,健全德性考核机制

实现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目标要求,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德性考核机制的保障作用。明大德、守公德以及严私德三者构成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价值属性与核心要义。衡量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需要坚持政治导向和人民认可等重要原则,借鉴“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经验优势,健全完善多维度研判、多主体评判的考核体制机制。当前,探索德性的量化考核体系,要紧紧围绕明大德、守公德以及严私德的目标要求,从正向引导指标、反向控制指标、荣获激励指标等维度进行建构。此外,在坚持“考核为锚”的同时,要强化德性考核结果的实践运用。“政德考核评价结果主要可用于选拔任用、选先评优、惩戒鞭策。”^[5]从上述关于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及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两个维度入手,必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考核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二、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然现状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问题。习近平围绕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策略,为推动落实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持之以恒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实践探索,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发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视政德建设与实践养成。然而,就当前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现状来看,仍面临着永葆初心使命的独有难题及重名利轻奉献、认知偏差与政德行为失范、政德建设机制尚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上述这些因素加剧了新的赶考路上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时代之困。

1. 面临永葆初心使命的独有难题

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始终做到永葆初心使命,始终保持为党、国家和人民干事创业的良好精神状态,避免由于领导干部自身的德性问题和病症导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政德建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新时代新征程永葆初心使命,迫切需要领导干部依靠人民监督这一“外在良方”进行祛病除疴,更重要的是要讲政德立政德养政德,依靠自我革命这一“内在免疫”,从德性上和思想上强身健体。

2. 面临重名利、轻奉献现象

新时代领导干部肩负新的使命,迫切需要领导干部正确地对待名与利,树立科学的名利观。“领导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是一个党员党性原则的反映,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的折射。”^[6]追求正当、合法、适度的物质利益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必要条件。领导干部要把握好公与私、己与人等各种关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奉献。但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守好欲望之门,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不强,经不住金钱、利益和名誉的诱惑,在实际工作中急功近利、追名逐利。还有的领导干部过度化地追求各种物质利益,不愿意为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做贡献,从而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俗圈套,为民、清廉、奉献等政德精神受到侵蚀,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行为规范格格不入。

3. 面临认知偏差与政德行为失范现象

坚持人民本位观是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根本价值导向。部分领导干部由于理想信念不坚定、初心使命不笃定,出现了认知偏差与政德行为失范现象。一是领导干部在身份定位上受多重属性的影响出现了认知偏差。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兼具政治属性、“经济人”属性、文化属性等。

领导干部面临着兼具多重属性的时代境遇,无疑给坚守“勤务员”这一政治属性和定位带来一定冲击。二是在政治权利与政治责任的关系上出现了认知偏差。部分领导干部过于强调政治权利的享受,滥用公权甚至公权私用,忽略了自身担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这种政德行为失范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部分领导干部割裂了政治权利与政治责任相统一的内在关系,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和期待。三是在思想认知与工作实践的统一关系上出现断裂和偏差。部分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没有将思想认知层面上的人民本位导向真正转化为笃定初心使命、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最终产生了“两面人”与“四风”乱象等问题。

4. 面临政德建设机制尚不健全的困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虽注重政德建设,但由于政德建设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积极性和实效性。一方面,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内容有待细化,教育体系有待健全。现有的政德建设的内容设计主要散见于党政法规与党纪条例中,多数停留在原则性、宏观性的政策口号上,有待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具体目标要求角度,细化政德建设内容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明确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遵循的具体道德准则与行为风尚,形成政德养成的明确导向与行为规范,切实解决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怎么建”及政德建设考评工作“评什么”等前提性问题。另一方面,考核评价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实况的机制和方法有待完善。考评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实况要着力解决好“怎么评”“谁来评”“怎样用”等问题。在考核评价的实施过程中,现有的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考核工作主要在纪委(监委)、巡视和组织等部门工作中开展,但多是对权力失范、严重失德的人员进行查处,常态化、专项化、制度化的政德建设考核工作体系有待建立健全。现有考核评价的主体主要是上级部门或本单位,相对缺乏第三方独立的评估机构的监督,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有待增强。政德建设考核评价结果“怎么用”的问题还有待细化探索,进而真正发挥考核评价在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中的“风向标”作用。

三、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必然路径

新形势下要破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应然目标与实然现状之间的张力矛盾,就要引导领导干部做到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统一政德共识;要不断探索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培养政德心理;坚守人民评判标准,内化政德价值;坚持约束与激励齐抓,健全伦理保障。这些举措必将为克服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困境,促进领导干部政德养成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1. 做到“两个维护”,凝聚政德共识

从凝聚政德共识方面入手,筑牢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思想基石。一是引导领导干部强化思想武装,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7],也是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首要大德。当前,领导干部要扎实学懂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并从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树牢“四个意识”的政治高度立政德,强化执政为民的政治责任和担当,保持为政以德的强大政治定力,这是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障。二是积极弘扬并践行新时代的政德观,最大化凝聚政德共识。在遵循政德教育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从弘扬并涵育大德、公德和私德三个维度入手,整体性推动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常态化科学化。同时,新形势下要大力推动政德制度化建设,把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结合起来,着力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和政德考核力度,引导领导干部自律自省、慎独慎微,净化自身的生活圈、社交圈,把内在修德与外在行德有机结合起来,切实筑牢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培育求真务实、公正廉洁的为政品格。

2. 探索创新方式方法,培养政德心理

从政德认知、政德情感、政德意志三维视角,探索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培养领导干部的政德心理。一是开启政德认知。当前,要结合党的二十大的相关精神加强政德宣传教育,自上而下地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坚持多措并举,加强整体部署,健全并创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集中系统学习宣传新时代政德观的制度;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平台激活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科技支撑,加强开展政德建设宣传力度,引导领导干部形成政德记忆、理解政德意义,从而开启政德认知。二是体验政德情感。通过实践教学、以案促改、道德模范引领示范等直观方法,促使领导干部在政德建设实践中形成直觉、想象,体验道德情感。通过体验政德情感,使领导干部的正义感得到增强,引导领导干部追求正义;使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得到增强,厚植领导干部爱民情怀;使

领导干部的谨慎感得到增强,鞭策领导干部慎独慎微慎欲;使领导干部的敬畏感得到增强,促使领导干部始终做到心中有戒;使领导干部的荣誉感得到增强,促使领导干部能够秉持党兴我荣、国强我荣、民富我荣的观念。三是培育政德意志。培育政德意志固然可以依靠加强教育、培训以及法规、制度的约束等“外”治的方略,但更重要的是“‘内’修即个人加强学习,注重自省,躬身实践”^[8]。当前,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君子型人格,采用费曼记忆法不断深化道德认知,形成思维信念,引导领导干部自觉地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责任内化为强烈的责任感,在循序渐进中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道德意志。

3. 坚守人民评判标准,内化政德价值

从确立评价标准和涵育政德价值两个层面,为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提供可行方略。一是坚守人民立场,科学评判政德建设成效。坚守人民立场是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核心所在,也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逻辑源头与实践指归。人民群众是否认可和满意是评判政德建设实况的最高标准。无论是明大德、严私德,还是守公德,这些政德观的涵育与养成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起点的。其中,“领导干部守公德的指向性对象就是人民群众,这是其履行职能的原始立脚点”^[9]。坚守人民评判标准,由人民群众评判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实况,必将显著提高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科学化水平。二是笃定初心使命,涵育政德价值。初心和使命是政德建设的灵魂所在,内在地规定着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任务指向。其中,筑牢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核心要义,严明政治规矩和纪律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政治保障,加强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要求。坚守初心使命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遵循和不懈追求。推动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初衷和目标实质上就是促进领导干部笃定初心,明大德;激发领导干部勇担使命,守公德;引导领导干部砥砺品格,严私德。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引导领导干部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德选择,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作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遵循,从而进一步把新时代政德观的价值意涵转化为领导干部为政以德的生动实践。

4. 坚持约束与激励齐抓,健全伦理保障

从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双重维度入手,不断健

全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伦理保障。一是完善约束与鞭策机制。从强化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力度出发,坚决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同时把依法治吏、依规治吏和以德治吏有机结合起来,将严的主基调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推动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法制化,鞭策领导干部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切实做到严以用权、修身立德。二是健全考评体系与激励机制。从量化层面构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要着力解决“评什么”“谁来评”“怎么用”的问题。从健全考评与激励的内容指向来看,要着力从“四个意识”和理想信念状况来衡量领导干部明大德的具体实况,主要包括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方面的实况,还包括党内政治生活层面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和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等方面的实况。从党性修养和为政品德状况来衡量领导干部守公德的具体实况,主要包括宗旨使命意识、践行群众路线、依法行政与履职尽责等方面的实况。从个人修养和家风家教状况来衡量领导干部严私德的具体实况,主要包括知行品格、审美旨趣、道德情操、家庭风气建设等方面的实况。同时,从健全考评与激励的主体选择来看,要从构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工作新格局的高度,坚持多元力量协同推进的理念,着力构建由组织部门、所在单位、干部本人、媒体代表以及独立的评估机构在内的多元化考评主体,搭建领导干部政德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工作联动机制,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提供机制保障。此外,从健全考评与激励的结果运用来看,“要通过对监督考评结果的

科学运用,使党政干部道德行为主体得到实际利益补偿并享有相应的荣誉”^[10]。具体来讲,实施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考核评价体系重在评准评实,要强化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考核的监督力度,并着力增加政德在干部提拔任用、选先评优以及惩戒鞭策中的量化权重,从而最大化激励领导干部讲政德、立政德、养政德。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4.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42.
- [3] 黄建跃. 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探索, 2022(5): 1-13.
- [4] 曹洪滔, 张倩. 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与价值[J]. 理论导刊, 2020(4): 4-10.
- [5] 吴大兵. 基层领导干部政德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思路[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9(4): 38-42.
- [6] 张启元.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J]. 共产党员, 2018(11): 32-33.
- [7] 朱昔群. “两个维护”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N]. 经济日报, 2019-03-19(12).
- [8] 刘军汉. 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基本遵循: 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重要论述[J]. 学习论坛, 2019(10): 27-31.
- [9] 林意章, 孙阳阳. 习近平政德观的理论出场、发展历程及价值维度[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21(6): 26-32.
- [10] 周四选. 新时代党政干部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 中州学刊, 2019(10): 19-24.

The Necessity, Rea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Political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Xu Jiajia Liu Fe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 among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is in a state of tension between necessity and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cessity goal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for leading cadres should prioritize the cultivation of great virtues and cultivate strong Party spirit;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with the core goal of upholding public morality; take strict personal ethics as the basic goal, emphasizing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make strong assessment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moral assessment. As far as the reality is concerne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for leading cadres currently faces unique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their original mission, as well as multiple dilemmas such as valuing “fame and fortune” over “dedication”, cognitive bias and misconduct in political ethics behavior, and the imperfect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ethic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n the new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for leading cadres should achieve the “two maintenances” and gather consensus on political ethics; explore innovative methods and cultivate political ethics psychology; adhere to the people’s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internalize the value of political ethics; adhere to both constraints and incentives, and improve ethical protection.

Key words: leading cadres;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 fully and strictly administer the Party

责任编辑: 思 齐

长三角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历史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策略

高丽娜 蒋伏心

摘要: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区域开放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需要更高的、持续的自主开放能力提升。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处于规模偏好向质量提升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已初步具备区域竞争新优势、双向开放格局与更主动的制度供给生态,构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基础。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长三角对外开放格局的重构应以主体协同型主动开放、多维联动型系统开放、创新引领型自主开放为导向,在驱动力、激励体系、创新生态等方面积极行动,为更高水平的自主开放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 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历史逻辑;现实基础;行动策略;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36-07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1],将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的战略抉择^[2]。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以自主开放能力提升为驱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和国际环境不稳定性的叠加导致经济不确定性剧增。我国作为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国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必须深入思考,顺应历史逻辑,应对内外部发展条件与环境变迁,加速推进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三角要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作为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产生极强的区域带动和示范效应。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承担着率先建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是我国今后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和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先导区^[3],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性是其应有之义。提升区域自主开放能力是长三角区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支撑、引领与示范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的相关数据,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开放的经济区域之一,2020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约占全国的41.4%、28.4%,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优势日渐稳固;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全社会研发强度达2.8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和每亿元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专利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内消费升级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20BJY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群协同创新系统绩效评价研究”(71603133)。

作者简介:高丽娜,女,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蒋伏心,男,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授权数分别为 27 和 116 件,但在创新成果的结构与质量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当今世界处于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科技革命加速与区域发展转型升级的交汇期,只有实现高水平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才能更有力牵引区域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出发,立足比较优势转换,以强化自主开放能力为突破口,必须紧扣新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与开放体系的耦合优势,准确把握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重塑长三角高水平开放系统。

一、高水平开放必然由自主开放驱动的历史逻辑

在发展阶段转换的时代背景下,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其实质是重塑对内、对外空间经济关联网络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高水平开放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符合我国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历史逻辑,也是国际市场外部环境加速变化使然。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载体或结果,标志着发展动能、路径转换带来的分工与竞争范式转变。区域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差异化开放模式在空间与功能层面协同演进的结果,厘清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属性与现实逻辑,关系到我国中长期开放与发展全局,还需进一步阐明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4]。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主体性、主动性与内生性。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切换^[5],全球创新分工网络更加多元化与多样化,在构筑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6]的背景下,必将重新界定国家或区域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的位置。从区域层面来看,对外发展格局无疑是前期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耦合演进的结果。基于唯物史观,新一轮区域开放模式的选择、发展过程乃至新开放格局的重塑,是既定社会条件的历史生成过程^[7],即开放格局重构的过程必然是承接与革新并行的过程。因此,充分厘清发展格局重构提出的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要求,锚定新目标,才能准确制定高水

平开放新路径。

2. 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自主开放能力的提升

自主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遵循,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道路的本质性规定。缺失“自主”之魂的开放往往是低层次的、难以持续的,更无法实现高水平发展。

自主开放是具有深刻时空内涵的主动选择。一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自主”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自主能力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是循序渐进的重塑过程,无论是开放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开放形式等,都要依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及约束条件不断调整。在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时,受到资本、核心技术、品牌等稀缺要素的制约,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8]。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低水平发展均衡逐渐被打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逐渐形成深度嵌入国际循环的正反馈机制,也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耦合产生了超大市场效率与弹性叠加优势。我国企业、区域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但未能同步构建、发展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对国外技术、市场等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一直未能彻底打破产业技术的低端锁定局面,这是我国自主开放能力相对滞后的结果。二是“自主”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我国坚持对区域对外开放模式的动态调整与革新,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提高发展能力,构成开放发展的生命力之源。伴随区域综合实力提升,出口导向的国际循环动能日显乏力,出口带动效应持续弱化,出口导向型经济扩张过程已结束^[9],进入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阶段。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重构生产过程,将重塑全球产业链的底层逻辑,由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主导力结构调整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发展动能转换带来的作用路径演进使长三角开放发展的动力机制面临深刻调整。经过多年的开放发展,区域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系统,必须深入思考新发展格局演进过程中内外循环高效联动的路径。

3. 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处在规模偏好转向质量提升的重要历史节点

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作为开放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区域,面对资源配置方式持续重构的内在要求,亟须深入探讨高水平开放的实现路径。从贸易主体看,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相关年份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长三角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8.28%提高至2006年63.35%的高点,随后开始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38.67%;从贸易形式看,加工贸易尤其是来料加工贸易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长三角加工贸易出口额占长三角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5.93%提高至2005年51.69%的最高点,随后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24.5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融入全球产业链方式的动态演进特征。我国区域对外开放虽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但并未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位势的跃迁,短板在于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产业链可控能力有待提升,这同时也制约着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升。“对外贸易偏好”^[10]是国内资源配置效率与区际联动性不高的结果,加深了区域产业链的“分割”程度,更多呈现为全球产业链上的区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开放层次的提升。进入新发展阶段,只有实现全球化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换,真正转变区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式与路径,才能加速外部循环主导开放模式的转型。具体而言,需要辩证认识自主开放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推动长三角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的动力机制,突破对原有开放模式的路径依赖,探索双循环互促发展的“长三角方案”。

二、新阶段长三角开放型经济转型的现实基础

在新一轮开放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在深化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同时,不断强化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叠加优势,为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开放模式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1. 长三角区域竞争优势转换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在规模、结构与创新等不同维度的新区域竞争优势框架逐步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层次不断提升,在重构对外发展结构与层次的同时,也增强了区域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从规模角度看,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重心区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实现GDP27.6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24.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5万元,比全国3.51万元的平均水平高约52.3%;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居全国第一。经过多年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践,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机制、市场规则等的协调性增强,多样化、多元化市场主体基础数据

平台构建为信息共享提供基础,长三角区域要素、经济活动等的高水平统一市场建设不断推进,本地市场规模优势日益凸显,不断强化长三角集聚要素与经济活动的正反馈机制,为新一轮区域开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结构角度看,一是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新兴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共同发布的《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2021》显示,2020年长三角区域高技术产业利润2885.6亿元,占全国的约3/10;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服务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2、1/3;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35.1%。二是发展的空间协调性日益增强。根据相关省市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长三角区域城市人均GDP变异系数为0.406,2010年为0.702,同期广东省城市人均GDP变异系数2020年为0.545,2010年为0.699;2020年长三角城市人均GDP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82,2010年这一比值则为19.90,而广东省2020年与2010年最高与最低的城市人均GDP之比分别为5.14和6.92,长三角的空间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三是发展质量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间、省域经济内、市域经济内发展的多样性、多层次特征较为显著,既为产业调整拓展了弹性空间,也增加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层次性、多元性特征。

从创新角度看,长三角作为我国重要的科创高地,创新资源禀赋与协同创新优势明显。一是创新要素优势不断累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长三角R&D投入强度为2.8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三成,每万常住人口R&D人员数为95人,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领军型科学家规模优势不断积累,高被引科学家达237人次,占全国的27%;集聚了全国约1/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高新区为代表的创新平台体系日益完善,上海张江、合肥国家级综合性创新中心的建设强化了区域前沿性基础研究优势。二是区域深化创新协同。长三角区域创新基础设施共享共用工程推进多年,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等联动政策顺利推进,叠加G60科创走廊等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创新成果共用、创新扩散注入催化剂。通过不断完善人才流动配套政策,逐步扭转人力资本空间、组织间错配局面,为成本驱动型开放向创新引领型开放转变奠基。

2. 长三角区域双向开放格局基本确立

近年来,长三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区域对外开

放格局不断演进,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从对外开放的空间取向上看,长三角对外经济合作伙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日益向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双支撑”局面转变。长三角区域在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政策、经济和地理优势^[11],在贸易、投资等方面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公布的数据,2020年,长三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达1.98万亿元,约占长三角出口总额的28.5%,占全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额的36.5%,且年均增速十分明显;对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占比由2000年的63.01%下降到2020年的47.35%左右。二是对外开放的“进”“出”协调方面,2021年长三角吸引外商投资890亿美元,新增对外中方投资额361亿美元,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之比约为2.47:1,2012年这一比值则为5.96:1,充分表明区域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全方位、双向开放格局日益稳固。三是从国内视角来看,长三角在全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版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长三角区域更主动的制度供给生态日渐完善

长三角开放经济发展服从于全国推进对外开放顶层设计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与区位优势,已成为全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长三角各级政府根据内外条件与环境变化,实现政策动态优化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积极探索契合发展阶段转换现实需求的区域治理体系。这种由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的制度供给优势以及其空间联动机制强化构成的主动型制度供给生态,既是前一轮对外开放发展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构成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关键体制保障。

一方面,区域相关政策设计由国际循环导向转向公平导向。前一轮对外开放,受限于资本与技术等稀缺要素,形成对外部要素市场的巨大需求及非对称式收益分配,建立了由国际循环主导的政策激励体系。为吸引外资进入,各级地方政府争相制定、实施了诸多带有较强横向竞争性的激励政策,逐步形成不同程度的外资型市场主体“超国民”待遇治理机制,被动适应和追随国际经贸潮流和国际经贸体制^[12],实现了外资进入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但经济增速变化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9],在实现区域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对外开放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由低成本产生的“锁定效应”使开放模式具有

了较强的路径依赖。与此同时,外资进入选择的空
间异质性成为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重要动因。以江苏省为例,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苏南、苏北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之比2000年分别为11.6:1以及23.38:1,区域开放经济发展差异成为影响江苏省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并日渐形成对原有发展模式的依赖。通过相关区域政策的有意识引导与激励,长三角空间协调性发展取得较好成效,2020年苏南、苏北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之比分别下降为3.11:1与11.48:1。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同区域、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推动了对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各类市场主体塑造了“一视同仁”的竞争环境,从而构造了经济与非经济要素参与高质量转型的“正反馈机制”^[13],加速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另一方面,从制度协同性来看,长三角区域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协同、产业政策协同等推进政策协同水平不断提高,持续释放一体化发展的政策红利。长三角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加速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开放平台,推动规则、标准、管理等制度层面开放水平的提升,促进更公平的多元市场主体竞争环境日益优化,更高水平、更主动开放的意识与生态日渐形成,在不断提升开放层次的同时,重塑区域开放竞争新优势。

三、长三角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重构方向与行动策略

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由要素、产业联动转向系统化协同。提升发展格局重构与发展模式演进的适配性,既要清楚开放发展模式演进是驱动发展格局重构的根本性力量,也应充分认识到适时的发展格局调整是加速发展模式转变的内在机制,这是制定相关政策与行动策略的重要遵循,有利于驱动长三角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1. 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开放新格局的重构方向

区域发展模式的演进方向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发展新格局的特性,围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要强化“以我为主”理念对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联动性与自主性。

第一,主体协同型主动开放。培育不同主体的开放自主性,关键在于激发不同区域、差异化主体自

主创新意识,构筑实现内生增长的底层逻辑。自主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是驱动市场主体主动开放的有力保障,可以有效破解创新要素配置的时空不对称问题,这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相关政策发挥作用的基本着力点。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扩散规律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创新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具有其独特属性,因此主体行为协同的实现十分关键。行为经济学认为,公平偏好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市场主体主动协同型开放,在较大程度上需要公平竞争环境的保障,不同规模、部门、所有制类型等差异化主体享有统一、公平的政策,这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能动性、实现良性竞争的环境底色,也是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第二,多维联动型系统开放。从时间维度来看,经济发展过程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面对差异化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及外部环境等,其发展模式应不断适应阶段特征动态变化。从内外联动关系视角来看,开放模式的演进与前一轮对外开放模式与结果间存在紧密的承接关系,前一轮对外开放奠定了长三角在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发展的起点,设立了约束条件;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是在新起点上,考量内外部条件与环境变化基础上实现的系统演进过程。从空间维度来看,在长三角前一轮开放发展中,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是首要目标,空间开放时序上的渐进式、过渡性制度安排成为影响对外开放格局演进的重要因素,不仅表现在长三角区域内,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不同类型区域的开放时点、推进模式等上都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效率优先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使长三角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成为国内竞争力较强的三大重心区域之一,达成了开放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但区域发展失衡、发展质量不高问题也相伴而生。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将产业链布局环节转向内循环^[14],强调不同产业发展的区际联动性。从政策维度来看,不同区域、部门政策的制定、实施尚未实现高效联动,如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不够^[15],难以有效发挥政策合力。

第三,创新引领型自主开放。“创新是第一动力”,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自主开放,因此,外循环重在推进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16]。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高质量的对外发展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基础,这是长三角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根本动

力。技术进步方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跨国传递效应^[17]紧密相关,我国技术进步方向长期难以匹配区域要素禀赋特征。随着我国与国外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技术引进成本逐渐大于自主研发成本,叠加外部环境变动加速带来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必须更多依赖于自主研发,进而持续修正原先偏离自身要素禀赋的技术进步方向,由资本偏向性转变为劳动偏向性^[18]。因此,长三角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推动国际竞争优势由成本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关键在于国内创新链的完善与升级,从根本上转变外源式技术创新主导模式,提升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度,“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19],真正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2. 长三角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行动策略

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动力。打破原有对外开放模式的惯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多维度、不同领域的协同行动。围绕创新引领自主开放能力的提高,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体系的“长三角样本”,应从驱动力、激励体系、生态构建等方面完善行动策略。

第一,进一步完善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制度环境。新发展阶段,现代化战略目标决定了速度型赶超要让位于效率和质量型赶超^[10],长三角区域在注重增量维度的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应重视存量维度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一方面,伴随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条件日益完善,政府作用发挥的领域、方式等也不断变化,这是一个动态化、持续化的过程,需要突破对原有对外开放模式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治理框架匹配新发展阶段的需求,注重实现多领域、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互动。地方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要从直接干预区域经济活动向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转变,采用助推式的政策逻辑促进差异化区域、多元化主体实现创造性合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政策联动性,实现“建设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为具有行业、区域、所有制、规模等异质性特征的市场主体提供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公平竞争环境,激发创造性合作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改革,保障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完善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减少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干预,逐步实现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

破除不利于创新分工与合作展开的人事管理、户籍制度、分配等体制障碍,促进创新要素区域配置效率的提升;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创新供需匹配度,加速创新扩散;优化区域创新生态,面向产业链而非地区,进一步打破创新生产及其产业化过程中的“本地化”偏好带来的桎梏,充分释放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红利,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引入与本区域产业创新相匹配的创新成果,提高开放发展质量与水平。

第二,完善有组织创新与自主创新协同发展的激励体系,共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提升长三角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需要在创新驱动基础上培育核心技术的竞争性优势^[20]。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本、产业配套、现代化交通通信网络等不断优化带来的动态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要素聚合能力。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创新需求存在异质性,长三角区域市场主体与国外技术差距不断缩小,驱动创新方式由外部引进逐渐向自主创新转变。但由于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存在黏滞现象,打破路径依赖受到内、外部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转变过程往往是非线性的。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异质性主体创新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十分关键。创新激励政策实施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精准性,激励机制的设计一定要遵循分类、分层次的基本原则,注重结构层面的调整与优化,发挥政策高效引导作用。在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基础研究、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市场机制失灵现象较为普遍,要充分发挥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优势,推动有组织创新活动的协同开展,充分发挥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协同效应;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要充分保障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激励市场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日益接近世界前沿的整体背景下,基础研究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从国际经验看,基础研究的突破是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通过其成果转化不断催生新产业生态系统。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其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较于主要沿海省市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我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基础研究经费占其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4.53%,远低于京津冀地区的12.28%,以及全国平均值6.01%。人力资本空间、组织间配置的失衡会加

剧要素供需不对称局面。因此,建立基础研究导向的区域创新激励政策需要强有力的、能与上海创新能力实现对接的、多中心的创新网络系统,这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并取得对外开放主导权的必要举措。长三角区域已具备多创新中心支撑基础,要积极争取国家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装置在长三角的进一步布局,培育建设各类国家级创新载体,聚力打造世界级科技中心。

第三,优化创新要素共生生态。区域创新系统是复杂的,异质性主体联结模式的社会化特征和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促成竞合机制及学习机制的动态协同演化,从而集成创新要素,重构区域合作架构。长三角区域已集聚相当规模的创新要素,新的发展阶段需着力强化功能协同,完善共生型创新生态系统,这是企业、区域乃至国家形成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从空间层面来看,长三角要进一步发挥各类国家级、省级等高新区、经开区创新要素、创新活动集聚的空间载体功能,打破行政区经济利益最大化引致的刚性约束,鼓励共性技术与新兴产业孵化的融合创新,促成区际、组织间的创新联动,推动面向产业链、创新链的优化与升级。从创新平台层面来看,长三角要进一步提升基础性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集成能力,加快建设科技资源服务共同体,强化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研究成果研发与输出的“池”功能。

高水平创新要素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区域一体化创新生态形成的基础,其中高效的人才市场建设是关键。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区域创新分工与合作过程中最活跃的微观主体。长三角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人才高地,规模优势渐显,但结构性错配仍是较长时期以来制约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发展阶段,需进一步关注人才的层次性、流动性与匹配度问题,加快建设一批重大人才创新创业载体,打造区域人才一体化网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支撑高水平开放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制度层面,完善基于人才分类的多维度评价体系,构筑包容性、开放性的多样化人才成长环境,实现“流量”扩容与“存量”优化的协同。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环保等投入水平,推动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均等化发展,逐步缩小区际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为创新要素流动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流动提供坚实基础,助力要素市场真正实现一体化。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往往具有较强的路径

“惯性”,任何转变都难以一蹴而就,往往是在前一轮发展形成的新起点上实现转换升级。目前,长三角开放型经济发展处于阶段转换的关键节点,既具备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现实基础,又面临诸多内外挑战,探寻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路径,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问题。在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前提下,要注重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互动,解决动力机制问题。只有真正实现创新引领开放发展,才能驱动高水平外向型经济发展,在自主开放能力的提升中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要瞄准高水平开放,不断优化行动策略,以长三角“高水平自强自立”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求索,2021(1):108-115.
[2]任保平.构建新格局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N].经济参考报,2020-10-20(A7).
[3]蒋伏心,高丽娜.打造长三角多中心创新网络系统[J].群众,2019(20):14-15.
[4]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1(4):4-23.
[5]杨丹辉.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N].光明日报,2020-11-05(15).
[6]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J].管理世界,2021(1):1-18.

[7]韩震.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与理论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04-113.
[8]方兴起.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2):68-74.
[9]刘世锦.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86.
[10]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8):20-36.
[11]刘洪愧.长三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建议[J].经济体制改革,2021(5):55-60.
[12]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8(2):4-19.
[13]张平.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变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进机制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20(10):37-49.
[14]洪银兴,李文辉.基于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1):119-125.
[15]张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J].经济学动态,2020(5):15-27.
[16]洪银兴,杨玉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J].经济学家,2021(3):5-14.
[17]王林辉,杨博,董直庆.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和不同传递路径异质性效应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4):82-100.
[18]郑江淮,荆晶.技术差距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的变迁[J].经济研究,2021(7):24-40.
[1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20]洪银兴.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新发展格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1):7-11.

Historical Logic,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Action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 Level Open Patter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Gao Lina Jiang Fuxin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regional opening system, and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will inevitably require higher and sustained independent opening capacity.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s at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cale preference to quality improvement. It has initially possessed new advantages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a two-way opening pattern and a more active ecology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which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a new round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At a higher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pening up patter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initiative opening up of 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system opening up of multi-dimensional linkage, and the innovation-led independent opening up.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actively take action in driving forces, incentive systems, innovation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 higher level of independent opening up.

Key words: a new pattern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historical logic; realistic foundation; action strategy; Yangtze River Delta

责任编辑:刘 一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钱正元 秦兴方

摘要: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既关系人民福祉,也关乎民族未来,是“国之大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城乡生态融合发展遵循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从中国发展实际考量,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城乡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因此,需要在城乡“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融合发展的绿色框架之下研究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实践向度,以“生态”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领域的绿色化转向。

关键词: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解读;以人民为中心;实践向度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43-06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迈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长久以来我国城乡居民“非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全域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由此引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始终未能系统性化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三农”的发展为代价,困囿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政策倾斜,传统乡村的产业根基、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都默默承载着源于城市快速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加速凋敝的乡村衰变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不可避免地沦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洼地”。因此,推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成为实现城乡地域空间共生共荣、城乡社会经济共建共享、城乡生态环境共治共管的重要抓手。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这是一份为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撑的标志性文件。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既是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所要追求的关键目标,也是实现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彰显了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主张。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乡环保一体化或者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而是以“生态”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纽带,促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领域的绿色化转向,使“绿色驱动”成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切地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强烈渴望与生活诉求,因而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愈加突显。鉴于此,文章尝试从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实践向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新命题。

收稿日期: 2023-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嵌入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制度创新研究”(17AJL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本循环视域下中国区域不平衡地理演化特征、形成机制及模式重构研究”(20YJCZH080)。

作者简介: 钱正元,男,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江苏扬州 225009)。秦兴方,男,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 225009)。

一、理论基础：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因素,由经济二元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是体制性、全面性的城乡二元对立。尽管如此,中国城乡生态关系的历史演变也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马克思、恩格斯对消灭城乡对立、推进城乡融合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1]618},只有“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1]686}，“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2]，“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3]。由此可见,城乡生态对立是城乡关系对立的现实映照,治标又治本良方在于疏通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

1. 人的二重属性：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纵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议题,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始末的核心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建构起人的二重性学说。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209}即: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地球上千千万万动植物、微生物以及无生命组分一起,构成了数量庞大的生命支持系统,这是人作为自然生物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地球生命系统中唯一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形式,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作用和改变着自然界,给大自然烙上了人类的鲜明印记,这是人作为自然生物的特殊性。需要强调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能动性、创造性的人类活动不可能脱离自然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211}换言之,这种通过人的类意识而自觉存在的类活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类活动是以社会为基础,通过人的类活动使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有机统一。我们不妨基于“哲学三问”考察人的本质:首先,人是什么?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其次,人从何处来?人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最后,人往何处去?人是自然生态人与社会经济人的统一。概言之,人的二重属性表明人是自然生态因素

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内在统一、自然生态本质与社会经济本质的辩证统一。

2. 物质变换理论：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表征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一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史,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发展的历史”^[4]。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普遍存在的物质变换关系。物质变换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科学内核。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概念的重要论述涵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纯粹自然界中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生命成长为基础的新陈代谢过程;二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生产实践为形式的人类劳动过程;三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变换,即是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第二层含义尤为重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许涤新先生曾指出:“马克思的关于劳动过程是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生态体系的意义,具有人类(结成社会的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6]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折射出人类社会历史因素,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背后可以发现隐藏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经济关系。概言之,只有通过人的生产劳动把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纳入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

3. 城乡物质循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7]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物质变换断裂的直接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全球性跨国贸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鉴于研究需要,以下只涉及城乡之

间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统一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城乡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主要存在于城乡居民共生性生态系统(如大气、水、阳光等)以及交互性生态系统(如土壤、岩石、植被等)之中。这两个子系统有效衔接城市与乡村,实现城乡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与信息传递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功能。城乡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主要存在于城乡社会生态系统(如社保、就业、医疗等)以及城乡经济生态系统(如商品、金融、生产流通等)之中。这两个子系统有效链接城市与乡村,实现城乡价值增值、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系统的循环功能。城乡之间物质循环过程(包括生态、经济、社会循环)畅通无阻,是城乡之间物质变换过程能够顺利完成的基本条件。只有把社会经济系统回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基于生态耦合、经济整合、文化融合形成“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简称生态经济系统),并促进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协调优化,才能有效化解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矛盾。概言之,只有建构城乡之间的生态经济系统,才能实现城乡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辩证统一。

4. 城乡生态融合: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

城乡生态对立是因为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淤塞、物质变换断裂。恩格斯曾写道:“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1]409-410}比如这次新冠疫情往往集中在大城市暴发,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过密引致的一系列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顽疾,仅靠城市自身无法根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大城市更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因为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可以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率考量,即使如今的科学技术造出高耸穿云的大楼、隐秘的地下城市,能够让更多人生活在钢铁水泥浇筑的冰冷丛林,但在既定物理空间人口聚集的数量一定有极限,不管是出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理、心理需要,还是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的政治需要,甚至还包括潜在的军事需要,无限膨胀的城市必将迎来规模不经济阶段。基于分工产生的城市与乡村分离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那么,城乡对立导致的一系列

经济、社会、生态问题又该如何化解?这一切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裹挟下的生产方式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奉行经济理性、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国家极力追求经济生产力强盛,却有意偏颇了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剥削工人、城市剥削农村,继而逐渐演变成人类对大自然的剥削。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必然包含城乡生态融合向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物的束缚、人的束缚^[8]。需要构建起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理论,促进生态生产力、经济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生产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辩证统一。

二、价值意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人民性”品格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站稳人民立场”^[9]。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很强烈的价值论意蕴^[10]。只有从“人民性”的维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是为了保障城乡居民的整体利益(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1.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居民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居民生态共富的价值追求,主张以“绿色”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使城乡居民共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成果。狭义层面上讲,共同富裕只涉及经济层面的共享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分配正义等相关议题;广义层面上讲,“生态文明理应纳入共同富裕框架,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11]。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成果和最底线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尚介于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之间,城乡之间各个领域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成为后小康时代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顺次递进,从生态扶贫到生态脱贫再到生态致富、生态共富的赓续发展,党中央在每个历史阶段所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都植根于民之向往。

明显处于现代化建设之“短板”的中国农村应该如何振兴?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是“脱贫攻坚转向

乡村振兴”的关键契合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有其生态型、内生性的发展模式,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区位不佳,但生态资源丰富,相对于城市而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现代化模式必须有别于城市。过去一提到农村的穷困就把问题归因于穷山恶水。其实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所谓“穷山恶水”也就可以转变成尚待开发的“生态红利”,习近平指出:“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12]¹¹²绿水青山能够顺利转变成金山银山,背后一定有“生态需求递增规律”在起作用。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其逆城市化心理逐步得到释放,对绿色食品、乡村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生态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提高,其生态意识逐渐被唤醒,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有机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康养农业等农业新业态遍地开花。概言之,只要城市和农村在生态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可以达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就可以成为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法宝,也是城乡居民共同的生态福祉。

2.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城乡地域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

没有生态的可持续就没有经济的可持续,“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12]⁴⁵。但是,“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3]。“城市中心主义”环保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着城乡地域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单纯从生态视角来重新评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可以说,经济上的辉煌成绩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分派“污染红利”,甚至是城市通过直接向农村低成本、零成本转移大量污染才获得。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也已经从对“物质文化”的渴望升级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将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全力促进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辩证地分析,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新时代以来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党中央一切工作宗旨都是为解决广大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最迫切的民生需求。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呼应城乡环境正义。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从污染转嫁的“避难所”化身为生态治理的“主战场”,这从侧面反映出过去城乡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非正义性。新时代城乡环境正义以价值理性替代工具理性,以生态理性限制经济理性。

至今仍在肆虐西方国家的新冠疫情以及愈演愈烈的欧美新一轮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足以证明:坚持人民性原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绿色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也要看到“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13]。概言之,中国式环境正义是一个真命题,通过城乡生态融合的方式系统性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城乡生态环境问题,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蕴含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

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一方面蕴含着城乡生态共富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主张,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泱泱中国永续发展的价值担当。如果说前者只是涉及当代人的发展权益和环境权益,那么后者就涉及到代际间的发展权益和环境权益,甚至是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益。生态问题无小事,不能继续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绿色发展的信念,源自于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首次向全国人民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14]的伟大号召。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15]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16]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7]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8],并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阐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2]¹。党中央始终站在国家战略的政治高度,整体谋划、全局统筹城乡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进而表现出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粗放式发展导致的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趋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非均衡发展表现出“城市病”和“农村病”共存并发,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愈发频繁。城乡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生态意识的觉醒并迈向全面生态化转型的过程。生态文明批判吸收了农业

文明(乡村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合理内核,是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极具广泛包容性,既不排斥农业文明生态和谐的一面,也不排斥工业文明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一面,并充分利用二者的科学成分与合理因素积极推动人类文明生态转向。概言之,如果无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出现结构性困境;如果没有推进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句空话。迈向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之路,既要谋划好当代人的生态福祉和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保存好美丽中国和锦绣江山。

三、实践向度: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绿色化路径建构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乡村建设行动”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有所不同,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是在城乡融合发展大背景之下提出的,跳出了单纯“为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的狭隘思路,着力建构城乡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式、协调式的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之路。

1. 建构城乡自然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组合成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建筑起地球上跃动的生命共同体。一国疆域内,城市与乡村必然存在于命运与共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城乡自然生态系统依照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非生物物质和能量的生态链进行循环,城乡之间在“生态链”上产生了联系。生物领域的食品安全性、物种多样性,非生物领域的大气、水、土壤等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生态链上的这些节点直接或间接联通着城市与乡村。作为城市的后花园,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和“水缸子”。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为城市筑起一道生态安全的屏障,在气候调节、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即生态环境治理在区域上需要城乡兼顾、统筹谋划。国家政策和财政资金需要进一步向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补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需要重视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和农业生产污染治理,推动“厕所革命”,实施垃圾分类,禁止秸秆焚烧,修复土壤污染等。事实上,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城乡社会经

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强烈扰动,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自动修复的法则。因而,要想根治城乡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从城乡社会经济系统中找药方。

2. 建构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

中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之后,政界、学界、企业界普遍认为需要把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人才、数据等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嵌入到落后的农村地区,从而实现农村外源性动力的内源化,“输血”与“造血”携手推动乡村振兴。要以“生态化”的方式将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嵌入农村经济系统中,实现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在“双循环”中,国内大循环要求城乡之间在“产业链”上形成强大合力,建构城乡产业生态体系。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细分领域,是现代社会劳动高度分工的必然结果,生产劳动是连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桥梁,因而产业链延伸也就把经济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牢牢地链接在一起。从城乡经济高速增长到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表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需要切换到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双轮驱动”。城乡产业生态可以细分为三部分:产城融合、产村融合、三产融合。其中三产融合最能体现城市和农村在产业链上的关联性,城市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加上农村的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打通农业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推动一、二、三产跨界组合,从而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革,最终目的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概言之,城乡经济生态系统融合发展需要加快打通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流通的重要渠道,实现城乡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上的互联互通。同时,需要始终践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才能实现城乡经济建设的全面生态化转型升级。

3. 建构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融合发展的路径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普遍拥向大城市,而走出农村读书的大学生也很少愿意回来建设家乡,核心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政策指引,使得中国城乡之间拥有非均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文化、政治等领域实现了全面的发展,到那时,世外桃源般的田园乡村一定会是很有吸引力的好地方,既可以圆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乡愁梦,也能实现很多农村居民的城市梦。广义层面的社会建设包括了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城乡社会生

态系统的融合发展也需要从“社会链”上找出路,在现代社会,政府、公众、企业、NGO组织是社会链条上的核心成员。而社会治理、生态治理领域,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干,百姓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范式的后遗症。自上而下的治理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如此方能形成“三治融合”并趋向“善治”的最佳社会治理状态。可以说,为了推动城乡社会建设的全面生态化转型,一是需要建设生态型、服务型政府,努力实现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的生态化,大力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工作;二是需要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游、娱等领域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消费)理念;三是需要鼓励和支持以绿色产品、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企业发展,督促污染企业环保整改,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与此同时,需要充分发挥公益性民间组织(NGO)尤其是环保公益性民间组织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概言之,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融合发展需要客观承认城乡之间在空间形态、功能定位等方面具有差别,也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均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权利以及政治参与权,努力实现城乡社会领域包括环境民生在内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4] 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4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208.
 [6] 许涤新.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J].社会科学战线,1983(3):50-58.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8-919.
 [8] 秦兴方,张颖,孙凤娟,等.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中国样式[J].教学与研究,2019(4):30-40.
 [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
 [10] 方世南.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价值论意蕴[J].学习论坛,2017(6):40-44.
 [11] 沈满洪.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J].治理研究,2021(5):5-13.
 [12]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4] 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0.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1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01.
 [1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0.
 [1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7.

The Theoretical Basis,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y

Qian Zhengyuan Qin Xingfang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ople's well-being, but also to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and it is a "great country".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follow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atural ecological essence and socio-economic essence, natural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socio-economic relationship,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natural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socio-economic production. Consider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contains the value pursuit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 the value appeal of urban-rur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valu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green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syste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ake "ecology" as the lin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arxist interpretation; people-centered; practical dimension

责任编辑:刘 一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张立冬 李丹

摘要: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既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也有利于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农地矛盾和纠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上,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较为强烈的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以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要立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在坚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益;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关键词: 农地确权;土地延包;土地流转;政策衔接

中图分类号: F32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49-08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核,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农地制度变革,以及为明晰产权而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下简称“农地确权”)工作,承载着维护农民权益、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等多维目标。推进土地延包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了农户对承包地的物权意识,在已完成农地确权的情况下,需要处理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一方面,这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为积极拓展农村土地确权成果运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农地确权和土地延包都事关农民群体切身利益,做好两者的

衔接有利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农地矛盾和纠纷的化解,进而有效维护农民利益,并有助于基层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的顺利落实。

一、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背景、目标与逻辑

要充分理解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的逻辑,必须厘清农地确权的实施背景和政策目标,以及国家层面已有相关制度安排的政策导向。

(一) 农地确权的实施背景与政策目标

农地确权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与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转变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息息相关,总体思路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和赋权的稳定性。按照这一脉络,可以从以下两个阶段理解农地确权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困的动态性与精准脱贫后低收入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研究”(21BJY242)。

作者简介:张立冬,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04)。李丹,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04)。

的实施背景与政策目标。

1. 第一阶段: 农地还权与“两权分离”(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我国在1952年开始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化,之后先后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到1962年基本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框架。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土地虽然在法律名义上被界定为农民集体所有,但是为贯彻执行国家的计划指令,由人民公社组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并决定农地种什么、种多少、上缴多少等具体事项。可以说,除了范围极小的自留地,农民几乎不具有产权实施的自主选择空间^[1]。然而,由于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存在无法有效实现劳动监督和计量的先天性困难,当勤劳的社员无法通过自由退社来保护自己利益时,便会采取“磨洋工”“搭便车”等偷懒行为,这类行为的存在损害了农业生产效率。

为了解决农业劳动者的激励问题,在部分地区农民的实践和争取下,我国逐步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因此它包含了农地制度安排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两个层次的内涵。对于前者,农地虽然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农地的经营权属于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对于后者,农户家庭成为经营决策的独立单位,赋予家庭的剩余索取权有效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替代,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通过农地“两权分离”,实现了国家对农民地权在经营权层面的“还权”。

随后,我国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农民对依法承包土地的产权主体地位,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2003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农户作为承包方所享有的各项权益。

2. 第二阶段: 农地确权与“三权分置”(2016年至今)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两权分离”实

现了农户生产性努力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执行,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制度建立之初所具备的小农特征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制约也日益突出。关键内因在于我国人多地少的总体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就是“命根子”的传统意识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集体成员公平获得土地的诉求。外在表现为:一方面,农户层面呈现出农业经营规模小和农地细碎化的特征,这既困扰着土地规模化的进程^[2],也制约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土地均分的理念深入人心,不但承包初期按人(劳)均分土地使用权,而且承包期内时常会因家庭人口变动或政府对部分集体土地实行征收等原因而重新调整承包地。部分研究表明,63.7%的村在第二轮承包时进行过土地调整,34.6%的村在二轮承包之后还进行了土地调整^[3];对闽西北一个乡的调查发现,基本上村集体每隔5—10年都要进行一次小调整或者大调整^[4]。

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及避免承包期内频繁调整承包地以促进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成为近年来我国农地政策的总体取向。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确立了“三权分置”的制度目标,核心是推进农地制度由“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的方向进行改革创新,重点是围绕保护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两个方面确权赋能。首先,不断强化农户承包权的稳定性。临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末,199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其次,不断放活经营权。实施“三权分置”改革从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以保障经营主体的经营预期和相应权益,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优化配置。

在“三权分置”农地制度下,无论是承包权的稳定,还是相关权利的保障,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权利归属,解决“两权分离”制度下农户承包地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等问题,并建立相应的登记管理制度。基于此,我国从2009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点农地确权颁证登记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二）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衔接的政策逻辑

农地确权是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面临着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衔接的问题。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面临的问题,而对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关注较少。已有文献前瞻性地指出了农地确权后面临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与第三轮承包期时点的衔接问题^[5];关注到了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初步探讨了如何妥善处理无地与少地人口带来的人地矛盾^[6];认为做好政策衔接工作,既有助于及时化解“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农地确权所产生和积累的负面效应,还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农地再延包政策^[7]。然而,对于两者具体的政策衔接,尤其是对于农户和基层干部等群体的诉求情况,以及如何回应和解决相关利益群体的期待与诉求问题,尚有待深入调查和研究。

从时间节点来看,全国层面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基本在2018年左右完成,而大部分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在2023—2027年到期,做好两者的衔接工作迫在眉睫。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妥善处理无地和少地人口的利益问题,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问题。对于前者,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政策的实施,农地价值和农地收益逐渐提高,农民对承包地的物权意识不断增强。无地和少地人口的利益诉求既成为少部分农地确权和土地纠纷的难点,也成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需要关注的重点。对于后者,村级土地制度的安排实施取决于多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合力,不同利益相关者都会对农村土地延包的制度安排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已完成农地确权的背景下,只有充分了解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诉求,才能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关键问题,如农地是否调整、如何调整等作出研判,从而为有效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提供决策依据。

从农地确权的效应来看,较为确定的是农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增效应^[8-9];农地确权通过地权稳定性的提高增加了农户的生产性投资^[10-11],而且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就业转移^[12-13]。至于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现有研究所持观点并不统一。早期更多研究认为,由于农地确权降低了流通过程中的交易

费用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14-15]。但近期有不少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作用可能被过高预期,其对土地流转并未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16],反而因强化禀赋效应^[17]、诱导农户不断提高转出农地保留价格^[18]、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19]等,对农地转入具有负向作用,从而降低了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契机,进一步缓解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得到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关注。

从政策导向来看,对于农地确权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工作,总体的政策思路可以从2019年出台的《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看出端倪。首先,该文件肯定了农地确权的重要性,认为农地确权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更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益和落实“长久不变”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在农地确权与土地延包的衔接上,该文件指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但允许“承包地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众普遍要求调地的村组”按照“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进行调整,从而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对于农地确权的成果,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已颁发的土地承包权利证书在新的承包期继续有效且不变不换。最后,该文件提议在新的承包期内继续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而新一轮承包期内因承包方家庭人口增加、缺地少地导致生活困难的,该文件提出通过提高就业技能、提供就业服务和做好社会保障等工作加以解决。

二、农户与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诉求及内在逻辑

对于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工作,国家层面的政策取向是以农地确权为基础,总体上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进行延包,并允许特殊的少部分情况进行小调整。然而,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诉求是什么?诉求的内在逻辑机理是什么?只有深度剖析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相关利益者的现实诉求和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了解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面临的多方影响。这对于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部分利用具有代表性的S省的调研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S省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跨越南北区域的省份,经济实力处于第一方阵,且省内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梯度差异明显,不少研究都认为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20-22],对我国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本文所用数据为2020年采取随机问卷调研方式获得的数据。调研地区涵盖了S省内7个设区市,考虑到农业在S省内3大区域的相对重要性,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北部地区选择了3个设区市,在其他2个区域各选择了2个设区市。在调研对象上,包括农户和基层干部2个群体,同时考虑到村一级层面农户意愿的相似性,我们对每个村的调研样本基本控制在15—20个,通过涵盖更多的乡镇以提高本文调研数据的代表性。本文最终获得的农户层面的调研样本共计312户,其中S省南部、中部和北部的样本数量分别为58份、129份和125份,占比分别为18.59%、41.35%和40.06%;基层干部有效问卷共计245份,其中南部、中部和北部的样本数量分别为71份、78份和96份,占比分别为28.98%、31.84%和39.18%。从样本农户的农地确权情况来看,91.03%的农户已完成土地确权,与到2018年年底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相符合。农地未确权和部分未确权的农户样本占比分别为6.73%和2.24%。

(一) 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诉求

本部分侧重于分析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诉求,重点围绕对延包政策的态度和延包方式的选择两个方面展开。

1. 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总体持支持态度

总体来看,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农地确权后,受访农户对土地延包政策表示完全赞同、不完全赞同和无所谓的比重分别为48.40%、15.71%和35.90%;比较而言,基层干部表示赞同的比重重要明显高于农户群体,有69.39%的基层干部表示完全赞成,较农户群体高出20个百分点。此外,农户群体持不完全赞同态度的占比要低于无所谓态度,而基层干部群体则相反,持不完全赞同态度的占比要略高于无所谓态度。从区域层面来看,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对延包政策的态度基本相同,即三大区域均表现出完全赞同的占比最高,同时经济发展

相对较慢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虽然总体倾向于赞成,但不完全赞同的态度较南部地区更为强烈。

2. 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

调研发现:首先,支持进行调整的群体占主导地位。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支持第二轮农地承包到期后延包时进行调整的占比分别为63.14%和63.27%,两者比例大体相当。其次,适当调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进行调整的主流态度。无论是农户群体还是基层干部群体,选择适当调整的占比都要明显高于村组重新分配土地的占比。整体上,基层干部群体较农户群体更倾向于适当调整的延包方式。最后,延包方式选择的地域性差异较为明显。对比来看,经济发展滞后的北部地区农户群体更加倾向于完全重新分配土地,基层干部则倾向于适当调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户群体愈加倾向于适当调整,基层干部则更加倾向于适当调整乃至不再调整。

此外,为了考察农地确权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包方式选择的影响,我们分析了已确权、部分未确权、未确权三类农户群体对土地延包方式的选择意愿。研究发现,未确权农户群体希望采取重新分配方式的意愿最为强烈,部分未确权的农户群体相对倾向于适当调整。未确权农户群体的强烈调地意愿,主要归因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纠纷,地已被村集体收回,代耕、流转、占耕等原因的纠纷,因家庭新增人员无地且争取不到承包地,以及地块边界纠缠不清等。对于已完成确权的农户而言,虽然选择不再调整的占比(31.34%)明显高于未确权和部分未确权的农户群体,但是总体上仍是调整占据主流意愿,其中选择适当调整的比例最高(33.80%),选择重新分配的比例为29.23%。

(二) 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农地调整诉求的内在逻辑

前文所述,农地确权既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群体对承包权的产权强度,也有利于通过放活农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农地资源。在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间时间间隔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选择不再调整并按照已颁发的土地承包权利证书直接延包更加符合政策预期。然而,前文分析也表明,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农地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农地调整诉求的内在缘由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推进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延包政策衔接十分重要。

1. 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和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

对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时延包方式倾向于调整的农户群体,本文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该群体意愿选择的理由进行了分析。

首先,无论是选择适当调整还是重新分配,家庭人口增减导致的人均土地不公平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以选择适当调整的理由为例,已确权、部分未确权和未确权三类农户群体选择家庭人口增减导致人均土地不公平的占比都最高。自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各地农村人口、土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有出生、有死亡,有婚进、有婚出,有迁入城镇落户等。同时,当前农户群体层面也出现了明显分化,既存在已不再从事农业、不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或已不居住在农村但已确权到土地的承包户家庭,也存在居住在农村且因人口减少而承包较大面积农地的农户家庭,还存在因人口增加而人均承包面积较少且在城市无稳定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群体,这种相对的不平衡必然导致部分农户群体因相对剥夺感而感受到不公平。可见,尽管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承包期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承包地的权益,但农户群体对于集体组织成员权所赋予的公平获得承包地权益的理念仍深入人心,并未随着农地确权以及第二轮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实施而弱化。

其次,在农地确权的维度上,因承包地被集体收回且一直无地成为未确权农户家庭选择适当调整乃至重新分配方式的第二关键原因。伴随着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土地流转价格的提高和可能被征地的预期收益,农户持有农地的收益显著提升。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衔接时间点,无地和少地人口期待通过采取调整的方式获得与村庄其他人员同等的承包权,符合未确权和部分未确权这两部分人群的利益。

最后,本文对其他原因的开放式回答进行了汇总,总体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是农户群体选择适当调整方式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前两轮土地承包期间,为了平衡农户家庭之间在土地诉求上的利益,基层普遍根据土地类型(如水田、旱田等)、质量好差等次和位置不同,在农户间进行细碎化的分配。基于田野调查发现,经过多年的地力改良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土地质量的差异性已经很小,农户家庭越来越希望其所承包的细碎化田块能

够相对集中。因此,该类农户群体都倾向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时通过适当调整将家庭户的分散承包地集中到一起,这样既有利于机械化操作,也更加方便农地流转。

2. 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对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

作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的具体落实者,在顺利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的背景下,逻辑上基层干部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应与前文宏观政策预期相符。然而实际的调研数据分析显示,与农户群体相比,基层干部群体更倾向于选择适当调整的延包方式,需要统筹考虑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稳定等维度的因素,对其选择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

从农业现代化的维度来看,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逻辑更多基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考虑。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实现路径和具体模式上主要包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服务适度规模经营^[23]。农户层面存在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导致基层干部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上普遍面临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上,从农村的具体实践来看,即便农地已完成确权,但是由于农地的不可移动性、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差异性以及部分农户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农地细碎化会导致农地自发流转的“市场失灵”从而限制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24],土地也自然难以有效地实现集中经营。二是在服务适度规模经营上,农户层面土地的细碎化不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它既阻碍了农机服务的采用^[25],也提高了粮食经营规模农户的生产成本^[26]。因此,基层干部群体普遍期望借助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通过农地调整和互换并地等措施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从经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随着取消农业税、落实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也迅速增加。总体来看,当前土地纠纷主要集中在权属纠纷、界址纠纷和无地少地人员的要地诉求。其中,权属纠纷数量最为庞大,主要为农村税费改革前因代耕、口头协议流转等因素引起的纠纷;界址纠纷数量较少,且主要由于历史、土地形状、耕作方式变化等引起;无地少地人员的要地诉求数量居中,不仅包括新增人口,还有复员军人、下岗职工以及当初为逃避农业税费“外挂户口”外出打工而如今户口又迁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当前无地少地人员的要地诉求对于基层干部而言最为关键,而且调研发现很多地区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即无地少地人员对承包地在二轮承包期内不调整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二轮承包到期延包时进行调整也已形成共识。如果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延包时上述土地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诉求得不到满足,基层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信访压力。

三、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的思路与对策

农地确权夯实了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为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坚实保障。推进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应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为根本,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导向,以统筹实现维护农民利益、回应民意诉求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等多维目标。

(一)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的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我国推进“三农”改革行稳致远的关键。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其核心是缓解农户间人均承包土地面积的不平衡状况,解决农户家庭层面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并进一步化解土地矛盾纠纷。这需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既要充分利用“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维护农户合法利益,也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积极作用。

1.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

推进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和方向,因此必须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注重两者衔接的系统性,并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性大,不同区域的农户和基层群体对农地确权背景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诉求也存在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各地根据省情、市情、县情大胆探索和创新。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实现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

2. 统筹维护好承包方和经营方利益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以及农地流转市场

建设,我国农业经营者已从以小农户为主逐步转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并存。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必须统筹维护好农地承包方和经营方的利益。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作为承包方的主体地位和意愿,组织力量依法收回应收回的农地,以“大稳定、小调整”的方式回应农民对于土地公平性的诉求,妥善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涉土矛盾纠纷,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另一方面,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核心是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当前农地经营权的放活和拓展都依赖于土地经营权的稳定,不能因农地承包权的调整而影响农地经营方的利益。

3. 将调整利益的方式作为调整土地的重要补充

如何保障好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问题,是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调研发现农户对承包地的诉求更多关注于流转所带来的租金,这意味着对于土地诉求合理但实在无法实物分配承包地的地区,可以跳出“先找地后分地”的在“地里”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调整利益的方式让无地少地农户获得相应土地所附带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这一“地外”赋权的调整利益方式,既有助于保障无地少地农户的合理权益,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农地调整意愿,有利于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

4.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要利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契机,持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方面,在保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经营权与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有效衔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农户群体对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以实现家庭层面农地集中的诉求,探索农地确权背景下通过农地调整和互换并地等措施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的途径,从而更加便于机械化操作和农田基础设施改善,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二)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的对策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工作,需要在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农地延包方式。加快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以化解人地矛盾、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

益。要充分利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契机,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在治理农地细碎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同步考虑农村集体经济增收。

1. 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

一方面,考虑到我国东中西等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以及各区域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差异,应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建议国家层面设立国家级试点,同时各省也应根据情况有针对性设立省级试点。另一方面,建议各试点成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多层次、多维度试点中“顶层”与“基层”的良性互动,在充分摸清、摸准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地矛盾、土地细碎化和土地纠纷等突出问题,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土地延包政策体系。

2.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政策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做好调查摸底工作。重点是摸清“地”与“人”两方面的情况,其中“地”主要是农户承包地、集体预留地、应收回土地等情况;“人”主要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因特殊情况未享受承包地的农户以及新增人口等情况。其次,做好部分农地的收回工作。对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应享受承包地,但因多种原因未能享受承包地,且长期居住生活在原籍并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户而言,依法收回应收回的土地是依法维护其土地承包权益的重要途径。总体来看,应依法收回的土地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实施前全家户口迁入设区市转为非农户口的承包方,以及承包农户(含五保户)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等两种情形。最后,制定分类延包方式。各地区应结合人地矛盾情况、农地流转情况以及可用于调配的农地情况(包括村集体依法预留的机动地、通过开垦等方式增加的土地,以及依法收回和承包方自愿交回的土地),遵循民主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因地制宜制定土地延包方式。

3. 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工作,关键在于解决好无地少地农户的合理利益诉求,而“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有地分地”主要针对拥有可分配土地资源的集体经济组

织,重点是通过摸清依法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底数,并确定科学的农地调整方案。“无地赋权”主要针对没有可分配土地资源的集体经济组织,其核心是通过给予无地少地农户相应的经济利益或实惠,如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权等,用以替代农户获得实体承包地的经济收益和就业功能,但需要平衡好“赋权”的收益与无地少地农户获得承包地的实际收益。

4. 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立足于农户希望解决家庭层面农地细碎化问题以及基层干部群体希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诉求,建议利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契机积极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其中,“小田变大田”在我国江苏亭湖和灌云、湖北沙洋、安徽怀远等地已有探索,其核心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保证农民承包土地面积不变,通过承包田块置换合并,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一户多块田”合并成为“一户一块田”。功能分区改革是指将全村整合的农田划分为自营区和流转区,其中自营区是由不愿意流转承包地农户组成的集中区域,同步实现农户层面的“一户一块田”和自耕意愿农户的承包地区域集中。流转区是将已流转的土地通过置换方式形成相对集中的区域,由转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此外,还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立公营区,由村集体生产经营,土地主要为各类经营主体不愿意转入的田块,从而在农地流转市场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5. 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过程中,无论是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还是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都依赖于进一步发挥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方的统筹协调功能。建议在稳定农村承包关系和充分保障农民承包权益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农地流转方面的功能,以解决市场化自发流转无法有效破解的农地细碎化难题。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从部分地区的实践探索来看,可以动员农户将属于基本农田性质的承包地逐步转包给村集体,由村集体完成土地整理之后再根据功能分区集中连片分下去。上述“整体倒包”的方式,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基础上发挥了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农地地块位置的功能,既实现了农户层面的“一户一田”,解决了农地细碎化问题,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利于促进农村集

体经济增收。

参考文献

- [1] 罗必良.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J].农业经济问题,2019(1):17-31.
- [2]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10):128-146.
- [3]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1):64-73.
- [4] 朱冬亮.土地延包“30年不变”的再认识[J].农业经济问题,2001(1):37-41.
- [5] 姚志.农地确权后的实施效果考察与衍生问题解密[J].现代经济探讨,2019(7):104-111.
- [6] 刘灵辉,向雨瑄.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保障策略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90-98.
- [7] 张浩.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J].江苏社会科学,2021(5):47-54.
- [8] 张国林,何丽.土地确权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J].改革,2021(3):121-133.
- [9] 李哲,李梦娜.新一轮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吗?——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8):182-190.
- [10] 林文声,王志刚.中国农地确权何以提高农户生产投资?[J].中国软科学,2018(5):91-100.
- [11] 应瑞瑶,何在中,周南,等.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18(3):110-127.
- [12] John Giles, Ren Mu. Village Political Econom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nd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8(2): 521-544.
- [13] 韩家彬,刘淑云.土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来自CHARLS的证据[J].人口与经济,2019(5):41-52.
- [14]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J].管理世界,2016(1):88-98.
- [15] 付江涛,纪月清,胡浩.新一轮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否促进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来自江苏省3县(市、区)的经验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5-113.
- [16] 罗必良,张露.中国农地确权:一个可能被过高预期的政策[J].中国经济问题,2020(5):17-31.
- [17] 胡新艳,杨晓莹,罗锦涛.确权与农地流转:理论分歧与研究启示[J].财贸研究,2016(2):67-74.
- [18] 罗必良,洪炜杰.农地确权与农户要素配置的逻辑[J].农村经济,2020(1):1-7.
- [19] 杨成林,李越.市场化改革与农地流转:一个批判性考察[J].改革与战略,2016(11):116-120.
- [20] 吴康,韦玉春.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区域发展均衡性的测度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8(1):64-74.
- [21] 张庆鹏.江苏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2:1.
- [22] 成春林.江苏金融发展空间差异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1.
- [23] 李海涛,傅琳琳,黄祖辉,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与展望[J].浙江农业学报,2021(1):161-169.
- [24] 王海娟,胡守庚.土地细碎化与土地流转市场的优化路径研究[J].学术研究,2019(7):45-52.
- [25] 纪月清,王许沁,陆五一,等.农业劳动力特征、土地细碎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5):910-916.
- [26] 杨慧莲,李艳,韩旭东,等.土地细碎化增加“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成本了吗?——基于全国776个家庭农场和1166个专业大户的微观调查[J].中国土地科学,2019(4):76-83.

Research on the Policy Connection Between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piration

Zhang Lidong Li Dan

Abstract: Doing well in the policy connection between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contract land extension after the second round expiration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maintaining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farmland confirmation, but also for resolving agricultural land conflicts and disputes during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extension methods of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piration, both farmers and grassroots cadres have strong demands for adjustment, and appropriately adjusted farmland extension methods occupy the mainstream willingnes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demands of farmers and grassroots cadres is different. The demand of farmers 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no land, limited land, and household level land fragmentation, while the demand of grassroots cadres is to promote moderate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and resolve land disputes. To ensure the polic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firm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and and extension of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s expiration, we should base ourselves on the demands of farmers and grassroots cadres, and carry out multi-level pilot projects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interests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lso prepare for the connec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establish a benefit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land division and land empowerment” to safeguard the reasonabl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with less land and no land; reasonably leverag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function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fields into large fields” and functional zoning reform.

Key words: farmland registration; land extension; land fragmentation; policy convergence

责任编辑:澍文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程传兴 廖富洲

摘要: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乡村治理;治理体系;三治融合;实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57-08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和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既存在手段上的差异性,又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自治是社会基础,法治是制度保证,德治是伦理根基。依靠单一的自治或法治或德治,乡村治理必将是一盘散沙。只有不断探索创新“三治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三者功能互补和优化组合,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形成乡村振兴的治理合力,才能充分发挥“1+1+1>3”的乘数效应,真正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一、研究进展及限度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

国学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对乡村振兴展开了深入探讨。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主题,有很多学者对如何有效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 关于乡村治理主体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新时期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不仅要关注农民主体,也要加强对于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以及新乡贤群体的重视,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要体现多元化和协同化^[1]。乡村治理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实践中具体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新乡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种社会组织等多个治理主体。然而,在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之间权责关系不明晰,导致乡村治理出现主体缺位、权力越位和职能错位等现象,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化程度弱和未能形成网络化的治理结构等问题^[2]。对此,学者们认为应该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2022JC38)。

作者简介:程传兴,男,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46),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乡村振兴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河南开封 475001)。廖富洲,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河南郑州 450046),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乡村振兴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河南开封 475001)。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3]。明确多元主体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能定位,明确“乡政”和“村治”的权力边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两委为基础、农民为主体、新型经营主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治理机制^[4]。四川省通过党政统合的多方协同治理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培育发展镇村特色产业,实现了乡村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5]。

(二)关于自治法治德治实现形式的研究

在乡村自治方面,需要乡村筑牢共建共治共享基础,构建村民利益共同体,丰富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方式,增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增强村民自治效果^[6]。在乡村法治方面,要树立法治思维,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法治体系,法治氛围的营造要更加积极和谐^[7]。在乡村德治方面,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根本遵循,激发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德治与法治、善治相结合^[8]。

此外,诸多学者对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构建多元化的数字化平台,以便于村民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保障自身权益,为政府了解民意、发现民情、解决民事提供便捷的方式^[9]。当前,全国已有多种形式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智慧党建、数字政府、农村“雪亮工程”、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村务云和“智慧村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10]。福建省建构的“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在自治、法治、德治的基础上引入政治和智治,强调“政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智治”发挥科技支撑作用^[11]。江苏省以“钉钉”应用为基础,技术赋能“三治融合”构建乡村治理体系,以实现异地村民“虚拟在场”,推动村两委透明运转,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监督,推动先进道德体系构建,促进先进文化扎根基层^[12]。

(三)关于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新时代背景下“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并不是治理形式上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优化整合,协同发力,要求不同治理模式之间优势互补,只有三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13]。要充分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坚持整体性、体系性和协调性的原则,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群众治理观念,完善政社合作共治模式,建立协同激

励机制,以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14]。在“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中要理清村民自治、法治秩序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坚持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结合信息化治理手段,提升“三治融合”的治理效能^[15]。建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多元组织,坚持人民立场,强化治理过程中的人民民主,强化道德习俗的治理效能^[16]。围绕村民自治和公共服务需求,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道德评议会和村民议事会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建设农村法律服务平台,推动村规民约的完善修订,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推动三者实现真正融合^[17]。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乡村治理及“三治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其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缺憾,例如,对“三治融合”方法路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三治融合”的聚合效应、整体效能和有效性的研究,“三治融合”的体制机制设计和载体创新的研究,以及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力提升的对策研究等还比较欠缺,亟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探索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可行性思路及有效措施。

二、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成效与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党和国家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为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各地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也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存在明显的问题和不足,需要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一)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取得成效

近年来,各地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例如,山东省曲阜市的党建引领模式,安徽省宁国市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海南省儋州市的基层矛盾联动调节机制,河北省河间市的乡风文明建设模式,河南省的自治、法治、德治和数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福建省的“五治融合”模式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体上看,各地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根据当地实际,不断创新探索,积极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实现了自治强基、

法治保障、德治教化,协同发力,综合施治,大大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能,推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农民主体地位,以自治增添活力。通过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扩宽民主参与渠道,建立村党支部、村民大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使村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中。

第二,以法治定纷止争,培育乡村法治思维。不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进一步培育村民的法治理念,确保基层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用权,切实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为乡村治理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第三,以德治春风化雨,营造文明乡风氛围。通过开展乡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服务载体作用、制定村规民约等形式,激发群众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持续提升群众道德素养。

同时,在积极推进“三治融合”基础上,各地(如河南)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通过现代化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基层治理与群众需求同频共振,大大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二)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存在问题

1. 一些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不足

乡村治理“三治融合”需要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参与,需要引入社会资源、外部人才,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很多地方的乡村治理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没有充分发挥新乡贤、社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或其他社会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阻碍了多元主体治理效能的发挥,制约着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一些村级党组织存在着党员老龄化、干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组织软弱涣散,工作因循守旧,缺乏沟通协调能力,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影响力、领导力不强,难以胜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任。

2. 自治法治德治的实现形式需要进一步创新

第一,村民自治形式需要创新。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村民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大量乡村人口外出务工给村民自治带来了较大影响。也有些村庄存在村务公开透明度不够或公开内容过于笼统、公开不及时等问题,使得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阻碍和谐

乡村的建设。

第二,乡村法治建设仍然滞后。农民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法治宣传教育氛围不到位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民本身缺乏对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对法律程序了解不足,加上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较少,宣传模式较为单一,法治文化氛围不浓,导致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信访不信法”,遇事“讲人情、讲关系”的思想普遍存在。部分乡村干部也存在法治观念淡薄问题,致使有些地方仍然存在知法犯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等现象。在法治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乡村法治建设严重滞后,乡村法律服务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

第三,乡村德治教化作用不显著。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外出谋生,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旧的乡村秩序不断瓦解,而新的乡村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弱化,农村社会风气缺乏强有力的正确引导,部分农民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产生错位,特别是一些青年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勤劳致富思想、守法经营美德比上一辈都有明显弱化,甚至存在漠视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以及道德滑坡的现象,封建迷信、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厚葬薄养、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不断出现。

第四,乡村治理“三治融合”机制尚未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三治融合”,融合要在区分各治理方式作用范围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不同的功效,实现功能互补,优化治理效能。但实践中重“三治”轻融合的现象普遍存在,更多的是将三者分开而论,强调各自的治理效能,缺乏对“三治融合”创新机制的探索创新。一些地方只强调村民自治,而忽视法治和德治的作用,村庄内部矛盾过度依赖柔性方式解决,较少寻求法律途径,法治在乡村内部运用率较低。

3. 乡村治理效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乡村治理效能首先表现在乡村经济发展成效,但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村地区对如何发展本村经济缺少谋划和思路,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措施不力,发展环境不优,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财力支撑不足,存在无钱办事的问题,导致综合治理水平较低、服务内容和供给方式单一。此外,乡村社会治理还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当前,

城乡差距大、农村民生欠账多、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从而给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三、建立健全县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

解决乡村治理中各种困难和问题,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必须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力。

(一) 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

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是一个完整的工作链,需要县乡村各类治理主体协同行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各类治理主体各行其是,这往往抵消了他们的活动效能,迫切需要通过建构“权能相称、权责一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以化解乡村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效能^[18]。所以,在推进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县乡村三级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责,健全县乡村一体化治理机制。

1. 强化县委统一领导

乡村振兴是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的,必须强化县委对乡村治理的领导,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县委书记要当好前线总指挥,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落实县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统筹乡村振兴各项任务,做好顶层设计,制定规划和实施举措,做好乡村治理所需人、财、物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政策、物质条件和环境。此外,县委还要负责乡村党的建设与干部的培养任用工作,大力推动政府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 深化改革强乡赋能

乡镇党委要加强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加强村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特别是要加强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拔培养。要指导村党组织切实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为村党组织开展乡村治理提供工作条件。

乡镇需要积极依法推进村民自治,从直接参与管理转变为间接地、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引导村民形成常态化的民主参与机制,通过村民自

治促进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乡镇要依法处理好村级事务和干群、邻里矛盾,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并推动法律服务进村入户,对干部群众进行法治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此外,乡镇也要推动文化进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一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增强乡镇服务能力,使其更好地履行乡村治理职责,必须深化政府改革,对乡镇放权赋能。要增加乡镇财力,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要向乡村倾斜,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要求,做到事权与财权相一致,提升乡镇服务农村农民的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的资源下沉到基层,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乡镇政府要创新服务农民的方式,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乡镇政府的部分职能对接到各种社会力量上,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3. 构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多元化组织体系

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是开展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实现“三治融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前提。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好,团结带领全村群众把经济发展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农民教育好,加强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把乡村社会秩序维持好。因此,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重点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建设强有力的党支部需要按照“双强”标准选好配强党支部成员,特别是要选好党支部书记,要打破身份、行业、地域等界限,从乡村干部队伍、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农村改革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基层党组织要注重培育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切实调动它们参与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构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多元化组织体系,推动各组织之间协同运作,将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等整合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为农村实现“三治融合”提供坚实的组织载体。党组织要引领其他村级组织的建设,加强政策和工作能力的培训,注重提高各村级组织成员特别是组织负责人的素质和能力,制定科学的组织章程,规范工作程序,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更

有效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齐心协力解决农村基层内部的利益矛盾,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提高乡村治理成效。

(二)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1.不断完善基层智慧党建体系,提升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科学化水平

加快推动农村“互联网+党建”,使党建工作业务流程化、操作便捷化、交流实时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运用数字化平台督促村干部行为规范化,加强农村基层党员的管理,调动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工作效率。通过数字化平台扩大宣传范围,开展网络教育,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2.提升党支部领导村级治理能力

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方法,完善“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提升村务管理网格化水平。构建“多网合一”的管理体系,将农村的民生服务、经济建设、居住环境等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事情都融入一张网中。实施“三级网格、四级管理”工作办法,实现“治理重心沉下去,治理能力提上来”。实施村级综合服务提升工程,加快推广“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改革模式,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真正做到及时服务、联系群众,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通过网格化的管理让群众充满幸福感、安全感。

四、探索创新“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石,可以规范村民行为、化解基层矛盾,为法治和德治创造安定的社会条件。法治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以其强制力为自治和德治提供支撑。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利用村规民约、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德育平台为自治和法治提供良好的道德基础。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既要有效发挥每一种治理方式的优势,又要弥合各自功能的局限性,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

(一)着力创新“三治融合”的实现形式

1.进一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

第一,激发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首先,通过抓改革促发展激发农民的热情。党支部要挖掘自身

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策略,理清思路,激发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只要产业发展起来了,能够增加村民收入,村民就会关心村里的发展,积极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其次,着重改善民生,凝聚民心,提升为民服务效能。要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切实关心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最后,推动农民民主权利落实,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诉求,真正接受群众监督,以激发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村民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第二,创新村级“微治理”结构。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是包括政府、村民、乡村经济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政府需要加强多元主体塑造,给予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尤其是乡村事务中的抉择机会,引导各类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类村级组织合作共治。要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挥村委会、合作社等的作用,形成“一核引领、多方共治”的格局。

第三,创新村民自治形式。首先,要健全一套村级事务的议事规则,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做到村里的事情由村民商量着办,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治理格局,确保村民民主权利落实到位。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制度,深化拓展“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断深化村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健全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制度,使群众真正参与到决策、管理过程之中。再次,要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进一步完善以村务监督、述职述廉、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让村民的民主权利真正落实到位。最后,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村民自治方式,使村民可以在网上传递信息,表达民意,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有效推动村民网络化参与乡村治理,解决村民“不在场”困境。

2.进一步完善乡村法治的实现形式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健全和完善乡村法治工作的有效形式。首先,乡村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要依法行使职权,依法依规处理事务,用干部的言传身教,营造乡村法治环境。其次,要健全乡村执法监督机制,纠正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等违法现象。最后,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法治方式创新。推进“互联网+法律顾问”建设,联合法律院校和法律服务机构,整合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通过微信

群、法律服务 APP 或自助机终端设备推送典型案例和法律知识,为群众提供业务咨询、在线申请法律援助等服务,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引导群众以正当途径,以法律手段,合理合法解决矛盾纠纷。

3. 进一步创新乡村德治的有效形式

德治是支撑,要实现乡村善治必须强化乡村文化感召力,提升村民道德感知,借助文化和道德力量推动乡村德治工作,重视乡村文化体系构建。

第一,通过思想政治引领,提升乡村德治水平。首先,要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从思想上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其次,要加强乡风文明和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中蕴含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尤其是乡村社会中熟人间的道德规范的积极作用。政府和村级组织可以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制定道德规范,组织起草和修订村民道德公约,让群众广泛参与道德建设,使乡村治理中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章可依,并通过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组织有效发挥乡间舆论作用,从而构建乡村新型道德体系。最后,要发挥德治的正向引领作用。通过民主评议票选道德模范,树立道德榜样,引导村民向善向好。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德治方式创新。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三会一课”等意识形态活动,打造红色资源线上研学平台,切实提升乡村宣传教育的效果。以图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具象地呈现我国传统文化之美,为强化乡村文化认同提供载体,助力文化保护与传承,增强乡村文化吸引力。

(二) 加快“三治融合”的载体平台建设

在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加快推进“三治融合”的载体和平台建设,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的相互嵌入,以更好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1. 打造“三治融合”的载体平台

第一,制定一个体现自治法治德治精神的村规民约,形成村民共同行为准则。村规民约对于规范群众行为、提升村民现代文明程度、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党群干群和邻里关系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村规民约由集体协商制定、村民群众监督落实,促使村民行为规范化、乡风家风文明化。同时,要综合运用物质奖惩、道德约束等手段保障村规民约切实落实,使其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党支部应以各村实际为基础,主导制定体现自治法治德治要求的村规民约,以规范村民的行为,维护

村民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府应该对村规民约的起草、审核和修订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有效维护村民权益,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从而把自治、德治融入法治之中。

第二,健全一套以自治为基础、以德治为方法、以法治为保障的调解平台。农村的一些小矛盾有时候会引起大问题,如果单纯依靠法律去解决,往往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实践中很多村的调解工作深入细致,化解矛盾的效果很好,其做法值得借鉴。例如,河南省兰考县张庄村探索建立了“讲理堂”调解模式,创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融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各方资源,为群众提供专业、及时、有效的矛盾调解和法律咨询,很多矛盾在进入司法程序前就能化解,大大减少了涉诉案件,能够较好地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建好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文明乡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一个新颖而重要的阵地,要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资源,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传递给群众,增强广大群众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一方面,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讲党的理论和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广泛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丰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健康新风尚,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四,构建一个集信息发布、民意收集、线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平台。一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公开发布村级各项事务,让广大农民及时了解村务状况,提高对乡村治理的信任感与认同感。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加强农民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有效互动联系,实现有效沟通和干群关系的融洽。三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吸引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村庄事务和社会治理活动,形成更加符合民意的公共决策。四是在乡村人口流动较大的当下,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有效地把村内常住居民、村级组织和频繁外出人口联结起来,随时沟通交流,互通共享信息,共同推动乡村治理。五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和群众评价机制,提高乡村治理的社会化程度,壮大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

2. 大力推动“三治”相互嵌入,融为一体

实现“三治融合”需要三种治理方式相互配合,更需要三种治理方式相互嵌入。

第一,在村民自治中嵌入法治、德治内容。法治既是实行村民自治的根本保障,也是乡村治理各个主体的基本行为遵循;德治则起着“内化于心”的教化作用。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优势,按照法治精神建设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将村民自治活动限制在法治框架内;另一方面,要把德治寓于自治各项活动中,树立明确的价值导向,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中自治与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共同规范乡村干部和群众的自治行为。

第二,在法治中嵌入自治、德治内容。在法治建设中,只有在村民自治体系逐步完善、村民道德水平逐步提高的环境中,乡村法治才能够真正健全。道德规范越是被社会成员遵守,法律发挥的作用就越小。推进法治不仅要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各个治理主体对于国家法律的遵循,还要依据法律来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规则,实现干部群众自觉遵守自治规则与实践法治精神的内在统一。

第三,在德治中嵌入自治、法治内容。实行乡村德治同样需要村民自治能力不断提高、法制日益健全。在德治中要充分利用乡村各种自治组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村民自治实践对村民而言就是规则意识、道德意识的强化。在乡村德治过程中,必须加快推进现代法治下沉乡村,改变一些地方缺乏法治意识的状况,使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在遵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自觉践行乡土文明行动规则。

五、着力创造实现“三治融合”的支撑保障条件

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互融合,需要多方面的支撑和保障条件,改善乡村的发展环境。

(一) 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1. 加强基层村干部队伍建设

当前乡镇干部队伍难以支撑乡村振兴的需求。由于乡镇工作辛苦、待遇低、升职慢,乡镇干部队伍深陷于人才“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同时面临着人才结构不合理、人员流动频繁等问题,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人才服务乡镇,为乡村振兴集聚人才力量。

在乡镇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河南省兰考县盘活编制资源,推进“减县补乡”改革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该县选派 2000 多名自筹和差供人员到乡镇工作,每年按 30% 的比例转为全供事业单位人员,其事例被评为全国改革典型案例。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乡镇人才短缺问题,也解决了部分县(市)直部门需要“自我瘦身”的问题。同时,要大力培养村级干部队伍,使村干部成为真正带动一方百姓、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乡农村的领路人。一方面要加大村干部培训,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切实提高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和县乡机关干部进入村干部队伍,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

2.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也是开展乡村治理的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素质更高的乡村治理人才。新型职业农民更关心乡村治理问题,更希望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他们不仅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热情高,能力也更强。为此,一方面,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做好乡村人才培育工作。应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完善培育机制、创新培育模式,以提升培育效果。另一方面,要出台强有力的措施,激励各类人才特别是农业科技人才到乡村创业和服务,支持返乡农民工、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到农村创业,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二)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能增加集体收入,使村两委有更多财力发展公益事业,增加公共福利,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凝聚民心。实践证明,集体经济发展越好的村,乡村治理成效就越好,村党组织的号召力也就越大。推动乡村治理“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成效,必须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多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用集体资产租赁、承包经营或股份合作方式,盘活闲置集体财产,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二是凭借土地、山水、田园等特色自然资源,开发增收项目,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三是村两委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顺应群众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意愿,以“地”入股,实现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把分散经营的小农户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化去适应市场化,实现规模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四是村两委领办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购销服务等,增加集体收入。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选择适宜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三)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是发展乡村智慧农业的基础,也是乡村数治建设的保障,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信息等基础设施。首先,加快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在农业农村的普及度和覆盖率,推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其次,加快实施农业农村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提升工程,发挥各级政府作用,鼓励支持各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合作,建立数字农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乡村数字化复合型人才。最后,把互联网、数字化知识等技能培训融入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体系当中,切实提高农民的数字化应用能力和知识素养,让农民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红利。

参考文献

[1] 敖翔.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格局构建的挑战与途径[J].农业经济,2022(9):47-49.
 [2] 颜杨,刘永红.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博弈关系与法治破解路径[J].领导科学,2021(20):103-105.
 [3] 刘文婧,左停.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J].地方治理研究,2022(2):53-66.
 [4] 辛瓊怡,于水.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J].求实,

2020(2):90-99.
 [5] 孙莹.协同共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四川省J市的乡村振兴实践为例[J].理论学刊,2022(2):128-136.
 [6] 程传兴,谢娅婷,张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主要难点与对策[J].行政科学论坛,2020(7):40-45.
 [7] 孟莉.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J].领导科学,2019(24):108-110.
 [8] 姜珂.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J].伦理学研究,2021(5):33-40.
 [9] 刘伟.新时代我国村民主体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20:56-70.
 [10] 刘俊祥,曾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64-71.
 [11] 胡宝珍,欧洲华,刘静.新时代“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之建构:基于福建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东南学术,2022(2):126-133.
 [12] 王冠群,杜永康.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1(5):124-133.
 [13] 李艳荣.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J].农业经济,2020(4):34-36.
 [14] 徐汉明,李辉.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J].求实,2022(3):87-99.
 [15] 李若兰.完善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J].中国领导科学,2019(6):93-96.
 [16] 李小红,段雪辉.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J].理论探讨,2022(1):70-76.
 [17] 李小伟.“三治融合”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J].经济问题,2021(10):95-103.
 [18] 张新文,郝永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J].学习论坛,2022(2):93-100.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s”

Cheng Chuanxing Liao Fuzhou

Abstract: Realizing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completing other task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is constantly upgrading.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some major issues such as inadequate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mperfect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and low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system at the county, village, and township levels, explore innovative forms of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and strive to create conditions that truly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s” of rural governance,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s; implementation form

责任编辑: 澍 文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胡守勇

摘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新征程上开辟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乡融合迈向深层次的客观需要,是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任务,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的本质所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是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主体条件是城乡互融共生的文化形态,物质基础是城乡互融共促的发展格局,核心内容是城乡互融共通的公民道德,关键要旨是城乡互融共进的精神生态,基本途径是城乡互融共创的建设范式。基于价值、间性、空间、交往、情感、制度六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有利于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层面深入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关键词:城乡融合;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49;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65-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1]的重要命题,是对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作出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新征程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方略,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目前,学术界对该命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建设方面,如探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框架、路径和保障机制等问题^[2],或提出通过物质塑形、精神铸魂、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3]等观点。而专门聚焦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成果还比较少,且主要是宏观政策层面的探讨,如认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农村,需要树立系统观念^[4]。高质量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亟须从学理上阐释其丰富内涵,探讨其分析框架,深入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空间,从而为具体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时代意蕴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刻解读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这一命题的时代意蕴,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更知其所以必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这个科学命题的理论内涵。

1. 开辟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到了触及“天花板”的阶段。从理论层面看,自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首次被提出至今,精神文明的话语形态经历了从意识形态话语向大众话语,从问题意识向价值追求的系统推进^[5],相关研究围绕理论内涵、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党的领导,以

收稿日期:2023-02-18

作者简介:胡守勇,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03)。

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教育和科学、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展开,甚至曾有学者发出创建“精神文明学”^①的倡议,但相关研究总体呈现零散化、感性和表层化特点,学理性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更有学者认为精神文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苍白性”^[6]。从实践层面看,全国上下围绕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以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2017年)等文件精神,聚焦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协调,精神文明建设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统筹等命题展开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方式方法等都日趋定型,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已经成为常态化工作。然而,还需看到,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仍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这种研究范式客观上已经与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不相适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精神文明建设只有顺应城乡关系加速演变的客观现实,摆脱城乡二元的路径依赖,围绕融合发展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境界。

2. 推进城乡融合迈向深层次的客观需要

城乡关系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基本关系,“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7]。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城乡分割”“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融合”等阶段。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就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做出了具体安排。随后,国家发改委等十八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确定浙江嘉湖片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河南许昌、重庆西部片区等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聚焦11个方面^②的重点任务先行先试,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改革措

施。尽管各试验区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现行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安排来看,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目前只有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建立乡村文化保护利用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安排,缺乏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总体制度设计。精神文明既决定于物质文明,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整体性,反映一个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的总体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和层次结构,系统内某一部分、某个层次的发展水平不能代表整个系统的发展水平。从实践探索来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究其原因,都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密切相关,即城乡融合发展缺乏足够的、应有的价值引领、文化条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众所周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城乡物质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也包括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进而言之,没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不会自然带来精神层面的融合发展,而精神层面的融合发展则会给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因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9]。因此,只有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城乡精神文明的共振,才能使城乡融合发展行稳致远,不断向纵深迈进。

3. 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任务

新时代新征程催生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0]虽然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持续冲击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其在广阔的乡村依然“倔强地”存在,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两个结合”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具有世界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更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这种鲜明特色主要源于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立于百年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红色文化,具有延续

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等突出特征,既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风范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的中国话语。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立足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成就、基本经验和现实条件,着眼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任务。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式变革,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搭建城乡互动平台,赋予增量;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破解城乡结构矛盾的路径方法,增添动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夯实发展基础,提升势能;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表达,是自信自强的主动作为,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必将进一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睡的基因”,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华文明底色,为加快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4.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的本质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是既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除了具备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外,更加重视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并致力于克服“资本逻辑的泛滥、市场驱动力量的过分膨胀所导致的人的需要的畸形发展、精神世界的扭曲和贫乏”^[11]问题,体现着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12]等制度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性”^[13]的观点,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坚持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制度体系,是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旨在补齐城乡融合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个短板,补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这个弱项,是新征程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1]23}的重要举措,是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关键所在,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本质。深入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能够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厚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开拓文化文明发展路径。

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新征程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必然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方向路径、方针策略、方式方法、政策体系,以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产生深刻影响。只有准确理解其科学内涵,才能高质量推进新征程上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笔者尝试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深刻内涵进行系统解读。

1. 根本要求: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

精神文明建设在古今中外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都发挥着在社会意识中培根铸魂、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教化功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唯有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在守正创新中更好地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效能。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党中央顺应城乡关系的发展态势,遵循精神与物质辩证法的客观规律,锚定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宏伟目标,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略进行结构性调整的举措。这种结构性调整必然加快以城市和乡村为大致分野的传统与现代、主流与支流、外来与本来、高雅与通俗等文化形态的交流、交锋、交融,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融合新场域。在这个新的场域中,基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大众文化与基于传承机制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现实竞争是非对称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空间会受到更多的冲击;基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攻势与反制会一直存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把握好方向,坚持住原则,守护好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4]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旨在提高城乡居民的整体生活品质 and 城乡社会文明程度,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革命文化的方向引领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熏陶,必须坚

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从根本上确保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根本立场和正确方向。

2. 主体条件:构建城乡互融共生的文化形态

以什么样的理念来看待城市和乡村的互动关系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关于城乡关系的顶层设计先后经历了城市领导乡村、乡村支持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以及“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开始谋划和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作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部署,丰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内涵。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学术界发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以及‘城市本位’利益取向主导下的‘以城统乡’的实践致使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均,乡村文化发展的优质资源被城市抽取,城市文化强势、单向地对冲乡村文化,破坏了城乡文化关系的平等性与和谐性”^[15]。如果这种错位的城乡关系长期得不到校正,不仅会导致城乡融合难以实现,还会助推城市文化吞噬乡村文化,严重破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根脉”,危害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城市社会既有讲效率、讲理性、讲规则、讲信用等优势,但也存在精神颓废、抑郁焦虑、见利忘义等各种“城市病”;乡村社会存在讲道义、讲情理、讲团结、讲忠孝等优良传统,但也有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各种“乡村病”,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内在地要求城市和乡村两大主体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中摒弃“城市优于乡村”的主客观念,树立城乡文化的“间性思维”^③。要充分认识到,城乡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城市和乡村唯有融合发展,才能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以及新的文明^[16]。基于城乡之间的主体融合构建城乡互融共生的文化形态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主体条件。要将城乡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精神文明建设,营造城乡互益、互融、共生的文化形态,从认知上明确城市和乡村的平等地位,并将其作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和行动准则。

3. 物质基础:形成城乡互融共促的发展格局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进下的重大任务,必须遵循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城乡物质文明层面的融合,城乡精神文明层面的融合就难以落地生根;没有城乡精神文明层面的融合,城乡物质文明层面的融合也难以以为继。在城乡关系的塑造中,城乡空间布局是政府对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进行科学规划、调整优化的法定行为,是主导城乡关系演进格局的关键因素。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城乡空间布局,就有什么样的城乡发展格局,我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及其长期存在与城乡空间“区隔式”布局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必须以城乡空间的“融合式”布局为前置条件。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中,推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在县域范围内的统筹布局、互融共进,是实现城乡人口、资源和其他要素均衡布局、合理流动的基本条件,是构建城乡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城乡高品质现代生活、优化城乡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抓手。必须充分认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客观实际,把塑造城乡互融共进的发展格局作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质生态的发展目标抓精神文明建设,摒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说教式”工作方式,“要办实事、讲实效,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8]⁶。始终围绕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互融共生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仅能够为物质文明层面的城乡融合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能够不断丰富和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和发展空间。

4. 核心内容:重塑城乡互融共通的道德规范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其中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把握好城乡道德建设这个关键,把塑造城乡互融共通的伦理道德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分别实现了“从‘寄生’到‘中心’、从‘主宰’到‘依附’的‘转身’,这一‘转身’既包括了乡村与城市关系、乡村内部关系与结构的转向及其所指向的伦理转型,也体现为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变及其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并由此而生

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道德图景”^[19]。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全年外出农民工1.72亿人,本地农民工1.24亿人^④。尽管城乡人口高频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城乡道德规范的交流交融,但到目前为止,城乡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种鲜明的道德形态。在乡村社会,由于大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尽管受到现代市场观念的冲击,但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依然是乡村道德形态的浓厚底色。在城市社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只是“匆匆过客”,尽管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但“叶落归根”的心态或浓浓的“乡愁”依然是存在于很多城市居民精神世界的深深念想。乡村熟人社会一般重人情、看面子,人际交往倚重伦理规范、注重礼尚往来;城市属于陌生人社会,人际交往更加倚重理性规则、注重守信重诺。在现实生活中,城乡社会道德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常常导致城乡居民在道德实践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社会交往,还会成为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上的道德“疙瘩”。因此,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要从城乡两方面着手,着力推进城市社会道德建设和乡村社会道德建设双向互动、相向而行,使城乡道德体系互融共通、优化升级。一方面,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18]¹⁹⁶,同时强化法治宣传和依法治理,在乡村社会植入现代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道德建设,系统治理市场经济对道德体系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遏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引导城乡居民爱党爱国、明德向善、重情重义、孝老爱亲、守法诚信,形成城乡互融共通的伦理道德体系,排除城乡居民交流交往中的价值理念障碍。

5. 关键要旨:构建城乡互融共进的精神生态

国内有学者从生态危机视角提出过精神生态的概念,旨在改善人类内在精神状况、弥合破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祥和的良性循环^[20]。国外亦有学者认为精神生态是一个融合了不同世界观的概念^[21]。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22]本文所指的精神生态体现为精神文明建设场域内相关主体、社会思潮、资源要素的结构及其运行状态。精神生态决定着社会群体的理想信念、人生追求、思维方式、审美偏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约束条件。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变化的社会节奏与不变的自然节律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给个体情绪、群体心理和社会心态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不利于城乡社会精神生态的良性发展,精神抑郁、情绪焦虑、偏激暴戾等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的突出痛点。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又是重大的精神文明建设短板,除了需要“从公众认知、基础教育、社会心理、患者救治、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救助保障等全流程加大工作力度”^[23],还需要从城乡社会精神生态优化方面着力。全面优化城乡社会的精神生态是营造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氛围、提升精神文明建设质量的基础性工程。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城乡精神生态建设面临新情况和新机遇,需要采取互融共进的路径推进精神生态优化。一方面,城乡精神生态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给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造成结构性障碍。同时,城乡社会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精神生态问题,需要将精神生态优化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城乡精神生态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知足常乐”等朴素价值观在乡村社会还有很深的群众认同基础,这恰是治愈城市社会一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的“良方”;开放包容、理性高效的城市社会则为乡村居民开拓视野、放大格局、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有必要将构建城乡互融共进的精神生态作为关键要旨,发挥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精神空间的互补性,构建城乡社会共享的精神生态,夯实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生态基础。

6. 基本途径:坚持城乡互融共创的建设范式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一个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建设范式的选择事关建设目标的有效实现。相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城乡区隔范式,城乡融合背景下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构建城乡统筹协调、互融共创的建设范式。一要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建设。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能够增进公共性和集体主义认同,充分感受和认同渗透其中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而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需要以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基本依托,切实把握“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

题”^{[18]256},坚持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补齐短板、补强弱项,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具体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建设为主要突破口,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城乡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内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二要形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化通道。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贯通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各领域,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衡量标准。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能够充分激发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效力,为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助力文化自信自强开辟路径。具体要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构建制度性通道,实现城乡要素最优配置以及城乡风貌相得益彰。三要统筹城乡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要积极探索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具体方式,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和文明创建中将城市和乡村统筹起来考虑,将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谋划,将融合发展的理念融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

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依据和鲜明时代意蕴的新命题,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需要一个学理性的分析框架。相对于理论内涵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分析框架则应凸显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旨在为理论层面构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评价标准、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为实践层面探寻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提供学理支撑。本文立足于理论内涵的研究基础,着眼于实践层面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聚焦评价和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尝试性地提出包含以下六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期能对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价值维度

价值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根本要求的重要视角。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首先要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处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从价值维度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应落实三个方面的根本要求。一是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整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18]98}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始终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在多元杂陈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中画大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同心圆,需始终彰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中更加巩固。二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土壤”,其哲学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处事态度等闪耀着中华文化智慧的光芒,始终是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在积极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必须坚定中华文化的立场,保护好城乡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前人留下的各种文化遗产,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承,使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彰显中国智慧、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三是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其蕴含的价值导向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必须贯穿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无论是在理论分析中,还是在实践推进中,都要牢固树立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整合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 间性维度

间性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主体条件的重要视角。将主体间性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文化间性思维,有利于引导城乡两种文化形态形成平等互鉴、互融共生的关系。文化间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更是一种文化的政治态度、伦理实践和

社会行动依据^[24],其要求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都保持开放性,使之能够在交流互动中互相借鉴、融会贯通,形成融合发展的态势。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互动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对称关系,维护城乡文化主体的平等性在实践中存在重重阻碍。对此,必须认真把握维护主体条件的三个控制性因素。一是城乡文化要素交易的等价性。城乡文化资源要素交易的等价性是文化间性的直接表现,在县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中,要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东风”,加快破解制约城乡文化资源要素交易的不公平问题,切实维护乡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乡村文化资源权属主体的合法权益。二是城乡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性。城乡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性是文化间性的现实表征,城市对乡村单向性的文化输出结构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背道而驰。在继续做好文化、科技、艺术“三下乡”的同时,亟须积极扶持“非遗”传承人,支持民间文艺团体、民间艺人等积极健康的草根文化,鼓励支持优秀乡土文化的外向传播,不断减少乡城文化产品输出的“逆差”。三是城乡文化振兴的整体性。城乡文化振兴的整体性是文化间性的价值追求,要力争将县域文化振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指标要求投射到城乡每一个角落,覆盖到城乡每一位居民,补齐补强县域范围内的短板和弱项,不断实现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均衡可及和整体提升。

3. 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物质基础的重要视角。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以城乡融合共促的发展格局为物质基础,而城乡融合互促的发展格局与区域、城乡空间的协调布局直接关联。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结构安排框定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和走向,也决定着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从空间维度分析,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融合布局是确保城乡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物质基础的直接体现。要跳出传统精神文明创建的单向思维,使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与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融合共生的格局全面对接。一要将精神文明建设元素融入城乡生产空间。生产空间的布局决定城乡产业体系发展的体量和质量,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城乡产业布局,加快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县域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指标。二要将精神文明建设资源下沉到城乡生活空间。生活空间的优化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城乡居民的公共生活、生态宜居以及民族地区各民族嵌入式分布格局等要求。充分考虑都市圈、城市群和县域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地将精神文明建设资源下沉到集体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撤并搬迁类村庄。在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资源合理布局的过程中,要确保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公共服务紧贴城乡生活空间,方便居民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服务。三要将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体现到城乡生态空间。生态空间的布局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营造绿色低碳生活,科学设定并严格守护资源消耗上线、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推动城乡环境风貌、社会风貌和精神面貌相辅相成、共同提升。

4. 交往维度

交往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核心内容的重要视角。社会交往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始终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规约,其行为规则的倾向性决定了社会文明的形态。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发挥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我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长期发挥着主导作用,乡村社会常被定义为礼俗社会。与此相对应,由于市场化、城市化的强力影响,现代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在商业活动频繁的城市社会发挥着主导作用,城市社会的现代法治特征更加突出。城乡社会交往制度规约的差异既不利于城乡社会交往,也不利于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分析框架中确立交往维度,旨在推进形成城乡互融共通的道德规范,排除城乡社会交往的制度隔阂,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一是城乡共遵道德规范。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两者都对社会交往发挥规约作用。中华民族积淀着丰厚的优秀传统道德资源,“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18]282},以此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重建新时代城乡居民共同遵从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将相关道德规范融入法治建设、融入城乡居民日常交往。二是城

乡共守法治底线。法治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是现代公民基本的道德要求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法治教育纳入城乡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树立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风尚,坚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城乡交往基本规则。三是城乡共促社会融合。当共同遵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以及共同遵守法治底线逐渐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时,城乡之间也会随之逐步实现普遍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

5.情感维度

情感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关键要旨的重要视角。“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果是不可避免的。”^[25]因此,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健康的社会情感为依托。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一般有三个层次:社会心态、群体心理、个体情绪,即宏观、中观与微观^[26]。互融共进的精神生态集中体现为城乡居民个体情绪、群体心理和社会心态的良好状态。要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强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中的情感治理。一要培育健康的个体情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精神领域的“所有制”问题^[27]。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需要完善个人情绪生成机制,推动个体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互动式结构,构建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相互贯通的情绪世界。二要化解负面的群体心理。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群体性的利益冲突,进而形成负面的群体心理,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化解,就将影响整个社会心态。此外,还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力度,及时化解负面的群体心理。三要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共享共有的社会需求、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的总和^[28]。社会心态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要深刻把握社会心态的影响要素与内在结构,把社会心态的调适作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互融共进的精神生态。

6.制度维度

制度维度是分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基本途径的重要视角。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关键在制度。推动城乡互融共创建建设范式的形成需要从三个层面强化制度供给。一是构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行动指南。然而,还需要认识到,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层面针对精神文明建设还缺乏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因此,还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政策体系。二是完善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领导体制。强化各级党委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其纳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议事日程;进一步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顺应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新机遇,将各级志愿服务工作机构和职能整体纳入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探索城乡志愿服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三是完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机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效途径,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有力抓手。要整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的创建指标,形成有利于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重构县域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体系,推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载体渠道创新,不断增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推动力。

注释

①精神文明学最早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提出,较早的论著有范英主编的《精神文明学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稍晚的论文主要有董莉、董玉整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的《试析精神文明学的哲学基础》一文。②参见《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9]1947号)。③一般认为,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基于对“主体间性”“差异哲学”“他者理论”“视域融合”等的批判继承,率先提出了“文化间性”理论。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间性”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使之逐渐成为处理文化多样性、调适文化差异很有影响力的范式和策略。④《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

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eqid=ad18a3480005ec3100000003643f4282, 2023年2月28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张学昌.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56-64.
- [3] 刘志刚.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乡村振兴的文化困境与现实路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6):76-82.
- [4] 张明海.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N].光明日报,2023-02-08(6).
- [5] 樊浩.“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J].哲学动态,2015(8):5-13.
- [6] 王岩.新时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路研究[J].道德与文明,2017(6):8-1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8.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55.
- [9]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27.
- [10]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11] 郝立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6):5-8.
- [12] 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3):47-5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2.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
- [15] 张学昌.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文化间性的视角[J].新疆社会科学,2019(1):88-95.
- [16] 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9.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1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9]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
- [20] 鲁枢元.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J].当代文坛,2021(1):4-18.
- [21] SCATOLINI. From Spiritual Ecology to Balanced Spiritual Ecosystems[J]. HTS Th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2022(2):1-7.
- [22]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 [23]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154.
- [24] 汤国荣,章锦河,曹晶晶,等.文化间性理论要义及其在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8(2):118-130.
- [25]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 [26]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 [27] 徐秦法,刘星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突出文化建设?——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视角的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2022(12):26-33.
- [28] 管健.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J].人民论坛,2023(3):16-19.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u Shouyo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open up a new realm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a new journey, an objective need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 a deeper level, a strategic mission to undertake a new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key to highlighting the originalit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 a new journey.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soul with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ubject condition is the cultural for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ion, the core content is the civic moralit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key theme is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and the basic approach is the construction paradig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six dimensions of value, inter-subjectivity, space, social interaction, emotion, and system.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翊明

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李银兵

摘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不仅能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也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还能为农业强国建设培根铸魂。在人们秉持传统而又追求现代、建设乡村而又向往城市、安于现实而又怀揣理想的当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文化乡愁侧重于表达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依恋与珍视，文化乡建旨在强调人们对现代乡村文化的形塑与再造，二者都深深熔铸于新时代乡村文化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之中。因此，在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需要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理路的基本前提下，立足乡村民众现代化，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乡村社会全面进步，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文化乡愁；文化乡建；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074-09

当前，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农民真苦”“农业真难”“农村真落后”为标志的旧“三农”问题已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但随之而来的以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以及农村空心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又慢慢浮现，并逐渐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结构性问题。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也关涉农民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培育与塑造。因此，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须发挥乡村文化现代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导作用，凸显乡村现代文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所起的目标指向、精神动力、思维

工具、智力支持以及凝心聚力等文化功能。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如何根据矛盾发展的规律，解决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矛盾。”^[2]序³在人们秉持传统而又追求现代、建设乡村而又向往城市、安于现实而又怀揣理想的当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基于此，在深入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围绕为何现代化、如何现代化及现代化若何三个乡村文化现代化元理论问题，着重探析乡村文化现代化中内含着的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三对矛盾关系，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勾勒出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所具有的真理性、实践性与价值性及其“三位一体”而形成的系统性属性，进而形塑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整体结构和实践功能，为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多民族村落文化研究”(22XMZ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22YJA710019)。

作者简介：李银兵，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贵阳 550001)。

一、情感与理性: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

文化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4]毋庸置疑,乡村文化发展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城乡文化一体化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随着文化惠民工程有序实施、文化事业产业蓬勃发展、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以及农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乡村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但还需要看到,在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一种以文化服务虚无化、消费文化膨胀化、文化力量弱小化以及文化意识淡薄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现存态势和变化趋势也在一些农村地区显现甚至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乡村文化的前进步伐,是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要应对的挑战。面对乡村文化急剧变化及其呈现的现存态势,“乡村文化衰落论”“乡村文化无用论”“乡村文化消亡论”“乡村文化忧愁论”“文化乡建破坏论”等言论甚嚣尘上,给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基于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现实状况,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不仅要求全面客观地把握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各种现实条件,而且需要充分认识和化解乡村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诚然,现代与传统相对,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没有现代也不会有传统;没有乡村文化现代化,就没有农民现代化;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乡村文化现代化;没有农民文化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农民文化现代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始终贯穿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及其张力问题无疑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当前,文化乡愁的出现及其与文化乡建的矛盾运动,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转换的逻辑理路,也表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动实践,还指明了借助乡村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同时这也构成了分析乡村文

化现代性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比如,文化乡愁依赖情感,文化乡建依靠理性;文化乡愁珍视传统,文化乡建面向现代;文化乡愁注重记忆,文化乡建关注建构。要言之,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关系基本囊括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核心问题,很好地印证了乡村文化现代化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矛盾性。因而,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关系是分析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一个最好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源泉。诚然,要充分展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重构的真理性,除了要客观把握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客观事实和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之外,还要特别关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及其实践等相关问题。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在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中,事实、规律、实践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就成为了乡村文化现代化重构真理性的集中体现。

1. 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选择

有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存在四种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流派及其方法路径,即以主张走“全盘西化”为文化现代化路数的自由主义流派、以复兴儒学为文化现代化核心的现代新儒学流派、以强调文化批判和以文化建构为文化现代化主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以推动视野转换和文化比较为文化现代化手段的后现代主义流派^[5]。但笔者认为,以唯物论为基础、辩证法为核心、实践观为首要观点、历史观为最终归宿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无疑是分析中国文化和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流派。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处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上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质和优势。乡村文化现代化不仅包含着理论、实践和目标“三位一体”的主要内容,也具有集真理、价值、实践于一体的内在品质,还面临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等尚待化解的矛盾关系。由此可见,乡村文化现代化中多重矛盾关系的存在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应用于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契合性、科学性。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列宁也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7]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因此,运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

关系,无疑是解开乡村文化现代化之谜的一种正确方式。

2. 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要性

“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的缺乏、非理性的盛行。”^[8]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所有的现代化,不仅在于其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本质要求,也在于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2]360}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所具有的真理和实践伟力,是认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实现自由解放不可或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疑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乡村文化现代化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转换有其必然性。目前,学术界对乡愁本质的认识存在多样化解读,比如有人认为乡愁是现代城市人对以往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9],也有人从对亲人的思念、故园的怀念以及传统文化的眷恋等三个层次去解析乡愁^[10],还有人主张乡愁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恋旧情结,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情感表达^[11]。面对学界对乡愁本质的多样化解读,笔者认为,乡愁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忆与珍视中透露出来的一份特殊而复杂的情感。相比较而言,学术界对于文化乡建本质的把握则显得简单、明了,一般认为,文化乡建是与新时代兴起的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相连,具有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化建设或文化发展的明确意义。可以说,文化乡愁立足于精神,依赖情感认知,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表达,而文化乡建扎根于物质,充满理性认知,属于辩证法的实践叙事。其所表现出的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充分说明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区别。未来学大家托夫勒说:“但是倘若他们因不满现状就盲目地反对科学,走入非理性主义,沉溺于病态的怀旧情绪,或一味地享受‘现在’,那么他们不仅态度错误,而且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后果。”^[12]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就显得十分必要,即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首先须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从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的转换。换言之,乡村文化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的指导,且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理性实践和实践理性的产物。

3. 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可能性

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的转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具有实践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的出现,除了文化乡建具有比文化乡愁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之外,还在于文化乡建依存于中国式现代化,能很好地回答“中国之问”,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第一,文化乡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3]22}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现代化。当前,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党的庄严历史使命。共同富裕指的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物质富裕而精神匮乏不是共同富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也是文化现代化。乡村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文化乡建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和重要内容。第二,文化乡建可以很好地回答“中国之问”。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着眼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丰硕理论成果。中国之问作为“四个之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中面临的任务、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大量理论和实践课题亟待回答。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又是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治理的重心在于推进乡村现代化,而乡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与文化现代化,都必须以文明主体为主体,以文明主体的利益为根据,以集合起来的文明主体的意志为指导。”^{[2]序18}基于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主体作用的发挥要求极高,更加需要

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乡建无疑是解决中国之间的最好途径,也是回答中国之间的最好方式。第三,文化乡建蕴含着丰富的实践价值。有学者指出:“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与此相关,当前三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的破坏。”^[14]文化乡建既是过程,又是目标,集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于一体。文化乡建直面乡村文化发展现状,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乡村文化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事实依据;文化乡建强调文化建设实践,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中,不断界分和连接起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等矛盾关系,不断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文化乡建重在凸显乡村文化的现代价值,发挥乡村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在乡村振兴中的动力作用、在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综上,从文化乡愁到文化乡建的转换,不仅涉及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复杂矛盾的选择和处理,也牵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选择,更是直接区隔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理性行为,充分展现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真理不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关系问题,更是关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问题。诚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落脚于改造世界上。因此,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区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仅仅是解决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要准备,而深刻把握这两对矛盾深层次的转换关系,则是促进乡村文化现代化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核心问题和关键之处。引入正确的实践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文化乡愁的现代消弭和文化乡建的现代构建打开了一扇门。

二、传统与现代: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

有学者认为:“逝去的知识体验或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追怀,从个体的回忆逐渐汇聚、上升或者转化为集体性的文化记忆,并最终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文化构建行为。”^[15]诚然,实现从“记得住乡愁”到“留得住乡愁”的飞跃,的确要借助文化记忆这个情感纽带。正是依托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情感,人们才能够凭借集体性记忆去进行对传统的发明。但

“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16],且“文化并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17]。这说明,文化构建不单是人们情感满足的非理性行为,还涉及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政治等矛盾关系处理的理性实践,理性在其中无疑是居于决定性地位。但就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而言,在方法论上,不仅要充分运用文化乡愁的情感作用,还应发挥理性所具有的整体性和重点性功能;在看到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对立性区别的同时,还要发挥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一体性关系。只有辩证地认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对立统一关系,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行为才能得以顺利展开。换言之,只有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实现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互动实践,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乡愁侧重于强调人们用特殊复杂情感传达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依恋与珍视,而文化乡建则着重于指人们用理性化实践表达对现代乡村文化的形塑与再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决定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之间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传统是现代的过去,现代是传统的未来,传统与现代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8]的道理所在。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就是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传播现代文化,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遵循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内在一致性,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1. 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逻辑理路

真正的文化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有机生长和盛衰变化来展示人的丰富的生存,来不断超越给定的文化形态,推动历史的演变。文化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后得性、适应性、分化性、整合性、变异性和涵化性等多重属性,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因此,文化乡建应兼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当前,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在随之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并积

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从治理的层面讲,一方面,文化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保持协调并受其决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看到文化发展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即文化在根本上受到经济、政治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形式和规律。文化这种独特的发展形式和规律主要表现为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文化内部各形式之间相互影响及其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明确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文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也就明朗起来。总体而言,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主张:坚守传统文化精髓,抵制现代文化的侵袭;主张现代文化引领,消除传统文化的影响;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协调同步发展。诚然,对任何性质的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来说,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协调起来同步发展无疑是最为理想和最为现实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坚持文化乡愁和文化乡建的同一性关系,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基本前提,能够在实践中促使文化乡建进一步明确自身行动的基本遵循。

2. 立足于乡村民众现代化

学者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发展的最终要求体现在人的素质的改变上,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转变,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具备人的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20]。因此,人作为生产力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始终是衡量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最为重要的标志。只有实现广大乡村民众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具体而言,在文化乡建中,引导乡村民众走向现代化,需从以下三个基本层面来建立重构机制。第一,在教育机制上,要引导民众构建起融合非理性和理性、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新文化精神。“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3]³³教育作为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准备性要素,除了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之外,还在科技发展、管理水平提高和人才培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在文化乡建中,要在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基础上,用科学技术理性、人文主义情感、改革创新精神对广大民众展开文化启蒙,使乡村居民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自发走向自觉。第二,在制约机制上,要用法治的、民主的、人道的、规则的社会

运行机制去批判乡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的血缘的、宗法的、经验的自然关系和自在原则,引导民众在辩证否定传统文化中,对有着自然主义色彩和基于伦理中心主义结构的乡村文化进行合理扬弃,逐步形成乡村文化法制化、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将礼俗与法治进行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发挥他律和自律的积极互动作用。第三,在实现机制上,需要引导民众形成一种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的全新的生存方式和生产生活模式。针对一部分民众思维还处于“田园牧歌”“小国寡民”“世外桃源”“自得其乐”等封闭性、狭隘性、想象性的情感和记忆之中的事实,文化乡建除了要发挥教育启蒙和制度规约的作用,还要积极地把改造民众思想意识和改造其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建构起融合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统一的绿色生态文明,培育民众的绿色生态意识与和谐生态方式。立足于乡村民众现代化,文化乡建不仅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还能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主体性基础。

3. 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乡村民众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文化基因、精神家园、文化实力和财富,不仅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成熟发展以及民众安稳自足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古代中国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提供了文化支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物质文化为基础、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治文化为保障,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为精髓的农业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的辉煌成就。在新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机遇期,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培根铸魂等功能已成为时代之需和实践之急。然而,囿于时代背景、实践目标、发展方式、组织形式等不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要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化功能,则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过时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主要是指按照时代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拓展和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诚然,在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仅要明白文化“两创”的必然性,

也要辩证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区隔与文化交融等多重复杂关系,还要保存和拓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联系、自我扬弃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要承担起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植文化沃土、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成为党和国家文化自信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等时代重任。此外,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动力在于传播和交融,因此,除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交融发展,文化乡建还要进一步加强优秀乡村文化的国内外传播,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增进人们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认知,增强乡民的文化自信,推进乡村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

4. 引导乡村社会全面进步

乡村是集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特征于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具有多重社会功能,且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了人们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衰关系国家兴衰。当前,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及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乡村由于受到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为标志的新“三农”问题的困扰,其多重社会功能不断减弱。新时代党和国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有序开展。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不仅能为乡村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也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交融的关系。文化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不仅会促进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快速形成和发展,还能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因此,在文化乡建中,一方面,要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发挥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目标指引、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凝心聚力等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挖掘、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兴旺等有利于提高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文化建设工作。为了能够实现以上目标,一要改变以往看待文化建设以及建设文化的形而上的刻板方法;二要立足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乡村文化载体,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三要把文化乡建与乡村全面建设融为一体,推进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四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总之,

在现代乡村文化引导下,文化乡建要把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的积极功能融入乡村现代社会构建,不断推动和实现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飞跃。

总之,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面,看到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转换的必要性,为认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然性提供了前提;聚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同一性,寓乡愁于乡建,则为把握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彰显。当然,新时代文化乡建不仅是基于自然形式的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在特定社会和意识形态指引下,且有特定价值指向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政治之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使其免于沉沦,发挥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作用。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作为政治引领下融真理、价值与实践于一体的系统工程,需始终坚持立足于真理、重在实践、落脚于价值的基本导向。其中,价值始终贯穿于真理和实践之中,是真理和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基本表征。

三、文化与社会: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

“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或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视角入手,把它看做是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个学科的规划图。”^[21]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2]文化乡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作为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领导者、组织者,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理应主要针对党这个实践主体而展开。同时,价值作为反映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哲学范畴,是客体对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不是一种自然的、现成的关系,也不是主体需要与客体

属性之间随机相遇的关系,而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同客体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关系。基于此,笔者主要从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互动价值以及政治价值入手对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进行探析,以此彰显乡村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彰显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优势

诚然,在文化乡愁中,人们是用一种非理性化、超越时空和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回忆和想象;在文化乡建中,人们则用一种理性化、时代化和辩证法的模式对现代乡村文化进行形塑和重构。正是在对文化乡愁和文化乡建的表现方式和建构模式的比较中,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优势得以彰显。其一,在形式上,文化乡愁注重回忆和情感,是在非理性行为基础上对乡村传统文化表达依恋或忧愁情绪的主观行动;文化乡建强调形塑和重构,是在理性行为基础上对乡村现代文化进行建设和发展的一种社会实践。理性相对于非理性来说,其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全面性、理想性、辩证法、重点性等属性,使得文化乡建具有比文化乡愁更为科学的表现形式。其二,在方法上,文化乡愁跨越历史时空,局限于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思念眷恋,而较少考虑乡村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新时代的现实境遇。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乡愁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杂糅物;而文化乡建立足于新时代,把人们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现代社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要求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发展乡村现代文化,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可以说,文化乡建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其之于文化乡愁有着显著的优势。其三,在内容上,文化乡愁关注的是乡村传统文化,较少考虑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等基础性要素和条件,在有些情况下,还存在片面、孤立地看待和回忆传统文化的认识弊端;文化乡建侧重于发展乡村现代文化,在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还要求展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社会互融互促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其四,在指向上,文化乡愁表达出一部分人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美好回忆或现实忧虑,满足了一部分人精神上的寄托或忧思;文化乡建则传递了党和国家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的重视,以满足乡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农业强国目标为实践目标。就价值的主体性而言,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文明化,而“人就是人的世

界,就是国家,社会”^[23]3,“发展文化,实现文化现代化,其外在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其内在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24]。文化乡愁局限于文化本身,而文化乡建重在文化背后的社会的事实,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乡建在广度、深度、厚度上具有比文化乡愁更大的比较价值优势。

2. 突出文化乡建的互动价值成效

在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关系中,始终贯穿着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等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矛盾地位和作用的显现主要不在于矛盾的多少,而在于矛盾的最终解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认识和分析矛盾,还要重在解决矛盾。从价值衍生的角度来看,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文化乡愁的存在会对文化乡建产生负面影响,但在一定的条件情况下,文化乡愁也会对文化乡建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既要注意避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弊端叠加,也要积极引导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实现优势叠加,充分利用文化乡愁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去促进文化乡建,进而提升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价值。比如:文化乡愁抒发的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眷恋,能为乡村文化现代化奠定情感基础;文化乡愁表达的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喜爱,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有效利用提供现实依据;文化乡愁反映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文化乡愁流露的人们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些许担忧,能反向推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乡愁畅想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愿景,能进一步明确文化乡建的目标导向。概言之,文化乡愁具有促进文化乡建不断发展的正向功能,而作为对文化乡愁积极回应、继承和超越的文化乡建,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可以通过建设乡村文化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大历史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的文化乡建,能够保证乡村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实践性、价值性和人民性;在实践上,在文化乡建的系统框架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等具体工作不仅有了基本原则遵循,还具备了具体的实施依据。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有效互动,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性和文化乡建的真理性、实践性、价值性。只有不断促进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实现有效的互动交融,产生丰

富的互动成果,才能逐渐化解二者之间存在的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等多重复杂矛盾,进而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

3. 凸显文化乡建的政治价值内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3]17-18毛泽东讲道:“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5]文化乡建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是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集中体现。相较于文化乡愁的非政治性而言,文化乡建的政治属性十分突出,相应地,文化乡建的政治价值内涵也就十分丰富。第一,文化乡建高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党性作为一个政党固有的属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党的性质、理想信念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人必须充分了解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以及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一旦忘记初心和使命,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改变其性质,脱离人民,失去未来。”^[26]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是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文化建设和要实现的文化复兴,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性的高度体现。第二,文化乡建集中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形成的人民中心论。人民中心论以人民根本立场、人民幸福目标、人民主体方法、人民共享成果、人民利益标准、人类共生发展为主要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文化乡建以践行人民中心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坚持了文化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化、文化要热爱人民的建设导向,有力印证了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这一根本的价值坚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7]民生就是最大的福祉,民生也是最大的政治。文化乡建作为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文化乡建赋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8]文化乡建不仅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也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乡村社会的落地落实,还是乡村民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公德意识的积极行动。同理,文化现代化在乡村社会的推进和最终实现,不仅能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也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文化支撑,还能为农业强国建设培根铸魂,直接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事实上承担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动员’任务”^[29]。概言之,小传统与大传统的有效融合,民众与政党的同向同行,无疑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大结构性优势。

综上,从文化乡愁到文化乡建的转换,展现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见证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以文化乡愁促文化乡建,凸显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真理力量、实践指向与价值道义共同形塑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整体结构和实践功能。而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文化与社会互动,不仅很好地表征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辩证统一关系,也说明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矛盾,更彰显了乡村文化现代化的真理性、实践性与价值性及其“三位一体”而形成的系统性属性。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和结果的完美结合,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好表征。新时代讲好乡村故事、传播乡村声音、展现乡村力量,不仅要求理念、目标与原则的统一,也需要真理、价值与实践的同一,还倡导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合一。一言以蔽之,在文化乡愁中积蓄力量,在文化乡建中迸发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示力量,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虽任重道远,但未来大有可期。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4.

- [2]刘永佶.中国文化现代化[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9.
- [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612-613.
- [5]李武装.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四大流派及其方法论回观[J].探索,2010(3):155-160.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 [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8.
- [8]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3.
- [9]王一川.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身份的认同[J].甘肃社会科学,2002(1):7-10.
- [10]种海峰.当代中国文化乡愁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消弥[J].天府新论,2008(4):114-118.
- [11]游红霞.传统民俗复兴的文化乡愁叙事:以上海浦东三林镇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2-76.
- [12]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蔡仲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53.
-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4]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87-95.
- [15]陶成涛.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J].中州学刊,2015(7):157-162.
- [16]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 [17]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
-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2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
- [21]詹姆逊全集:第3卷[M].蔡新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杨竞业.文化现代化:从“自由的文化”到“文化的自由”[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序3.
-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110.
- [26]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2).
-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 [2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 [29]李武装,赵建保.现代性:中国文化现代化最基本的理论理性[J].探索.2013(3):103-110.

Cultural Nostalgia and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Li Yinbing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can not only provide cohes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 necessary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ultivate the so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In the current era where people uphold tradition while pursuing modernity, build rural areas while yearning for cities, settle in reality while harboring ideals, cultural nostalgia and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are contradictory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cultur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nostalgia refers to people's attachment to and 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while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refers to people's shaping and recreation of modern rural culture, both of which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rural 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y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nostalgia and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needs to follow the basic premis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laws and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guide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rural society, empowe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nostalgia; cultural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cultur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翊明

文化认知视域下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研究

管云波

摘要: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发展中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文化自信的生成路径中,文化认知是前提与基础,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文化自信的实现。依据认知理论及其发展趋势,文化认知是在批判传统认知范式基础上对认知活动的重新界定,可以为合理解释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模式和分析视角。在文化认知理论的关照下,认知活动凸显了人文主义的话语形态,既强调人的主体性要素,也包含社会文化环境要素,正是这些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文化自信成为可能。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认知;认知主体性;文化环境;文化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83-07

文化是国之根本,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发展的最终归宿。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当前,我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高度的文化自信可以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深厚基础和精神力量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在新时代的发展语境下,文化选择多样性和价值向度多维化的存在持续不断地冲击人们的思想,如何正确认知我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精神特质,增强文化自信,既关乎社会成员的自我确证与价值观判断,也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化和凝聚力。因此,从认知维度探寻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与逻辑理路,对推进我国新时期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

一、文化认知:文化自信构建的新维度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目前学界对文化认知主要有两种释义:一是以文化本身为研究主题和对象,挖掘并分析其认知理据,如对文化的价值、功能及其思维叙事方式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二是强调文化框架对认知和心灵的塑造性,进而给出各种文化因素的描述和诠释。两种解释相互关联且相互融合,本文则更侧重于从认知科学的认识论角度把握认知体系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微妙关联。

1. 认知研究的文化转向

自人类学揭示了认知活动的文化属性并将文化因素带入认知视野以来,学术界便开始从各种不同视角探讨文化因素与认知机制之间的关系,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个体认知和行为中的文化特性得到重视,同时也影响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021YY174);山西省高校教改创新项目(思政课)“传承与创新:山西红色文化资源和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耦合与融入路径研究”(2021JGSZ016);山西财经大学教改项目“新时期山西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SJ2021002)。

作者简介:管云波,女,山西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6)。

了认知科学的人文走向,为文化与认知活动之间关联性的继续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认知科学对文化因素在认知活动中的涉入研究是基于对传统认知范式的批判而提出的。在传统认知范式的研究中,认知被视为大脑内部对外在事物的信息加工过程,其认知理论、方法、结论等具有普遍性意义,可应用于一切认知环境。这种基于理性思维过程或“计算—表征”模式的认知观仅强调认知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认为认知结果越真实就越准确,以此达到认知的目的。这种认知观忽视了认知过程中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很难体现人们之间真实的思想交流,也很难真实再现人们基于感知运动系统的认知,无法得出关于“感动”“高兴”“冷暖”等感知信息,因此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传统研究范式之后的认知理论则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认知活动的情境之维、社会之维、文化之维,论证了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知科学内逐渐发展形成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以及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等4E认知模式可以概括这些认知框架。综合来看,这些理论的研究表明: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会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认知活动的许多根本性特征必须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等层面进行研究和揭示,而且认知心理过程“仅当与其主体头脑之外的特定环境合作时才能发挥其被设计的功能”^[2]。这就肯定了外在社会环境因素与认知之间的相关性,体现了二者之间由相互独立到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认知领域的变化趋势逐渐呈现出认知的文化论理念,凸显了认知过程中的文化底色。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内在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中,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领域,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显性方面,也会无意识地作用于人们的知觉、价值观以及互动模式,使认知主体形成特定的心理思维模式。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对所处世界有了统一的认知,而且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整体的、动态的,这就决定了认知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客观的表征过程,必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态度。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言,人类社会一经产生,人们便生活在一种“‘无缝之网’的文化模式中”^[3],借助文化模式中共建共知共享的标识符号系统,人们一方面可以进

行社会交往、社会交流和社会博弈,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规制。这就意味着,没有所谓的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

2.文化认知之于文化自信的价值意义

进入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进行阐释,且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就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新要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再一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自信既是精神力量的确证,又是知行合一的选择,对其生成机制及重要性的把握需要我们首先对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认知研究的文化转向旨在对人类认知活动加以文化视域的权衡和分析,使文化以“框架”的形式作用于认知主体。可以说,与传统认知范式不同,这种强调外在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认知思维具有重要影响和规范作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无疑对于提升文化认知水平、生成并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认知对文化的认知过程预设了认知主体与外在环境的分离性,试图通过纯粹个体性的抽象符号运算过程探索文化的产生、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不受他人意见左右,免受外在环境影响,仅仅通过大脑内部操作获得文化知识和观念。这种基于个体内在认知视角的认知是符合文化研究发展的有效尝试,人们可以通过单向的理论学习和知识输入,增强对相关文化知识内容的了解与认可。但同时也会因缺乏基于真实语境的理解和研究而不能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感染力,甚至会因阻断了认知主体与环境的关联而使人们产生对文化内容的逆反和抗拒,导致无法准确获得相关文化的真实面貌,更谈不上形成基于文化认知的文化自信。

文化认知既是对传统认知范式的反思和超越,也是在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的有益补充,其认知过程可以概括为:首先,必须要承认,大脑是信息的核心处理系统,心智是认知系统或认知过程的内在因素和核心因素,认知主体在认知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其次,还要关注文化这一环境性因素在认知过程中的参与和影响,它们既可以作为认知关注的对象,又是融入认知系统的重要外在因素,同时认

知主体与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实践也会影响主体的心智与认知,包括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果。

据此可知,文化认知使认知的动态过程得到更为完整的体现,可以为认知系统的整合、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一种更优的逻辑理路与思维方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提升文化认知水平,形成并增强文化自信,不能仅专注于大脑内部的计算表征,对人们进行术语、概念、理论等静态文化知识的传递和灌输,还要注重外在文化情境对认知的深化和推动,强调在实践情境中对文化观念的深度把握和理解,致力于通过“外在的”文化力量将关于文化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以及精神内涵等进行“内化”,使其入脑入心。

二、文化认知影响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

文化自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必然要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在文化自信的生成中,文化认知是其前提与基础,如若不对我国文化的基本事实进行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其逻辑结果必然会失去民族自信、国家自强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基石。

1. 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批判、反思、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4]显然,文化自信首先属于心理学范畴,然后才是其他学科的范畴。就其生成逻辑和发展路径而言,文化自信的生成发展需要按照一定的心理发展机制,在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等重要环节的有机整合中得以实现,其中,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准备阶段和逻辑起点,具有指向性作用。

首先,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直接相关。通常而言,认知的本质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是认知主体通过对外在事物的信息分析整理,逐步获得相关知识的过程。由此推之,在文化认知过程中,通过对特定文化信息的加工,认知主体既可以获得关于文化内容、文化发展脉络等基本信息,还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把握文化所蕴含的内在深层价值及意义。与文化认知的相对客观性相比,文化认同主要体现的是认知主体对文化的内容体系、基本价值以及逻辑体系的一种肯定性的态度行为和深厚的文化情感,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如若没有

对文化准确深刻的认知和把握,就无法激发向文化认同转化的情感动力,如若没有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性体认,文化自信就会因此失去文化认同的精神支撑和根基,成为妄自尊大的空中楼阁。

其次,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和盲目认同,而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5],在自文化与“异文化”的接触交流和比较中所彰显出来的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由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的跃升,还要基于对多重文化形态的全面了解和理性审思,在接触并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位置,促进自身文化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实现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环节,培育认知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它既是文化认知与文化认同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内驱力,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可能。

从发生路径来看,文化自信的生成是以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自觉为基础不断演进和整合的漫长过程。作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起点,直接影响文化内容的理解、文化价值的认可、文化潜力的判断乃至文化自信的构建。

2. 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构成

文化自信的生成是建立在认知主体对自身文化资源的整体构成、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以及价值理念等基本事实的全面准确认知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文化自信本身也蕴含着文化认知,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背后的依据和构成部分,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指向。

一方面,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可以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铸就文化辉煌,同时文化自信又来自于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准确认知和定位。通过文化认知,认知主体可以结合时代特点与趋势对自身文化的全部内容要素及其深层内核进行辨别、判断与筛选,及时摒弃文化糟粕,使文化自信的生成基础仅来源于适应并有利于时代发展的优秀文化资源部分,可以说,文化认知也是文化自信的内容构成。另一方面,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保障。文化自信立足于文化认知,而由文化认知向文化自信的转化轨迹总是与认知主体的文化认知水平、认知程度和认知层次直接相关,文化认知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认知效果,进而影响文化自信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文化自卑抑或是文化自负,其实都

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大都源自于认知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偏差,也都无法彰显自身文化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因此,如若缺乏对自身文化进行准确把握和系统分析的能力,文化认知则最终很难转化为文化自信;如若对自身文化所知甚少,缺乏深入了解,那么所谓的文化自信建设也只能是流于形式、肤浅失实,很难形成真正持久的文化自信。

从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可知,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依托,文化自信是文化认知转化的结果,是文化认知更高层次的肯定和尊崇。唯有从认知方面矫正文化自信的缺失,对自身文化拥有客观深刻的认知和觉悟,才能固本强基,形成真正的自信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3. 文化认知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在文化问题上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精神状态,它体现为观察、思考和推动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直面世界的从容、开创未来的坚毅。”^[6]当前我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创新发展,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文化认知对文化自信的重要影响在我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不断增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具体来看,我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得益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三个方面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认知层次愈发深入。

作为我国文化的主体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新时代治国理政仍可以从“找到应对乃至解决一些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挑战及问题的思想质料”^[7]。将传统文化置于历史语境中还原其本来面目,并以时代性为现实依据对其中的积极因素与精华部分进行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这是准确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可以“古为今用”的正确路径。需要注意的是,曾在革命时期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革命文化在新时代依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革命文化集体记忆的缺失会影响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致使虚无主义滋生以及社会价值观断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代表着当前时代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文化取向,其强大的价值能量引领我国文化朝着更加健康繁荣的方向不断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力量。因此,坚持三种文化并举,充分认知其价值意蕴,是我国文化自信得以彰显的应有之义。如若只钟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则会导致文化建设陷入“复古

化”沼泽,甚至引发认同危机,产生文化自负或文化自卑。

文化自信同时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辐射过程,“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的文化,总是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借鉴、吸收各种优秀文化”^[8]。当前,愈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基于我们对西方等外来文化秉持包容的态度和辩证的认知,具有在推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的文化辨别能力,使中华文明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获得滋养,同时保持自身独特的精神特质。设若完全推崇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则会导致我国文化根基被解构,陷入“西化”风险;设若简单拒斥一切西方文化,则又会走向文化封闭,这两种极端皆为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另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和发展前景的确认亦是不断夯实文化自信认知基础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兼具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范式。我们既可以对其进行理论阐释,挖掘其内在创造力、生命力等精神力量,也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情境,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充盈的精神底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如果仅专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静态解读而不扎根于中国实践,就会产生文化建设“教条化”问题,难以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更谈不上建立更加持久、坚定、包容、与世界相携相拥的文化自信。

三、文化认知视域下实现文化自信的路径透视

文化自信是我们不断追求的应然状态而非既定事实,尽管我国文化自信正处于重建和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但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充分的文化认知既非一成不变,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形成的。文化认知的理论框架则可以为全面提升文化认知水平,实现并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模式和分析视角。在文化认知理论的观照下,认知活动凸显了人文主义的话语形态,既强调人的主体性要素,也内含着社会文化环境要素,正是这些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使文化自信成为可能。

1. 尊重文化认知中认知主体性的发挥

认知过程是认知主体面对认知对象刺激时处理外部信息的过程。就认知主体而言,作为有生命、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存在,其认知主体性的发挥

直接关系着认知范围的扩展和认知层次的深化,决定着文化自信的建立。

认知主体性是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特性和机能,亦即人的自觉能动性。班杜拉(Bandura)曾在其研究中强调了这一核心主张:“人是自我组织的,主动的,自我反省的和自我调节的,而不仅是由外界环境所塑造或由潜在内驱力所驱动的反应机体。”^[9]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具有计划性、意向性、反思性、目的性等特征,蕴涵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对应到文化领域,文化认知绝非认知主体依靠一系列刻板指令对外在文化信息进行机械计算和信息转码的接受过程,而是其以主体价值和目的为认知导向,有选择的、创造性的、主动实践的结果,认知主体的文化背景、经验、情感、价值观等因素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文化认知过程和结果。

一方面,文化认知过程包括注意、感觉、知觉、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在此过程中,作为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认知机制,注意从一开始就具有指向性和优先选择性,直接决定着认知主体对零散的文化资料的初步筛选,形成对各种文化资料的感觉和知觉,并把握其文化属性。继而,结合认知目的和认知需求,认知主体通过理性判断、推理、反思等思维机制的再加工和创造,进一步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探知文化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关联,并将其逐步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构成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这也说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抑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弘扬与实践都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彰显了认知主体性。另一方面,就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文化本身而言,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偏倚,均是不可取的。文化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也没有自卑或自信等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人的自信,是人们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和基础上,赋予自身文化以认同、肯定的主观感知和情感感受。情感作为影响认知对象选择和认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刺激文化自信生成的重要媒介,如果忽视了人的认知主体性,就很难通过文化情感引起普遍持久的文化共鸣,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强国的建设者、文化自信的承担者,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并尊重其主体性的发挥,提升全民族文化意识,才能谈得上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情感与坚定信心。一方面,

可通过鼓励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参与文化建设,真正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落到实处,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力量,促进文化繁荣,激发文化自信的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接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精神思想上给予人们相应的指引,厚植全社会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此外,还可以通过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改进文化的宣传和传播方式,使文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促进人们的文化认知,培育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2. 注重文化认知中社会文化环境的构筑

每个社会的文化系统都有其独有的文化特质,以这些文化特质为核心会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并提供“一整套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则”^[10]。因此,环境因素作为认知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知的方向和强度。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认知水平,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强调个体认知主体性的发挥,也要正视文化环境变量所给予的影响与冲击,要将文化认知过程置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个体心理和文化环境之中。

在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中,社会成员往往会逐渐趋于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较为一致的道德评价以及行为方式,其最终还会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文化认知图式。文化认知图式在认知过程中有助于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使其可以继续对新事物进行判断、推理、回忆等心理活动,达到文化认知的目的。当前,我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发展和积淀,已经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独立自主、和谐创新、科学合理的文化内核和文化模式,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模式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个体认知图式,使个体对国家整体文化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形成和发展,个体价值观在逐步的文化认知过程中得到启发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自信在熏陶影响中逐渐树立、增强。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提升社会文化认知水平并形成文化自信,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文化在具有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亦具有跨民族、跨地域的差异、碰撞、渗透与互融等特性,尤其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文化碰撞更加频繁。因此,个体认知图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具体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不断调整变化。具体来看,就当前各国之间文化互动与较量不断升级的现状而言,面对一些外域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的碰撞,各种观念交相陈杂、多种思想同时并存、不同声音激烈交锋,这种

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会导致认知主体认识模糊、思想迷惑、道德滑坡,威胁认知主体既有的文化认知图式,导致其对我国主流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和误解,甚至陷入文化焦虑。

鉴于人们的认知图式受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而总是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其认知活动也因此呈现为多维度的、动态的过程,打造良好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提高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信息量,就成为构建并完善文化认知图式,增强文化自信保障能力的应有之义。从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需要通过系统、立体、多方位的教育和文化治理,从多种视角引导认知主体理性认识社会中所呈现的多种样态文化的特性、功能及其精神内核,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与标准,为实现并坚定文化自信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多样化的宣传与传播继续完善主体文化认知体系,持续性地向社会成员渗透我国主流价值观,并以此为基本价值向度对庸俗的消费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进行匡正,深化人们的文化认知。此外,还应注重文化产业的载体作用,在国内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要注重通过国际文化市场进行产品输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这样一来,当认知主体面临复杂的文化环境或观念冲击时,大脑中既有的认知图式和已形成的稳定的、正确的价值观就能使其澄清思想误区,扫除认知障碍,在多重文化形态的交相呈现中保持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高度认同。

3. 重视文化认知中文化实践活动的开展

环境因素之于认知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认知并不单纯来自于主体经验,也不纯粹产生于外在环境,它是在认知主体与具体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认知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化,无论是维果茨基的内化理论、吉布森的知觉心理学理论,还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都强调了这一观点,并试图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阐释认知活动。实际上,就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而言,文化本就不是静止的、形而上的产物,它依托生动的实践活动,源于现实生活以及人们与外在环境要素的交互作用中。因此,“文化不仅是一种表征系统,更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实践系统”^[11],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方能有效彰显,只有在特定文化实践活动的持续交互渗透中,文化认知水平方能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方能实现。文化实践活动是通过运用实践活动的形式来表

达或创造观念形态文化及其精神的对象化活动。借助文化教育活动、艺术作品、文化产品等物质载体,认知主体可以身临其境,在实践中加深对文化理念及其精神力量的体验和实际性影响,如若缺失了文化实践的推动,则很难实现由观念形态的文化向文化自信的转化。

具体而言,实现并增强文化自信的落脚点是培育一代代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共享文化成果可以在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同时,提升文化亲和力,使全体社会成员参与进来,融入进去,在文化浸润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并坚定文化自信。就文化实践的参与主体而言,其范围几乎涉及包括教育行业、新闻媒体行业、文化产业以及普通社会群众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而且“文化实践作为一种‘绝对创造性活动’是与文化以及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2],对社会影响至深,直接关系几乎所有社会成员对文化的深度认知与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反观以文化实践活动为载体的文化认知过程,其并非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完全表征的映射过程,而是主体和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动态耦合过程,社会相关部门、机构或工具等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各自承担着增强主体认知水平的功能。各种社会力量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的普遍参与和相互作用,体现了认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分布及其与社会各系统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涵盖了社会成员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实践作用,也强调了外在环境在文化认知过程中的参与和强化作用,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所有社会成员在文化共建的同时也能共享文化实践成果。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需要更高质量、更丰富、更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需要在掌握观念形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实践活动感受文化的实质性内涵和深层次的精神要领,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基本要求,防止文化实践活动因为偏离正确方向而失去意义。二要根据具体的文化内容及其价值意义,实现文化实践活动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凸显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以防因重形式、轻内容等作风问题而使认知主体难以达到由内至外、内外兼修的学习与认知目的。三要凸显文化实践活动的特色和风格,根据时代特点进行不断创新,彰显文化自信,避免因丧失吸引力而陷入千篇一律的尴尬模式或成为迎合潮流的标语。

结 语

文化既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气质、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关系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话语权。因此,当前多元文化共存语境下,文化自信的重建和提振从来不是纯粹文化领域的问题,它始终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在世界秩序重塑过程中,“文化权重上升已是国际共识,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权力结构体的构成”^[13]。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赛道上持续发力,还要以文化自信焕发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以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向,都是从不同视域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的使命担当。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发展道路、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凝聚精神力量,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争夺世界文化竞争制高点,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此,既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不断深化研究,也需要在实践领域持续深入探索。鉴

于此,从微观的认知维度探寻文化自信得以生成的有效路径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先导性作用。通过搭建通向文化自信的桥梁,一个个认知个体文化自信的实现会逐渐上升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最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2-43.
- [2] ROWLANDS.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0: 3.
- [3]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408.
- [4] 刘林涛. 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4): 21.
- [5]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 1997(3): 22.
- [6] 沈壮海, 张哲. 厚植中华民族奋力向前的文化自信[N]. 光明日报, 2016-07-19(4).
- [7] 马立志. 深入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内涵[J]. 理论探索, 2021(4): 47.
- [8] 任理轩. 文化自信何以更加坚定[N]. 人民日报, 2022-09-29(9).
- [9] 班杜拉. 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社会认知论[M]. 林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
- [10] 库珀, 库珀.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M]. 林勇军,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61.
- [11] 乔瑞金. 试论霍加特文化生成的辩证法思想[J]. 哲学研究, 2016(6): 87.
- [12]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8.
- [13] 范玉刚. 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 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6): 37.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gnition

Guan Yunbo

Abstrac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a more enduring and profound streng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which is not only the key to realizing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its generation path, cultural cognition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ccording to cognitive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s, cultural cognition is a new definition of cognitive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cognitive paradigm, which can provide a convincing explanatory mode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Under the cultural cognitive theory, cognitive activities highlight the discourse form of humanism, which emphasizes both the elements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elements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is the joint effect of th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mak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possible.

Key word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cognition; cognitive subjectivity; cultural environment; cultural practice activities

责任编辑: 翊 明

实践理性之刚柔辩证：儒家勇毅的现代义理

张方玉

摘要：勇毅之德的直观印象是勇敢、坚毅，而在深层本质上，儒家的勇毅乃是刚柔辩证的实践理性。根据“仁者必勇”和“刚毅近仁”，容易将勇毅之德判为依附于仁义的德性，勇毅之德的相对独立性由此受到削弱，但勇毅本身依然是“自成目的”的道德，这可以视为“依附性”与“独立性”之辩证关系。儒家将勇敢区分为匹夫之勇、贾盗之勇、士君子之勇等各种不同的类型，探讨了武力之勇、商贾之勇、治理之勇、成人之勇等诸种形态，进而呈现出“勇者不惧”的精神气魄和“君子之勇”的德性底蕴，这可以视为“小勇”与“大勇”之辩证关系。“刚毅”和“扰而毅”可以概括儒家弘毅的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勇猛坚强，二则忍耐持守。既要硬脊梁，又要守得住。刚毅之德充实有力，较易彰显；沉毅之德动心忍性，较难发现，这可以视为“刚毅”与“沉毅”之辩证关系。在刚柔辩证的维度探讨勇毅之德的现代义理，是推进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勇毅之德；仁者之勇；君子之勇；刚毅；扰而毅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090-08

儒家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勇”的地位自不待言，然而儒家对于“勇”又多有保留。孔子讲“仁者必有勇”，又讲“刚毅木讷近仁”，勇毅之德与仁德的关系清楚呈现。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孔子所赞许的勇，是君子的刚毅，和勇于为大义而献身”^[1]。勇敢与刚毅之间便有了一种内在的关联。《荀子·非十二子》中明确有“刚毅勇敢”的表述，《中庸》也讲“发强刚毅”，因此将勇与毅并联起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柏拉图认定人的灵魂有三种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以理性对应智慧，以意志对应勇敢，以情欲对应节制，进而达成和谐的正义，并推及国家与社会。亚里士多德将勇敢视为怯懦与鲁莽的中道，勇敢成为一种正确和适度的品质。相比之下，儒家勇毅的提法具有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既包含勇敢——意志力与行为中道的意思，又包含弘毅——动心忍性、任重道远的意蕴，还与仁、义、礼、智诸种德性难解难分，从而形成勇与毅的辩证统一。

一、仁者必有勇：“依附性”与“独立性”之辩证

勇敢作为诸德性之一，是否具有“独立性”，这在现代伦理学看来，似乎是个伪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序列中，勤劳、勇敢、敬业、诚信、正直、谦虚、友爱、乐观、进取等各种条目不胜枚举，不难发现，每一种德性都各自拥有自身的特质，意味着相对独立的道德品质。以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而言，勇敢自然也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德性，并不存在勇敢依附于其他德性的问题。柏拉图将勇敢视为灵魂中意志的美德，又将勇敢视为武士阶层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则更加明确地在怯懦与鲁莽的适度上界定勇敢的品质，可以说，这样的勇敢是独立而没有依傍的。孔子讲“勇者不惧”，以此与“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并列，表现出三者各就各位、

收稿日期：2023-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研究”（17BZX063）。

作者简介：张方玉，男，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曲阜 273165）。

守土有责的意义,所谓“不忧”“不惑”“不惧”显然具有不一样的指称内容,因此可以说,这里的勇敢也是独立而没有依傍的。然而,孔子又讲“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者必备勇德,而勇者并不必备仁德,由此人们便很容易形成一系列推论,例如,仁者兼容勇者、仁德包含勇德、勇依附于仁等。于是,勇敢是“独立”还是“依附”的问题便出现了。

不仅如此,儒家典籍对“勇”的论述常常颇有微词,或者持保留态度,或者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直接加以批评。孔门之中,子路勇敢,对此孔子的评价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子路对于勇敢有两个经典问题:一是“君子尚勇乎”,二是“子行三军,则谁与”。而孔子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都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190}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2]68}

人们或许会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的根源不在于“勇”而在于“无义”,但实际上,孔子确实常常是将“勇”与“乱”放在一起说的。比如,在《论语·阳货》中有“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的说法,在《论语·泰伯》中有“勇而无礼则乱”的说法。此外,《论语·泰伯》中有“好勇疾贫,乱也”之说。这就是说,但凡“勇”之所在,倘若“无义”、倘若“不好学”、倘若“无礼”,“勇”几乎就是“乱”的同义词。而对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之类的勇敢,孔子的态度更为明确——“吾不与也”。还可以看到,在孟子、荀子那里,这样的态度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曾列举出世俗的五种不孝之行: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4]200}。

其中就有“好勇斗狠,以危父母”的行为。荀子将“勇而无惮”视为“天下之所弃”的错误行径,又讲“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乃是“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之事。

这些情况表明,儒家论“勇”具有深刻的批判视角,总是力图以仁、义、礼、智等德性发挥价值引导的

作用,从各个方面对“勇”进行规范和制约。进一步而言,儒家所论之勇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涵盖了敢于行动的各种情形,如“暴虎冯河”“好勇斗狠”之类的鲁莽行为,那些狂妄、莽撞、冲动、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恶行似乎也都归结在“勇”之名下。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所谓“勇”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行为区别明显,亚里士多德之勇是怯懦和鲁莽的中道,而儒家所论之勇却包括了鲁莽在内的宽泛行为。正因为如此,儒家总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勇”进行规范和制约,从而赋予“勇”以“德”的属性。如此这般,“勇”与“勇德”实际成了两个概念,“勇”是敢于行动的勇气、勇力,主要发挥的乃是工具性的功能,其价值性的功能仿佛是缺失的,从“勇”到“勇德”的升华离不开其他德性的加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确是消解了“勇”的独立性,并使之尽可能地依傍、依附仁义礼智等其他德性。儒家常将仁、智并提,而在仁、勇之间,却似乎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个体德性的层面上,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仁智统一;然而,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却是成了仁勇之辩。个体德性层面的仁勇之辩推及国家社会层面,逻辑地演化为王霸之辩:“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胡秋原先生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时曾经说:“以中国而言,四五千年来,帝王将相,真不可胜数。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概多半记得尧、舜、禹、汤、文、武,因为他们是有学问的皇帝;记得周公、管仲、萧何、韩信、李广、卫青、班超、诸葛亮、魏徵、李靖、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岳飞、刘基、张居正,因为他们是有学问的宰相或将军。”^[3]这里列举了许多有赫赫战功的将军,按照一般的逻辑,勇敢应是将军武士的基本德性,但人们脑海中的勇敢印象似乎并没有那样深刻,大约与儒家的观念态度密切相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勇”之独立性的消解,可能造成个体人格塑造中的某种缺失,比如,少了一些“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敢作敢为的冲劲”,少了一些“血性”“胆色”“抗争”“开拓”“进取”,多了一些“软弱”“忍耐”“圆滑”“知足”“保守”,这是应当深思的道德文化问题。

以上侧重阐述了儒家之“勇”的依附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德性问题,那么,“勇”在儒家是否具备成为独立性品德之可能?如果将“勇者不惧”作为儒

家德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勇德”之独立性理应是成立的。时穷节乃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论语》记载了孔子“不惧”的经典事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72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88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勇者不惧”表现为“天生德于予”的底气,表现为“其如予何”的信心;匡人以兵围孔子,“勇者不惧”表现为“天之未丧斯文”“斯文在兹”的信念。这样的勇气,孟子那里也有经典的呈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298

可以发现,儒家之勇在这里表现为临危不惧、泰然处之的情感、意志和行为,表现为“动心忍性”的道德实践,显然可以认为是区别于仁义礼智的独立品格,这是一种冲破阻碍克服困难的能力。“在挫折中求生存,固然要有勇气,在挫折中要求实现理想,更需要勇气。任何大小的成就,勇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必一事无成。”[5]除此之外,儒家之勇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勇”表现为行动的能力;再比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勇”成为人格品质的表现。“仁智兼备而弱于道义实践力,即为欠缺勇气的明证。从仁学实践认识论角度看,勇仍是独立于仁与智的品德。”[6]应当说,这些有关“勇”的记述,分别呈现出“勇”的多重向度——勇气、勇力、勇德,既表现为情感力、意志力,也表现为行动力,这是构成儒家“勇”之独立性的基石。

在宋明儒学那里,“勇”之独立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对“三达德”的阐发中,二程认为“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儒家之“勇”着重体现为行动力;朱熹则讲明理所以不惑,战胜私欲所以不忧,而勇气与道义相配所以不惧,儒家之“勇”着重体现为意志力、精神力。

在现代儒学中,“勇”之独立性意义获得进一步的彰显。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更加凸显以“毅”释“勇”,“勇”与“毅”内在构成一个整体。胡适先生在《说儒》中提出,孔子改变了传统的儒者,形成了一种“弘毅”的“新儒”,认为孔子提倡的新儒者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

下重任的人格”[7],而不再是那种“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之柔儒的儒者。很明显,这里的刚毅勇敢必然是将那种鲁莽之勇排除在外的,勇毅意味着儒者人格的一种理想。梁漱溟先生推崇“刚”的哲学,认为“刚”是内在气力极为充实的样子,是一种奋勇向前的势头,而“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全露出一个人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的样子”[8]。并且,梁漱溟所谓“阳刚乾动”的态度还明确排斥“欲望的计虑”和“向外逐物的颓流”,勇毅的独立性意义显得更为挺立。

二、威武不能屈:“小勇”与“大勇”之辩证

孟子“好辩”,曾在不同情境中表述“无好小勇”与“夫子大勇”,“小勇”与“大勇”之辩已然隐约其间。朱熹作注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9]215“小勇”与“大勇”之辩一目了然。在荀子那里,还有另外一种表述——“上勇”“中勇”“下勇”,称谓虽然不同,内在机理却是相通的。儒家典籍关于“勇”的系统性论述相当丰富,这些论述在各自的语境中含义不同:有的侧重构成要素,可称为“勇之要素辩”;有的侧重社会阶层,可称为“勇之阶层辩”;有的侧重实践主体,可以称为“勇之主体辩”;有的侧重行为活动,可以称为“勇之活动辩”;有的侧重德性境界,可以称为“勇之境界辩”……尽管这些内容相互交叉,比如“勇之主体”与“勇之活动”的论述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但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相统一,对这些论述进行考察仍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样,所谓“小勇”“大勇”就可以成为更加广义的概念,比如,“小勇”可以涵盖“匹夫之勇”“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等,“大勇”可以涵盖“君子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圣人之勇”等。

1.从构成要素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构成要素看“小勇”“大勇”之辩,朱熹的诠释言简意赅:一为血气之勇,一为义理之勇。《论语·季氏》所谓“君子有三戒”,其中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即为血气之勇,是为“小勇”。《孟子·告子上》所谓“舍生取义”,即为义理之勇,是为“大勇”。“勇之要素辩”区分“小勇”“大勇”,这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上文所论“依附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倘若沿着“小勇”“大勇”的思路,问题似乎迎刃而解:血气之勇无

法独立成德,必须依傍仁义礼智诸种德性;义理之勇包含其他德性要素,已是相对独立之“大勇”,所谓“依附性”就不再是问题。进一步而言,“大勇”凭依自身已然具有的各种要素,不仅形成了由血气而生成的意志力、行动力,而且形成了与仁义礼智相结合而生成的意志力、行动力。“从心灵哲学的角度说,勇是一种高度凝练、高度升华了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理性化的,也是持久的,不是凭一时意气用事的,如匹夫之勇。”^[10]显然,此种“高度凝练”“高度升华”的意志力不再是最初的血气之勇,而是理性、持久的“大勇”。在“大勇”的维度而言,显然不会出现“暴虎冯河”“好勇斗狠”的行为,至于“勇而无义”“勇而无礼”“好勇不好学”的情形,显然也不能归于“大勇”之列。孟子有著名的“性命之辩”: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4]333}

“性命之辩”颇为经典、颇受称道,沿着这样的思路,“小勇”“大勇”之辩与此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血气之勇可与口、目、耳、鼻、四肢并列,于是可以说——“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而义理之勇可与仁、义、礼、智、圣人并列,于是可以说——“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若无“勇之要素辩”,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儒家之勇,恐怕难以达成如此深解。

2. 从社会阶层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社会阶层看“小勇”“大勇”之辩,所论涉及“王者之勇”与“匹夫之勇”。齐宣王与孟子对话,惭愧地表示自己“好勇”,孟子提出的意见是——“王请无好小勇”,进而阐述了“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4]31}

“匹夫之勇”是胜敌一人,而“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则是“一怒而天下安”。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匹夫之勇”当是武士之勇或平民之勇,无惧无畏敢于搏杀,可以“赴汤火”“蹈白刃”,而“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则是君王之勇、统治者之勇,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性道德。与齐宣王对话,孟子在这里的“大勇”自然是为君王量身定制的。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谓君王之勇似与柏拉图理想国的设想有所不同。在柏拉图那里,勇敢大体是武士阶层的专属德性,而统治者的专属德性则是智慧,他们似与勇敢并无关联。而在儒家看来,圣王之勇应是很自然的事。这里人们会发现,儒家之“大勇”已将战斗之勇、战争之勇悄然转化为政治之勇,所谓“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即为典范。

3. 从实践主体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实践主体看“小勇”“大勇”之辩,荀子列举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进行阐述,精准到位。很明显,所谓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可归为“小勇”,士君子之勇可归为“大勇”。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恇恇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恇恇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11]28}

这里需要注意,人是实践的主体,狗彘并不能作为主体,然而社会现实中,也确实有所谓猪狗不如的鲁莽行为,因此用来形容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主体,大体也可以理解。相比之下,《庄子》通过孔子与子路的对话所描述的勇者,涉及社会生活各种职业身份,文辞优美,亦为“勇之主体辩”的经典表述:

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12]

这里所列举的“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圣人之勇”,可与荀子的论述相互参照。依照儒家“勇”之内在理路,基本可以判断,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当属于“小勇”之列,圣人之勇毫无疑问,自然是“大勇”。还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论“勇之阶层辩”,涉及“匹夫之勇”“君王之勇”,也本应包含在“勇之主体辩”中,乃是为了突出其阶层性、政治性而单列出来,这样更能展现儒家的政治之

勇。“勇之主体辩”深刻表明,儒家推崇的“大勇”是圣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而非武力之勇、战争之勇,“圣贤之勇”始终高于“英雄之勇”。这种情况似乎与英雄崇拜、圣贤崇拜内在相通。“我们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便想到他是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的圆满性。但当说孔子是一个英雄时,我们便想到他一生发愤忘食,自强不息,战胜种种困难的经历。”^[13]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儒家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之所以在辩证的维度探讨这个问题,是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使之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精神。

4. 从行为活动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行为活动看“小勇”“大勇”之辩,上文已多有呈现,比如匹夫之勇、君王之勇,或者贾盗之勇、君子之勇等。一定的道德行为总是一定的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从实践主体、行为活动来考察“大勇”“小勇”,只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差异,道德主体与道德活动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儒家典籍中,也有一些道德行为的描述并没有设定明晰的道德主体,人们虽然不能明确行为主体的具体身份,但大体也能推测道德行为主体的轮廓。比如,荀子有“上勇”“中勇”“下勇”之论:

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11]303}

这里对于“上勇”“中勇”“下勇”的行为实践均有详细入微的阐述,尤其是描述“上勇”文字最多、场景丰富、行为具体多样,但若要明确“上勇”之主体承担者,仍然是困难的。或许是君王之勇,或许是士君子之勇,抑或圣人之勇。“中勇”与“下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勇”“小勇”采用二分法,“上勇”“中勇”“下勇”则是三分,那么“中勇”如何划归?从“中勇”的行为来看,似乎归为“大勇”更为合适;但与“上勇”相比,似乎归为“小勇”也是可以的。这样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道德行为并非适用“大勇”“小勇”的二分法,这种行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因此对于辩证分析儒家之“勇”而言,“中勇”的提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5. 从德性境界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德性境界看“小勇”“大勇”之辩,儒家之“勇”就超越了一般的行为、品质的意义,进而上升为一种德性的、生命的境界。以境界论勇,是儒家之“勇”的重要特质,这里的“勇”通常起点较高,那些单纯的血气之勇已基本排除在外。所谓“勇”之境界高低,通常是以其中蕴含的义理、气象、格局而言的,最后可以达成“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情形,于是“勇气”升华为“浩然之气”。孟子列举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展现出“勇”的两种境界: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4]61}

孟子评价两人之勇,说“未知其孰贤”,但又说“孟施舍守约”,大约孟施舍之勇层次更高。孟子评价孟施舍似曾子,接着又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这意味着曾子之勇层次又高一些。而曾子讲“尝闻大勇于夫子”:“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怵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4]61}不难发现,北宫黝、孟施舍之勇已不仅是单纯的血气之勇,再加上“守气”“守约”,自是具有一定的境界,但与“夫子之大勇”相比,应该仍可称为“小勇”,这是境界论视域中的“小勇”。

“勇之境界辩”在宋代儒学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论点便是“颜子大勇”。

问:“颜子勇乎?”

曰:“孰勇于颜子?观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孰勇于颜子?如‘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之类,抑可谓大勇者矣。”^[14]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出自《论语·泰伯》,程颢、程颐据此演绎出“颜子大勇”论,这实际上体现了宋代儒学的气象。进一步而言,这里所论之勇,已经不再拘泥于何种阶层、何种身份、何种行为,而是更加着眼于一种人生的境界。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中具有坚实的底蕴——“大勇”,可以称之为“大丈夫”。

夫之勇”。钱穆先生讲：“当知孔子之得终其天年，不仅是大智，而且还得需大勇。”^[15]此种“大勇”便是在生命境界而言的。

三、任重道远：“刚毅”与“扰而毅”之辩证

近年来，社会生活中常常使用“勇毅前行”一词，据说还被媒体评为年度流行语。曾几何时，人们使用较多的则是“勇往直前”，两者对照，“毅”字凸显。尽管两者意思相近，但“勇”“毅”相连，语义显得更加饱满深刻。《说文解字》讲“勇”字“从力”，讲“毅”字“从殳”，是“妄怒”或“有决”的意思，如此来看，《说文解字》中两字的差异性较多而关联性较少。《尚书·洪范》有“三德”之说：“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在刚柔辩证的意义上说，“勇德”与“毅德”二者之间似乎亦有此种辩证关系：“勇德”多有刚猛之底蕴，“毅德”多有柔韧之底蕴；“勇德”侧重敢做敢为之行动力，“毅德”侧重长远持久之意志力。

众所周知，智、仁、勇并称儒家“三达德”，看起来“勇”之影响力要胜过“毅”，但儒家论“勇”多有保留。而《论语》有名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弘毅”与“刚毅”广为学者推崇，且为有志之士身体力行。上文从构成要素、社会阶层、实践主体、行为活动、德性境界等方面考察儒家之“勇”，实际上也就展现了儒家推崇“大勇”之本质所在，“大勇”即为“义勇”，“大勇”与“刚毅”内在相通。然而，当人们在使用“刚毅”一词时，其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前追溯，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已经出现“扰而毅”之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16]

禹与皋陶对话，皋陶提出“行有九德”，“扰而毅”就是九种德行之一，其意是和顺坚毅。仅就字面而言，不难发现，所谓“弘毅”“刚毅”与“扰而毅”已然展现出“毅”的三种意思。进一步考查典籍中的“毅”，还可以发现，“毅”实在是一个变化复杂的概念。《左传·宣公二年》论及“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毅”有“果敢杀敌”之意；《国语·楚语下》论

及“强忍犯义，毅也”，并认为“毅”是一种“华而不实”之德。而在《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等典籍中，对“毅”的注释和理解又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注释与理解，可以在刚毅、无欲、弘毅、进取、果敢、决断、扰毅、和顺、忍耐、沉毅、强忍、坚守等诸多方面对儒家“毅德”进行诠释。在这一系列对于“毅德”的诠释中，“刚毅”“弘毅”“扰毅”“沉毅”大体呈现出“毅”的四种典型形态，而“刚毅”“弘毅”颇有“刚克”之意，“扰毅”“沉毅”颇有“柔克”之意。

现代语境中的“刚毅”是一个合成词，这与“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的表述方式有所差别。后者的表述是四个单字，代表四种“近仁”之德：刚者无欲，毅者果敢，木者质朴，讷者迟钝。不难发现，“刚”与“毅”意义相通，“木”与“讷”意义相通，于是四个单字很自然地合成两个语词：刚毅、木讷。上文已经提及，刚毅的意思是复杂和变化的，这不仅是指从单字到语词的演化，还表现为不同文献中的语义变化。《荀子·非十二子》讲：“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刚毅”与“勇敢”合在一起，成为备受推崇的德行，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还带上了“不以伤人”。《中庸》亦讲：“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发强刚毅”被抬升到“天下至圣”的重要德行，其意义在于“足以有执”。

如果说《非十二子》与《中庸》中的“刚毅”是在诸种德行的并列中呈现的，那么，《礼记·儒行》则给出了一个独立而系统的呈现：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溇，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17]

这里的“刚毅有如此者”仿佛是影视中的特写镜头，儒者“刚毅”的意志力、行动力可以说是获得淋漓尽致的表现。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行》的“刚毅”不仅仅体现出一种“刚性”，而且清楚地呈现出刚柔辩证的特质：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此种“刚毅”乃是一种不纯粹的“刚毅”，是一种“刚中有柔”的辩证统一的“毅德”。

实际上，今天我们使用的“刚毅”常常突出“刚”的意思，这与《儒行》之“刚毅”有所不同。《论语·

公冶长》记录一段关于“刚”的经典对话：

子曰：“吾未见刚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2]46}

这段对话意味着儒家对于“刚”的基本理解——“无欲”，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人们也常常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余英时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孔子的“仁”是“刚性”，儒家君子只有将自己种种不正当的私欲净化之后才能真正在天地之间挺立起来；具备此种刚毅的精神，“君子”便能在“仁”的实践中勇猛精进，并永不止息，所以孔子又推重进取的精神^[18]。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常用的“刚毅”一词大体就有两个基本义：一是“无欲”（不屈于物欲），二是“进取”。

“弘毅”出自《论语·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80}

这句话是曾子所讲，深得夫子真传，影响深远，后世儒者多有发挥，诠释亦有差异。字面而言，“弘”一般释为“大也”“宽广也”，“毅”或解为“强而能断也”，或释为“强忍也”。比较来看，程朱理学对此的解读非常深刻，比如程子讲“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9]104}，实际是对“弘”“毅”两字做了辩证的分析。朱熹对“毅”的解读更为丰富、精妙，择要列举如下：

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

弘乃能胜得重任，毅便是能担得远去。弘而不毅，虽胜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

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

不弘，便急迫狭隘，不容物，只安于卑陋。不毅，便倾东倒西，既知此道理当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当恁地，却又不能割舍。

毅却是发处勇猛，行得来强忍，是他发用处。

又问：“‘死而后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则未死已前，便有时倒了。直到死方住。”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19]

可以说，这些语句无论在什么时候读来，总能使人心生敬佩之意。何谓“毅”？“毅”就是“立脚处坚忍强厉”，就是担负重任且能远行；就是“忍耐持守”，同时还是“着力去做”。“弘毅”使人远离“急

迫”“狭隘”“卑陋”，使人明理并力行、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弘毅”使人在发端的时候能够勇猛进取，在过程中忍耐坚持，终能担负重任、行得远路。由此而言，“弘毅”与“刚毅”皆有“进取不息”之意。

“沉毅”之说出自《论毅力》，编入梁启超《新民说》之十八节。《论毅力》开篇引用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语，推崇之至，赞叹“圣哉斯言”。谈“毅力”的行为表现，梁启超讲“笃信死守，身体力行”。谈“毅力”的实践意义，梁启超讲“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谈“毅力”的两种类型，梁启超讲“刚毅”与“沉毅”：

一曰兢惕于成败，而竭全力以赴之，鼓余勇以继之者，刚毅之谓也；二曰解脱于成败，而尽天职以任之，献生命以殉之者，沉毅之谓也。^[20]

在梁启超看来，“刚毅”注重成败得失，全力以赴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事情的成败得失往往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所以“沉毅”并不执着于成功，而是“尽人力”，投入热情的生命。“沉毅”就是在事业与生命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长期主义”和“进取精神”。这样看来，在梁启超那里，“刚毅”与“沉毅”自然形成了一种刚柔辩证的关系。还可以看到，梁启超所谓的“沉毅”与《洪范》“九德”之“扰而毅”精神相通，“沉毅”摆脱功利主义之束缚，解脱于成败得失；“扰而毅”和顺而坚定，亦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之气象。由此而言，“沉毅”“扰而毅”代表了儒家“毅德”的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同于“刚毅”“弘毅”的德性精神，意味着儒家“毅德”之“柔克”。

儒家的“勇”与“毅”是辩证的统一体，在整体上看，可用“刚毅”释“勇”，从而显现“勇”之刚猛有力，并确保“勇”始终处于“君子之勇”的良性状态。单论勇德，则存在着“依附性”和“独立性”的论争，又有“小勇”和“大勇”之论争。相比之下，“毅”无论是表现为刚毅、弘毅、沉毅还是“扰而毅”，总是呈现出一种儒家仁者之气象。“毅”与“仁”相关联，称为“近仁”；“弘毅”与“士”关联，于是“任重而道远”。还可以发现，宋明儒学对“毅”的阐释中，多用一个“忍”字。朱熹释“毅”，多用“强忍”“坚忍”“忍耐”，似乎颇有委曲求全之意；虽有韧性，但常常容易造成柔弱之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忍”释“毅”之落脚点不在于柔弱退让，而是在于“持守”“坚守”，唯有“守”，方能担负重任且“担得远去”。所谓“不毅”，就是不能“强忍”、不能“持守”，于是重担在肩便东倒西倾，因此不可能行得远。忍耐坚

守,挺直脊梁骨,奋力前行,非“毅”无以致其远。

在刚柔辩证的维度探讨儒家勇毅之德的现代义理,是推进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从表面上看,根据“仁者必勇”和“刚毅近仁”,容易将勇毅之德判为依附于仁义的德性,勇毅之德的相对独立性由此受到削弱,但勇毅本身依然是“自成目的”的道德,这可以视为“依附性”与“独立性”之辩证关系。儒家将勇敢区分为匹夫之勇、贾盗之勇、士君子之勇等各种不同的类型,探讨了武力之勇、商贾之勇、治理之勇、成人之勇等诸种形态,进而呈现出“勇者不惧”的精神气魄和“君子之勇”的德性底蕴,这可以视为“小勇”与“大勇”之辩证关系。“刚毅”和“扰而毅”可以概括儒家弘毅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勇猛坚强,后者忍耐持守;既要硬脊梁,又要守得住。刚毅之德充实有力,较易彰显;沉毅之德动心忍性,较难发现,这可以视为“刚毅”与“沉毅”之辩证关系。由此而言,勇毅之德的直观印象是勇敢、坚毅,而在深层本质上,儒家的勇毅乃是刚柔辩证的实践理性。

参考文献

[1] 陈来. 儒学美德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397.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 胡秋原. 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
- [4]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 韦政通. 中国的智慧[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9: 61.
- [6] 李幼蒸. 仁学解释学: 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57.
- [7] 胡适. 说儒[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9: 62.
- [8]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33.
- [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 蒙培元. 心灵超越与境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40.
- [11] 张觉. 荀子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 [1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65.
- [13] 贺麟. 文化与人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77.
- [14]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11.
- [15] 钱穆. 人生十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5.
- [16] 顾宝田, 洪泽湖. 尚书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21.
- [17] 礼记[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192-193.
- [18]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30-131.
- [19]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997-999.
- [20] 梁启超. 新民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72.

Hardness and Softness Dialectic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On the Modern Meaning of Confucian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Zhang Fangyu

Abstract: The intuitive impression of the virtue of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s bravery and firmness. But in the deep essence, th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of Confucianism is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dialectics. According to “benevolent people must be brave” and “perseverance approaches benevolence”, it is easy to judge the virtue of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as the virtue attached to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the virtue of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s weakened. But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tself is still the morality of “it becomes the goal”. This can be seen a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Confucianists divided courage into various types, such as the courage of rough fellow, the courage of a businessman or a thief, and the courage of a gentleman. Confucianists discussed the courage of force, businessmen, politics, and all-round persons. They showed the spirit of “brave men are not afraid”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gentleman’s courage”.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courage” and “great courage”. Rigid perseverance and flexible perseverance can summarize the two basic aspects of Confucianism. One is brave and strong, and the other is patient and persistent. It is a hard backbone, and it can persist at the same time. Rigid perseverance is powerful and easy to show. Flexible perseverance is reserved and difficult to find. This can be seen a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id perseverance” and “flexible perseverance”. Discussing the modern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dialectics,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rtues.

Key words: virtue of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courage of the benevolent; courage of the gentleman; rigid perseverance; flexible perseverance

责任编辑: 思 齐

儒家养生心法

——以孟子心学为中心

黄玉顺

摘要:从个体生命养护的角度看,孟子的学说可以视为一种养生哲学,其宗旨是“事天俟命”,即养生以事天和修身以俟死。由此,养生获得了终极信仰的意义。就此而论,孟子的“心学”就是一套养生心法。第一,养生就是“养体”,但不仅是肉体的“养身”,而且是养护作为身心统一体的生命体。进一步说,养体的根本不是“养小体”,而是“养大体”,即“养心”。第二,养心包括情感能力、意志能力和理性能力的培养。养心的要领在于“寡欲”,即“有所不为”,亦即排除“不义”的意欲,而专注于“可欲”的意欲。第三,养心的本质是“养性”,即养护自己的天赋人性。养性的步骤是“尽心”以“知性”,进而“知性”以“知天”。“尽心”包括尽情、尽意和尽思,即充分发挥情感能力、意志能力和理性能力。“知性”则是天赋人性的自我反思,旨在“知天”。“知天”包括对内在超验之天和外在超凡之天的认知,这正是终极信仰的养生宗旨的体现。第四,养性的途径是“养气”,即培养浩然正气。养气的根本方法是“以直养气”,即“集义生气”,亦即通过培养正义感来养护生命力。

关键词: 养生;养体;养心;养性;养气

中图分类号: B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098-12

所谓“养生”,指个人通过调养身心来养护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统计 2021》(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1),中国人 2019 年的预期寿命 77.4 岁,健康预期寿命 68.5 岁。至于孟子的时代,人均寿命只有 20 岁^[1]。然而孟子竟然享年 84 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实属罕见的高寿。那么,孟子究竟是如何养生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注意孟子的养生思想^[2-5]。不过,这些零星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将孟子的“养生观”视为孟子思想的局部副产品,而非孟子哲学的整体系统特征。本文旨在阐明:孟子的整个博大精深的“心性之学”思想体系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养生哲学,即其“心学”就是一套养生心法。

养生心法是讲“怎样养生”的方法,但首先要回

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养生?这是养生的宗旨问题。通常以为养生的目的就是“延年益寿”,这其实是肤浅、狭隘甚至危险的想法。问题在于:“年寿”究竟意味着什么?养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养生哲学的首要问题。且不说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的苟活是何等的了无生趣,甚至不乏因为“活腻了”而一死了之的“空心人”;更有某些“养生专家”反而英年早逝,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养生宗旨问题,以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6]2671},结果正如孟云卿《古别离》诗云:“人皆算年寿,死者何曾老?”

孟子养生哲学的宗旨,他自己概括为“事天俟命”: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7]2764}

这里的“夭寿”问题,正是养生的问题。孟子显

收稿日期:2023-03-30

作者简介:黄玉顺,男,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然是说,“事天俟命”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讲:养生以事天;修身以俟死。

(一) 养生以事天

所谓“事天”,是说侍奉天帝,奉行天道。赵岐注:“行与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朱熹集注:“事,则奉承而不违也。”^{[8]349} 在孟子的思想中,“天”即“上帝”^{[9]2675,[10]2720,2730,[11]},而显示为“天道”^{[12]2721,[13]2777};“天”生成了人与万物,即“天之生此民也”^{[14]2738},“天之生物也”^{[15]2709}。孟子说“所以事天也”,“所以”表明:“存心养性”的养生不是目的,“事天”才是目标,养生是为了“事天”。

这是寻常的养生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养生为什么要“事天”?孟子指出,这是因为人的一切,包括寿命,都是天所赋予的,即“此天之所与我者”^{[16]2753},犹如今天的科学认为自然寿命是由先天的基因决定的。所以,自然寿命叫作“天年”。因此,养生的追求,“若夫成功,则天也”^{[9]2681},“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4]2738}。所以,孟子指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2]2720} 养生必须牢记:绝对不能“逆天”,悖逆天道自然。

孟子认为,一方面,种种违背天道自然的做法,尤其企图长生不死、肉身不朽,就是“逆天”;但另一方面,“事天”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否则就无所谓对“养生”的追求。尽管人们的寿数是天赋的,但如果积极地养护生命,那同样是“逆天”,而不能“终其天年”^{[17]27-29,35}。正如孟子所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16]2750,2751}。

具有“事天”的态度,养生也就获得了一种神圣崇高的意义:“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7]2766} 这就是说,养生远不只是关乎延年益寿的事情,而是关乎终极信仰的事情:没有对天的信仰、敬畏,实不足以养生。唯有“事天”的态度,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养生的动力,而避免“空心病”。

(二) 修身以俟死

所谓“俟命”“俟死”,是说等待天赋寿数的到来。赵岐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朱熹集注:“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8]349} 这里的“命”指“天命”及其所蕴含的“寿命”,即人与万物的先天禀赋及其自然寿数,正如子夏所说“死生有命”^{[18]2503}。因此,《孟子》全书两次提到“养生”,

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6]2666};“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10]2726}。所以,孟子指出:“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赵岐注:“夭寿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13]2779} 我们理当坦然地“修身俟死”,因为人有生死乃是“天之所命”的“天理当然”^[19];企图永生不死,天理何在!因此,面对生死,应有张载的态度:“存,吾顺事;没,吾宁也。”^[20]

问题在于:既然“俟命”或“俟死”即等待死亡,为什么还需要积极地“修身”?孟子说“所以立命也”,“所以”表明:“立命”是目标,“修身”养生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修身”,就不能“立命”,也就不能真正“俟死”,亦即不能达到自然寿数。据科学研究,人的自然寿命大约是120岁乃至150岁;然而人们的实际寿命远未达到这个限度,其原因是人们总有种种“自作孽”的折腾,即未能“修身”养生。孟子指出:“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21]2690} 修身养生,就是积极地“自己求之”。所以朱熹特别强调:“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8]349}

因此,孟子所说的“俟命”绝非消极地“等死”,而是积极地“修身”养生,直至“死而后已”^[22]。孟子指出:“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7]2764} 朱熹集注:“岩墙,墙之将覆者。”^{[8]350} 能“尽其道”而“修身以俟死”,即能享有正命;立于危墙之下,或者犯罪而“桎梏死”,则“非正命”,乃是“自作孽,不可活”的短命。所以,孟子主张积极地以“修身”为“养生”,以此“顺上天之命,尽个人之能”^[23]。

为此,孟子指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7]2764} 传统的解释有误。其实,“在外者”指天命的定数,所以“求无益于得”,例如奢求长生不死、肉身不朽就是徒劳无益的;“在我者”指自我的修身努力,所以“求有益于得”,即养生追求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具体究竟应当怎样“修身俟命”呢?以下就是孟子的养生心法。

一、养体

养生当然是“养体”,但是意指养护身心统一的

生命体(life subject)。孟子所说的“体”,有两种用法:(1)身体、肉体,例如“劳其筋骨,饿其体肤”^{[24]2762};“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1]2691}。仅仅供养身体,“此所谓养口体者也”^{[12]2722}。(2)作为身心统一的生命体,例如“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体之充也”^{[21]2685};“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16]2752-2753}。孟子说“居移气,养移体”^{[7]2769},是讲环境的选择对人的影响,使其“气”“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限于身体,而首先是心性的变化。这种意义的“养体”就不仅是“养身”,而是养护身心统一的生命,“养体”即指“养生”。

(一) 养生与养身

毫无疑问,养生首先是肉体的“养身”,即供养、养护身体。孟子所说的“身”,与“体”一样,有两种用法:(1)通常指身心统一,犹言“自身”“自我”,例如“反身而诚”^{[7]276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2]2718};“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12]2721};“穷则独善其身”^{[7]2765}。这种意义的“身”与修身之“身”是同义的。(2)偶尔也专指“身体”,即肉体,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15]2705}。

笔者这里所说的“养身”之“身”即指肉身、身体。这里“养”字用的是本义,《说文解字》:“养,供养也。从食,羊声。”^{[25]107}甲骨文作“𠄎”(𠄎女),从羊、从支(pū)。“支”即敲击,《说文解字》:“支,小击也。”^{[26]67}可见“养”字的初义是“击羊”,即杀羊以备食物,引申为以食物来供养身体。通常的讲究饮食,以至锻炼身体、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之类,无非“养身”。

这种肉体层次的“养身”当然是养生的基础,人首先必须维持肉体生命的存在。如孟子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27]2744}但是,单纯的“养身”未必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单纯追求肉体“养身”带来的种种健康问题。例如有些锻炼身体的“养身”方式,简直就是“作死”。这是因为:人并非单纯肉体性的存在者,而是身心统一、灵肉一体的存在者;不仅如此,心理的健康对于生理的健康具有极为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是情绪性的存在者、意欲性的存在者和观念性的存在者。心理有疾而身体健康,那是不可能的;相反,心理健康大有益于生理健康,这早已是常识。

所以,孟子对单纯肉体的“养身”不太感兴趣,而是强调养生需要“心法”。孟子心法的“养生”,亦称之为“养体”。

(二) 养小体与养大体

所谓“养体”,这里的“体”并不是单纯的身体、肉体,而是作为身心统一的生命体。这是基于孟子以自我为本体的哲学主张,即是“以身为本”^[28](这里的“身”指自身、自我)。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2718};“守身,守之本也”^{[12]2722}。否则,生命力会迅速干涸枯竭:“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10]2727}因此,“养生”就是“养体”,即养护自我生命体。孟子指出:

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楸,养其槭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16]2752-2753}

这里,孟子从“养身”谈起,进而提出“养小体”与“养大体”的分辨。那么,何谓“大体”“小体”?且看以下对话: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6]2753}

显然,“大体”指心灵及其功能,即“心之官”;“小体”指身体的感官及其功能,尤其是“耳目之官”。朱熹集注:“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29]335}可见,“养小体”就是养护感官,“养大体”则是养护心灵。孟子指出,当两者发生抵牾时,就有一个取舍问题,不能“以小失大”“以小害大”。

那么,为什么说“养大体”比“养小体”更根本?赵岐注,“小者,情欲也”;“小体纵恣情欲”^{[16]2753}。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孟子关于情欲的思想(详下),也不符合“耳目之官”属于认知功能的性质(情欲并非

认知)。其实,孟子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讲的:“小体”的感知可能造成认知的片面,带来危害;而“大体”则能够避免片面认知及其危害,因为心能“思”,即具有综合反思能力。朱熹集注:“耳司听,目司视,各有所职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29]335}确实,唯有心思能将各别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综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荀子也说:五官“天官意物”,必有所“蔽”,所以需要“心有征知”^[30]。养生问题亦然,绝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31]2526}。

在哲学上,孟子不仅如上文所说的“以身为本”,即以自我为本体,而且进一步“以心为本”,即以“大体”为本体。所以,养生要“反其本”^{[6]2672}(返本),以防“不揣其本,而齐其末”^{[24]2755},以致“失其本心”^{[16]2752}。于是,孟子提出:养体的路径乃是“养心”,即通过养护心灵来养生。

二、养心

作为“心法”,孟子的基本养生方法就是“养心”。那么,何为养心?如何养心?

(一)“养心”的内涵

孟子所说的“心”并非生理器官,即既非心脏,亦非大脑,而是心灵的综合性的官能,即包括情感、意欲、思维在内(这其实是中西古代共通的理念)。因此,养心的内涵包括情感能力、意志能力、理性能力的养护。

1. 养情:情感能力的养护

孟子所谓“心”,很多时候指情感。例如,“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6]2671};“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1]2689};“推恶恶之心”^{[21]2691}。“万章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27]2743}齐宣王说“吾不忍其(牛)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孟子说“是心足以王矣”^{[6]2670}。

孟子指出,人心具有共同的情感:“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6]2750}这里的人心“同然”,是说人心“同悦”,即对美食、美声、美色、美德的相同的情感反应。

众所周知,情感分为消极的负面情感(如怒、哀、恶)和积极的正面情感(如喜、乐、爱),前者不仅

不利于社会和谐,而且不利于自我的身心健康。因此,孟子讲养情,强调积极的正面情感。其中,孟子最重视的是“四端”之心,即四种本真的情感: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1]2691}

这“四端”中,首要的是不忍人之心、惻隐之心,亦即爱心,孟子认为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养心、养情的根本。这样的本真情感,孟子谓之“赤子之心”:^{[10]2726}朱熹集注:“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32]

对这样本真情感的养护,孟子以草木养护为喻: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16]2751}

这就是说,这样的“良心”或“仁义之心”,即“人之情”,亦即“人之性”,需要“操存”,使之“得其养”;否则已不是人,而是禽兽,养生何为?

2. 养志:意志能力的养护

孟子所谓“心”,有时指欲望、意欲、意志。例如,“欲贵者,人之同心也”^{[16]2753};“丈夫生而愿为之以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以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33]2711};“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6]2671};“我四十不动心”^{[21]2685};“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16]2752};等等。

上节讨论的肉体的“养身”,孟子称之为“养口体”;而与之相对的养心,则是“养志”。他说:“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

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12]2722}朱熹集注:“曾子则能承顺父母之志,而不忍伤之也。”^[34]这里的“养志”之“志”,尽管指的是曾子父亲的意志,但也涉及曾子本人的意志,即曾子“承顺父母之志”。“志”指意志、意欲,“养志”就是“养欲”。

养心首先是养情,然后是养志、养欲,这是合乎心理规律的,因为人们的意欲、意志,正是来自情感:我们对某人有了某种情感,自然就会产生某种见诸行动的意欲。

因此,孟子强调“立志”,其实也是“养志”。“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27]2740}伯夷的种种表现,所谓“伯夷之风”,都是意志的表现,能够感染他人,帮助他人立志、养志。例如阅读仁人志士的传记,即恰如“闻伯夷之风”,就是“养志”的一种具体方法,同时也是下文要讲的“集义”的一种方法。

这样的“养志”,又叫“尚志”,即让自己的意志、意欲变得高尚。“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7]2769}这就是说,“尚志”就是养护“仁”的情感、“义”的意志。

所以,孟子指出:“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12]2721}这里“义”对应意志,“仁”对应情感,意志源于情感,所以,养志不过是“志于仁而已”^{[24]2760}。养志就是以“仁”即“爱”为精神家园,以“义”为正道坦途;否则就是“自暴自弃”。

孟子指出,如果自暴自弃,不能养志,那是非常危险的。“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12]2721}这看起来似乎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其实很有道理:如果不仁不义,就会主观上良心不安(忧),客观上遭到鄙视(辱),这会导致心理疾病。

3. 养思:思维能力的养护

孟子所谓“心”,有时指理性思维。例如,“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也’云尔”^{[35]2694};“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35]2699}。在孟子看来,“思”正是“心”的基本官能,即“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16]2753}。

孟子所说的“思”,有两个向度,即对象性的运思和自返性的反思。

(1)对象性的运思,例如,“思以一豪挫于人”^{[21]2685};“思与乡人立”^{[21]2691};“夷子思以易天下”^{[15]2709};“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13]2779};等等。

孟子指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6]2670-2671}心的这种“权”“度”,即权衡与测度,也就是“思”。“养思”就是养护自己的这种运思能力。

这种对象性的思,孟子称之为“操心”,他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7]2765}爱的情感与意欲,上升到“思”的层面,即为他人“操心”“虑患”。由此看来,如果以为养心需要做到“居无思,行无虑”^{[17]71},乃至“形若槁骸,心若死灰”^{[17]27},那就大错特错了。调查证明,造成老年痴呆的原因之一,正是长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31]2527};反之,坚持“用心”“操心”,正是长寿的秘诀之一。这是因为,唯有为他人“操心”“尽心”,才可能真正“忘我”“无我”;为他人忧,自己才能真正“无忧”,这也是孔子揭示过的一个深刻道理^[36]。因此,养生、养心需要避免陷入“无思无虑”的误区。

(2)自返性的反思,例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10]2727};“思天下惟羿为愈己”^{[10]2729};“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10]2731};“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14]2738};“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16]2753};等等。“养思”就是养护自己的这种反思能力。

孟子特别重视反思能力。他从对象性的爱养桐梓(犹今爱养花草),谈到爱养自身,就是自返性的反思的结果:“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16]2752}

这种反思,孟子谓之“反身”(返回自我),他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2764}这种反思乃是最高最大的快乐,因而能获得并保持良好的心态,故能延年益寿。何以如此?孟子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2]2721}这就是说,这种反思看起来是返回人道的自我本真,而本质上却是回归天道的本真。所以,“思诚”就是“思天”,这与上文所讲的养生宗旨——由“知天”而“事天”一致。这样才能“忘我”,但并不是忘掉本真的我,而是忘掉那

个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我。因此，“乐莫大焉”乃是“乐天”。

对于养生来说，“思诚”极为重要。这里的“思”并不是那种“小心思”“小聪明”，不是那种算计、权谋的所谓“智慧”；否则正如《红楼梦》十二钗曲《聪明累》所言：“机关算计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如果能在反思中“思诚”“反身而诚”，则正如孔子所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8]2503}

（二）“寡欲”的实质

关于养心，孟子最经典的论述是：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孙奭疏：“孟子言此以教时人养心之术也。”赵岐注：“寡，少也。欲，利欲也。”^{[13]2779}这里的“欲”指“利欲”；“存”“亡”指生命的存亡，当然是“养生”的课题。但是，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个命题往往被误解，其极端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朱熹虽然说“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但又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并引程子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37]这是符合孟子本意的，即“寡欲”并不是“灭欲”“禁欲”“无欲”，倒恰恰是“以理求欲”。

1. “欲”：意欲的人性本质

孟子的“寡欲”不仅并非“灭欲”，正好相反，正当的欲望恰恰应当加以养护，即如上文所谈的“养志”。有些学者将孟子的“寡欲”理解为“清心寡欲”^[38-40]，大谬不然。“清心寡欲”出自《后汉书·任隗传》：“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41]这是战国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出自《老子》的“少私寡欲”^[42]。所谓“清静”，尤其值得商榷。自周敦颐以来，儒者多讲“主静”，流入静坐禅定。试问：终日静坐，血脉不通，体弱气虚，何以养生？

人类最基本的两大欲望，就是食欲与性欲，即“食色，性也”^{[16]2748}，前者赖以维持生命，后者赖以繁衍生命。此话虽是告子所说，但孟子并不否定，而同样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3]2777}这样的人性欲望，孟子称为“天性”：“形色，天性也。”^{[7]2770}关于食欲，如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16]2750}；“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16]2752}；等等。关于性欲，如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知好色，则慕少艾”^{[14]2734}；等等。

除“食色”外，人类还有各种欲望，孟子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生理性的“天性”和社会性的“人性”^{[16]2748}。在孟子看来，不仅“人性”的欲望不可灭，而且“天性”的欲望也不可灭，都应当加以存养，即都是“养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寡欲”并非“禁欲”“无欲”，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欲望，追求“养生”本身就是一种欲望。因此，禁欲主义是反人性的、“逆天”的。第一，既然欲望“人皆有之”，那么，否定了欲望，那还是人吗？这样的“养生”，所养的还是“人生”吗？第二，反人性的禁欲式的“养生”，未必能够达到养生的目的，因为它是“逆天”的，是对人性的压抑，这必定会导致心理疾病，并由此而导致生理疾病。因此，面对这类“逆天灭性”的所谓“养生”，必须牢记孟子的命题：“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当然，孟子并不是说一切欲望都应当无条件地满足。孟子讲“寡欲”，正是要揭示满足欲望的条件。

2. “可”：意欲的正当条件

上述分析表明，“寡欲”之“寡”并非欲望的数量问题，而是欲望的性质问题。孟子用“可”来限定“欲”，特别指出：“可欲之谓善。”^{[13]2777}这就是说，养心的要领乃是排除“不可”的意欲，而养护“可欲”的意欲。

所谓“不可”的欲望，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上不可能。例如，“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15]2705}“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10]2731}，“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13]2779}。长生不死之类的养生追求，即属客观上不可能。另一类则是主观上不可为。例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33]2711}。孟子思考的重心在后者，这其实属于孟子正义论的范畴，其理论体系的核心结构就是“仁→义→礼”的奠基序列。^[43]

（1）非礼之事不可欲。在儒家的话语中，“礼”乃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例如男女爱欲的实现，必须遵循婚姻的礼制规范；否则，“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33]2711}。这就是说，违背婚姻规范的爱欲是不可欲的，即属“寡欲”的范畴。

又如经商谋利的意欲的实现，也需遵守市场交易的规范。例如，不能垄断市场。孟子曾说：“季孙

曰:‘……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35]2698}所谓“龙断”即今所谓“垄断”,是一种不公平的市场行为,这样的欲望是不可欲的,亦属“寡欲”的范畴。

但是,既有的礼,即现存的社会规范,未必就是正义的;或者虽然正当,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转换,未必仍然是适宜的。这样的“礼”就应当加以孔子所说的“损益”^[44],即需进行制度变革,重建规范。而规范的重建,是根据“义”的原则。

(2)不义之事不可欲。按孟子的正义论,“礼”的正义性来自“义”,即仁爱精神赋予“礼”的正当性;生活方式要求“礼”的适宜性。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违背现行礼法的欲望未必就是“不可”的。例如,“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赵岐注,“权者,反经而善也”;“归于常经,谓以仁义礼智道化之”^{[13]2722、2780}。赵岐所揭示的正是孟子正义论“仁→义→礼”之间的奠基关系:当“礼”与“义”发生冲突时,应当“取义”^{[16]2752},所以孟子总是强调“仁义而已”^{[6]2665}。孟子指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27]2745}不通过“义”之路,就无法通达正确的“礼”之门。

例如对于“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言行规范,孟子却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0]2726}这就是说,当意欲符合“义”的原则时,“礼”的规范未必需要遵守。这是因为,判定某种意欲是否“可欲”,其根本标准不是礼,而是义,即正义原则。

就是说,“寡欲”的价值尺度是:“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27]2743}因此,养生就是“以义养心”。

(3)不仁之事不可欲。按孟子的正义论,不仅“义”优先于“礼”,而且“仁”优先于“义”。因此,养生根本上是“以仁养心”。

看起来,“仁”似乎是非常高的境界,难以企及,其实不然。“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13]2778}。这就是说,“仁”不过是“人皆有之”的“不忍”之心、“无欲害人之心”而已,其实就是上文谈过的“恻隐之心”而已。孟子认为,这是先天的情感能力。“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

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7]2765}这就是说,只要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而没有“害人之心”,那么,欲望就是“可欲”的,不必“寡欲”。

否则,如孟子所指出,不可欲的欲望,不仅不能养生,反而会带来灾难。例如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王曰:‘……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6]2671}做不可欲的事情,为所欲为,当然就会招致灾祸。

一言以蔽之,“寡欲”的要领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7]2765}在孔孟的话语中就是“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13]2779}“有所不为”就是对不可欲的事情“寡欲”;而“进取”就是做“以仁养欲”“以义养欲”的事情。

三、养性

进一步说,孟子认为,养心的本质是“养性”,即养护自我的天赋人性。有学者说,“‘存心养性’就是要人保持生而有之的‘善’本性”,“最终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45]。这是正确的理解,但还不够完备精当。这是孟子的完整表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7]2764}

这就是说,实现“事天俟命”宗旨的前提是“知天”,而“知天”的前提是“知性”,“知性”的前提则是“尽心”。显然,“养性”的步骤是:尽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这是“养性”心法的一个序列:尽心→知性→知天。

(一)尽心以养性

养性的功夫,首先就是“尽心”。《孟子》全书最后归结到《尽心》篇,可见“尽心”的分量。所谓“尽”,指充分发挥。而所尽之“心”,上文已讲过,涵盖情感、意志、思维。因此,“尽心”包括尽情、尽意、尽思,就是在“可欲”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感能力、意志能力、思维能力。

1.尽情以养性

“尽情”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感能力。孟子

认为,“尽心”就是“尽其才”,也就是“尽其情”。“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16]2748}

例如丧葬的棺槨,孟子认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恻乎?”赵岐注,“尽于人心所不忍也”;“棺槨敦厚,比亲体之变化,且无令土亲肤,于人子之心,独不快然无所恨也?”^{[35]2697}这就是说,丧葬棺槨是为了“尽情”。

又如“三年之丧”的礼制,孟子说:“亲丧,固所自尽也。”孙奭疏,“父母死之时,当以礼安葬之,如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及祭之礼,如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15]2701}。朱熹集注:“父母之丧,固人子之心所自尽者。盖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46]252}这也是在讲“尽情”。

2. 尽意以养性

情感会导向意欲,即指向具体行为的意志。“尽意”就是坚守自己“可欲”的意欲,充分发挥自己的意志能力。

关于自己独立意志的坚持,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2765}又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3]2710}还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33]2710}这种独立意志的坚持,即属“尽意”。

至于“尽意”的养生效果,孟子指出:“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孙奭疏:“君子于道,至于成章则充实,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为之喻焉。”^{[7]2768}孙奭的解释,来自孟子这两段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2777};“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7]2767}。这确实可以理解为“尽心尽意”带来的养生效果。

3. 尽思以养性

“尽思”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尤其是反思能力。孟子指出:“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12]2717}

所谓“尽”,赵岐注“尽心”为“尽极其心”^{[7]2764},朱熹集注为“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8]349},这并不是说完全彻底“穷尽”,而是“尽量”或“尽可能”之意,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者,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例如,有人说:“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35]2698}孟子对此并不否认,因为周公也是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梁惠王有一个疑问:“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的“用心”,包含了情感、意欲、思维。但孟子指出:这固然是“用心”,但并没有真正做到“尽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6]2666}梁惠王将人民的灾难归咎于天灾,而不去反思自己的政治造成的人祸,这是没有做到“既竭心思”。

(二) 知性以养性

由“尽心”而“知性”,具体乃是由“尽思”而“知性”,即通过反思而知道自己的天赋人性乃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孟子才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这种“知”乃是“性”的自我反思,即知的主体是“性”,知的对象也是“性”,亦即并非普通的知识,而是反思的智慧。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智”?这看起来高不可攀:“仁且智,夫子既圣矣。”^{[21]2686}但实际上,孟子又说,“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6]2749};“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21]2691}。因此,“智”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而是“行若无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10]2730}这是因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12]2725}。然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不过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7]2765}。

至于由“知性”而“养性”的养生效果,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7]2767}学者指出,“从《孟子》中‘晬面盎背’之说,可见孟子养生

学的身心生理机制”；“孟子‘晬面盎背’之说深刻揭示了道德、心灵与身体气机的内在关联，体现了儒家养生修身的特征”^[47]。孟子是说“知性”以后，就能够由内而外地呈现出充满生机的健康状态。朱熹集注，“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著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晬然，清和润泽之貌；盎，丰厚盈溢之意；施于四体，谓见于动作威仪之间也”^{[8]355}。这是尽心知性以后表现出来的“气象”。

(三) 知天以养性

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这是何以可能的？“性”与“天”是什么关系？“性”是内在于人的，却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即超越经验；而“天”却是外在的，即是超凡的(transcendent)，即超越这个凡俗世界^[11,48]。但孟子这里讲的“天”却有双重指称：内在之天指人的天性，外在之天指形而上的天帝。“性”之谓“天”，因为它是“天生”“天之所与我者”。因此，“知性”当然就是某种意义的“知天”。

1. 内在超验之天的认知：知性

上文讨论的“知性”，所知的即是内在超验之天。显然，“知性”乃是超越经验的。例如，孟子根据齐宣王对牛感到“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而“知王之不忍”，进而知其具有“保民而王”的潜能^{[6]2670}。这里，见其“不忍觳觫”是经验性的见闻，而知其“不忍”，即具有“恻隐之心仁也”，则是超验性的推论，即“思”的结果。上文说过，“知性”本质上是“性”的自我反思；这就是说，对内在超验之天即性的认知是反思的结果。养生需要反思其性，因为知性、知天，才能养性、事天，践行养生的宗旨。

2. 外在超凡之天的认知：知天

这里的“天”是外在之天，即是超凡的天帝。为什么要“知天”？因为这对养生具有根本的意义；唯有“知天”才能“知命”即知天命，进而才能养生。“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7]2764}这是终极信仰对于养生的意义，上文已讨论过。

同时，通过“知天”，才能真正彻底地“知性”，即才能够理解自己的天赋仁性。例如，孟子告诉梁襄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6]2670}“不嗜杀人”就是仁性，乃是天赋人性，犹如苗之勃兴；而“养生”如果不遵循上天的这种“好生之德”^[49]，岂

非南辕北辙，恰如苗之枯槁？

所谓“知天”，就是“知道”，即知天道。“仁则荣，不仁则辱……《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21]2689-2690}这就是说，对于养生来说，“知天”才不至于“自作孽，不可活”。

四、养气

孟子养生心法的“养心”“养性”，其途径是“养气”，即培养其浩然正气。学者指出：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既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又是养生的方法”^[50]。孟子“继承及发展了孔子的‘仁寿’理论，并创立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养生思想，从理论及伦理的高度阐述了长寿的秘密”^[51]；“孟子的养气说，在养生的同时引入了价值观念”，“对养生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52]。这些都是值得参考的意见，值得进一步细致分析。

中国哲学的“气”范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时是物质概念，有时是精神概念，有时则是兼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概念。那么，孟子的“气”是怎样的概念？孟子指出：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16]2751}

这段话往往被误读，以为养生是“养夜气”，诸如黎明时分打坐修炼之类^[53]。其实，这是一种譬喻，即“孟子举‘夜气’为喻”^[54]。这里有几点要注意：其一，“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乃是以树喻人，意谓“人日夜之所息，犹如树木所得平旦之气”。此处的区别十分明显：言树木则讲“平旦”（黎明）；而言人则讲“日夜”“旦昼”，并非专言“平旦”，诚如船山所言：“何待向晦宴息，物欲不交，而后气始得清哉！”^[55]因此，其二，“夜气”只是以树木所得的滋养来比喻人所得的滋养，前者是自然现象，后者却是精神现象。其三，“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好恶”不应当读“hào wù”，而应当读“hǎo è”，意谓美丑

善恶,与前句“可以为美乎”相呼应;“好恶与人相近”即孔子所言“性相近”^{[31]2524}。要之,此处“夜气”“平旦之气”之“气”只是比喻。这就是说,“养气”之“气”需当另说。

孟子“养气”之说,集中论述于下: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21]2685-2686}

这种“浩气”显然既非单纯物质性的,亦非单纯精神性的,而是一种影响身体状态的心灵状态,即是一种整体生命状态。它涵盖了道教及中医讲的“精、气、神”,但其形成路径不同,不是由形体而精神,而是由精神而形体,即“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它是“至大至刚”的阳刚之气,但又并非纯阳之气;借用老子的话说,这种气乃是“负阴而抱阳”的“冲气”^[56]。

这种“浩气”表现为“勇气”,所以“养气”又叫“养勇”。孟子指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21]2685}孟子进而指出,这种勇气乃是意志的表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1]2685}上文说过,“志”即意志。这就是说,“浩气”就是内在的意志凝聚为“志气”,表现为“勇气”。

那么,怎样“养气”?孟子明确指出两点,即“以直养”和“集义所生”。

(一)以直养气

何谓“以直养”?赵岐释“直”为“正直”,朱熹释“直”为“不可屈挠”^{[57]231},两者都忽略了孟子这句话是在谈“如何”养气的问题。孟子原文意谓:尽管此气“至大至刚”,但如果不能“以直养”,则不能“塞于天地之间”。

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何谓“直”?孟子不见诸侯。“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赵岐注,“枉尺直寻,欲使孟子屈己”;“人当以直矫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33]2710}朱熹集注:“枉尺直寻,犹屈己一见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57]264}这就是说,“直”指不能枉屈自己的自由意志。

不仅如此,“枉己”便是“枉道”。孟子主张“直道”,正是孔子主张的“直道而行”^[58]。何为“直道”?孟子引证放勋之言:“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其中“匡之直之”,赵岐注:“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15]2705-2706}朱熹集注,“邪者正之,枉者直之”,“使自得其性矣”。^{[46]260}这就是说,“直道”是说“仁义礼智”的天赋本性,它诚直而坦率。确实,一个人如果总是憋屈自己的意志,而不能直率坦荡,那是不利于修身养生的,所以孟子才强调“以直养”。

这种直道,乃是内在本性的外现。孟子决定会见墨者夷之:“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赵岐注:“今我可以见夷之矣,不直言之,则儒家圣道不见(现),我且欲直攻之也。”^{[15]2707}朱熹集注:“直,尽言以相正也。”^{[46]262}这里的“尽言”,正是“尽心”的一种表现。

为此,孟子谈到“揠苗助长”问题,也是一种比喻:养气犹如“耘苗”。“以直养而无害”,这里的“无害”是说“勿害”,意谓不可揠苗助长;否则,“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这里,一方面,“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比喻不致力于“养气”,那是“自暴自弃”;而另一方,却又不可揠苗助长,而应当是“直”的态度,亦即径直地遵循苗的天然本性、人的天然本性。

在“仁义礼智”中,“直”更直接地对应于“义”,因为两者都是在说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所以接下来孟子讲“集义”的问题。因此,朱熹释“集义”为“事皆合义,自反常直”^{[57]232},也是以“直”说“义”。孟子指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7]2745}意思是说,“义”为“直道”,犹如“周道”(大路),“其直如矢”。这里的“直”形容“义”,与下文所言“集义所生”相呼应。总之,“以直养”其实就是“以义养”,就是“率性养

气”“集义养气”。

(二)集义生气

孟子指出,养气的根本方法就是“集义”,即培养自己的正义感^[59]。儒家所谓“义”即“正义”(justice)^[60],源自生活情境中的正义感,而概括为正义原则^[61]。已有学者指出,养气就是“持续不断地培养”并且“坚持正义”^[62],这是正确的理解。

1.集义养气的方法

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朱熹集注,“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57]²³²。这就是说,“集义”就是积聚自己心中的正义,具体的方法就是要求自己“事皆合义”,即视听言动都要怀有正义感,这样自然就会形成浩然正气。故有学者指出,所谓“以直养而无害”即“持续地以直道、正义来培养”,“理直气壮,从而使个体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状况”^[63]。简而言之,集义养气的养生心法,就是随时凡事坚持正义,以积聚正义感,养成浩然正气,如此而已。

2.集义养气的效果

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赵岐注,“能养道气而行义理,常以充满五脏;若其无此,则腹肠饥虚,若人之馁饿也”;“自省所行,仁义不备,干害浩气,则心腹饥馁矣”。朱熹集注,“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则不足于心,而其体有所不充矣”^[57]²³¹⁻²³²。

确实,人们感到“气馁”,都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言行缺乏正义,所以气短心虚;反之,孟子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13]²⁷⁷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3]²⁷¹⁰,这是何等的气象,何等的气场!这是因为能够集义养气,自然就能“理直气壮”“中气十足”,正气充盈,邪气难侵,表现出旺盛强健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J].生命与灾害,1996(5):27.
- [2]朱玉栋.《孟子》养生观对《内经》养生学的影响[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1991(4):31-34.
- [3]常乃讯,宋田政.孟子的养生观[J].中国民间疗法,2012(8):77.
- [4]贡树铭.孟子的养生观[J].中医药文化,2010(5):39.

- [5]马翠莲.孟子的养生思想探赜[J].鄂州大学学报,2014(11):23-25.
- [6]孟子注疏:梁惠王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孟子注疏:尽心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孟子注疏:梁惠王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0]孟子注疏:离娄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J].文史哲,2021(3):86-103.
- [12]孟子注疏:离娄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孟子注疏:尽心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孟子注疏:万章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5]孟子注疏:滕文公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6]孟子注疏:告子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7]王先谦.庄子集解:第1册[M].影印本.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
- [18]论语注疏:颜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9]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下[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73.
- [20]张载.正蒙:乾称篇[M]//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3.
- [21]孟子注疏:公孙丑上[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2]论语注疏:泰伯[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487.
- [23]逯富红.孟子的养生之道[J].人民周刊,2018(23):68-69.
- [24]孟子注疏:告子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5]许慎.说文解字:食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3:107.
- [26]许慎.说文解字:支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3:67.
- [27]孟子注疏:万章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8]黄玉顺.“以身为本”与“大同主义”:“家国天下”话语反思与“天下主义”观念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6(1):30-35.
- [29]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415-420,404-409.
- [31]论语注疏:阳货[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526.
- [32]朱熹.孟子集注:离娄下[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92.
- [33]孟子注疏:滕文公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4]朱熹.孟子集注:离娄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85.
- [35]孟子注疏:公孙丑下[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6]黄玉顺.无忧的智慧:孔子论“忧”[J].文化大观,2015(1):29.
- [37]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02,201.
- [38]薛慧.孟子:清心寡欲,善养浩然正气[J].养生保健指南,2013(3):25.
- [39]王建利,杨瑞鹏.孟子的养生之道述略[J].科技经济导刊,2016(34):110.
- [40]韩星.《孟子》:修心养性与家国天下[N].团结报,2022-07-18(5).
- [41]范晔.后汉书: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753.
- [42]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第十九章[M]//王弼集校释:上册.北

- 京:中华书局,1980:45.
- [43] 黄玉顺.孟子正义论新解[J].人文杂志,2009(5):9-22.
- [44] 论语注疏:为政[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4.
- [45] 乔晶.孟子“存心养性”的养生哲学观[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11(4):6-7.
- [46] 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7] 翟奎凤.“睟面盎背”:孟子的养生修身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13(6).
- [48] 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J].探索与争鸣,2021(5):73-81.
- [49] 尚书正义:大禹谟[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35.
- [50] 乐爱国.孟子论“气”与儒家养生学[J].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0-53.
- [51] 李敏,任秋君.孟子养生思想探微[J].兰台世界,2013(1):106-107.
- [52] 钟英战.孟子养气说:古代养生学与价值观的引入[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66-68.
- [53] 肖永明,王志华.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4-25.
- [54] 简逸光.王阳明“夜气”解[J].孔子研究,2016(4):111.
- [55]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M]//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1075.
- [56]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二章[M]//王弼集校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117.
- [57] 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8] 论语注疏:卫灵公[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8.
- [59] 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6):14-20.
- [60] 黄玉顺.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J].社会科学研究,2012(3):135-141.
- [61]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32-42.
- [62] 宋田政,常乃讯.探索孟子养气方法,丰富现代养生理论[J].中国民间疗法,2012(9):78.
- [63] 周际明.孟子养生思想探究[J].科技信息,2011(13):522.

Confucian Mental Method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 Centered on Mencius' Philosophy

Huang Yushu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life preservation, Mencius' theory can be regarded as a philosophy of health preservation, whose purpose is “to serve Heaven and to await foreordination”, that is, to preserve health so as to serve Heaven and to cultivate oneself so as to meet death. Therefore, health preservation g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ultimate faith. In this regard, Mencius' “mind theory” is a set of mental methods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First, health preservation is “life cultivation”, which is not merely the “body cultivation”, bu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ife as a body and mind unity. Furthermore, the root of life cultivation is not “to cultivate the small organic function”, but “to cultivate the big organic function”, that is, “to cultivate the functions of mind”. Second, the mind cultivation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apacities of emotion, will and reason. The key of mind cultivation lies in “reducing desires”, which means “to refuse to do some things”, that is, to eliminate the desires of “injustice” and focus on the “allowed” desires. Third, the essence of mind cultivation is “to cultivate humanity”, that is, to cultivate one's own human nature given by Tian (Heaven). The steps of humanity cultivation is “to exert the capacity of mind to fullness” so as to “know the nature” and “to know the nature” so as to “know Tian (Heaven)”. “To exert the capacity of mind to fullness” includes the capacities of emotion, will and reason. “To know the nature” is a self-reflection by the given human nature, aiming at “to know Tian (Heaven)”. “To know Tian (Heaven)” includes the cognitions of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tal Tian and the external transcendent Tian,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ultimate belief in health preservation. Fourth, the way of humanity cultiv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vital spirit”, that is, to cultivate the great righteous spirit.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e vital spirit cultiv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with frankness”, namely, “to generate the spirit by accumulating justice”, that is, to maintain vitality by cultivating a sense of justice.

Key words: health preservation; life cultivation; mind cultivation; human nature cultivation; vital spirit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涵 含

理学养生之道

——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赵薇

摘要: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理一”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养生;心性性情;格物穷理;主敬;浩然之气

中图分类号: B23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110-11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9年对健康(Health)进行了新的定义,健康是由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道德四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道德意识与行为四个方面都能保持和谐的、积极向上的一种生命状态。健康研究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就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则是古已有之。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中的“养生”“摄生”,基本接近今天的“健康”的提法。所谓摄生,今称为养生,指个人通过调养身心的方法来养护生命,从而提高生命质量,完善道德品质,和谐身心,和睦关系,最终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典籍中,如《论语·雍也》就有“仁者寿”,《礼记·中庸》有“大德者……必得其寿”等说法。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有着丰富的健康养生方面的资源,中国古代的圣贤也多为养生之典范。我们不妨在对健康问

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将涉及此问题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资源进行发掘和整理。

朱熹一生坎坷,尤其是晚年体弱多病,竟然享年71岁,相较于两宋时期“平均寿命56岁”^[1],实养生之典范。至亲的早逝以及自身的体弱多病,让其对养生之道特别重视,他躬身实践,形成了一套内外兼修的养生方法。但是,今人对朱子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理学成就上。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知道,学界开始关注朱子的养生思想以及养生实践始于21世纪。如詹石窗、梁丽萍、余天泰等,这些研究成果多聚焦于朱子养生思想与实践的单方面刻画,将朱子的养生思想视为朱子哲学思想的一部分^[2-4]。目前学界没有将朱子的养生之道作为朱子哲学的整体系统特征来加以研究的论文。本文旨在阐明:朱子的心性修养论思想体系是一套完备的养生哲学体系。朱子的心学修养论虽不专门谈养生,但养在其

收稿日期:2022-03-30

作者简介:赵薇,女,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济南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济南 250100)。

中;朱子的养生之道与当今世界卫生组织的现代健康理念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早了八百多年。因此,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朱子的心性论

心性修养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关于个体身心修养的学问,其思想学说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方面面,还兼具生命养护之道。

(一)心统性情说

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可以用“心统性情”来概括,即“心统性情”是朱子心性论的核心命题^①。

1.心统性情说的形成过程

朱熹“心统性情”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心统性情”首先由张载提出。张载说:“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5]374}朱熹对“心统性情”说情有独钟,给出“颠扑不破”的高度评价^[6]。

朱子在解构、完善“心统性情”说的过程中,未发、已发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未发、已发问题是由二程先提出来的。程子云:“既思便是已发。自注:思与喜怒哀乐一般。”^{[7]200}讨论的范围不限于如何节制情绪以及情操培养,还涉及对念头、思维的反思。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8]498}吕大临反问:“未发之前,谓之无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8]498}程颐又补充解释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9]也就是说,心既包含已发,也包含未发。朱熹在31岁师从李侗后,数年间与张拭反复讨论、体究《中庸》之未发、已发问题,也就是“中”“和”问题。朱熹在《中和旧说·第一书》中提出,人心中总是念念相续,一日之间,万念起灭,没有无念的时候,那么圣人所说的“未发之中”“寂然不动”是指什么呢?朱子在静默体验后得出“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10]的答案,以此用心印证了程子之说:“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自心为已发,性为未发。”^{[11]3130}经过多年的静默体证,朱子在40岁时写道:“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11]3130}这里,朱子已由过去的“思虑未萌,事物

未至之时”为“邪暗郁塞”而体证为“寂然不动之体”,并且“天命之性当体具焉”。由于未发、已发问题也称中和问题,所以朱子称其为中和新说,之前的观点为中和旧说。朱子经多年体证,将二程的前说、后说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融会贯通。朱子先是从“未发”“已发”探讨心性关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实质是以性为体,以心为用”^{[12]165};乙丑之悟后转变成“未发指性,已发指情”^{[12]176}。朱子《仁说》有言: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11]3279}

《仁说》之后,“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11]3304}。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统一起来:既讲性情之合,也讲体用之分,二者统一于一心。这标志着朱子“心统性情”理论体系的成熟,用姜广辉先生的话说:“朱子中和新说将未发作性看,将已发作情看,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心统性情,这就恰当地解决了心、性、情在心性理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13]

2.心统性情说的结构

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是讲心的结构,也就是心、性、情在朱子心性论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朱子说:

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发于智识念虑处,皆是情,故曰“心统性情”也。^{[14]2514}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15]93}

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是以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16]

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是在张载提出“心统性情”说与二程的未发、已发学说的思想基础上发展成的。“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5]339}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故心也兼体用。也可以说,性与情是心之体用的两个方面。朱子的“心统性情”说,彻底解构了心、性、情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统一起来;既讲性情之合,也讲体用之分,二者统一于一心。心何以能统摄“性情”?这不得不涉及朱子对

心、性、情本质的理解。那何谓心?心何以能“统”性情?这就涉及朱子心性论中较为复杂的一个范畴——心。

(二)心、性、情之辨析

1.心之三义

“心”字在朱子思想中可以从知觉之义、一身之主宰和道德之义三个方面去理解。

朱熹说心:“虚灵知觉,一而已矣。”^[17]“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11]3180}心有知觉之义,这是心的主要功能。心是人用来觉知世界、认识世界的通道,也是心的第一含重义。人除了能知觉饥食渴饮、声色臭味外,还能知觉君臣父子的理义,前者为“人心”,后者为“道心”,然而“道心”并非知觉所从出,而是根于内在于心的仁、义、礼、智之性。朱子非常重视心的知觉作用,认为这种知觉作用发自虚灵之体,是虚灵明觉,这是知觉之心的通则^[18]。

朱子把心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它既是“虚灵明觉”之体,又是“神明不测”之物。《朱子语类》中有言:“问:人以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15]87}这个神明不测之心是形而上的本体之心,用形而下的“能觉”之心觉其形而上的“所觉”之理(本体之心)。这是一种由形而下往形而上的逆向的自我觉知过程。

所谓知觉,在传统中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为“知”,即认知、认识,这是一种知识性的心。这种意义的心,虽然也为传统中国人所重视,但并不特别突出,但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则成为他们最重视的心,尤其是近代哲学以来,理性的认识心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第二层为“觉”,这是传统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观念。觉即觉悟,觉悟是指古人对天地间至真至诚的大道的觉悟。这种觉悟,既有对宇宙生生不息的感悟,也有对精微之物所蕴含的大道的体察。对于这个觉知之心,朱熹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9]在朱子看来,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是指感性欲念。何以会有道心、人心两种不同的觉知?朱熹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以所以为知觉者不同。”^{[20]14}人生来就有道心,因常存于心灵深处,故微。人心,泛指一切过度的欲望,包括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生理欲望等感性情欲。感性情欲并不是恶,但如果对

感性情欲不加以限制就会流于恶,故危。虽然道心先得,生而就有,但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道心微而难见。道心、人心并非两个心,只是分析地看是两个心。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心”,绝不仅是认识意义的心,还是觉悟意义的心。人可以超越个体而达到对天地万物的知觉。

心是一身之主宰,又为万物之主宰,这是心的第二个含义。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为一身之主宰,在于心中有个天理。朱子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21]心是神明之舍,能够统御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如耳、目、鼻、舌、身等,故为“一身之主宰”^{[14]2514}。朱熹又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20]14}一件事做得对与不对的价值判断,就如同人心会受自然生理之性的支配:寒冷了想要衣服御寒,饿了想要吃食物,这些都制约于自然因果法则。我们内在的道心,也就是道德意识,会对一件事做出对错与否的价值判断。这种当与不当的判断,乃我本有之道德理性(道心)所自觉做出的决定。这即是人心听命于道心,让道心为一身之主宰的含义。

心具众德,心有道德之义,这是心的第三个含义。这个道德之义正是从以上两个含义来的,因为心能觉知道德意识,做一身之主,所以心具有天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四端”即是天赋的道德,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这个本心是与生俱来内置在我们每个人体内的。如草木有本,而茎叶由此而生,人有此道心,则具万理,孝悌忠恕,均由此发展而来。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是指人先天就具有的道德判断力,是人内在的价值系统,也是人之为人的良知与底线。而不断扩充本心,由人心中不断觉悟道心,下学而上达,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感性情欲的意识,是成为君子、圣贤的根本,也是人禽之别。如《孟子·公孙丑上》所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离娄下》所云,“人之与禽兽相差者几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

2.统之二义

朱子心统性情的“统”字有两种含义。统字有兼容之义、主宰之义。“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5]339}统的两种含义都是从心上说性情。朱子言“心统性情,统犹兼也”^{[14]2513},指心兼性情。“性、情字皆从心,所以说心统性情,心兼体用而

言。”^{[15]96}“统”的另一个意思是“主”。朱子说：“心者，性情之主。”^[22]心“主”性，也“主”情。心“主”性情，是从心的知觉功能上讲性情。

3. 性之二义

朱子认为“心统性情”中的性，既包含天命之性，也包含气质之性。程子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23]，朱子推崇为千古不刊之论。程子认为，只讲天命之性，不讲气质之性，不够全面；只讲气质之性，不讲天命之性，便不明性之源头之所在。不能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分作两个来看。

(1) 天命之性。朱熹在《元亨利贞说》中说：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11]3254}

大抵言性，便须见得是元受命于天，其所禀赋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15]90}

朱子在这里所说的“性”不能仅从人的角度而言，还要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而言。性直承天命。《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朱子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15]82}这里所谓物是包括人与万物而言，所谓性是指万事万物的本质，因而“性”也就成了朱熹心性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人的角度来说，“在天为命，禀于人为性，既发为情”^{[15]90}，“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15]83}。朱子说的天命之性，是人禀受的天理；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朱子谈论最多的“性”就是仁、义、礼、智，朱子认为此人之性乃天所生成，流行而赋予人与万物，人得形气之正，得此理之全（仁、义、礼、智）以为性。

(2) 气质之性。性包括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提法，是张载、二程提出的。这个观点将孟子的性善论看作天命之性，将荀子主张的性恶论以及后来扬雄主张的性善恶混、韩愈主张的性三品论等，都归于气质之性，朱熹对此叹服赞扬。“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24]70}张载、二程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提法，让千年的性善论、性恶论的纷争消弭于无

形，为厘清“性善”“性恶”，传承圣人之学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4. 情

朱子心性论中的情，是相对“性”而言的。“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15]89}假如性是体，情便是用；假如性是静，情便是动。情是性发动后的情感，如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属于情。因为性不可见，只能从萌露出来的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四端处来揣度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此情从心上见，但之所以会有此情之发，则决定于性。朱子心性论中的情，不只是四端之心属情，喜、怒、哀、乐也属情。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子解释说：“其未发也，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25]18}喜、怒、哀、乐之情，也需要心的主宰，当发则发，只要是发而中节就好。这个中节之情如《论语·八佾》所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若心不能主宰情，任由喜、怒、哀、乐之情或泛滥或不及，则是心的放肆与失职，会造成不善。情之恶非由性而发，而是情迁于物，心失其主造成的。

朱子认为，欲也是情的一种表现。欲是由情发出的。“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15]93}欲望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我欲仁”之类，就属于好的欲望一类。如果纵欲无度，则“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容”^{[15]94}，那天理就被欲望所遮蔽。欲望之情仍离不开心心的主宰，需要省察已发之情，控制情欲。

朱子心性论中的“情”还包含“思”“意”在内。朱子说：“情是发出息地，意是主张要息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15]95}情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意则是自觉的心理活动，有念虑，有计度，有主向。《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子解释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不可离之意。”^{[25]18}朱子从《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情讲大本、达道，是从情上说性。性不可见，情才是性的显现，由情而知性之有。无论是仁、义、礼、智之性，还是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情，统于一心，由心之虚灵知觉显现其情感内容。朱子虽然以体用关系说性情，以未发、已发来说性情关系，但都

是说“道须臾不可离”(《中庸》),即“道之体”与“道之用”不相离,亦即性情不相离,以用来显体,由情来显性,以心之虚灵知觉显现其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内容。朱子《近思录·为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圣人可学而至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26]

未发之时五性为仁、义、礼、智、信,一旦感外物动而发之则称之为七情。情炽而益荡时,对情不加节制,是对本性的一种伤害。以上是朱熹关于“情”的基本思想内容。

二、朱子心性论的修养方法

修养之于心地,犹如食物之于身体。朱子心性论的终极目标是成圣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离不开“主敬涵养”“格物穷理”的修养方法。朱子将成圣贤的心性修养功夫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正如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言: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27]

朱子把小学与大学的内容概括为“事”与“理”的不同。“小学者,学其事”^{[28]124},小学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些都属于“事”,这些事诸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28]125}。“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28]124}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28]125}。大学,学的是诸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己、治人的“事”背后的“理”。大学不光要学会处事待人,还要穷究如此做事背后的“理”。小学是“知其然”,大学是“知其所以然”。小学的心性修养功夫重在主敬涵养、躬行实践,做到“收其放心,养其德性”^{[29]505}。大学的心性修养功夫在主敬涵养的同时,还要加上格物穷理的功夫。主敬涵养的心性修

养功夫是格物穷理功夫的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失了小学的主敬涵养的心性修养功夫,则很难达到成君子、圣贤的目标。所以朱子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28]125}

(一)主敬涵养

朱子将“敬”字提到了“入德之门”^{[30]3}、“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31]、“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32]210}的地位和高度。朱子强调,“敬”贯彻上下始终,尧、舜、禹、文武、周公,圣人相传的,只不过是“敬”字。“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得圣人田地,也只放下这敬不得。如尧舜,也始终是一个敬。”^{[28]126}

主敬涵养作为心性修养小学阶段的功夫,是圣贤学问的起点。朱子的著作《小学》一书中,提出了以“主敬”为心性修养内涵的基本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准则。小学是“学其事”“培其根”。具体在学习态度上,要做到“学业则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33];听课时要做到“坐必安”“听必恭”;在孝敬父母方面,要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小学》摘录的《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孝的句子,孔子的回答就突出了孝背后“敬”的功夫。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孝最重要的是产生于内心的敬意,做到在父母面前和颜悦色,才是真正懂得了孝的真意。在与人际交往方面,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在待人接物上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修己以敬”(《论语·宪问》)。

主敬既是圣贤学问的起点,也是终点。在朱子看来,小学阶段的主敬只是去做,不需深究背后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角色的增加,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谓:“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则知小学之不能无赖于此以为始;知小学之赖此以始,则夫大学之不能无赖乎此以为终者,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34]主敬涵养仍然是大学阶段的主要内容。

当弟子问朱子如何在敬上下功夫时,朱子回答“内无妄思,外无妄动”^{[32]211},主敬功夫需要在身心两方面下功夫。

在心方面,朱子强调:“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32]210}“主敬”就是让“心”发挥主宰的作用,让

心去统摄性与情。在心方面,则要做到“主一无适”,就是“专心致志”“纯一”的心理状态。在朱子看来,人生来就天赋不同,有智愚贤否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每个人禀气昏明清浊不同。朱子认为这种天生的气禀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后天的“主敬”的功夫,让心做主宰来“变化气质”,让气质之性返回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朱子建议用“常惺惺”法,唤醒那个被私欲或者气禀遮蔽的心。朱子解释“惺惺”说:“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今人说敬,却只以‘整齐严肃’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35]“主敬”可以让心“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36],不但能变化人的气质,而且可以达到“内无妄思”的“心统性情”的理想状态。

身的主敬涵养,体现在视听言动上。主要从端正身体的仪容、仪表、仪态等方面来体现内心的恭敬态度。“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落肃,皆敬之目也。”^{[32]212}即通过约束身体、规范外在行为,使其符合礼义的功夫,做到“端庄严肃”“外无妄动”。

另外,敬还要有“义”。在朱子看来,义是万事万物对天命之性的分享和发用,万物各安其性,各尽其分,就是义。仁体义用,遇事要灵活处理,既要把握“敬”的根本,也要“敬义夹持”,根据是非原则处理各类遇到的事情。

总之,主敬也是一个心身互相作用的过程。这种主敬的状态表现出来就是“若行时,心便只在行上;坐时,心便只在坐上”^{[32]201}，“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32]213},应接事务时,身心肃然地专注于要做的事务上,此即“敬在事上”,无事时敬在心中,敬以直内,专一澄明。主敬功夫既是个人心性修养的方法,又是贯通形上形下、内外始终的为学途径,还是安邦定国之策略。

(二) 格物穷理

朱子说:“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37]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思录〉提要》的评价,“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虽出自《大学》,但有经无传,不好理解。朱子补充了“格物致知补传”,对格物致知专门做了阐释,也是其晚年定论。其文如下: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30]7}

朱子解释:格,至。物,事。格物,穷至事物之理。在朱子看来,“理”虽然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理”也同时散在天地、万物之中,故探究“理”离不开格物功夫。朱子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指出:“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初看须用这本子,认得要害处,本子自无可用。”^[38]朱熹认为,致知的源头在于格物,格物的目的是穷理。要达到这一点,不会只格一物便能把握天地、万物之“理”,也无法把万物逐一格过再穷理。

格物必须“即物”,在朱子看来,格物的功夫离不开接触事物。朱子认为,理既在事中,又在人的心中,必须通过接触事物来穷究事物之理。同时指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7]188}在朱子看来,天下万物共有一理,但分开来说,一物各有一理。读书明理是穷理的好方法,评论古今人物的是非得失,也是穷理的好方法。人伦日用之间,应事接物得体合宜,则是最为切实的穷理方式。因此,朱子强调“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反复累积,以达“豁然贯通”的效果。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的表里精粗、内心的全体大用都能获得一种彻悟,达到对天理的心领神会,这就是“物格致知”。

“格物穷理”离不开切己体察,也就是“亲身体察”。当有人请教朱子有关心与性的问题时,他总是回答:“这个要人自体察始得。”^{[15]88}“要切己体察,不可只作文字看。”^{[39]181}个体生命的切己体察既是为学的方法,也是为学的原则。即便是看经典文字,也不可随声附和迁就。“须沉潜玩绎,方有见处。不然,人说沙可做饭,我也说沙可做饭,如何可吃?”^{[39]185}朱子所讲的格物,主要是对德性之知的内在体认,比如朱子说:“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39]185}知,识也。一种是见闻之知,通过耳目的感官所获得的对外在事物之理的认知;另一种是觉知,也是德性之知,是对天理的体认。天理是每个人

生来就有的,但由于被“气禀所拘、私欲所蔽”,故不能彰显。通过格物穷理,以格外物之理体认心中之天理,这样,内与外,天与人,心与理皆合而为一。

总之,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是朱子心性论中重要的修养方法,“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40]¹⁵⁰。居敬、穷理二事互相发用。“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40]¹⁵⁰通过二者的互相发用,可以消解蒙蔽在心上的私欲,纠正气禀之性,恢复天命之性,最终达到对天理的体认,进而实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生命之为生命的自我道德完善的修养目标。

三、朱子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

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对天理的认知以及对于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仁者寿”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生命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养生体系,以下从树立“天人合一”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

(一) 树立“天人合一”的养生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经典命题。朱子在承继先圣“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地万物一理”的理念。朱子说,“天,即理也”^[41]，“气之清者便为天”^[39]¹⁸¹。在朱子看来,天是理之天,也是气之天。朱子认为,人是“理”与“气”合力作用的结果。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24]⁶⁵这样,人的生命便包括两部分,一是身(由气构成的形体),二是心(由理构成的精神),两者结合构成人这一生命体。

朱子认为,理是世间所有事物的根源。天地万物虽形状各异,但都同出一理。如何能做到明彻、通达天“理”?这是“天人合一”的关键所在。朱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格物穷理”的心性修养功夫来体认天理。在朱子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是一体。但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由于被私心、物欲这

些渣滓所遮蔽,而认为天人两隔。正如朱子所说:“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便与天地同体。”^[42]在朱子看来,心性修养的功夫就是从心上解蔽,去掉私心、物欲这些渣滓,使得人能复其天命之性,重现内在的仁、义、礼、智的光明本性,达到“无我”“与道为一”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能以超然的态度应对外在的境遇,无论得失、毁誉、贫富甚至生死,都有一种豁达乐观、不动心的态度,而这种忘我的“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恰恰可以达到养生、长生的目的。

(二) 树立“仁者寿”的养生境界

要树立“仁者寿”的养生境界,打造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的养生体系。朱子养生之道的突出特色,就是身心共养,养心为主,再辅以养气以存心,让心来统御管理情志等,达到仁者寿的修养目标。

1. 以“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

早在两千多年前,《论语·雍也》中就有“知者乐,仁者寿”的说法。一个怀有仁爱之心的人更容易长寿的缘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给出了解释。他说仁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43]。仁者内心清静,中正平和,没有过多的贪欲,取天地自然之物养其身,静心凝神,取浩然之气养其心。

仁是德的总称,是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孝、悌、忠、信、义、礼、廉、耻等,都来自“仁”^[44]。弟子们问“仁”,孔子没有明确地告知什么是“仁”,而是告诉弟子们“仁”应该怎样做。《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爱”是“仁”的核心内容。只有心中有爱,才会尊重他人,才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真正地做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是主敬涵养功夫和格物穷理功夫都做到精微之蕴的体现,仁者是对自己的各种社会角色都能止于角色伦理,为父当慈,为子当孝,为君当仁,为臣当敬,知其所止,是仁爱之心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自然发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穷究到底,就是一个体认天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天“理一”的过程。一个身心和谐、人际关系和睦的人,涵养的是周遭的一团和气,气机条达,自然也会更加健康长寿。

2. 身心共养

养生包括身心两部分内容。先说养心。养心包括明道、寡欲两个方面。

首先,养心要明“道”。朱子强调养心先明养生之道。因此,朱子常劝人读医书以明养生之道:“无事时不妨将药方看,欲知得养生之理也。”^[45]在朱子看来,所谓的养生之道,其实就是阴阳之道。他说:“医技养生家之说,皆不离阴阳二者。”^[46]朱熹深谙阴阳之道。他在《周易本义》中说:“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盖凡万物之属乎阴阳者,莫不如此。”在朱子看来,阴阳不光是天地之道,也是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变化之父母,神明之府以及治病之根本。人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明彻阴阳之道。阴阳作为事物分类的两种不同属性,是对一般规律的高度抽象性概括。“阴平阳秘”是人身心理健康、精神饱满的根本保障。人体内阴阳二气调和的样态,就是一团和气,也是“仁者寿”的样态。

其次,养心要寡欲。《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在孟子看来,养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欲望。朱子注释道:“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47]在朱子看来,善养生者,首先应当明天理,消人欲,通过心性修养功夫,将邪思妄念止于起心动念的萌芽之中,能及时知止,“收其放心,养其德性”^{[29]505},拔根塞源,从源头祛除贪欲,变化气质,让人心静平和,达到内外兼修、身心健康的目的。

再说养身。养身包括“养备”与“动时”两个方面。

首先,人之有身,就离不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料。朱子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48]朱子对于养身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于过度的欲望则提出要遏制。朱子在饮食方面主张节俭并身体力行。在其门人程端蒙及其友人董株记录的《程董二先生学则》中有这样一段话,基本反映了朱子饮食有节的养生观:“饮食必节;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49]朱子强调饮食以清淡为主,饮食不宜过多,饮食有节更有益于养生。

其次,养身要“动时”。朱子早年“力田养亲”,过的是耕读生活。朱子的仕途非常坎坷,传经、弘道是他平生之志,游学、讲学之余,他仍躬耕桑陌,“投笔事农耕”^[50]。“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就是

其辛勤耕耘的真实写照。通过观察植物的“春生、夏长、秋敛、冬藏”,朱子更加理解顺应天地阴阳、四时的变化去养生的重要性。闲暇之余,朱子喜好游历山水,常常与三五友人结伴登山临水,徜徉于山水之间,吟诗抚琴,谈经论道,放松身心,颐养性情。“书史之外,酷爱山水。”^[51]

3. 养生先养心

朱子说:“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14]2514}养生当先养心,养心先养道德之心,这是身心健康的保证。在养心方面,理学家尤其是朱子,特别重视通过主静来养心。朱熹曾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32]217}当心散乱无法收敛时,可以用静坐调息来“收敛身心”,养一身浩然之气。静坐可以让人内心静定,如此方能探究万物之理。正如《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子认为,通过静坐,可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朱子推崇“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朱子曾对弟子说:“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得见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闲场中,如何读的书?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吃,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52]在朱子看来,人如果能在白天加强心性修养的功夫,闲话少说几句,闲人少见几个,省下时间来静坐观心,体悟经典之理,这样坚持一两年下来,学业上会大有长劲,精力也会充沛,心智水平也可提高。

朱子还结合自身学习《春秋》的经历,对学生说:“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静甚事,后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39]198}起初他认为解《春秋》与心静不静无关。之前他听罗从彦先生讲《春秋》,总体感觉比较浅显。后来罗先生“随人入广,在罗浮山住两三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透彻”^{[39]198},回来再讲《春秋》,微言大义,透彻明白。因此,朱子认为,心静对于学问的精进、境界智慧的提升非常关键。所以,朱子一生选址建的多家精舍、书院都在远离喧嚣、幽静安宁的地方,目的就是“涵养天机”。朱子晚年常被疾病困扰,而且视物昏花,视力下降严重,常常通过静坐调息的方法来调养身心,并自述胜过服药的效果。朱熹在《答林九伯(九)》中说:“某今年顿觉衰惫,异于常时,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药更不见效,只得一两日静坐不读书,则便觉差胜。”^[53]在《答黄子耕(十)》又说:“病中不宜思虑,凡事可且一切放下,专心存心养气为务。”^[54]

4. 养心先养德

养心尤以养道德之心为要。朱子以仁言“心之德”，把道德纳入人身心健康的范畴中，而且认为是否有道德之心是衡量一切健康的根本。尤其是让心做主宰，去统御性情，祛除贪欲，调节偏执的情绪，将人的情感、欲望纳入到礼义允许的范围，使得个体达到一种“中和”的身心状态。这种身体、精神的“中和”状态，恰恰具有修身养性、调节情志、延年益寿的效果。朱子生活的南宋，政治腐败，国破世衰，党争激烈，物欲横流。朱子提出“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55]，在朱子看来，养道德之心的过程就是靠损减“人欲”来复明“天理”。心性修养当以“天理”为本，以“人欲”为末。朱子总结道：“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32]207}朱子以“天理”来约束自身，用道德礼仪去规范、约束人的各种过度的情感、各种超出自身需求的贪欲，以达到养道德之心的目的。

5. 养气以存心

朱子从心性修养论的角度对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夜气”多有阐发，指出养气对心性修养的作用。

(1)浩然之气。“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气，体之充也。”天地万物只要有生命就有形体，气则充满于形体各处。形体中的这股气本自浩然，如果后天不能善加养护，就会消退而气馁。而孟子善加涵养这股气，使它能充盈回复到本初的浩然盛大。学生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朱子在解释孟子“浩然正气”时认为，人之血气与浩然之气只是一气。“义理附于其中，则为浩然之气。若不由义而发，则只是血气。”^{[56]1244}又说：“浩然之气，只是这血气之‘气’，不可分作两气。人之言语动作所以充满于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气。只集义积累到充盛处，仰不愧，俯不作，这气便能浩然。”^{[56]1246}血气者，乃生命之根本。气血充盈，则健康长寿，气血失和，则百病皆生。当行义之气充于血气之中，则为浩

然之气。根据朱子所言可知，“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用天地之间的义与道养生，使之升华为浩然之气，这是把个体生命的养生上升到与天地万物合一的高度。黄玉顺先生指出：“所谓‘养气’，就是在生活中自觉地培养这种是非观念以及相应的直觉判断能力、内在感受能力、情绪体验能力。”^{[57]14}拥有浩然之气的人因通晓道义，廓然大公，而更具勇气与正义。所以，养浩然之气可以养心以行义。

(2)夜气。朱子对孟子的“夜气”之说有诸多阐述。朱子认为，“夜气”是一种“清明自然之气”^{[56]1716}，“夜气”可以“滋养个仁义之心”^{[58]1398}。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仁义之心”，这是与禽兽差“几希”的关键。“盖要此气去养那仁义之心。如水之养鱼，水多则鱼鲜，水涸则鱼病。养得这气，则仁义之心亦好，气少则仁义之心亦微矣。”^{[58]1395}在朱子看来，存“夜气”养“仁义之心”，就同用水来养鱼一个道理。水多则鱼儿鲜活，水枯竭，则鱼儿会生病死亡。朱子甚至引《孟子·告子上》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涵养好“夜气”，可以存“仁义之心”以区别于禽兽；反之，夜不能寐，昼伏夜出，久之则仁义之心丧失。朱子进一步解释，“仁义之心”的多少与体内之“气”的清浊程度有关。他说：“心之存不存，系乎气之清不清。气清则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则事物之来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58]1393}又说：“歇得这些时后，气便清，良心便长。及旦昼，则气便浊，良心便着不得。如日月何尝不在天上？却被些云遮了，便不明。”^{[58]1393}“平旦之气，只是夜间息得许多时节，不与物接，才醒来便有得这些清明之气，此心自恁地虚静。”^{[58]1393}平旦是指寅时，早上3点至5点，因为夜间不与物接，休息多时，此时之气属于清明之气。心虚静，气清则良心能够存立，应接外事时便不会迷惑；反之，气浊则心幽暗不明，也就丧失了应接外事的能力。“夜气”所具备的“清”可以彰显“仁义之心”。黄玉顺先生指出，“浩然之气涵养人的良知与正义感”^{[57]18}，这是极有见地的。也正如朱子所说：“气清，则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长处言之。人之善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滋长。又得夜气澄静以存养之，故平旦气清时，其好恶亦得其同然之理。”^{[58]1399}“夜气”不仅对心具有存养的作用，还具有以别人禽、彰显良知与正义感的功效。

虽然“夜气”对心有存养作用，但朱子认为心性修养的着力点不应放在夜间，而应在白天的人伦日

用上下功夫。“于旦昼时,不为事物所汨。”^[58]¹³⁹⁹“旦昼所为,坏了清明之气。夜气微了,旦昼之气越盛。一个会盛,一个会微。消磨得尽了,便与禽兽不远。”^[58]¹³⁹⁶如果对白天的所作所为不加以节制,不存养、操持此心,即使有“夜气”的涵养,也不足涵养“仁义之心”,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6. 情志养生

稳定的情绪、开阔的心胸以及健康的心态是心性修养的体现,也是一个人身心健康的标志。缺乏心性修养功夫的人,在遭遇逆境时,常常会陷入紧张、焦虑、愤怒、沮丧、激动等大起大伏的情绪状态中。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七情引起的气机失调,造成脏腑功能的疾病。朱子的“心统性情”心性修养论,强调对天理的认知以及对于情欲的节制,注重身心合一,用心来调摄情绪以养生。朱子强调:“心有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30]⁸忿懣、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人人皆有,如果能做到心不为这些情绪、偏好所动,可以称得上身之修养。所以我们要加强心性修养的功夫,并将其践行于人伦日用中。加强心性修养功夫,让心作一身之主宰,在情绪升起时,及时知觉并纠偏,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一方面,它能让人免受那些偏执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完成个体道德的提升,促使人们心胸开阔,心平气和,保持一种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有利于修身养性。

总之,朱子心性修养论的理学养生之道,讲求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中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中下功夫,从生活细节中去涵养德性,超凡入圣。这种处处照管、兼体用、合内外、引导自我身心健康的举措,具有人文治疗的效果,对当今那些只重养身不重养心、只养“小体”不养“大体”的养生观念有一定的启发和矫正作用。

注释

①蒙培元认为,“心统性情”说是朱子心体用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性说的实质所在。蒙培元:《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8页。陈来认为,“心统性情”说标志着朱熹心性论的完成。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参考文献

[1]任淮南.朱熹的涵养之方[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89-93.

- [2]詹石窗,于国庆.论朱熹的身心健康思想[J].东南学术,2002(6):30-35.
- [3]梁丽萍.朱熹养生思想研究[J].长江丛刊,2016(21):82-84.
- [4]余天泰.朱熹养生思想探讨[J].中医药通报,2016(5):41-44.
- [5]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6]朱熹.朱子语类:卷五[M]//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9.
- [7]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
- [8]吕大临.蓝田吕氏遗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1183.
- [10]朱熹.与张钦夫:第三书[M]//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315.
- [11]朱熹.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M]//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2]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3]姜广辉.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J].孔子研究,1993(4):75-83.
- [14]张子之书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5]性理二[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M]//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29.
-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 [18]蒙培元.朱熹心说再辨析[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5-11.
- [19]尚书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6:2009.
- [20]朱熹.中庸章句序[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1]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M]//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90.
- [22]孟子九[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6:1388.
- [23]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35.
- [24]性理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5]朱熹.中庸章句[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6]朱高正.为学大要[M]//近思录通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 [27]朱熹.大学章句序[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
- [28]学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9]朱熹.大学或问:上[M]//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0]朱熹.大学章句[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1]朱熹.答何叔京[M]//朱熹集:第4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880.
- [32]学六[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3]朱熹辑.嘉言[M]//小学集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80.
- [34]真德秀.四书或问[M]//四书集编:大学集编.长春:吉林出版社,2002:26.
- [35]大学四[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 2016;373.
- [36]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二[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56.
- [37]朱熹.答宋深之:五[M]//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72.
- [38]大学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6.255.
- [39]学五[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
- [40]学三[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九.北京:中华书局,2016.
- [41]朱熹.论语集注[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65.
- [42]论语二十七[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1151.
- [43]董仲舒.循天之道[M]//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2-93.
- [44]赵薇,王汉苗.正心:传统文化与人格养成[M].北京:中华书局,2018;71.
- [45]朱子四[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2677.
- [46]易一[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1605.
- [47]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82.
- [48]学七[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224.
- [49]张伯行.学规类编[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
- [50]朱熹.朱熹诗词编年笺注[M].郭齐,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631.
- [51]朱熹.晦庵先生文集:第59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4;19.
- [52]朱子十三[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2806.
- [53]朱熹.答林井伯[M]//朱文公别集:卷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4.
- [54]朱熹.答黄子耕[M]//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515.
- [55]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十七[M]//朱子全书: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99.
- [56]孟子二[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
- [57]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6).
- [58]孟子九[M]//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6.

The Way of Neo-Confucianism in Health Preservation

— Focus on Zhu Xi'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Cultivation

Zhao Wei

Abstract: As individuals born from the Qi of heaven and earth, we are governed by four laws that guide our path to health. Zhu Xi, a philosopher, provides us with the fundamental truth of health. Zhu Xi's approach to health is root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emphasizing mo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aim of becoming a sage and a gentleman. His theory of mind cultiva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elf-awareness, the influential role of the mind, understanding the natural order, and controlling desire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in achieving balance in body, mind, and temperament is "neutralization," while striving for a spiritual state where one's actions align with moral principles. This detached way of life, characterized by a contented mind, an optimistic outlook, and an open-minded attitude, represents the ideal state that people aspire to attain. Although Zhu Xi's theory of mind cultivation does not explicitly focus on maintaining health, it indirectly contributes to it. Zhu Xi's approach to health is built up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Heaven and Man Principle" health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the 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encompasses concept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placing priority on nurturing the heart, fostering emotional health, and considering "benevolent longevity" as the ultimate state of well-being.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health practices based on Zhu Xi'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health concerns.

Key words: health preservation; the heart governs the nature of emphasize reverence; investigate things to acquire knowledge; emphasizing reverence; the great righteous spirit

责任编辑:涵 含

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与官方的动物保护

纪昌兰

摘要:宋代女性的头饰除了常见的簪钗等传统饰品之外,其他各类饰品也丰富多样。这些饰品不仅造型独特,制作材料和配饰更是新颖别致,其中有不少是动物制品,诸如翠羽、白角、鹿胎、鱼枕骨、玳瑁等。为了制作这些头饰需要大量的动物作原材料,这会对动物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面对这种“另类”的审美时尚,宋代官方站在遏制奢僭和教化民众向善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且适时制定了不少针对猎捕动物的限制性措施。这些禁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动物的效用,个中因由深刻地反映出了宋代国家治理的智慧。

关键词:宋代;女性头饰;动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121-07

宋代女性的头饰除了簪、钗等传统常见物件之外,还有各种别样经典饰品,包括翠羽、梳篦、闹娥、玉梅、雪柳、春幡、人胜、玉燕等,种类丰富多样。这些首饰不仅造型新颖独特,而且花样层出不穷。上述所列头饰有不少是由动物骨骼、麟角、羽毛等制作而成,诸如翠羽、白角、鹿胎、鱼枕骨、玳瑁、龟壳等,都是女性头饰中的常见材料。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商人们不择手段获取相关材料,捕杀动物便屡禁不止,这也引发了宋代官方的高度关注。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女性头饰的研究不少^①,但是对女性动物制品头饰及官方的限制举措和效用的研究尚显薄弱。通过展现宋代女性头饰中的动物制品样式及其品类,探索官方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举措,发掘隐含于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对于考察宋代国家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宋代女性头饰中的动物制品

古人认为:“礼,男子冠,妇人笄;男子免,妇人

髻。妇人之饰,不过以发与笄而已。”^{[1]3493}实际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中所见女性的头饰早已超越笄这一礼制范畴,簪、钗、步摇、珠翠、花钿等无不摇曳生姿,各种名目令人眼花缭乱。宋代女性的头饰丰富多彩,其中不乏各种精巧别致的动物制品,所涉材料包括翠羽、白角、鹿胎、鱼枕等。

第一,翠羽饰品。翠羽,是禽鸟的羽毛,尤以翠鸟、孔雀的青、蓝色羽毛为主^[2]。两宋时期,翠羽大多数被装饰点缀在钗冠等头饰之上,奢华美艳,是女性妆饰侈靡的典型体现。翠羽作为妆饰用品曾经风靡一时,尤其受到广大女性的推崇和喜爱。宣和年间,宋徽宗曾在睿谟殿张灯庆祝元宵佳节,兴起之余“曲燕近臣”,举行赏橘活动。预宴臣僚王安中记述了宴会的具体情形,可从中一窥深宫中妃嫔们的翠羽饰品风貌。宴会上,“清蹕再传,珠箔轻明,嫔御中出,翠铺高朵,金泥窄袂,宝带玉贝”^[3],妃嫔们“翠铺高朵”的装扮就是翠羽头饰的高贵奢华体现。宋代诸王纳妃给女方的聘礼中也包括“真珠翠毛玉钗朵”^{[4]2735}这类首饰。绍兴年间“时去宣和未远,

收稿日期:2022-03-05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商品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宋代饮食业研究”(2022BLS011);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24-CXRC-20)。

作者简介:纪昌兰,女,信阳师范大学根亲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信阳 464000)。

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4]1429},翠羽饰品依旧受到女性的青睐。宋词中也不乏对翠羽饰品的相关描写,诸如“垒金梳子双双耍,铺翠花儿袅袅垂”^[5]、“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齐楚”^[6]等都展现了女性妆饰中翠羽饰品精巧别致的形象。

第二,白角饰品。白角通常被制作成冠子、梳子等饰品。白角主要取材于牛等动物的犄角,是制作冠子的优质材料。宋代女性佩戴的白角冠造型颇为独特,冠体通常装缀白角梳数把,使其“上下相合,左右对称”^[7],形制美观而不失奇夸,颇受富贵家庭女性的喜好与推崇。

白角冠在唐代形制并不夸张,唐朝诗人王建在《赠王屋道士赴诏》诗中就有“玉皇符诏下天坛,玳瑁头簪白角冠”^[8]的吟咏,提及道士簪戴白角冠之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唐朝白角冠属于道家的装扮。宋代初年,妇人冠子以漆纱为之,“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而这种以漆纱制作和金银珠翠等首饰装点的冠子“初无定制”,只是女性佩戴之际随心装点而已。宋仁宗时期,白角冠出现于宫廷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造型相当夸张,以至于“议者以为妖”^{[9]35}。白角冠子在宫廷内兴起之后,“人争效之,号内样冠”,之后这种时尚风潮迅速蔓延,受到了广大女性的追捧与喜爱。北宋中期,刘斧在传奇《温泉记》中记载了“张俞骊山遇太真”的仙人轶事。其中,太真询问张俞:“今之妇人首饰衣者如何?”张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10]从二人对话中亦可见当时白角冠的流行程度。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知开封府钱明逸所见“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梳一尺余”^[11],其形制与兴起伊始宫廷内的奇夸造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难想象女性佩戴如此高大冠梳行动不便的情形,“登车担皆侧首而入”^{[12]338},冠子如此之大,进出车轿都要俯身侧首,加之头上佩戴多个白角整体看来十分奢侈。御史刘元瑜就认为女性佩戴如此奢华奇夸的冠子是“服妖”,因而建议朝廷予以禁止,并且“重赏告谏者”,致使“妇人多被罪者”,但是这种强制行为“大为识者所嗤,都下作歌辞以嘲之”^{[13]4019}。

第三,珍珠饰品。宋代女性头饰中不乏珍珠,尤以珠冠为典型。珠冠主要是由珠翠装缀而成的冠子,妆饰起来十分奢侈华美。词人周紫芝曾经以“雪色珠冠光射月”^[14]来赞赏此冠。南宋时期,理

宗朝周汉国公主出降之际,皇家为其准备的诸多嫁妆中,就有真珠九翠四凤冠、真珠玉佩一副、北珠冠花篦环、七宝冠花篦环等珍贵物品^{[15]26}。宋哲宗元祐年间,上元节后宫开设御宴,以丞相吕公著夫人为代表的近臣妻室得以入内侍宴。此次宫廷御宴在座诸位妃嫔及侍宴女使们的装扮各具特色,其中“太妃暨中宫皆缕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珠。珠甚大,衣红背子,皆用珠为饰”^[16]。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郑皇后册立之初,“有司创制冠服,后言国用未足,冠珠费多,请命工改制妃时旧冠”^{[4]8639}。关于此次服制之议始末,在《宋会要辑稿》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

执中奏事言皇后受册冠服当办具者。上曰:“比有司画一来上,内头冠合用珠子。中宫一见,辄自陈曰:‘方今朝廷用度未丰,不当以服饰之费耗邦财。头冠用珠数多,请以为妃时所服冠命工改造,增篦插三枝足矣。’朕嘉其能躬俭节用,亦既许之。”执中奏曰:“此盖陛下克勤克俭风化所及。今士大夫儒素之家岁时节序尚皆竞务鲜华,况母仪天下,又当受册盛礼,虽其费十百于此,岂患不足。而能以朝廷费用为虑,躬自菲薄如此。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内治而兴,此可为陛下贺也。”尚书右丞邓洵仁请纪,以其事宣付史馆,从之。^{[17]269}

宋徽宗郑皇后册立之际,按照礼仪头冠“合用珠子”,皇后则以“头冠用珠数多”为由请求对其所服冠子进行改造,在节省朝廷开支用度的同时又借此表明克勤克俭的德行风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冠子奢靡华丽,耗费颇多。

第四,鹿胎饰品。宋时鹿胎常用于制作女性的冠子。鹿胎冠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冠子类型,将鹿胎皮制作成冠子佩戴于头上,不仅能够起到收束和妆饰头面的效果,更重要的则是彰显出佩戴者独特的妆饰品位及体现其尊贵的社会地位^[18]。鹿胎冠俨然成了一种高档的奢侈品。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已经出现“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19]34}的现象。南宋绍兴年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4]1429}。临安城里的街市上专门设有“修洗鹿胎冠子”^{[20]120}的铺面行当。关于鹿胎冠,宋人诗词中也不乏相关吟咏,王之道在一首《浣溪沙》小词中就有“鱼枕蕉深浮酒蚁,鹿胎冠子粲歌珠”^[21]的描写。而在花蕊夫人所作的一首《宫词》中还出现了“老大初教学道人,鹿皮冠子澹黄裙”的“鹿皮冠子”,大约是与鹿胎冠子

类似的鹿皮材质首饰制品。

第五,鱼枕骨饰品。宋代由鱼枕骨制作器物十分常见,其中就包括了女性佩戴的冠子。鱼枕冠主要是由鱼的枕骨制作而成,在《百宝总珍集》中有鱼枕“多出襄阳府、汉阳军、鄂者,皆有大者当三钱……主造冠子,大者十六七个器物用之”^[22]的记载。由此可见,襄阳府等地盛产的鱼枕骨颇为闻名,主要用来制造冠子。淳熙年间,嘉兴人徐大忠随父去中都就职,途中暂居仁和县仓畔。夜晚读书之余窥得窗外一靓丽女子“戴鱼枕冠,皂衫黄裙红履”^[23]¹⁰⁹¹,另有杉田院行者宁氏受邀为宁居院所设水陆斋写文疏,居于寝堂小室,黄昏之际见窗外一女子“顶鱼枕冠,语音僇利,容仪不似田家人”^[23]⁷⁷⁴。行者根据女子的容仪装扮而判断其身份,大约一般农家女子少见佩戴这种头冠,除去劳作便捷方面的考虑之外,或许又跟冠子价格密切相关。关于鱼枕冠的售卖价格,在《夷坚志》中有所反映,一位临川客商游走贩卖首饰,至于浮梁(今江西浮梁县),以七百钱售出鱼枕冠一顶。客商感叹“交易费力,消折本钱”^[23]¹¹³⁰,以七百钱一顶出售属于亏本买卖。另据宋仁宗朝之后“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9]³⁵的记载,可知这种冠子的兴起大约略晚于白角冠,即北宋中后期。苏轼在《鱼枕冠颂》中就有“莹净鱼枕冠,细观初何物。形气偶相值,忽然而为鱼。不幸遭网罟,剖鱼而得枕。方其得枕时,是枕非复鱼。汤火就模范,巉然冠五岳。方其为冠时,是冠非复枕”^[24]的吟咏。随着时代的发展,鱼枕冠逐渐受到了广大女性的喜好,佩戴这种冠子者不免日趋普遍起来。南宋时期,鱼枕冠已经非常大众化了,生活于南宋后期的舒岳祥曾提及“今浙江有苦条木,其木条长而叶涩,可以磨洗鱼枕”^[25]之事,也可从一个侧面印证鱼枕冠辐射面之广。

二、宋代官方对动物饰品的禁令

女性头饰中动物制品的大量使用,形成奢靡风气的传播,引发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基于遏制社会奢靡之风蔓延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宋代官方不断颁布针对翠羽、鹿胎、白角等以动物制品为原材料的饰品使用的禁令。

第一,针对翠羽的禁令。翠羽的使用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因此禁止捕猎鸟类的禁令唐朝即有所见。唐朝时期,安乐公主曾命令尚方合百鸟毛编织成两件裙子。这种特制的百鸟羽裙“正视为一色,傍视

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相当奢侈华丽。皇家这种独特而奢靡的羽毛裙衫引起了富贵豪奢们的争相热捧,纷纷进行效仿,一时间“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26]。唐玄宗时期厉行节俭,“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27]。从“采捕渐息”的记载来看,禁止士庶穿戴奢靡的翠羽服饰,即限制了民间对于相关动物的捕捉。

宋朝初年,针对翠羽服饰的禁令依然存在。开宝年间,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襦入宫,太祖见之对公主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13]²⁸⁶此后,朝廷禁止使用翠羽作为女性饰品的诏令屡有颁布^②。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朝廷诏令临安榜谕:“今后销金为服,增赏钱三百贯。其采捕翡翠及贩卖并为服饰,并依销金为服罪赏。”所有翠羽、销金服饰“限三日毁弃,违者重坐之”。此外,还明确规定“其犯金、翠人并当职官,除依条坐罪外,更取旨重作行遣”^[28]²¹⁶⁵。为了表明坚决禁止的强硬态度,绍兴二十七年宋高宗下令将交趾等国进贡的六百余支翠羽“焚之通衢”,并且禁止宫人服用销金、翠羽^[4]⁵⁸⁷,算是在公开场合的一次表态。直到咸淳八年(1272年)正月,朝廷依然下诏“自今宫禁敢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必罚无贷。臣庶之家,咸宜体悉。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从重典”^[4]⁹⁰⁹。从以上诏令来看,朝廷颁布的禁令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遏制效果。

但是一方面由于翠羽实在是过于璀璨光华,对于爱美的女性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难以从根本上阻止其追逐时尚的步伐;另一方面,朝廷的禁令时有松懈,间或惩处力度不够,导致“禁而不止”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南宋初年,朝臣王十朋在应对宋高宗的廷试策略中说道:“朝廷往常屡有禁铺翠之令,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28]²⁹¹⁰南宋绍兴初年,宋高宗针对销金、翠羽为妇人服饰屡禁不止的情况,对辅臣训示道:“已戒宫中内人不得用此等服饰,及下令不得放入宫门。”禁令之下“无一人犯者”。又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申严止之,仍下广南、福建禁采捕者”^[4]³⁵⁷⁹。反映出朝廷禁令效果不佳,同时也充分说明女性对于翠羽首饰的热衷与崇尚,导致其长盛不衰,时时出现在时尚潮流之中。

第二,针对鹿胎冠的禁令。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朝廷就发布了“禁以鹿胎皮为冠”^[13]²⁷⁹¹的诏令。关于这次禁用鹿胎冠子的诏令

在《宋大诏令集》中也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载。诏令明确规定臣僚士庶之家不得佩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捕鹿胎,并制造冠子”,如有违犯“并许诸色人陈告,其本犯人严行断遣”,违反者一律受到严厉的惩处,告发采捕鹿胎,佩戴、制造鹿胎冠子者均有赏金^{[29]737}。政令之下,其结果“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19]35}。诏令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效果,胆敢逆风而上制造鹿胎冠子者寥寥,佩戴鹿胎冠子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南宋初年,戴鹿胎冠的时尚风潮再次席卷而来。绍兴年间又出现了“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4]1429}的现象,对此朝廷又不得不颁布禁令。秦桧当权期间,谏官惧怕其权势,“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4]13763},很好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佩戴鹿胎冠子势头之盛,以至于禁止佩戴鹿胎冠子成了南宋初年君臣之间“老生常谈”的一个热门话题。绍兴二十九年二月,知枢密院事陈诚之上奏指出民众残害物命,以鹿胎为冠,“其用至危,其害甚酷”,揭露了当时民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的猖獗状况,建议朝廷予以制止^{[17]8390}。面对臣子们的慷慨陈词,宋高宗也是颇为关切。因此,在绍兴六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频繁下诏禁止臣僚、士庶之家佩戴鹿胎冠,规定民间不得采捕鹿胎、制造鹿胎冠。但是从诏令执行情况来看力度远远不够,并没有形成宋仁宗时期“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的显著效果。关于此事,从宋高宗君臣的对话中尽可窥探其中的缘由。宰执曾经上奏建议禁止民众使用涂金铺翠、鹿胎等首饰,宋高宗对此回应道:“宫中禁之甚急,民俗久当自化,不必过为刑禁也。”^{[28]1963}朝廷采取“怀柔”态度,对百姓寄希望于教化疏导,导致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针对白角冠的禁令。白角冠也在宋代官方的限制名录之内。皇祐元年,宋仁宗下诏:“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犯者重致于法,仍听人告。”^{[13]4019}对女性佩戴的白角冠进行严格限制,在国家政令强制之下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效果,以至于“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9]35}。但是,仅凭朝廷政令难以从根本上阻止女性们追逐时尚潮流的步伐,“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9]35}。直到南宋末年,白角冠子依然存在,在《吾竹小稿》中有一首诗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笑问傍人

披得称,已遮日色又遮羞。”^[30]又可见这种冠子流行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

三、宋代限制动物制品头饰的主要原因

宋代官方频繁颁布针对女性头饰中动物制品的禁令,从禁令及其内容来看并非单纯的保护动物,蕴含其中的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

第一,遏制奢僭之风,规范社会等级秩序。禁止民众佩戴略显奢靡的动物材质饰品,从本质上来看是宋代国家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中国古代社会,服饰除了具有蔽体御寒的基本功能之外,还是区分群体之间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关于此,《淮南子·人间训》中就曾指出:“冠履之于人,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31]宋人叶梦得也有“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32]的说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的等级服饰制度,往往发挥着区分人群、强化权力与分配利益的功能^[33]。女性佩戴诸如翠羽、鹿胎等动物材质的妆饰品,追逐时尚潮流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风尚走向奢靡。当时社会诸如“闺门之内,奢靡无节”^[34],近世“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35]的现象相习成风。早在宋真宗咸平年间,朝臣张齐贤就曾提及“近岁风俗尤薄,奢侈相尚,每为事恐不过人”,继而建议“此弊当急惩戒”^{[13]944}。张氏并未解释面对奢靡无节的社会风气国家为何需要“急惩戒”,但是蕴含于其中的玄机却是一目了然的。

在倡导服饰穿戴遵循“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9]7}基本原则的古代社会,逾越等级秩序的奢靡时尚无疑会引起官方的高度警惕。早在汉代,贾谊就曾强调指出服饰具有“以等上下而差贵贱”的礼仪化象征意义,“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如此,服饰穿戴礼仪尊卑等级固定,百姓就会“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36],具有不可多得的国家治理意义。对于古人这种治理之道,宋人同样谙熟于心,尤以士大夫为代表。苏洵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诸如“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37]36}之类的现象,他是颇为忧心的。宋徽宗政和年间,有臣僚揭露当时社会上“闾阎之卑,倡优之

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强调“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尤其是“衣服之制,尤不可缓”。据此建议,“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间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如此一来,“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4]3577}。同样强调了明确服饰穿戴等级尊卑贵贱对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治国理念在宋代帝王颁布的诏令中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如景祐三年,宋仁宗诏曰:“俭守则固,约失则鲜,典籍之格训也。贵不逼下,贱不拟上,臣庶之定分也。”明确了谨守社会贵贱等级秩序的重要性。针对“鞞毂之间,士民之众罔遵矩度,争尚僭奢,服玩纤华务极珠金之饰,室居宏丽交穷土木之工”的违制现象,宋仁宗特别强调“倘惩诫之弗严,恐因循而滋甚,况历代之制,甲令备存,宜命攸司参为令式,庶几成俗,靡蹈非彝”^{[19]212-213},明令予以严格规范,避免上下失序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王宫贵族的奢靡之风,也会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众盲目的趋从。与前朝类似,针对女性这种奢靡的妆饰方式,历来倡导简朴之风的宋代朝廷同样颇为关注,屡出禁令予以制止。上述开宝年间,永庆公主穿着贴绣铺翠的襦入宫,宋太祖见之当即训诫道:“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殿转贩易,伤生浸广。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听罢“惭谢”^{[13]286}。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面对广大女性佩戴颇具奢靡色彩的动物妆饰品,宋代官方不断颁布诏令予以禁止,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仁善为德”治理观念的影响。猎杀动物做成饰品相当残忍,如鹿胎冠子就是一种相对珍贵的动物饰品。宋代女性们佩戴鹿胎冠子风靡一时,甚至出现“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19]34}的夸张现象。民间杀鹿取胎,制作鹿胎冠子悄然成风,所谓“竞刳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29]737},即是如此,以至于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大关注。其制作材料“鹿胎”颇不易得。鹿胎是一种名贵的中药,它是将母鹿流产的胎仔或从母鹿腹中取出的成形的鹿胎或胎盘,经过酒浸、整形、烘烤和风干等程序制作而成的。制造鹿胎冠子之鹿胎应是当时尚在妊娠阶段的幼鹿之皮,因皮毛纹路颜色独特美观而被用于制作冠子^③。鹿一般生活于深林之中,狩猎者为了获取鹿胎皮不惜铤而走险。当时就有所谓鹿“俗贵其皮,用诸首饰,竞

刳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29]737}的说法,从“竞刳胎而是取”的描述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鹿胎冠的特殊之处。绍兴二十三年,有臣僚指出:“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4]1429}亦可见鹿胎冠是由鹿胎皮制作而成的特殊头冠饰品,可以想见鹿胎的难得与珍贵。

珍珠玳瑁的获取也非常残忍,如南宋淳熙年间,有人在吴江地区“见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铗刀剜其肉,最为残酷”,一枚才值一二钱^{[12]485}。取自于翠鸟、孔雀的翠羽也不易得,尤其是拥有翠羽这种艳丽羽毛的孔雀多在南方热带地区。时人周去非记载的海南诸多土产中就有翠羽一项^[38]。这种禽羽大多通过商人贩卖或进贡的方式流传到中原地区。黄休复曾提及好友寄递一只孔雀幼雏之事。好友在信中写道:

所属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尾大而绿,光翠夺目。孔雀自爱其尾,欲栖息,必先择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网罟,须俟甚雨,尾沾而重,不能高翔。初为所擒,则雀欲展其翅,恐伤其尾,至死尚爱护之。土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于丛篁幽闇处,藏蔽其身,伺其过,则急断其尾者。若不急断,回首一顾,即金彩无复光翠,故生者为贵也。为妇人首饰及扇拂之类。^[39]

从信中可见,只有雄性孔雀的尾羽才能制作成光彩夺目的首饰。为了得到这种同样为孔雀自身所珍视的羽毛,人类想尽办法进行捕获,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其手段的残酷性。

宋代官方禁止民众捕杀动物制作饰品源于当时社会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宋代社会儒释道三种文化观念融合,对宋人的思想修养、精神风貌、处世心态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古人“三教一理,儒言存心,释言明心,道言修心”^[40]的说法就颇具代表性。宋孝宗谈及三者时也曾强调:“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41]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独特旨归与侧重之处。尤其是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佛教倡导善行,这种教化对于广大民众产生着颇为深刻的影响。当时民间就有“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赐千灾,鬼神谴之,天之报善罚恶,甚于影响”^{[20]173}的谚语。根据时人周密的记载,民间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当天举行西湖放生会,百姓们竞相购买龟鱼螺蚌等动物放生^{[15]41},也是当时社

会民众受到佛教影响的一种表现。在佛教浓郁的积德行善意识的教化和熏陶之下,人们对于虐待、滥杀动物的做法大多难以容忍,予以谴责在所难免,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颇受影响。关于此,在诸位帝王颁布的禁捕诏令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如天禧年间,宋真宗下诏:“淮南、江、浙、荆湖旧放生池,废者悉兴之;元无池处,缘江、淮州军近城上下各五里,并禁采捕。”^{[13]2085}表现出了特有的好生之德。宋仁宗也曾在禁采鹿胎诏令中指出此举“既浇民风,且暴天物”,因此强调:“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29]737}在述及仁宗朝关于采捕珍珠的禁令时,苏洵更是以“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37]36}来阐释帝王的仁德悲悯之心。大观初年,郭天信请求中外并罢翡翠妆饰,宋徽宗因此指示:“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4]3576}同样以“惠养万物”为说辞表达其好生仁德。南宋绍兴年间,朝臣在奏疏中提及民间以玳瑁、鹿胎制造饰品,“残二物之命,以为一冠之饰,其用至危,其害甚酷”,言辞恳切充满仁善之意,建议严令禁止民众贩卖和制造以这些动物为原料的饰品。对此,宋高宗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和高度的认同,诏令“从之”^{[17]8390}。宋高宗本人亦曾对辅臣训示道:“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4]3579}诸如以上说法在宋朝历代帝王下发的禁捕诏令中屡见不鲜。

事实上,任何由君主做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实践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从来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42]。宋代帝王秉持以善为本的基本理念,频繁发布禁捕诏令,遏制社会时尚风潮奢靡无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动物,既顺应了佛教积德行善的教化思想,也符合宋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可谓一举两得。

结 语

以宋代女性动物制品头饰为考察重心,又可见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南宋时期在杭州城里的街市上,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其中最属官巷花作闻名,其间“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20]115}。包括冠梳首

饰等女性头饰在内的一应商品应有尽有,制作技艺极其工巧,样式更是推陈出新。这一方面说明宋代女性注重对于自身的修饰,大胆追求新颖独特的妆饰风格,是美与时尚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在雄厚的物质财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刺激之下,女性的妆饰也随之日新月异,常变常新。

宋代女性妆饰求新尚奇,时尚潮流推陈出新,这就导致服饰逾越等级现象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宋代国家针对女性妆饰的限制诏令屡屡颁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一切足以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层之间变动加速,阶层之分已日渐模糊^[43],也是导致此类限制禁令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宽松,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百姓们过着享乐的日子。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宋代都市人口的增加,交通商业的繁盛,居民财富的增加以及居民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44]。换言之,以女性头饰为典型代表的时尚潮流从来不会在种种限制中止步,反而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越来越“放肆”,这也就很好地诠释了时尚的特殊性。

此外,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繁盛,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日渐受到挑战,民众逐利思想潜滋暗长,食利阶层随之而兴起,“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23]670}。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铤而走险者不在少数,社会乱象横生,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宋朝统治者洞若观火。有宋一朝官方对广大民众捕获鹿胎、翠羽等行为屡下禁令,不仅仅在于宣扬惠养万物的仁爱之心,借此树立国家好生为德的价值理念,更在于整顿民风民俗,避免民众出现诸如“竞割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等铤而走险的行为。政令之下,引导民众安于现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这一点从宋代官方“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29]737}之类的诏令中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注释

①刘秋根、任欢欢:《宋代女性时尚消费》,《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许静:《宋代女性头饰设计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董孟雅:《宋代女性婚嫁妆饰时尚研究》,安徽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②咸平二年、景祐三年、大观元年、绍兴五年、绍兴九年、绍兴十年、绍兴二十七年、隆兴元年、嘉泰元年、嘉定八年、咸淳五年、咸淳六年、咸淳八年,朝廷均颁布有翠羽禁令。参见《宋朝事实》

卷十三、《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宋史》卷二十、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六等相关记载。③王惠莹：《北宋女性便冠研究》，北京服装学院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旭、郭声波：《鹿胎消费与宋人的环保意识》，《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以上学者都认为“鹿胎”冠子所指鹿胎是尚在妊娠阶段的幼鹿皮。

参考文献

- [1]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493.
- [2] 曲音. 旧时色: 中国传统色彩风尚[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1: 136.
- [3] 王安中. 初寮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27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10.
- [4] 脱脱. 宋史[M]. 中华书局, 1977.
- [5] 吕胜己. 渭川居士词[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1: 18.
- [6] 王仲闻. 李清照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53.
- [7] 周汛, 高春明.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57.
- [8] 尹占华. 王建诗集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300.
- [9] 王林. 燕翼诒谋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刘斧. 青琐高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3.
- [11] 江休复. 江邻几杂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593.
- [12] 刘永翔. 清波杂志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13]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4] 周紫芝. 太仓稊米集[M]//四库全书珍本二集: 第265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1: 2.
- [15] 周密. 武林旧事[M]. 杭州: 西湖书社, 1981.
- [16] 李廌. 师友谈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7.
- [17]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8] 王惠莹. 北宋女性便冠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57.
- [19] 李攸. 宋朝事实[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35.
- [20] 吴自牧. 梦粱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 [21] 周振甫. 唐宋全词[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967.
- [22] 佚名. 百宝总珍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78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811.
- [23] 洪迈. 夷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4] 苏轼. 苏轼全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693.
- [25] 舒岳祥. 阆风集[M]//四库全书珍本三集.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1: 2.
- [26]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78.
- [27]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377.
- [28]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29] 佚名. 宋大诏令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0] 陈起. 江湖小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57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94.
- [31] 刘安. 淮南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568.
- [32] 叶梦得. 石林燕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49.
- [33] 阎步克. 服周之冕: 《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
- [34]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9.
- [35] 曾巩. 曾巩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39.
- [36] 贾谊. 贾谊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29.
- [37] 苏洵. 苏洵集[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0.
- [38] 杨武泉. 岭外代答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71.
- [39] 黄修复. 茅亭客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42.
- [40] 许结. 中国文化史论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43.
- [41]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544.
- [42] 谢和耐.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M]. 刘东,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51.
- [43] 刘复生.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 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J]. 中国史研究, 1998(2): 85-93.
- [44] 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304.

Female Animal Products Headwear and Official Animal Prote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Ji Changlan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ornaments such as hairpins, the headwear of women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also rich and diverse. These ornaments not only had unique shapes, but also had novel and unique materials and accessories. Many of them were animal products, such as jade feathers, white horns, deer fetuses, fish pillows, hawksbill, etc. The Song Dynasty court strictly controll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hibiting extravagance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towards goodness, and formulated many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hunting animals. To some extent, those prohibitions also protected animals and deeply displayed the state governing wisdom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female headwear; animal protection

责任编辑: 王 轲

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孟姝芳

摘要：清代吏役舞弊为害不断，嘉庆十四年的王书常案即其一。案发以后，不仅书役等被处以绞斩之罪，涉案的户工部和内务府官员以及管理三库大臣也被予以处分。此案处分，既有吏部按照制度的严苛处分，又有以嘉庆为首的皇权对制度处分的从宽调整，最终使得官员处分处在一个可接受的范畴之内，由实降实革到虚降虚革，避免官场的大动荡。但是，皇权治理及其对官员处分的调整，却造成对处分制度效用的冲击和对吏治腐败的催生。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前中期这种处理模式的常态化。

关键词：嘉庆；官员处分；王书常案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128-10

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假印案”被称为乾嘉道时期书吏舞弊案的典型，对此案学界有一定研究，如薛刚的《从“假印大案”看清嘉庆朝吏治》^[1]，倪玉平的《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2]，作者分别从“假印案”发生的原因、过程、“假印案”整治的失败等角度探讨了这起案件。也有文章如关文发的《嘉庆吏治评议》^[3]等，对案中官员处分予以点及，然未及深论。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尝试探讨当时以吏部为主的制度议处和以嘉庆皇帝为主的皇权调整之间的关系。在制度议处中出现了官员处分的严苛问题；在皇权调整中出现了官员处分从宽轻减的问题。皇权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官员的处分力度，体现了皇权治理对制度治理的完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处分制度本身的效用和导致吏治的愈加腐败。王书常案所揭示的制度治理和皇权治理之间的关系，不独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也同样存在，可见清代对案中官员处分的一贯处置模式已然常态化。

一、王书常案的问题及严重性

这起案件发生在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由时任步军统领的禄康将随意捏造工程名目、大胆伪造工部文稿、私刻印信冒领银两的工部堂书王书常和其他一千经承、贴写拿获。经审讯得知，“王书常每次假捏钦派办工事由”^{[4]778}，伙同各部书吏，从嘉庆十一年起，冒领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储司银两和物料，前后共14次，其“冒领银数共计五万余两，其冒领颜料、缎匹按照例价计值银一万九千余两”^{[4]777-778}。嘉庆对此案尤为震怒，指示迅速查办。

首先是刑部议罪。嘉庆十四年，军机大臣、刑部等奉旨严讯，通过昼夜熬审加以刑吓，案情水落石出，结案治罪上奏。此案治罪依据数款律例：律一，伪造诸衙门印信冒支钱粮者斩立决，为从绞监候。律二，诈传诏旨为首斩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律三，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监候，为从减一等杖一百

收稿日期：2023-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嘉庆朝官员处分及其失误研究”(19XZS008)。

作者简介：孟姝芳，女，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呼和浩特 010070)。

流三千里。律四,伪造假印将起意与雕刻之人并以为首论。律五,诈伪六部文书盗用印信者绞监候,诈伪其余衙门印信文书者杖一百徒三年。律六,诈伪六部各司文书者,俱与其余衙门同科。律七,知人盗后分赃者,计所分赃准窃盗为从论。律八,恐吓取财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律九,凡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4]778}。可见,王书常等人所犯不止一项罪状,而是数罪并及,盗库者焉能活命!刑部的治罪轻者发配充军,重者绞斩^{[4]778-779}。

其次是由嘉庆裁决。在刑部拟罪基础之上,嘉庆降旨裁决:“该犯等作奸藐法,情罪重大,实属法无可宽。”对于案中“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著即处斩,蒋得明著即处绞,派侍郎托津、景禄前往监视行刑。”此外,“传集六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书吏各数人前往环视,俾共知儆惧。谢兴邦、商曾祺俱著绞监候秋后处决。陶士煜、王嘉鼎、秦浩、钱树堂、祝广平、叶锡嘏均著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宋良辰、万彭俱著发附近充军”^{[4]775}。前后处死者6人,发配充军者8人。

比对刑部治罪和嘉庆定罪,对于所有罪犯的定罪嘉庆全部依从了刑部的制度性议罪,不仅没有从宽,而且还强制性命六部、三库、内务府书吏观看,给予他们心理上的震慑。可见,对于吏役犯罪的处置和对于官员的处分,嘉庆的处置是截然不同的,对吏役,嘉庆的态度是罪无可赦甚至要加重处罚,而对官员,处分可从宽减轻并可以再次被起用。

就此案嘉庆十四年曾有旨:“王书常等胆敢捏造印信,冒领帑银库件竟至十四次之多,酿成巨案,现已按律严办。其失察之堂司各官亦分别降革治罪。”^{[5]721}“牵连、遣戍、降革大小多员。”^{[4]775}嘉庆讲得比较轻松,实际上此案牵涉官员很多。自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来,一拨又一拨官员受到处分。这些处分从制度的实降实革后转为皇权干预下的虚降虚革,部议处分的效用大打折扣。

二、嘉庆给出对官员处分的初步定性

针对此案需要处分的官员,嘉庆曾就处分官员的程度如何提出初步定性,这是官员处分的第一个环节。吏部便以此定性为基调,进行具体的按例制度性议处。

1. 嘉庆针对内务府大臣处分初步定性的“反复”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庆桂奏请议处失察冒领库银案的内务府堂司各官。嘉庆由此初知案

情大发雷霆,立即对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6人发难,指出此6人的失职之处:“内务府于伪造工部假印文领,屡次照文给发毫无觉察,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各员怠玩不职,究属咎无可辞。”苏楞额、阿明阿“二人现系工部堂官,各司文稿俱应阅视,使于内务府给发银款时,思及工部衙门并未具奏此件,一加查核何难立破其奸?乃被欺多次”,“岂堪复胜部院之任,苏楞额、阿明阿俱著即行革职,仍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这是最重的定性。至于英和、常福、和世泰,“俱著先行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对于征瑞,因出差在外,情稍可原,“著交部议处”^[6]。除嘉庆以皇帝身份直接处分个别官员外,更多的涉案官员则是按照皇帝的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规定予以议处。

按照嘉庆的治罪处分逻辑,治理失察处分之罪,必须要以精确的失察情况为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精确依据则是大臣们在任期间的失察次数。为更准确地议处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将犯案官员在部年月与失察假印次数进行比对,统计苏楞额在侍郎尚书任内有失察已冒领二次未领一次;英和在内务府任内失察已领一次;阿明阿任内失察已领七次未领一次;常福任内失察已领一次^[7]。这项比对核议工作须非常细致,否则稍有差错就会导致后期处分的错误。

军机大臣将此次失察次数清单进呈给嘉庆,使嘉庆看到了实际的失察情况,这与其先前的主观评判“屡次照文给发”有一定出入,嘉庆及时改变定性:“苏楞额在工部、内务府年分俱久,其平素办事尚属细心。”“乃于此等文稿并未寓目疏忽已极,本应仍予治罪,但其失察仅止二次,与阿明阿之失察七次者有间。苏楞额业已革职,著加恩免其治罪。阿明阿仍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至英和、常福于兼工部侍郎任内各有失察一次,前经降旨将伊二人同和世泰一并严议,此时亦应量予区别。英和、常福、和世泰著分别严加议处。”^{[5]700}此旨将苏楞额的刑部治罪免去。嘉庆以所谓的“一秉至公”^{[5]700}掩饰了自己前期的失误判断,也使得部分内务府大臣的罪状有所减轻。

2. 嘉庆针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军机大臣又二次上报管理三库大臣的失察次数。档案载:董诰失察二次;恭阿拉失察三次;庆桂、王懿修俱失察一次;费淳兼管工部失察一次;瑚图礼失察一次;禄康、曹振镛俱失察一次^{[4]765}。涉及8位管理三库大臣,其整体失察次数为一到三次之间。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嘉庆依据上述失察次数的不同,对各位管库大臣的失察处分给出初步定性,费淳“著交部严加议处”;董浩、恭阿拉、瑚图礼、曹振鏞“均著交部议处”;庆桂、王懿修“著交部察议”;禄康“此次失察之处,毋庸交议”^[8]。这是嘉庆针对三库大臣给出的初步定性,各有侧重。

3. 嘉庆针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工部堂官的失察处分有两处,一是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二是失察冒领户部三库。嘉庆的初步判断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的处分,嘉庆认为:“工部堂官失察书吏铺户舞弊,印由私雕,与盗用堂印者稍有不同。所有工部堂官任事较久者著交部议处,其本年到任者著交部察议。”^[6]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特点是较为平和,只有议处和察议,没有严加议处,这是嘉庆鉴于上次对内务府大臣的初步定性有误而吸取的教训。

为定性准确,军机大臣同样呈报了工部堂官失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次数。大学士费淳和原任尚书缙布都失察五次,苏楞额失察一次;尚书邹炳泰失察一次,曹振鏞失察四次,戴衢亨失察一次;侍郎英和失察二次;署侍郎多庆和邵自昌失察一次;侍郎成书失察三次;原任侍郎阿明阿失察二次;侍郎福庆和周兆基失察一次;原任侍郎蒋予蒲失察三次;侍郎陈希曾失察二次;顾德庆失察二次^[9]。这次涉及16位大员,失察大致在一次到五次之间不等。

嘉庆同样依据失察次数,给出初步定性。费淳“于本部书吏冒领三库银物失察至五次之多,咎无可辞,著先拔去花翎不必兼管工部事务,再行交部严加议处”;曹振鏞、成书、蒋予蒲“均著交部议处”;英和、陈希曾、顾德庆、多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戴衢亨、福庆“均著交部察议”^[6]。工部堂官的失察处分是嘉庆给出的第三次定性,可见失察次数越多,处分定性越严重,相反则为察议。

4. 嘉庆针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同样的,户部堂官失察次数也是他们定罪的依据。大学士禄康失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六次;尚书德瑛失察六次;戴衢亨失察四次;曹振鏞失察一次;侍郎托津失察二次;赵秉冲失察五次;英和失察二次;刘鐶之失察四次;署侍郎桂芳失察一次;原任侍郎苏楞额失察四次^{[4]765}。涉及10位户部堂官,其失察次数在一到六次之间,嘉庆依此定性:“禄康著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协办大学士补授户部尚书,德瑛著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工部左侍郎,俱仍交部严加议处。戴衢亨、赵秉冲失察较禄康、德瑛俱少,况

伊二人供职内廷不能常川到署,著交部议处。刘鐶之失察四次又未画稿,著交部议处。曹振鏞、托津、英和、桂芳均著交部察议。”^[8]嘉庆在直接处分个别官员的同时,又做出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具体议处。

皇帝初步定性,是处分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围绕察议、议处和严加议处展开。议处是核心,较轻者察议,较重者严加议处,程度不同。

三、吏部依照制度条例进行严苛议处

在嘉庆初步定性的基础之上,吏部按照制度条例对内务府官员、管理三库大臣、户工部官员予以具体议处,这是处分的第二个环节。吏部议处多为实降实革,因此被视为制度的严苛。实降实革处分对国家行政运转的影响颇大,故而才会有后期嘉庆对严苛制度的调整。

1. 吏部对内务府官员的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内务府6位大臣。“苏楞额兼任内失察二次,业经奉旨革职免其治罪,应毋庸议。阿明阿兼任内失察七次,先经革职应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英和、常福亦曾兼任各失察一次,应俱请革职。和世泰未曾兼任工部,止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七次,应请量减为降二级调用。征瑞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二次,应请降一级调用。”^[6]“应……”这是吏部按例议处的套语,因为还需皇帝最后确定,此时表达的是按制处分的内容。此次内务府大员处分分为革职治罪者1位,革职者3位,降调者2位,分别是降二级和降一级调用。吏部议处较为严苛,均为实降实革。

其次议处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司员和笔帖式。其处分定罪轻重亦与失察次数相关联,郎中德音、员外郎士诚失察八次,员外郎广善失察七次,郎中瑞宁失察五次,库使恩吉、常文、罗汉保失察八次,灵铸失察五次,此8位“均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郎中文光失察二次,祝麟、穆翰失察一次,此3位“应请即行革职”。当时值日笔帖式保禄、恒启、景椿、裕善、士风和收文笔帖式达善、郭升阿、石麟、托永武、福泰、重荫,此11位“于假印咨文投到时尚未能即时查出,亦应一并革职”^[6]。司员和笔帖式共有22员,处分较重,8位被议为革职并遣戍乌鲁木齐,14位被议为革职。按制处分总体上严苛,皆为实降实革。

2. 吏部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的控制严苛议处

吏部依据嘉庆定罪态度对管理三库大臣进行议

处,各官处分具体是:费淳管理三库,“失察冒领物料一次,照例应议降留;又兼管工部未能详加核对漫无觉察,奉旨严加议处,应将大学士费淳即照溺职例革职”。董诰、瑚图礼、曹振鏞、恭阿拉“奉旨交部议处,应将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吏部尚书正黄旗汉军都统瑚图礼,户部尚书曹振鏞,礼部尚书正蓝旗满洲都统恭阿拉,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留任;曹振鏞共降二级留任”。庆桂、王懿修“奉旨交部察议。应将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正黄旗满洲都统庆桂、礼部尚书王懿修,均照例减为罚俸一年”^[8]。此次制度议处各官处分参差不等,奉旨严加议处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革职;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降一级留任,奉旨察议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罚俸一年。由处分程度可见对管理三库大臣的处分有实革的,有虚降的,甚至有罚俸的,其处分整体轻于内务府官员的处分。缘何如此?从吏部的议处诠释中,可知官员担任本职和兼职,失察都要被处分,只不过本职和兼职被处分轻重有所不同,本职处分往往重于兼职处分。有清一代“一职数官,一官数职”^[10]的状况也是导致大员被处分居多的一个原因。

3. 吏部对工部堂官失察的控制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的处分。其所据条例为:“定例书吏舞文弄法侵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出降二级调用。又吏部议处事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调用。又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加议处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其奉旨改为察议者,酌量减等各等语。”^[6]

依据以上三条制度规定,吏部议应将工部堂官费淳、前任工部尚书曹振鏞、前任工部侍郎成书、前任工部侍郎蒋予蒲、工部侍郎陈希曾、工部侍郎顾德庆,“均照该管上司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历任未久及本年到任之工部堂官庆惠、工部侍郎福庆、前任工部侍郎周兆基,“于降一级调用上减为降一级留任”^[6]。这是吏部将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条例议为降一级调用,有6位工部堂官;将奉旨察议的对应制度条例减为降一级留任,有3位官员。此次因嘉庆起始就定了从宽的基调,吏部议处,引例确当,处分有实降有虚降,整体已从宽,不需皇权二次调整。

其次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户部三库的处分。此次按制议处结果,费淳因“奉旨交部严议,应照例加等再降二级调用,共降三级调用”,因“任内有革职留任之案无级可降应行革任”。曹振鏞、成书、蒋予蒲“均奉旨交部议处,应照例各再降一级调

用,共各降二级调用”。英和、陈希曾、顾德庆、多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戴衢亨、福庆“均奉旨交部察议,应照例各减为降一级留任”^[6]。此次按照处分条例费淳因加等议处议为降三级调用,因无级可降议为革职;曹振鏞等3人以议处对应议为降二级调用;英和等9人以察议对应议为降一级留任,此次议处也是有虚降有实降,层次不等。

4. 吏部对户部堂官失察的控制严苛议处

吏部议处户部堂官,所引用处分条例有以下四条:条例一,书吏舞文弄法侵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出降二级调用。条例二,三库银缎颜料等项倘有重支冒领等弊,照违制支给例降一级调用。条例三,吏部议处事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调用,本管官应降一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留任。条例四,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加议处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其奉旨改为察议者,酌量减等^[8]。按照条例中规定,最重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最轻的处分是降一级留任,所谓的加等和减等,是在这些级别上予以加减。因此户部堂官的处分是:禄康、德瑛因是“奉旨交部严加议处”,应“均照该管上司降一级调用例上加等议以降二级调用”。戴衢亨、赵秉冲、刘镛之因是“奉旨交部议处”,应“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曹振鏞、托津、英和、桂芳是“奉旨交部察议”,应“均照例各减为降一级留任”^[8]。嘉庆的初步定性对于该处分哪些官员,怎么处分作了指示。吏部遵例议处时,定罪的理由是嘉庆认定的,定罪的程度是嘉庆指示的,可见黜陟大权把握在皇帝之手,部院承担的只是遵旨按例议处。

5. 吏部对户工部下属官员的严苛议处

对户工部承办官员的议处,吏议结果为,工部虞衡司掌印郎中英奎在其任内,因失察共有十二次之多,“英奎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银库给发银两全以户部印札为凭,“福建司三次文札均系已革员外郎刘洋即刘承澍主稿呈画先行……应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工部笔帖式惠昆“屡被欺蒙,翻稿画押,亦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工部虞衡司掌印员外郎常安、户部福建司掌印郎中定柱、宽宁,员外郎时敏失察次数一到二次和主事锡礼岱,“均照溺职例即行革职”。颜料、缎匹库司员于假印文领没能查出,即行给发物料,颜料库共计三次,缎匹库共计二次,“应交部查明该管司员等概行革职”^{[4]779-780}。

此番吏议对各官处分以革职和遣戍为主,在几

拨处分中,此拨革职官员至少在10位以上,最为严厉。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批直接的承办官员,因其职位相对较低,嘉庆给出的定义是依照吏部所议,将以上承办官和司员全部革职,部分遣戍乌鲁木齐^{[4]775},制度治理与皇权治理实现了难得的趋同,皆为实革。

对户工部其他司员及下属的议处。这些官员包括给发画押的户部监放官、银库司员及工部虞衡司、福建司画押各司员、江南道御史等,嘉庆命“均著照所拟交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4]775}。随后,便有颜料库郎中宝诚等19位,户部监放官郎中四德保等17位,工部虞衡司失察舞弊司员郎中等24位官员,被议为降一级调用。此为实降,但是所降级数不多,也就无须皇权的再度调整。吏部议处是处分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吏部按照定例予以的制度议处,其特点在于以实降实革为主,颇为严苛。

四、嘉庆对制度处分严苛的从宽调整

王书常案中每一次的制度议处之后,凡存在处分严苛实降程度严重的,嘉庆均会进行从宽调整。这种从宽调整的对象不是针对所有官员,主要针对内务府大员以及户部、工部堂官,其他官员即使被议为革职、降调,也很难有从宽的可能,一般都是“照依部议”。嘉庆的调整定义属于官员处分的第三个环节。

1. 嘉庆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调整定义

嘉庆虽然申飭道:“部院各衙门大臣位崇责重,于经管事务分应尽心综核……设于初起时各该管大员等有一二人精明详察,烛破其奸,立时查拿惩办,则罹法者必不至如此之众,而承办各职官亦不至严谴多人。”^{[5]725}但转念又以大员“一时更易多员,乏人简补”^{[5]725}为由,从宽调整大员处分。首先是费淳“前已拔去花翎退出工部,今部议革任,著革去官衔降为侍郎……兵部右侍郎一缺即著费淳署理”,并没有将费淳革任而是直接降补。其次,曹振鏞、成书、蒋予蒲由各降二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三级留任”,由实降转为虚降。陈希曾、顾德庆由部议各降一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二级留任”^{[5]725-726},由实降转为虚降。

2. 嘉庆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从宽定义

部议对户部各堂官处分本来不重,嘉庆却再度从宽,禄康前已降为协办大学士、尚书,“其部议降二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德瑛前已降补

工部侍郎,又以其“精力已衰”,“著即以二品顶戴休致”,获得荣归。戴衢亨、赵秉冲、刘鏞之部议各降一级调用,“俱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5]725}。亦皆由实降转为虚降,一拨拨的处分还没起到效果,便在嘉庆的从宽意旨下消失殆尽,官员不用再予降调。

3. 嘉庆对内务府大员的从宽定义

嘉庆十四年嘉庆降旨,阿明阿“原拟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之处,著改发热河”。英和、常福、和世泰、征瑞4人,“分别议以实革实降之处,亦皆咎所应得。惟内务府大臣同时出缺简任乏人,且伊等离任之后转得置身闲散自图安逸,著从宽姑予留任”。英和、常福原议革职,此时“著降为三品顶戴,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和世泰原拟降二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征瑞,原拟降一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4]755-756}。针对这批内务府大员的制度处分是比较重的,实革实降,但是在嘉庆的调整下皆予留任,这是处分的实质性变化。

而上文所论嘉庆对于内务府的管库司员、库使、笔帖式等的处分并没有丝毫的从宽。仅以“职守尤专”^{[4]756},维护了吏议处分,将内务府中下级官员革职并遣戍。这份谕旨体现出对不同等级官员的最终处分完全不同。针对内务府大臣,嘉庆在吏议基础上按照惯例予以从宽,予以不同的留任等轻处。而对内务府司员及库使、笔帖式等,则完全遵照吏议予以实革。因此,嘉庆的从宽是“有限”从宽,嘉庆的调整也是“有限”调整。

虽然在处分制度的规定中,有由降调、革职到降留、革留的转轻规定。但是,处分制度中却没有规定可以从轻的官员的范围,皇权从宽的对象是有限的大员,而最基层的官员是根本没有从宽机会的,他们的命运就是被“革职”,这也是皇权治理的阶级局限性所在。

五、皇权治理的后续及影响

1. 迅速起用大员对处分制度造成的冲击

由上文可知,“因失察或纵容吏役有犯而受到惩处(降调、革职和查办)者,部院大员不乏其人”^[11],但从嘉庆的调整来看,嘉庆主要是对大员进行了宽免。此后,又加速对大员的迅速起用。

首先迅速起用的是苏楞额和阿明阿。苏楞额是因案革职,阿明阿亦是革职并发往热河。嘉庆十五年,距离案结不久。嘉庆降旨:“念伊等究系公过,

苏楞额于办理工程素为熟悉,尚可录用,苏楞额著加恩赏给圆明园六品苑丞,阿明阿著赏给八品笔帖式。”^{[12]153}其次宽免重用的是禄康和费淳。昭槤曾记载:“宗室相国禄康……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其所操持,率皆以市井毁誉为之趋慕,罔识朝廷大体,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13]256}可见禄康才具一般,却是屡任要职。前论嘉庆十五年,嘉庆从宽处分后禄康改为降三级留任,此时嘉庆以同样理由,“究系失察公过,著加恩仍复还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衔,著管理吏部事务”^{[14]75}。费淳被从宽处分后降补兵部右侍郎,此时“所有工部尚书员缺著加恩即将费淳补授”^{[14]75}。嘉庆恢复了他们的大学士、堂官身份,这些做法都导致“处分无以儆效尤”。但是,嘉庆依然从宽和起用了他们。嘉庆十五年,嘉庆在对此案的回顾中流露出其真实想法。他讲道:“近日各部院衙门因循怠玩相习成风,推原其故,由于各大臣等思避专擅之迹,惟以含容博大之誉,推委邀安静之名,虚称办实事则废弛,不肯正色率下综核名实,一切文移奏牍委之司员。而司员中又无实心任事之人,一切委之胥吏,听其播弄画诺施行……试思朝廷政柄操之自上,若大臣盗权坏法,则为太阿倒置。今幸纲纪肃清,大臣等尚无此弊。”^{[12]6-7}

王书常案中,嘉庆认为是大员官权的出让,而不是其皇权的被侵夺。所以,嘉庆认为宽免大臣重新重用他们,重塑各级机构之官威,才能使行政如常,处分仅予“薄惩”即可,这无疑是对处分制度本身的严肃性和处分效用的冲击。“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也哉?”^{[13]248}对于这样的大员不加严惩,而再予重用,嘉庆朝的吏治如何能清明!

2. 嘉庆允许中下层官员捐复对吏治的影响

嘉庆十五年正月冒领案结束不久,禄康就奏请将降革司员概予捐复。嘉庆当即批示:“此不可行。该员等甫经部议,若遽令捐复原官,非惟不足示惩,抑且迹涉言利,有此政体乎?”^{[12]10}但随后,便出现了“英奎捐复”事件,从而为案内其他降革官员捐复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禄康的提议捐复在若干时间之后也成为了现实。

英奎是新授内阁大学士勒保之子。嘉庆曾于“十四年四月,以勒保七十生辰,赐御书‘宣勤介景’

匾额。十二月,擢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15]2213}。十九年八月,勒保“目疾增剧,命开大学士缺,仍在家食威勤伯全俸”。嘉庆二十一年,降旨:“勒保之女,著指与四阿哥为福晋。”^{[15]2214}英奎就是这么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

王书常案中,英奎因案不仅被革职,且被遣戍乌鲁木齐。案结不久,嘉庆十五年,嘉庆念“勒保在外宣力有年,又年逾七旬”,加恩将英奎“仅予革职,免其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12]2}。同年,勒保在具折谢恩之际,自认“平素管教不严”,并“恳请罚缴银二万两,稍安卞怀”^{[16]40}。嘉庆默许罚银,但是变通了收银说辞:“朕于臣下功罪惟秉公赏罚,其有身获咎愆者,只照例治以应得之罪,从未开罚缓赎过之端。今勒保此奏虽名为自行认罚,仍系欲代伊子乞恩赎罪……所有此次请罚缴银二万两之处著不准行……现在南河兴举要工需费孔繁,勒保为国重臣,谊难漠视,若恳请捐廉助工尚属可行,著准其缴银一万两分作二年,由川省径解南河备用,俟勒保奏请到日降旨加恩赏收,可也。”^{[16]40}勒保岂有又岂敢不乐请“捐廉助工”?其实质是替代英奎完成了捐复。

嘉庆此时虽然顾忌舆论不承认此“捐复”,但是到十六年就不再否认了。“勒保之子英奎亦系此案革职,前因勒保奏请捐复,业已施恩允准。”^[17]因此,嘉庆十六年开春,户工二部奏请捐复因王书常案而分别降调的人员,嘉庆降旨曰:“该员等事同一例,亦著格外施恩,俱照所请准其捐复,仍留该衙门行走分别补用。”^[17]官员先前的革职降调处分随着捐纳而消逝,捐纳、捐复对吏治以及处分制度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3. 皇权治理亦回归到制度治理

案后嘉庆朝出台相关处分条例,使得皇权治理又回归到制度治理。出台私造印信失察处分的更细致规定,为的是遏制此类恶劣案件的一再发生,但是制度规定太过细致,反而脱离实践,不便于官员引用和掌握,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太过烦琐而失去制度的本意。

如嘉庆十一年,原处分规定:“本官不行查拿降二级调用。失察奸徒私雕假印未经行用者罚俸一年。已经行用者查明在何处行用,将失察行用之地方官降一级调用……若行用后直至告发始行查拿者减为降一级留任,未能拿获者仍降一级调用。”^{[18]282}本条以“查拿”“行用”为重点,主要针对本官失察,在假印行用与不行用情况下的分别处分,对官员予以降调、降留或罚俸,此条已足够用。

但是,嘉庆十七年,又出台更为细致的规定:“本官失察吏役雕造印信……别经发觉始行查拿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二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二级调用。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至奸徒雕造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九月,别经拿获罚俸一年。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18]282}此规定不断重申着“别经发觉”“别经拿获”“自行访拿”等说法,以此对官员予以区别处分。

嘉庆十一年,嘉庆的条例重在本官能否主动发现问题,十七年的条例强调监察御史等对官员失职的监督。然而,这种烦琐的例条,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可见制度在设计时就已出现问题,才会导致皇权的不断调整,而皇权的调整又带来诸多其他的问题。

六、清前中期皇权治理为主的常态化

“约束之,羈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19]155}龚自珍的描述反映出有清一代,尤其是前中期,处分制度造成官员处分苛严的事实,除嘉庆朝之外,乾隆朝和道光朝皇权同样对制度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了调整。

1. 乾隆朝对官员严苛处分的调整

第一,皇权调整吏议实降实革为虚降虚革。乾隆一朝六十年,乾隆对吏议处分的从宽,曾屡屡点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曾指出:“向来外省失查属员至降革者,往往以事属因公,且人材难得,故加恩留任者多。”^{[20]110}三十四年,又指出:“督抚等向来遇有处分,部议应降应革,皆格外宥原从宽予以留任。”^{[21]46}三十五年,指出:“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21]671}到乾隆后期,同样从宽调整。四十年,指出:“向遇吏部议处司道等降调之案,俱量予从宽留任者多。”^{[22]47}四

十一年,提到:“朕于督抚等公过处分,应行降革者,概予从宽留任。”^{[22]492}五十一年,旨曰:“近年各省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宽留任者。”^[23]不论乾隆的顾虑为何,面对制度造成的严苛处分,乾隆的从宽调整确属事实,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数例为据。如乾隆十六年,江苏按察使后补河南汝光水利道翁藻因失察民间私铸,吏部议处为降级调用,乾隆降旨:“著照部议带所降之级从宽留任。”^{[24]272}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因督饬下属通永道王楷治蝗不力,被交部严加议处,吏部照例议以降三级调用。旨意:“方观承著革职从宽留任。”^{[24]757}二十年,贵州巡抚定长因疏请原任黔西州知州黄秉忠崇祀名宦祠,乾隆认为定长此举系“瞻徇市恩”,将之交部严加议处。吏部议处定长照例情例降二级调用。得旨:“定长著革职从宽留任。”^{[25]101}三十年,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因办理新疆乌什事务错误,应照例革职。旨曰:“明瑞、阿桂俱著革职从宽留任。”^[26]以上数例是大员被处分的实降实革因皇权的介入调整为虚降虚革。

此外,不同处分案中,亦有官员的实降实革处分被从宽为虚降虚革。如乾隆二十一年,河南南汝光道高照因公科敛财物一案,牵连下属知县张权舆等官,吏部以借送财物将这些官员议为“概行革职”,乾隆认为事属“上司勒索”且“被议多员,其中不无才可办事之人”,因而将张权舆等11位知县的革职处分调整为“革职从宽留任,俟八年无过再请开复”^{[25]433}。四十三年,吏部议处失察高朴家人私玉过境各官分别降革。乾隆降旨:“各省地方官于私玉过境漫无稽查,吏部照例议以降革,均属罪所应得……此案系初次发觉,从前类此者自属不少,难于逐一追究。所有议处大小各员其应革任者,著从宽免其革任仍注册。其应革职降调者,著照部议降级俱从宽留任。”^[27]又是数十位官员免除实降实革的命运,乾隆对制度严苛处分的调整,亦被官员“视为泛常”^{[20]110}之模式。

第二,以开复制继续调整官员处分。清代处分法规《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严苛,“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28]548},致使官员“处分多而开复不易”^[29]。为此,乾隆五十二年专门针对大员留任处分,出台新的开复制度。乾隆对开复背景予以阐释:“向来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该部议以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人而累至十余案者。盖因该大臣等屡经简擢任事有年,朕念人才难得且因其尚系公过,是以每遇议处之

案,酌量案情从宽留任者,不一而足。但愈积愈多,未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转属有名无实,亦非整饬吏治之意也。”^[30]¹⁷⁰反映了皇权从宽治理的常态化。乾隆遂降旨:“著交吏兵二部,将内而大学士九卿、八旗都统副都统,外而督抚将军、副都统提镇现任各员,部议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查明每人名下所积之案各若干次数,分别开单进呈,候朕详加察核。其案情较重处分分数多者,或酌量议罚再准其开复。其情节尚轻处分分数少者,或竟予开复……嗣后并著吏兵二部每届五年,即查明具奏一次请旨办理。著为令。”^[30]¹⁷⁰此令意味着大员留任处分开复的进一步制度化。

随后,吏兵两部查核大臣原案次数开单呈览,乾隆详加查核后裁定:“在京大臣内如喀宁阿、穆精阿所得降革处分俱已积至七案,姜晟积至九案,处分数多。喀宁阿、穆精阿著将任内应得廉俸分例各罚出二年。姜晟已任湖北巡抚……仍著将侍郎任内应得廉俸分例罚出二年。所有喀宁阿、穆精阿、姜晟从前降革处分,俱准其开复。至各省督抚处分积至六案以上至十案者八人。内如尚书德保、侍郎李封所得降革处分多系从前在巡抚任内之事,德保、李封俱著罚出巡抚养廉二年。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闵鹗元、毕沅俱著照本任罚出督抚养廉二年……雅德现以副都统衔在喀什噶尔办事,所得处分俱在从前督抚任内者,著罚出总督养廉二年。所有德保、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雅德、闵鹗元、毕沅、李封从前降革处分既已议罚,俱著准其开复。”^[30]²⁰⁰⁻²⁰¹乾隆五十年的这次制度调整治理再次反映出处分制度的严苛,皇帝不得已出台新的制度予以解决。

2.道光朝对官员处分的调整

第一,道光帝将部议实降实革处分调整为从宽处理。道光五年(1825年),两江总督魏元煜等因漕务办理失当,吏部将之议以降调。道光降旨:“魏元煜、严烺经朕屡次饬谕,均未能筹办妥协,即照部议降调亦属咎有应得。姑念魏元煜甫经简授两江总督,到任未久。严烺职司河务,此次漕运迟延,非尽关河工办理未妥,尚可少从末减。”因此将二人处分调整为留任:“魏元煜著加恩改为降四级从宽留任,严烺著加恩改为降三级从宽留任。”^[31]³³⁵道光七年,因战事问题处理不妥,长龄等被部议革职。道光又予以从宽:“长龄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本应照部议革职,姑念道路辽远,一时难以更换,长龄、杨遇春、杨芳、武隆阿俱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31]¹⁰⁶⁶

以上都是个别性的,还有群体性的。如道光十

三年,户部捐纳房贴写蔡绳祖等私办假照一案,各部司员因“毫无觉察漫不经心”,有被革职永不叙用的,有被降调停其升转的。若干年后,道光又予以从宽处理,“本属咎所应得,姑念事隔数年,人数众多,此中不乏人材,若概予废弃尚觉可惜,因令将降革各员开单呈览”。最终,将“奉天府府尹乌尔恭额著加恩开复顶戴;原任翰林院修撰朱昌颐著加恩准其捐复主事;其革职之陆以烜等五员,降四级调用之呈麟一员,升三级调用之李韞英等三员,降二级调用之重谦等三十七员,降一级调用之恒景等十四员,国子监降一级调用之荣第等二员,降一级留任之瑞庆一员,俱著加恩准其捐复,补缺后并准其一体升转”^[32]。从而将此前规定永不叙用的、停其升转的官员,以捐复的形式予以从宽。

道光十九年,济克默特参奏紫禁城内值班之王大臣永康、内大臣常喜、文职全庆、武职常恒、散秩大臣侯张淳、庆郡王奕彩、侍郎溥治、副都统连贵、内大臣肃亲王敬敏、散秩大臣书桂,于出班进班之际,“不遵定例,任意迟早”,道光降旨将所涉王大臣等交各该衙门分别严议议处。各衙门根据道光初步定性,议“请将该王大臣等爵、职,一并斥革”。道光对于各衙门的严议处分,认为“实属各所应得”。但笔锋一转,“惟念年岁久远,积习相沿,恐以前旷班者尚不止此数人。若但将永康等惩治,转不足以昭平允,姑从宽免其斥革予以薄惩”。在此理念下,定议:“永康著罚公俸六年;觉罗常喜著革去副将统并一切差使,仍罚世职俸四年;张淳著革去散秩大臣,仍罚侯俸四年;庆郡王奕彩著退出内廷行走,仍罚王俸六年;肃亲王敬敏著革去宗令、内大臣,仍罚王俸六年;书桂著革去散秩大臣,仍罚侯俸四年。常恒、全庆、溥治、连贵、中山俱著降二级调用;济克默特著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33]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诸王大臣的处分,保留了其爵位和一定职位。

第二,更改法规与条例以调整制度处分的严苛。“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各部署无虑数十,各有则例,即各有处分。”^[34]⁶⁸“处分则例之设,最为严厉,一切惩戒以此为准则……而吏部每拘泥成例,轻重倒置,以致处分失平者日多。”^[34]⁷⁰⁻⁷¹王钟翰阐明了以则例为主的制度规定,也会导致“处分”的种种“失平”。道咸时期大员胡林翼亦曾言:“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35]提及了制度治理的弊端所在亦有“于实政”无益之处。贺长龄也曾指出处分制度带来的深层危害,“今则

科条繁多,惟簿书期会之为急,少有龃龉,即干吏议,虽有愿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为自全之计”^[28]⁴⁰⁰。鉴于此,道光朝对处分制度进行了两个调整。

首先,道光四年,全面从宽处理《吏部处分则例》中之例条。道光继位后,吏部尚书那彦成奏请续修《吏部处分则例》,于道光四年完成,是对当时处分制度之具体调整。此次重修意见始于军机大臣曹振鏞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条陈,奏“为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堂官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事”,其意大致为:“今欲去其弊,必须删节例案,以数条并一条,去其烦碎而存其大旨。至删减例条,吏兵二部删减无多,今条陈内复以删节例条为请……量宽公罪,实为救弊之急务。应请于吏兵两部处分则例内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除私罪毋庸置议外,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者逐条细核,非事实关重大者酌改从宽,由吏部兵部将公罪内共存降调、革职处分若干条,其中情节较轻应改降留革留之处悉心核办,陆续奏明请旨。其造册舛错迟延等处分,应列明何项册籍,非实有关系不可少者,即应裁撤。其余繁文以此类推。”^[36]曹振鏞提出具体修订意见,意在“从宽”。道光阅后接受,郑重颁布上谕:

军机大臣六部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一折,所议甚是。六部律令务在持其大纲,则政清而易理……部中多立科条,州县无日不奉行具文,转荒其教养本务,于事何益。而公罪繁多,贤吏或因此废黜,不肖者巧于规避,部书得以舞文纳贿,皆由于此。嘉庆十八年曾敕吏兵二部删减处分例条,该部未能实力遵行。又谕题调要缺,不计因公处分,而该部续议章程仍复牵混。殊不知公罪从严,则中材以下之官益多巧避。严其经征处分则多垫欠,而那新掩旧即成亏空。严其承缉处分则多讳盗,而纵恶养奸转贻大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著吏兵二部各将处分则例悉心确核,于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非事关重大者酌改从宽。各部烦苛无当处分例文,互商裁汰,务归简明。其公罪处分,除盗案及正项钱粮停升外,余皆不碍推升。至题调要缺,则一切因公处分皆无庸计算,各纂成例册呈览。^[37]

道光基本采纳军机诸臣之意,这份上谕给重修处分则例定了基调,即从制度上彻底放宽因公处分,避免制度严苛再度造成处分的加重。有宗人府府丞毛式郇曾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奏为军机大

臣等率议将吏兵二部则例改重就轻罔顾废弛致流弊事”一折,驳斥军机大臣的此种提议,“今军机大臣等忽又持宽减之议,于京外文武各官诚为甚便,但恐便于官,而不便于国,不便于民,此实不可不虑”^[38]。从侧面反映出道光四年所修之处分则例,是制度治理的由严苛转为从宽。道光皇帝如此关注与调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官员实际处分。道光朝后期皇帝的直接改实为虚大为减少,就有这一原因在内,这是皇权治理的深度体现。

其次,道光十年,废除定期修纂处分则例之制。处分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因时代的局限有偏颇不适之处,因此它也是一项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制度。有清一代,曾规定,各部则例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然而,道光十年,御史王玮庆就则例修纂的时限予以上奏,从而改变了这一历史的修纂传统。道光十年二月初六日,朝廷有旨:

御史王玮庆奏六部重修则例,宜率由旧章,如有更改,应专折奏明通行一折。各衙门颁行律令,原期垂诸久远,其有今昔异宜者,固应随时酌改,然不必定限十年,即开馆重修一次。若如该御史所称各部则例十年一修,往往不能依限告成,每迟至六七年始刊刻完竣。又未能及时颁发,其间数年之久,各省官员既无新例可遵。又谓旧例已改,茫无所措,而书吏得以高下其手。及至刊改颁行将届,则例重修之时,新例又成废本,无所遵循……嗣后各部已颁成例无得轻易更张,如有因时制宜,必应更正之处随时专折奏明改定,立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以免书吏影射弊混,不必定限十年开馆重修,致滋流弊。^[39]

这份谕旨意味着定期修例之制由此取消,作为则例之一的处分则例,其修纂由此也变得减少,这也是我们看到清后期所修处分则例不多之原因。修纂次数的减少,版本的减少,从客观上对严苛的处分制度予以了调整。

余 论

以王书常案为例,处分的环节包括三个方面,处分的最初交议、吏部的具体议处、皇帝的最后定义。三个环节中,属于制度层面的只有中间环节,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治理调整的有首尾两个环节。可以说,官员处分始终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皇权治理要远远凌驾于制度之上。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

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中期这种处理模式的常态化。

参考文献

- [1] 薛刚.从“假印大案”看清嘉庆朝吏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174-182.
- [2] 倪玉平.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M]//清史论丛: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3-38.
- [3] 关文发.嘉庆吏治评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75-82.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上谕档:第14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帝起居注:第14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录副奏折:奏为严议费淳等失察王书常伪造印文冒领库银案事[A].北京:档号:03-1528-065.
-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附片:奏报内务府大臣失察冒领广储司银日期次数事[A].北京:档号:04-01-01-0514-032.
-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录副奏折:奏为严议禄康等失察书吏王书常伪造印文冒领库银案事[A].北京:档号:03-1528-064.
-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单:呈工部堂官失察次数清单[A].北京:档号:03-1529-002.
- [10] 钱穆.国史大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835.
- [11]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52.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帝起居注:第15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3] 昭梿.嘯亭杂录[M]//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4] 清仁宗实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5] 王钟翰.清史列传: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上谕档:第15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奏为户工二部降调捐复官员应否列入京察一等请旨事[A].北京:档号:03-1573-026.
- [18]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33[M]//续修四库全书:第8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9] 夏田蓝.龚定盒全集类编[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辑第71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 [20] 清高宗实录: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21] 清高宗实录:第1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22] 清高宗实录:第1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23] 清高宗实录:第1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1065.
- [24] 清高宗实录: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25] 清高宗实录: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26] 清高宗实录: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221.
- [27] 清高宗实录:第1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398.
- [28]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9] 清高宗实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403.
- [30] 清高宗实录:第1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31] 清宣宗实录: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2] 清宣宗实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36-637.
- [33] 清宣宗实录: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0.
- [34] 王钟翰.清史补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 [35]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10.
-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军机大臣曹振鏞奏为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堂官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事[A].北京:档号:03-1643-012.
-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奏请开则例馆事[A].北京:档号:03-2160-022.
-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奏为军机大臣等率议将吏兵二部则例改重就轻罔顾废弛致流弊事[A].北京:档号:04-01-01-0612-010.
- [39] 清宣宗实录: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2-553.

The Strict System and the Adjusted Imperial Power: the Research of Wang Shuchang Case and Official Punishment in Jiaqing Reign of Qing Dynasty

Meng Shufang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succession of fraudulent acts of official servants, the Case of Wang Shuchang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Jiaqing Reign was one of them. After the case, not only scribes and others were executed by hanging, but also the officials of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nd the Minister of Management of the Three Treasuries were punished. In the punishment of this case, there were both strict punishments im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 and lenient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al sanctions by the imperial power headed by Jiaqing. In the e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officials was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From actual demotion, actual dismissal to false demotion, false dismissal, it avoided major turmoil in the officialdom. However, the imperial governance and its adjustment to the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had caused shock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promoted corruption among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This mode of handling official's punishment in this case by the Jiaqing Period existed not only in the Jiaqing Reign, but also in Qianlong and Daoguang Periods. It reflec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handling in this mode at least in the pre-Qing and mid-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aqing; official punishment; Wang Shuchang case

责任编辑:王 轲

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罗时进 陈家愉

摘要：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往往以唐诗文本为据，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唐诗之路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唐诗之路研究需要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通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扶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为唐诗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唐诗之路；现象表征；事件属性；行为感知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138-06

“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它最初由本土学者提出，2021 年因当代著名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与北京大学董强教授合著的《唐诗之路》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然而，唐诗之路的概念如何界定，它对唐诗、唐代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在理论上认识、在学术上把握其内涵和本质，仍是需要探讨、阐释的重要问题。“唐诗之路”这个概念内在地确定了它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是唐诗研究大树上的一个重要分枝。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这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由具体性向抽象性延展，从路程、生活、经验三个维度讨论唐诗之路研究的三重构境。

一、路程：唐诗创作的“现象表征”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作为一个概念，唐诗之路能否作为唐代诗人的行为现象在创作中凸显？答案是肯定的。迄

今为止，在尚能够较为完整地描述出生平大概的唐代诗人中，很难发现某个作者始终处于极小范围的静默状态，他们总有自己的位置移动。道路山重水复，路上行人往来，这是现实社会的日常，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唐诗意象。唐人诗题中“发、辞、过、渡、游、涉、行、经、旅、次、宿、归、赴、使”等动词以及大量地方名词表达的就是路程现象。如：“度岭方辞国，停辇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宋之问《度大庾岭》）“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秦音尽河内，魏画自黎阳。”（薛能《送冯温往河外》）“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韩翃《宿石邑山中》）唐代诗人因各种原因，经常处于“在路”状态，形成了重要的唐诗现象表征。

路程，是一个有关行走的总体概括，而分析是基于具体事实的，这就需要对路程有具体的理解。虽然无须做过细的分类，但基本的层级区分仍有必要。唐人行走的路程，一般看来有大区域、中区域、小区域之分，下面分别论述。

收稿日期：2023-05-21

作者简介：罗时进，男，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031）。陈家愉，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苏州 215031）。

1. 大区域

每个时代的文人,一般都有属于本时代的“东游记”“西游记”,或“南游记”“北游记”,唐代诗人写作最多的是“西北游记”和“东南游记”,这与唐代政治中心在西北,而休养栖息地在东南有关。如此就从宏观上见出唐代诗人“向北(西北)”与“向南(东南)”的唐诗之路,这是大区域的道路。唐代以西北为帝京所在,其南面而治天下的威严常常受到漠北少数民族或其他游牧族群的威胁,战事频发。为此许多诗人远赴边塞,其中较多部分属于大区域道路。京官外任或贬谪边远地区,其路程绝大部分也属于大区域道路,至于官员派任羁縻州的情况,自不待言。唐人往往有壮游、漫游的习惯,路程远近不同,大区域行走情况颇为常见。唐代还有某种较为特殊的行旅,如崔致远自新罗乘船西渡入唐,留唐16年后,以“充国信使”的身份东归新罗,他的履迹形成一条独特的唐诗之路,自然也应归入大区域之列。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唐人大区域范围的行走虽然有一些属于特殊现象(如官员派任羁縻州、崔致远入唐),但绝大部分属于普遍现象。这种普遍现象中最突出的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和出发地的行走路线,以及以西蜀为主要方向的行走路线。后人所说的“从古诗人多入蜀”或“古来诗人每入蜀”中的“古”即指唐代^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甫、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唐代向西蜀行走的诗人形成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队伍,在唐诗史上留下的跋涉作品、景观作品极为丰富,几乎不少于由北方下吴越、向岭南的诗篇。

2. 中区域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大致可以看作北方和南方的两条东西轴线,而北方与南方如何界分呢?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无疑就是秦岭,其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普遍认知中,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是秦岭-淮河一线,秦岭即为最显性的界线。“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2]

唐代诗人中,有部分作者(如初唐一些出生于北方的学士),平生未曾越过长江,没有在江淮以及更南向地区留下足迹,其行走路线即使偶尔涉及边庭,也应看作是中区域的行走。唐代显庆二年(657年)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一度以洛阳为神都,洛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分司东都

制度的建立,赋予了洛阳特殊的政治功能,使其具有了重要地位。唐代西京至洛阳,其间数百里,是唐代诗人往还频繁之道,终唐之世“京洛道”都是最显要的唐诗之路。唐人行旅大致出于公私二道原因,主要有应举、下第、游幕、铨选、出使、赴任、迁官、贬谪、量移、访友、避事等。其中游幕、量移、避事多发生在中区域范围。另外,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文人之间有所流动,其长江流域之行亦属于中区域行走。

3. 小区域

唐代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驿道、驿站,严耕望先生考证,“唐制三十里一驿,开元盛时,凡天下水陆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量闲剧置船马。……按实考之,驿距疏密无定准,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而边远地区,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离当在四十里以上,则全国驿道踰六万五千里”^[3]。这是考察唐诗之路的重要依据。唐代诗人经过驿站行至远方,盖归于大、中区域范围,数个短距离驿站之间则往往属于小区域。

另外,唐代运河与长江沿岸的都会往往是区域性交通枢纽^②,也是文人行走、集聚的中心。由此中心向外辐射,就形成了若干唐诗之路。如韦应物、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苏州成为江南诗学重镇,湖州、杭州、常州的诗人从三个方向向苏州汇集,显示出江南诗学昌盛的景观。在唐代江南,吴越文化具有突出的共轭性,其间就自然存在一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本质上也是区域共轭形成的文化共轭,其中一部分也具有小区域诗路属性。在小区域内,个体诗人的行走路线非常值得注意。如杜牧偏爱淮南、江南,在扬州、润州、宣城、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均有履历行迹,这些地方勾连起来便是一个杜氏“小长三角”^③行走版图。

以上三个区域层次的划分,大区域有数千里之广,中区域有数百里范围,小区域则为百里、数十里不等。地理范围的大小与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的诗歌创作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等约性,地理范围的大小虽然与诗人分布的密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然而,通过不同层次的区分可以看出,唐诗之路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解释唐诗生成的简单工具。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再省思、再界定。这种省思和界定不应遵循某种既定模式,只有突破既定模式、习惯思维,才能有新发现,发掘出“路程”所具有的丰富诗学内涵。

二、生活：唐人行走的“日常”与“事件”

唐人的居处与行走，都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唐人的生活史，可以成为唐代社会史的凭证，因此生活无疑也具有历史性。唐代诗歌史是唐代历史的一个分支，其历史性的存在所凭借的就是那种感性的、鲜活的、具有社会性本质的诗人，而诗人是生活中的人，只有映照在具体生活影像中时，才能被看见，被写入诗歌发展史。

唐代诗人是通过现实生活来生成具有社会本质的自我，也生成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学特性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居处相比，也许行走更能表达现实生活的状态、意愿，更能突破某种日常生活的感受，激发出情感与灵感，更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就使行走自然走进了文学天地，走进了诗歌胜境。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道出了行走对于唐诗创作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唐诗之路的意义所在。对此应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 “事”的世界

这里需要对日常生活做一些意义阐述和延伸。人生活在“事”的世界中，而“事”的生活有“日常”与“事件”之分。“日常”具有重复式、均质化的性质，体现出一般性、同类性；“事件”是日常的断裂，即打破日常，消解了均质化，具有较大的片段性、不可预见性。“常人安于故俗”^④，“故俗”具有日常性，是共知而熟悉并形成长期习惯的样态，这种生活即日常生活。而诗人，尤其是有个性的、优秀的诗人显然异于常人，他们不能安于故俗，要走向新场域，探索新可能。如果说故俗多通过“时间性”证成生活，那么去俗则往往通过“空间性”证成生活。行走是进入时间流程中的空间，突破了居处的日常性，更多表现出事件性。就此而言，唐诗之路的生活视域是一个事件性视域。

那么行走是否就绝对归于事件，而非日常呢？答案并非如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恰切的分析。如王维《辋川集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洋、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欽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4]值得注意的是，王维所说的“游止”就是一份“路线图”，本质上这条“游止”之路也是唐诗之路。尽管文学史家将

王维的隐逸生活看作一个事件，但由于这种犹如“鱼龙隐苍翠，鸟兽游清冷”（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的隐逸生活，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重复性、均质化，这种高雅的事件已经转化为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日常了。其实，不少唐代诗人经常为了同样的目的，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其结果并不具备不可预见性，这样的行走也并非事件，而应属于日常生活。由此又可以延伸出一个观点，即行走的事件性与目的达成的某种或然性，以及行走空间范围的广度有关。而唐诗之路肯认的必要性、重要性，描述的精彩度也正与此关联。

2. 隐匿的力量

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主体支配客体那样简单，事实上，当人进入复杂的世界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往往转化为人与某种隐匿力量的关系。因为那种力量是隐匿的，人的自我努力并不能必然达到预设目的，这就具有了或然性。或然性越大，事件性越突出。众所周知，唐代文人普遍追求科举的成功，但很多人总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徘徊、挣扎。一举及第是小概率事件，3年、10年乃至30年方能登科，是大概率事件。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忧中有喜》条所记公孙乘的求举之事人所熟知，毋庸赘述。公孙氏“垂三十举”毕竟有一个与妻阔别而再见面“后旬日登第矣”的喜剧性结局，而李昉等所纂《太平广记》卷七十四《陈季卿》篇所述半真半幻的赴举之事则充满了悲剧色彩。陈氏先有书写10年不第悲情的《江亭晚望》诗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垂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陈氏即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又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风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即将登舟，陈氏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陈氏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恸哭于家，谓其已为鬼物矣。

这三首诗都属唐诗之路范畴的作品。陈季卿的行走从江南到西北，空间范围极为广阔，在唐代科举类作品中，这三首诗作为一组诗，空间现场特征非常鲜明，构思也相当奇幻，充满了悲情。就唐代某个举子而言，进京赶考之路和归去之路一般都是固定的。而将举子们一条条行走路线的作品汇集起来，就构

成了唐人被隐匿力量控制的科举生活史,在唐代社会史中具有重要的史料证明力,其作品则因情感复杂、强烈而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

3. 人生的跌宕

唐代诗人进入台阁后,有时会因遭受贬谪而走出宫廷。他们远距离行走在阔大的地理空间中,巨大的人生跌宕和心理落差也充斥于所历之时空。唐人“行走诗”中,此类例子甚多。

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描述自己被贬潮州的情况与感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朝奏”而“夕贬”言其事件突发性极强,“潮州路八千”形容此行何其艰难!与韩愈最终尚能重返京城相比,柳宗元等一批诗人卒于贬所,更显示出行走的或然性和悲剧感。文宗朝,相国宋申锡谋去宦官,反为宦官所构,遭贬谪而死。如此悲剧引起诗界震动,产生相当数量的作品,如许浑在《靖恭里感事》中云:“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十多年间经历了贬谪、量移、召回、再贬的过程,这构成了深烙其心境的个人的唐诗之路,不仅为唐诗史拓展了事件维度,也增加了唐诗的思想深度。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行走,唐代诗人的征戍、行旅、离别等,往往具有更大的或然性和空间感,其作为唐诗之路的特征更明显,可论性也更强。由此可以理解,唐诗之路往往与事件具有内在联系,事件性是唐诗之路的内涵属性,以事件性为基础,可以构建具有唐诗之路本质意义的知识观。

三、经验:唐诗之路上的诗人感知

“唐诗之路”本身是一个命名。命名是一种语言活动,即用某个语词概括对某些事物、现象的认知,这种概括得到普遍肯认便成为概念。但从初始命名到概念形成有一个从始端不断发展的过程,始端命名的意图是指称的起源,这个意图在后来人那里未必一定得到遵循。事情往往总是这样:已有的言说本身会被再言说,后来的言说者所具有的时代性会影响表达,再言说就成为言说链条中的新环节,时代在不断发展,新环节会不断产生。

今天作为言说对象的唐诗之路,与最初具体摹状性的唐诗之路意义同中有异。“路”是唐诗之路坚硬的物理基础,其“形”其“状”的物质性作为基本

要素不可或缺。但长期以来,随着对唐诗研究的不断深化,加之知识生产、地方知识、身体美学、空间哲学等理论有新的发展,对“路”之“性”的感知和认识也会不断深化和发展。我们不必用一个新的命名对始端名加以区别,但需要用新的感知和认识去进行区别——既区别于始端名的摹状意图,又区别于一般的唐诗研究。这种新的感知和认识,形成兼有形下与形上意义的唐代诗人行走大唐的经验。“经验是完全异质性的,其中无所不包,以至于其主要形式难以数清。经验作为沉淀下来的经历,承载着使我们的身体与其他有意义的身体相关联的意义。”^[5]虽然经验的主要形式难以数清,感知的积淀源非常复杂,但它与对象的主要逻辑关系是可以从不同维度去认识的。

1. 对行走履迹的感知

虽然唐人的行旅中经常有诗歌作品产生(有些已经亡佚了,有些至今尚存),但并不意味着唐人走过的所有道路都可以视为唐诗之路。唐诗之路既是唐人经历中的,也是后人意识中的。对唐诗之路的认知基础是对唐人行走履迹的确认,“履”是行走,“迹”是留痕。行走的普遍性不代表留痕的典型性,没有典型意义的留痕,需要在唐诗之路的研究中作排他性处理,否则这一问题研究的总体品质将会降低。如果将过于芜杂的行走纳入专门研究,唐诗之路研究将会混同于唐代诗人行履考证与描述,研究的专门性将会被消解。

事实上,在唐代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些成为经验意识的唐诗之路,如南北贯通的汴河道,北方的京洛道、商洛道、塞上道,南方的向吴路、剡溪路、岭南道等。有学者认为,在唐代存在着多个以都城为中心,以区域名城为支点的交通-文学三角,它们既是稳定的交通框架,也是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还是研究唐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的视角^⑤。这个空间架构和关系视角中包含着原生性的唐诗之路,学界已有认知。但我们并不应局限于唐人的意识和经验,研究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人行走履迹如果与唐诗(尤其是经典性作品)的生成紧密关联,也可以认作唐诗之路加以命名。

2. 对行走空间的感知

唐诗之路具有空间概念的意义。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象限,“空间从来不是空的:它总是体现出一种意义”^[6]。这种意义具有多种内涵:一是自然地理的意义,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一定心境下经过或流连某地,能够体察地理环境与人类情感

相通而形成立体感受。二是社会历史意义,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行走于一个空间,就走进一个社会网格,成为社会的主动或被动的力量^⑥。三是人地相须意义,体现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7]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前文提及唐诗之路的成立与行走空间范围的广度有关,这是指的一般情况,也有某种特殊情况,即小空间的行走也可能成为唐诗之路。在西方有著名的海德堡“哲学家小路”,在日本有闻名遐迩的京都“哲学小道”,“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相距遥远,但意境相同,都是在一条静谧的小路上漫步着人类最活跃、最智慧的头脑,孕育着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思想”^[8]。那么,在唐代,有没有这样的“唐诗小路”呢?我们已知的有杜甫的草堂小路和天台山的寒山道,应该还有其他。这方面的研究,颇意味。

3. 对行走目的的感知

作为事件的行走总是具有某种背景、动因、目的,行走绝不是一个无意识、无因果的行为。唐人的壮游、漫游既有认识世界、深化对自然的了解的目的,也有积累人脉、扩展人际网络的目的。具体来说,南人北上往往与干世求名、愿为世用的意识有关;出塞征戍多出于驱胡卫疆、立功报国的志向;贬谪远方则有某种政治事件或党派之争的背景;避难趋行显然与国家、家庭、人身的严重困境相关。这些都属于常识,即便如此,我们也未必能够展开历史大帷的褶皱,真正走进当时社会的“无知之幕”,共享其中所有的信息。我们还需要从历史史料中勉力发现一些沉寂的真相,使对行走事件的认识更加清晰。

但越是既成的唐诗之路,学者对于“路上人”的背景知识掌握越多,对其目的性了解越清楚;而对一些有待发掘的唐诗之路,相关认识和经验并不充分。如安史之乱中到江淮逃避战火者甚多,一些诗人的行走情况昭然,一些诗人的行迹却较为隐晦。唐代诗歌史上,还有一些诗人生平的末端已是传说,他们是否还曾有过行走,这种行走与唐诗生成是否具有关系,与他们曾经走进的唐诗之路是否衔接,我们无从了解和把握。在对历史的考索中,如果有新的发现或合理推断,都是对唐诗之路的经验丰富。

4. 对行走美学的感知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行走美学,“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是最典型的表现。行走美学的生发主体是人,利用不同的交通工

具(或徒步)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使身体的感知进入心灵,产生美的感悟,用一定的文学体裁加以表现,美学感知便得以传达。唐诗之路,是表现唐人行走美学的极佳工具。人们熟悉的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是行走中孤独而坚韧情感的生发;许浑的“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其中表现出的凄凉而壮阔的中原秋景非有目的和忧郁感的行走不能道出。

唐人的送别诗,颇似远行人与送别者共同进行的一种行为艺术表演:近景在周边,远景在前方,诗人利用目击与想象将一实一虚组合起来,构成美学空间,而行者与送者的肢体语言与表情为这个美学空间作出诠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唐诗之路的研究,应向哲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境界努力,至少应有显示思想倾向的观点。美学感知介于这两者之间,使唐诗之路研究在历史性之外增加了审美意义,这恰恰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

以上四个方面是唐诗之路概念形成的主要经验,单独来看具有基础性,组合来看具有递进性。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是以唐诗文本为据的,是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只有充分认识唐人的行走目的、行走履迹、行走空间、行走美学,对其加以思想性和美学性的思考,才能由形向意,构成唐诗之路研究审美形态层面的意义。唯有如此,唐诗之路的命名才具有真正的诗性。

结 语

雪莱说:“诗人是世间未经承认的立法者。”^[9]这是诗人的荣耀,也揭示出诗歌这一文体的重要意义。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从最高意义上说,唐代诗人是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文明形态缔造的参与者。从这一层面来看,唐诗之路研究独特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在研究唐诗之路问题上,只能适当吸收、借鉴研究唐代诗人和一代唐诗的理念与方法。对唐诗之路研究,我们不必过度高置其位,以其掇引唐诗学的发展,而是要实事求是将其作为唐诗研究的一个部门、一个方向,回到专门化研究的实际上来。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

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作诗以前和作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诗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它的读者生活的那个时代”^[10]。笔者认为,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我们不要期待这一研究涉及所有唐代诗人,更不能期待这一研究能覆盖全部唐代诗歌。在研究中审视全部作品是必要的,试图调用全部作品则无必要和可能。如果那样,就是唐诗研究的泛化,而过度泛化会消解唐诗之路研究的学术建设意义和特殊价值。

笔者做这样的分析、判断,并不是要降低唐诗之路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正是基于其价值性的考量。傅璇琮先生在《唐诗之路:中国文人的山水走廊》中指出:“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唐诗之路是一条浪漫而特别的路,是一条隐匿在历史中的山水人文道路。”^[11]这虽然是针对浙东唐诗之路而言的,但其强调的“特别性”对我们今天探讨更广义的唐诗之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的唐诗之路需要“专门”的研究方法,我们期待这种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在唐代文学整体研究格局中自成其类:通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相信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可以使唐诗研究“依类成化境”^⑦——开辟出一片新的人文天地。

注释

①如宝廷在《偶斋诗草》中云:“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

陈衍《石遗室诗集》亦称:“古来诗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②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③这里的“长三角”是借用现代区域地理的概念,江、浙、皖正在“长三角”范围内。^④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⑤具体论述参见李德辉:《唐代交通-文学的三角形架构及其文学意义》,《唐代文学研究》(第20辑)2021年第3期。^⑥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参见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弘志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⑦“依类成化境”为唐君毅先生之语,参见唐君毅著、黄克剑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第四章《依类成化境——观类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M].中文修订第二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1.
- [2]张伟然,周鹏.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5-11.
- [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序言.
- [4]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41.
- [5]赫勒.一般伦理学[M].孔明安,马新晶,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36.
- [6]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154.
- [7]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0.
- [8]武斌.从歌德的书房向外望去[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9:140.
- [9]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刘若端,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2.
- [10]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3.
- [11]傅璇琮.驼草集:第9册[M].北京:中华书局,2023:2509.

Journey, Life, and Experienc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ang Poetry Path

Luo Shijin Chen Jiayu

Abstract: When discussing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researchers often rely on Tang poetry texts, searching within the inked landscapes on paper for traces, routes, and patterns of the Tang poets' journeys. However, this represents a commo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rather than its unique desired realm.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is a specialized thematic direction within Tang poetry research, and i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for its inherent richness or disregarded in relation to the boundaries of Tang poetry and Tang literary studies. The study of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embodies the fragmented nature of Tang poetry, wherein scholars examine a distinct 'snapshots' of a poet's life. Likewis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ang poetry research,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itself becomes a snapshot. Researching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requires specialized and distinc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can consider the journey, life, and experiences as three constructs that shape the path of Tang poetry. By exploring the routes traveled by Tang poets, we can vividly portray their rich lives and emotions, uncover the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s reflected in Tang poetry writing, and open up new horizons for the study of Tang poetry.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Path; phenomenon representation; event attributes; behavioral perception

责任编辑:采薇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李芳民

摘要：“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关键词：渭城；《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别离意象；《阳关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144-10

长安是唐之都城，也是全国交通的中心与枢纽，由都城长安延展向四方的交通线，大致在长安的东郊、西郊形成两个重要的征行起点，即灞桥与渭城。“灞桥”位于长安之东，是出长安东行、南下与北上的钱行之地；“渭城”位于长安之西北，为唐人西行及西南行的祖帐之所。由于唐人离开长安以东行、南下与北上者居多，故因“灞桥”形成的“灞上折柳”“灞陵伤别”等具有符号特征的别离意象，在唐人诗歌创作中出现频率颇高。相较而言，西出长安的“渭城”意象则显得较为逊色。但是，如果从“渭城”作为诗歌意象的生成演变与经典化来看，其意义仍值得关注与重视。本文拟从“渭城”由一个地域空间到诗歌意象的演变及其在唐、宋的经典化过程展开讨论，追溯这一文学意象的生成与演变历史，并进而阐释其在唐代长安诗路文学意象建构中所具有的意义。

一、渭城：一个蕴含丰厚的地域空间

“渭城”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其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存在，要比其作为文学意象的历史久远得多。“渭城”乃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都之旧地，就使得这一地理名称及其所包含的地域空间，较之一般的地名，更富有历史文化蕴含。

“渭城”之名，与流经关中的渭河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因濒临渭水而得名。在中国历史上，由渭河等河流冲积所形成的关中平原，以山河形胜、物产丰饶而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①，因此它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几个重要王朝的定鼎之地。就其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而言，则是从秦开始的。不过，秦之都城，本名咸阳，自汉武以后，“渭城”之称始有取咸阳而代之之势。至唐代，“渭城”亦兼有唐都城长安之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代到北宋丝绸之路（陆路）上的驿站、寺庙、重要古迹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18ZDA214）。

作者简介：李芳民，男，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19）。

意。经过秦、汉、唐三代，“渭城”这一特定地理场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世事沧桑，不断地丰富着其文化含量，从而使得这一地域空间的内在蕴含愈来愈丰厚。

秦原为地处边陲的小国。《史记》记载，秦之先大业（伯益）为帝颛顼之裔孙女修之后，至大费，舜赐姓嬴氏。周孝王时，其先祖非子以善于蓄养马，赐邑于秦（今甘肃天水境内），不过其时尚不为诸侯所重。周幽王时，西戎与犬戎伐周，秦襄公将兵救之，因而被周室封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秦始与诸侯通聘享之礼。此后，经缪公之经营、孝公之变法，以及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的扩张，至庄襄王时，乃威震六国，有问鼎天下之势。至嬴政，秦之一统天下，可谓是水到而渠成。诚如贾谊所云：“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1]

在秦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其都城也经历多次迁徙。前后所历，分别有秦襄公二年（公元前 776）之“徙都汧”，秦文公四年（公元前 762）之卜居“汧渭之会”，秦宪公二年（公元前 714）之徙居平阳，秦德公元年（公元前 677）之卜居雍，秦灵公元年（公元前 424）之“居泾阳”，秦献公二年（公元前 383）之“城栎阳”^[2]，定都咸阳，则始于孝公之时。史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3]203}。

自献公后，秦历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其都城咸阳虽不断有所扩建增修，但大规模的宫殿营建，则在嬴政即位及其统一天下之后。在统一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人之”^{[3]239}。统一之后，秦则“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镞，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3]239}。

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 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3]241}。此后咸阳宫殿之营

建，更是穷奢极欲。《三辅黄图》称：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木衣锦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4]6-7}

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应是朝宫之营建，史载：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3]256}

朝宫营建，因工程浩大，故先建前殿阿房宫。《三辅黄图》谓：“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4]14}据史载，尽管阿房宫可能是在秦惠文王所建宫殿基础上的扩建，但因其豪奢宏丽，至始皇崩殂，犹未竣工。逮至二世即位，复继修之，终致秦之覆亡。

秦亡之原因，贾谊《过秦论》中以为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2237}，而所谓“仁义不施”，亦即不恤民力、穷奢极欲，终致“残虐以促期”^{[3]292}。“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5]，杜牧之慨叹，代表了后世对秦覆亡之因的认识。

秦以数代之力所建的咸阳城，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但也因秦的暴政而成为天下怨愤之所集。秦末项羽一炬，咸阳之宫阙化为灰烬。咸阳从此不仅成为废都，同时亦成为后人吊古之场域。面对这个昔日既以宏伟壮丽著称，同时又是暴君骄奢淫逸象征的都城遗址，人们留下的是无尽的叹惋与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怀，正如许浑《咸阳城东楼》所称：“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或许缘于秦末都城咸阳的被毁以及人们的复杂情怀,汉人定都关中后,重建新的都城,咸阳之名也逐渐被“渭城”所取代。《汉书·地理志》“渭城”注云:“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为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莽曰京城。”^[6]¹⁵⁴⁶《括地志》亦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秦孝公以下并都此城。始皇铸金人十二于咸阳,即此也。”^[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更为周详:

咸阳县,本秦旧县也,孝公十二年于渭北城咸阳,自汧、陇徙都焉。秦自孝公、惠文、悼武、昭襄、庄襄王、始皇、胡亥并都之。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钟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庭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每破诸侯,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以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充之。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土木皆被锦绣,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至。胡亥时,天下叛秦。汉元年,秦王子婴降汉,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及汉兴,以为渭城县,属右扶风。按秦咸阳在今县东二十二里,汉渭城县亦理于此,苻坚时改为咸阳县。后魏又移咸阳县于泾水北,今咸阳县理是也。隋开皇九年,改泾阳为咸阳,大业三年废入泾阳县。城本杜邮也,武德元年置白起堡,二年置县,又加营筑焉。山南曰阳,水北曰阳,县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8]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至汉代,咸阳之北原,又被选为西汉帝王的陵寝之地。西汉十一帝,除文、宣二帝葬于长安之东外,其余皆葬咸阳北原。自西而东分别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及景帝阳陵。汉帝陵在营建时,亦有徙豪富功臣家于帝陵之举。《关中记》记载:“诸陵……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陵县属太常,不隶郡也。”^[9]¹¹⁹《汉书·地理志》亦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6]¹⁶⁴²惠帝之安陵营建时,尝“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调戏,故俗称女啁陵也”^[9]¹¹⁰。诸陵中,长、安、阳、平、茂五陵,影响尤大。五陵豪富的汇聚,也使此地风俗为之一变。班固尝谓:“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

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9]¹⁶⁴²而五陵之子弟,多因富贵豪奢而倚势横行。其或探丸借客,作奸犯科;或斗鸡走马,豪侠相尚。由此,“五陵侠少”亦成为渭城特有的标志符号。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之都城,西汉时又因为诸帝陵寝所在而豪富聚集,渭城因此也成为具有独特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至唐,因为都城长安与秦都咸阳(渭城)及汉都长安的位置相近,渭城与唐人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当唐代诗人流连往返于这一场域时,渭城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就为其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可供表现的主题选择,唐诗中的“渭城”意象,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的面相。但同时,随着经典作品的传播,“渭城”意象的意义指向逐步向定向化发展,而其经典化的历史亦由此而起步。

二、“渭城”咏唱:唐人的渭城诗与《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

“渭城”成为一个诗歌意象是比较晚的。就目前所见文献看,在唐代之前,仅有一首诗歌涉及“渭城”^②。自唐代始,“渭城”在诗歌中才开始有了较多的表现。不过就数量而言,亦不算多。唐诗中涉及“渭城”者,约有20位诗人的诗作26首(两首重出,去其重则为24首)。具体情况见表1。

从唐人关涉“渭城”意象的诗歌来看,其题材内容与主题较为广泛,大致有田猎、送别、酬赠、羁旅、音乐、怀归、怀古、胜地、写景等。这表明,唐人涉及“渭城”意象的诗歌所寄寓的情思是丰富多样的。这一方面与“渭城”这一地理空间原本文化蕴含的丰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诗人因所处情境的差异而引发的感受不同有关。就表现主题意旨的丰富性而言,则首推崔颢的《渭城少年行》。崔诗云:

洛阳三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长安道。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不见家。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贵

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

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10]304

表1 唐诗所涉“渭城”意象诗歌及作者表

序号	姓名	诗题	诗歌主题或意象功能	作者时代	出处	备注
1	王维	《观猎》	田猎	盛唐	《全唐诗》卷126	
2	王维	《渭城曲》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127	一作《送元二使安西》。集本题即同一作
3	崔颢	《渭城少年行》	多重主题	盛唐	《全唐诗》卷24、卷130	
4	李白	《送别》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137	与岑参诗重出,诗题与诗句个别字有异
5	岑参	《送杨子》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200	与李白《送别》重出
6	岑参	《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	酬赠	盛唐	《全唐诗》卷201	
7	韩翃	《送李明府赴滑州》	送别	中唐	《全唐诗》卷243	
8	独孤及	《同岑郎中屯田韦员外花树歌》	胜地	中唐	《全唐诗》卷247	
9	杨凝	《夜泊渭津》	羁旅	中唐	《全唐诗》卷290	
10	刘禹锡	《与歌者何戡》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365	
11	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	符号性地名	中唐	《全唐诗》卷365	
12	白居易	《南园试小乐》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449	
13	白居易	《和梦得冬日晨兴》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451	
14	白居易	《对酒五首》其四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451	
15	周贺	《送李亿东归》	送别	晚唐	《全唐诗》卷503	
16	张祜	《猎》	田猎	晚唐	《全唐诗》卷550	
17	温庭筠	《送李亿》	送别	晚唐	《全唐诗》卷578	题一作《忆东归》,于周贺重出,题稍异
18	温庭筠	《偶题》	胜地	晚唐	《全唐诗》卷578	
19	温庭筠	《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	酬赠	晚唐	《全唐诗》卷583	
20	李昌符	《夜泊渭津》	羁旅赠别	晚唐	《全唐诗》卷601	
21	许棠	《秋江霁望》	怀归	晚唐	《全唐诗》卷603	
22	唐彦谦	《长陵》	怀古	晚唐	《全唐诗》卷671	
23	吴融	《分水岭》	怀归	晚唐	《全唐诗》卷686	
24	韦庄	《汧阳间》	写景	晚唐	《全唐诗》卷699	
25	谭用之	《渭城春晚》	写景	晚唐	《全唐诗》卷764	
26	崔仲容	《赠歌姬》	音乐	晚唐	《全唐诗》卷801	

《渭城少年行》属乐府诗,《全唐诗》卷24、《乐府诗集》卷66即收此诗于杂曲歌辞下。但用此题创作者,仅崔颢一人一诗。《乐府诗集》卷66鲍照《结客少年场行》下之解题文字曰:“《后汉书》曰:‘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曰:‘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

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11]948此篇之后,则有《少年乐》《少年行》《汉宫少年行》《长乐少年行》《长安少年行》《邯鄲少年行》等题之作。观此类作品,主题大略相近,因此很可能《结客少年场行》后诸题之作,其题目皆由《结客少年场行》衍生而来。其中的《少年行》多表现游侠少年的慷慨豪迈与放荡不羁,王维的《少年行三首》与李白的《少年行三首》可为代表。在“少年行”之前冠以地名,则以梁代何逊的《长安少

年行》为最早,其后陈代沈炯有1首、晚唐李廓有10首。崔颢《渭城少年行》之题名,可能受何逊的影响。不过,与何、沈之作相较,崔诗之内容则要丰富得多。一是崔颢以《渭城少年行》为题,虽不取“长安”,但其所用之“渭城”的地域范围,是一个包含秦之咸阳与汉唐长安在内的大“渭城”,故诗中的景观,既有棠梨宫、葡萄馆,也有长安道、曲江边;既有渭桥与章台,也有下杜与金市。二是其以秦地行人春日思归切入,通过行人的眼光展开铺叙,描绘了渭城春日的优美景色、繁华景象以及五陵少年探丸走马、贵里豪家沉沉歌舞、帝城章台箜瑟娱客、青楼倡家春风卖笑等都市生活场景。三是诗中活动的人物,以五陵少年为主体,突出其斗鸡走马、鸣鞭挟弹、流连倡家、出入青楼的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可谓“写尽当年渭城豪侈冶游情景”(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语)。从主题来看,崔颢此作显然承袭了自《结客少年场行》以及《少年行》等乐府古题之本旨,但他将“渭城”作为五陵侠少的活动背景,并创制《渭城少年行》之乐府诗题。无论是就唐人乐府创作而言,还是从渭城意象进入唐诗歌咏之历史来看,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崔颢此诗虽获得“轻飏婉媚,如游丝袅絮”(邢昉《唐风定》)的褒评,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却不能不让步于王维的《渭城曲》。王之《渭城曲》,本题当作《送元二使安西》^③,据题可知此乃送别之作,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中将其题作《赠别》,或即因其内容而简称之。正是王维此诗的出现,奠定了“渭城”在唐代西出阳关诗路赠别乃至整个古代诗歌赠别送行之作中的经典地位。

赠别送行,是唐人诗歌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严羽曾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2]而唐诗中的赠别送行名篇亦多不胜数,但论后世影响之深远,则又推王维之《送元二使安西》为首。从现存文献看,王维此作当时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当与其被诸管弦、广为传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传唱自盛唐始一直赓续不绝,于是“渭城”作为一个诗歌意象,也经由对《渭城曲》的不断传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诗歌创作,成为一个古代诗歌入乐传唱的经典。关于《渭城曲》的历代传唱情况,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一文已有详尽的勾稽与阐述^[13]。这里仅在王文的基础上,就唐、宋两代有关《渭城曲》传唱活动中一些重要现象对诗歌意象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略

作申说阐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王维诗配乐演唱后,《渭城曲》又或称作《阳关曲》,而二者实同曲之异名,因而以下凡论及后世诗文涉及《阳关曲》者,皆同《渭城曲》视之。

首先,王维此诗入乐谱曲后的传唱与社会影响值得注意。唐诗入乐而被演唱,在唐代较为寻常。《集异记》所载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故事,作为诗歌传唱之掌故,人所共知;诗人李贺,则因长于歌篇,所为“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14]。但是,像王维这首诗配乐之后受到不同阶层的喜爱,及至后世仍在不断地传唱,且引发丰富多样的传唱效应,则是空前绝后的。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此诗所配乐曲之精妙及名家演唱的艺术效果不无关系,而这两者也是紧密相连的。

王维此诗何时、何人配乐今已难以详考,唐人笔记小说中仅略有所及。成书于晚唐文宗大和年间的《大唐传载》曾称:“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15]891}而大约同时的《明皇杂录》中亦有相似记录,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15]962}二书皆谓王维此诗在开元中已被宫廷著名歌手演唱,只是《大唐传载》仅称《渭城曲》是鹤年最拿手的演唱歌曲,《明皇杂录》则谓龟年、鹤年兄弟不仅为当时备受玄宗顾遇的著名歌手,似乎还是《渭城曲》的制曲者。如此看来,王维此诗很可能在开元中即受到宫廷乐工的青睐与关注,配乐后即于宫中演唱。从“妙制《渭川》”来看,则很有可能《渭城曲》即为龟年、鹤年兄弟所作,或为其中之一^④。很可能由于此诗配乐精美动人,又兼有宫廷著名乐工的演唱,故其自开元之后,一直是宫廷乐工的保留演唱曲。

《卢氏杂说》中说:“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⑤而刘之《与歌者何戡》诗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16]768}米嘉荣、何戡、陈不嫌三人,既为“国乐”,米嘉荣且为“三朝供奉”,而何戡复能唱《渭城》,可知此曲在晚唐仍为宫廷歌手所传唱^⑥。可能因宫廷“国手”名家的传唱,《渭城曲》在社会上也广为传播。中唐文人中,除刘禹锡外,白居易在诗中多次提到听唱《渭城》之事,如《南园小试乐》:“小园斑

驳花初发，新乐铮铉教欲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不饮一杯听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和梦得冬日晨兴》：“漏传初五点，鸡报第三声。帐下从容起，窗间晓唳明。照书灯未灭，暖酒火重生。理曲弦歌动，先闻唱《渭城》。”《对酒五首》其四：“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市井小民亦颇喜传唱此歌曲。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

刑部侍郎从伯伯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辄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15]794}

其次，此诗的传唱构建并确立了一个长安西行赠别的诗歌意象经典。如前所说，王维此诗原题为《送元二使安西》，但是经由入乐配曲演唱，在后世的流传中，其原题则被曲名所取代，后世著录，亦多改此诗名为《渭城曲》或《阳关曲》。《乐府诗集》卷八十四“近代曲辞”《渭城曲》下即谓：“《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阳关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辞云。”^{[11]1139}清人赵殿成注王维诗，于此诗下也注云：“成按：《诗人玉屑》以此诗为折腰体，谓中失粘而意不断也。唐人歌入乐府，以为送别之曲。至阳关句，反复歌之，谓之《阳关三叠》，亦谓之《渭城曲》。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讴者，善唱阳关无故人词。’又《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诗中辞云。’”^[17]

显然，诗在配乐传唱过程中，“渭城”与“阳关”这两个地名作为歌曲的亮点而受到关注，正所谓歌曲之命名，“盖因诗中辞云”也。而就诗歌来说，也正是这两个地名，使此诗作为送别之作具有了独特的意味。这是因为“渭城”在这里不仅代表着京城

长安，同时也代表着故乡，阳关则意味着遥远的边塞。在汉代，阳关是中原与西域的分界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通……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6]3871}在唐代，“阳关”也往往是塞外的标志性地名符号，出阳关则意味着道途的荒凉、征行的孤独与别离的忧愁。如岑参的《岁暮磧外寄元九》：“西风传戍鼓，南望见前军。沙磧人愁月，山城犬吠云。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18]崔湜《折杨柳》云：“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落絮缘衫袖，垂柳拂髻鬟。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10]61}唐人写及西出阳关、远赴西域的别离之作甚多，但唯有王维此诗，成为表现西行别离之情的经典。王维此诗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渲染了渭城送别的特有氛围，而且情深意厚、含蓄蕴藉，将别离之际道不尽的深情寄于言外。诚如明人李东阳所说：“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19]

此外，诗中所描写的渭城朝雨、客舍柳色的环境氛围，又与诗人创造性地将唐人灞桥折柳的意象融入西行别离情境不无关系。宋人程大昌云：“汉世，凡东出函、潼，必自霸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王维之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盖援霸桥折柳事而致之渭城也。渭城者，咸阳县之东境也。唐世多事西域，故行役之极乎西境者，以出阳关为言也。既渡渭以及渭城，则夫西北向而趣玉门、阳关者，皆由此始。故维诗随地纪别而曰渭城、阳关，其实用灞桥折柳故事也。”^[20]但也正由于王维此诗移“灞柳折别”故事于“渭城”，营造别离之氛围，唐代西行赠别经典的建构才得以确立，而“渭城”“阳关”也成为西行出塞之路的标志性景观意象。

最后，此诗在唐代配乐传唱过程中，因传唱附带产生的故事与人物也值得注意。比如《刘宾客嘉话录》中所记长安邑里鬻饼者，以及宫廷乐工米嘉荣、何戡等，在后来围绕此诗与乐曲的传播活动中，也都成为富有意味的传播符号，为后来诗人相关的创作增添了富有趣味的素材。

三、“骊歌”：赠别意象的经典化与《阳关图》之意味

由于《渭城曲》自盛唐以后百余年的传唱效应，

入宋以后,其在宋人的文化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的影响。一方面,《渭城曲》在宋代社会各阶层仍广为传唱;另一方面,王维的原始诗歌文本,作为赠别经典,同样备受文人的青睐。伴随着歌曲的广泛传唱,《渭城曲》及其诗歌文本,在宋人的社交生活、诗歌创作以及艺术活动等方面形成多样的传播面相与效应。而宋代文人以不同艺术形式对《渭城曲》进行的多种回应,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曲》及其诗歌文本的文化蕴含。《渭城曲》的传唱,不仅丰富着文人的日常生活,刺激着他们的创作兴趣,而且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思维活动,启发了他们对送别空间的想象与联想。正是由于宋代文人的相关艺术创作活动,《渭城曲》无论作为歌曲还是诗歌,其意趣也进一步深化。于是,经由唐、宋两代文人前后相继的艺术创作,《送元二使安西》最终被形塑为赠别诗的经典,《渭城曲》也因不断传唱而成为古代“骊歌”之绝唱。

《送元二使安西》对宋代文人的影响,首先还是缘于作为歌曲的《渭城曲》的传唱。有关《渭城曲》在宋代的传唱情况,宋代文人的诗、词、笔记等作品中,都有所涉及^①。我们可以从宋人刘攽的故事感受《渭城曲》当时的社会影响与文人对此曲的赏爱。范公偁《过庭录》曾记刘攽轶事云:“刘原父知长安,妓有茶娇者,以色慧称。原父惑之,事传一时。原父被召造朝,茶远送之,原父为夜宴痛饮,有别诗曰:‘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至阙,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原父。原父适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原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酒病。’永叔戏之曰:‘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21]刘攽离别长安时,所宠歌妓送别所唱即为《渭城曲》,而刘攽亦以“白玉佳人唱渭城”的赠别诗句,留下了宋代文人与《渭城曲》的一段颇有趣味的故事。

宋代文人不仅喜听《渭城曲》,而且能唱《渭城曲》。强至《陆君置酒为予唱〈阳关〉即席有作》即有句云:“故人幽怨几时尽,至今愁杀《阳关》声。陆君酒酣喜自唱,坐上客泪俄纵横。”^②韩维《归许道中二首》其一亦有句曰:“京洛风尘久客情,暂由归路眼中明。最怜杨柳青青色,徐策征骖唱《渭城》。”^③不仅如此,宋代文人对于“阳关三叠”的演唱方法亦甚有兴趣。苏轼曾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

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22]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平日对《渭城曲》的关注与喜爱。

不过,从诗歌中“渭城”意象的经典化过程来看,宋代文人在文学与艺术创作层面对于《渭城曲》主题流向与深化的贡献,更值得关注。而这可以从宋人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创作、绘画艺术及连带的唱和之作来考察。

从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来看,由于《渭城曲》的广泛传播,《渭城曲》及与之相关的“渭城”一词,也成为宋人诗歌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符号。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原本为赠别送行之作,但在配乐而以《渭城曲》的形式传播后,其音乐性已对赠别的主题造成一定程度的掩蔽。中唐时白居易所作三首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抒发的主要是诗人欣赏音乐时的愉悦与快慰之情,刘禹锡的《与歌者何戡》也重在表现他长期遭贬而重返京城后再闻《渭城曲》“天乐”的沧桑之感,所以,王兆鹏在分析《渭城曲》在唐五代的流传与传唱时说:“唐五代人熟知的是乐歌名曲《渭城曲》,而不是近体绝句诗《送元二使安西》。”^[13]与唐人不同,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则再次激活了原诗的别离之意。他们在诗歌中运用“渭城”或“阳关”入诗时,多将其作为抒写送别之情的标志意象,如以下几首诗^④:

东风未晓放船行,卧唱《阳关》出渭城。老去与人浑惜别,不知何处可忘情。(晁冲之《送韩温父》)

正有寻梅约,今朝此见梅。小停剡溪棹,更尽渭城杯。人物良堪惜,山川会复来。前村风雪夜,归意莫生埃。(陈杰《江头闲行送去客》)

客子明朝早问程,尊前今夜若为情。使君亦恐伤离别,不使佳人唱《渭城》。(戴复古《李敷文酌别席上口占》)

还有一些诗人,则是以“渭城”作为具有符号性意象来烘托诗人的情感。如李复的《白沙驿在归州东江南岸》:

转侧下层巖,江流出断壑。寒云生古戍,野店引山泉。雨暗疏茅湿,堂危倒石悬。去程无限险,心落渭城边。^⑤

又如刘敞的《渭城》:

举世凡人歌渭城，流传江浦是新声。柳色青青人送别，可怜今古不胜情。^⑫

词人的创作情况，也大抵如是。如叶梦得的《醉蓬莱》：

问东风何事，断送残红，便拼归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羁旅。一曲《阳关》，断云残蔼，做渭城朝雨。欲寄离愁，绿阴千啭，黄鹂空语。遥想湖边，浪摇空翠，弦管风高，乱花飞絮。曲水流觞，有山公行处。翠袖朱阑，故人应也，弄画船烟浦。会写相思，尊前为我，重翻新句。^[23]

因此可以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不仅继承了王维原诗的主题意向，而且激活了该诗在《渭城曲》传唱过程中一度曾被音乐所掩蔽的赠别意涵，并确立了其抒写别情所具有的符号意象特征。

此外，宋代文人在诗词中运用“渭城”意象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浓度，不仅突出其抒写别情的意义指向，而且注入了浓厚的凄凉与悲伤的色彩，从而把王维原诗蕴藉含蓄的情感表现转化为浓墨重彩的深情抒发。如以下数作^⑬：

犹君莫唱《阳关曲》，自觉年来不能悲。
(韩维《同邻几、原甫谒挺之》)

离愁自堆积，辄莫唱《阳关》。(郭祥正《螺川送别王公济朝奉还台》)

《阳关》一曲悲红袖，巫峡千波怨画桡。
(黄庭坚《送曹黔南口号》)

一曲《阳关》双别泪，百壶清酒两邀头。
(洪朋《代钱无为马使君口号》)

休唱《阳关》催别酒，春情离恨总悠悠。
(江端本《梦中作》)

萧寺试来携手处，《阳关》已作断肠声。
(孙觌《嘉会饮钱爱姬大恸而别》)

三迭凄凉渭城曲，数枝闲淡阆中花。(陆游《阆中作》)

如果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使王维诗歌中“渭城”意象的意义指向不断稳固化、情感的分量不断强化，那么宋代画家《阳关图》的创作^⑭，以及与之相关的题画诗，则进一步深化了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拓展了“渭城”的意义空间。宋代诗、画艺术的交流与碰撞，使王维原诗中的“渭城”意象获得了新的发展。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李公麟的《阳关图》。

李公麟是北宋声名甚著的画家与诗人。《宋史》本传称：“(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其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雅善画，自作

《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24]《宣和画谱》中对李公麟的绘画艺术褒赞有加，谓其“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间阎、臧获、台舆、阜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善恶，与夫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妍丑，止以肥红瘦黑分之”^{[25]130}。书中称其绘画大抵“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公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25]131}，并记录当时御府所藏其107幅画之名称，《阳关图》亦在其中。所惜者，《阳关图》之真迹今已难觅，所画内容不能亲眼目睹。所幸者，有时人张舜民所作《京兆安汾叟赴临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画〈阳关图〉并诗以送行浮休居士为继其后》一诗存世，而据其诗之描述，公麟所绘之《阳关图》约略可得其仿佛。张诗云：

古人送人赠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画。自写阳关万里情，奉送安西从辟者。澄心古纸白如银，笔墨轻清意潇洒。短亭离筵列歌舞，亭下喧喧簇车马。溪边一叟静垂纶，桥畔俄逢两负薪。掣臂苍鹰随猎犬，耸耳驱驴扶只轮。长安陌上多豪侠，正值春风二三月。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举杯苦劝客，道是西征无故人。殷勤一曲歌未阕，歌者背泪沾罗巾。酒阑童仆各辞亲，结束鞦韆意气振。稚子牵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惟有溪边钓鱼叟，寂寂投竿如不闻。李君此画何容易，画出鱼樵有深意。为道人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红莲幕府尽奇才，家尽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门当巷陌，潺湲流水绕亭台。当轩怪石人稀见，夹道长松手自栽。静锁园林莺对语，密穿堂户燕惊回。试问主人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开。歌舞教成头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东国不我与，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买田箕岭下，更看筑室颍河隈。凭君传语王摩诘，画个陶潜归去来。^⑮

由张诗中的描述可知，李公麟的《阳关图》从主题、人物、空间场景等多个方面对王维原诗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与展衍，描绘了一幅比王维诗歌所写内容更为丰富的渭城送别图画。其中的画面、人物设计都对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作了生发与改造，表达了画家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独特思考。也可以说，作为画家的李公麟，借助王维诗歌中渭城赠别的曲蘖，利用《阳关图》这一画作，重新酿出了自己关于人生别离意义的“新酒”，从而也为王维诗中“渭城”意象

增添了新的蕴含。其中之意,张舜民可谓深有所会,故在诗中揭示说:“李君此画何容易,画出鱼樵有深意。为道人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宣和画谱》也说:“公麟作《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闻其意。其他种种类此,惟览者得之。”^[23]¹³¹王兆鹏对此有更细致的分析,详见其《〈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图画传播》一文,此不赘引。

如果单纯从送别场景也即“渭城”这一空间意象来看,李公麟的《阳关图》无疑是对王维诗歌的重大改造,大大丰富了王维诗中的“渭城”空间意涵。不过,李公麟《阳关图》中还有一个问题少有人注意到,即此画之画题与其内容的关系。佚名《复斋漫录》曾有这样的议论:

《送元二安西》绝句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伯时取以为画,谓之《阳关图》。予尝以为失。按《汉书》:“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馆在焉。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可也。东坡《题阳关图诗》:“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皆承其失耳。山谷题此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然则详味山谷诗意,谓之《渭城图》宜矣。^[26]

从张舜民诗歌中对李公麟《阳关图》画作内容的描述看,画面所描绘的空间场景的确是“渭城”而非“阳关”,但李公麟为何不将其画作命名《渭城图》而题作《阳关图》呢?胡仔是这样解释的:

茗溪渔隐曰:“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旧本《兰畹集》载寇莱公《阳关引》,其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亦以此绝句填入。词云:‘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26]

他认为题作《阳关图》,是受到流行《阳关曲》的影响,而《阳关曲》之名,又源于诗中之语。不过这样解释,或许有点简单化了。其实,画题与画中场景“渭城”之间的矛盾,也许正是画家别有用心处,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使画作更具有耐人咀嚼的意味。人生何处无离别,何处离别不感伤,但“渭城”之离别,正在于它要西行阳关之外,这样,“阳

关”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或许正是《阳关图》突出渭城别离之意的独特之处。所以,黄庭坚才说:“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27]苏轼也说:“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28]黄庭坚诗中所说的“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或许正是苏轼所说的“阳关意外声”。

自中唐以降,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赠别之作,历经唐、宋两代的接受与传播,逐渐成为送别诗的经典。在这一过程中,“渭城”与“阳关”始终是此诗最为抢眼的两个焦点。尤其是其中的“渭城”,作为西行出发的送别之地,经过众多诗人与艺术家的接受与再创造,逐渐发展成为别离的经典意象。而因“渭城”与“阳关”在王诗中所具有的呼应关系,人们也顺理成章由此展开了长安西行塞外的想象,“渭城”作为别离意象的特殊性也因此得以确立。近年来,唐人行旅与诗歌的关系备受关注,“唐诗之路”研究因而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渭城”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别离诗歌意象。

注释

- ①战国时苏秦说秦惠王即称:“秦四塞之国,披山带河,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汉初刘敬劝刘邦都关中,张良亦说刘邦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分别见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42、2043—2044页。②自汉以降至唐前,诗歌中提及“渭城”者,仅梁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其一这一首诗。诗云:“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簪。花舞依长簿,蛾飞爱绿潭。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5页。③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即作《送元二使安西》,并于题下注云:“《诗人玉屑》作《赠别》,《乐府诗集》作《渭城曲》。”见《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全唐诗》亦作《渭城曲》。按,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例略》称,其所见王维诗集“惟须溪评本为最善”,故“是编十四卷以前之诗,皆须溪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见《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可知王维此诗宋本原题应作《送元二使安西》。④不过,“制”之义甚广,既有制作、制造、裁制的意义,亦有“式样”之义。故“妙制渭川”,亦可理解为龟年、鹤年兄弟唱《渭城》,是天下唱此曲之楷式。据薛用弱《集异记》载王维“性娴音律,妙能琵琶”;其科举中第后又曾为太乐丞,故《送元二使安西》之人乐,亦不排除王维自制曲之可能。设如此,则《送元二使安西》之配乐传唱,应始自王维本人。⑤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51页。⑥《与歌者何戡》诗,《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系作年为刘禹锡大和二年返长安时。⑦关于宋人唱《渭城》的

情况,杨晓霭曾有讨论。据杨考,《全宋诗》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诗作近 50 首,《全宋词》出现的相关的词作 130 多阙。见杨晓霭《宋代声诗研究》,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4—75 页。⑧强至《祠部集》卷三,清武英殿聚珍版藏书本。⑨韩维《南阳集》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⑩下所引晁冲之、陈杰、戴复古诗,分别见《晁具茨诗集》卷七,清海山仙馆丛书本;《自堂存稿》卷二,豫章丛本;《石屏诗集》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景明弘治刻本。⑪李复《潘水集》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⑫刘敞《公是集》卷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⑬下引韩维、郭祥正、黄庭坚、洪鹏、江端本、孙觌、陆游诗句,分别见韩维《南阳集》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郭祥正《青山集》卷二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琳、李勇先、王荣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3 页;清四库全书本;洪鹏《洪龟父集》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四十六,日本元和七年活字印本;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8 页。⑭据王兆鹏《〈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图画传播》一文,宋代有六位画家曾有《阳关图》之画作。分别是北宋的李公麟、谢蕴文、修师以及南宋的僧梵隆、刘松年和李嵩。该文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11 年第 2 期。又,宋人方岳《深雪偶谈》又尝谓:“渭城朝雨衰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摩诘《送元二使安西》诗也。世传《阳关图》亦摩诘手,遂称二妙。”如是,则在宋人之前,王维亦曾有《阳关图》画作。⑮张舜民《画墁集》卷一,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参考文献

- [1]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35-2236.
- [2]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34.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 [5]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0.
-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
- [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 [9] 刘庆柱.三秦记辑注 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10] 彭定求,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1]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2]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8.
- [13] 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J].文学评论,2011(2):151-156.
- [14]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72.
- [15] 全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6]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768.
- [17] 赵殿成.王维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63.
- [18] 侯忠义,陈铁民.岑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6.
- [19] 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5.
- [20] 程大昌.雍录[M].杨恩成,康万武,点校.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43-144.
- [21] 范公偁.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364-365.
- [22] 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090.
- [23]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781-782.
- [24]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25-13126.
- [25] 宣和画谱[M].俞剑华,标点注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 [26]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9.
- [27] 黄庭坚全集 宋黄文节公全集[M].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176.
- [28] 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599.

From Weicheng, A Farewell Song in Weicheng to Painting of Yangguan: The Gener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a Parting Image on the Poetic Road

Li Fangmin

Abstract: As the former site of Qin capital, “Weicheng” is a historical and regional space with deep richness in culture, and it appeared in the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n became a poetic image with abundant implications. Since *A Farewell Song for Yuaner to Anxi* (masterpiece of Wangwei) was composed and sung, which was widely spread in the name of *A Farewell Song in Weicheng* and *Yangguan Triassic*, the significance of “Weicheng” as a representing symbol to the poetic image of “parting” was given prominenc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 Farewell Song in Weicheng* and *Yangguan Triassic* still had a wid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and became the iconic image of literati poems and lyrics in interpreting parting. In addition, some painters also used it as their painting material. The literati poems and lyrics in the So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Weicheng” imagery of parting and strengthened its emotional performance. The paintings of painters, especially Li Gonglin’s *Painting of Yangguan*, further enriched the interest and charm of the parting meaning of “Weicheng”. Therefore, “Weicheng” was then introduced as the canonization of parting image in literature. Besides, “Weicheng” was original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ang people’s westward journey, stretching to the Western Regions through Yangguan Pass. And it became a Tang poetic road from Chang’an towards the Western Regions due to the composing and chanting of poets along the way. Thus, “Weicheng” was regarded as an iconic parting image on the poetic way of westward journey from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Weicheng; *A Farewell Song for Yuaner to Anxi*; *A Farewell Song in Weicheng*; parting image; *Painting of Yangguan*

责任编辑:采薇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海派话剧图景

尹诗

摘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众文化环境逐渐形成。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海派话剧出现明星制、潮流化等大众文化的特征,其中蕴含着大众文化对于话剧审美经验和美学意义的特殊开发。海派话剧以民间性的坚守推进了民间文化与话剧艺术的有机融合,历史剧的热潮使得剧场成为传诉民间抗敌爱国情怀的独特空间。同时,海派话剧以改良之姿形成兼容不同文化艺术的多维面貌,参与建构了城市生活的公众休闲与流行风尚。大众文化促进了市民性现代品性的提升,有利于深化对海派文学、都市文学意义价值的探寻和思索。

关键词: 大众文化;海派话剧;市民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154-0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话剧^①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繁荣景象也是异常耀眼的。它以市民性的彰显与解放区、大后方话剧区别开来,在百年话剧发展史上留下了市民图景的印痕。以海派话剧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通过对20世纪上海市民文化的回眸,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海派话剧的了解,而且可以强化话剧史中一些被人忽视的因素。如海派话剧隐含着怎样的文学经验,传递着怎样的大众文化生产信息,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文化奇观,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海派话剧生产的大众文化语境

海派话剧和海派小说、海派散文一道组成了海派文学的大致图景,呈现出媒介、市场合力下的大众文化景观。长期以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被认为是“小市民”文艺。如茅盾曾言:“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

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性,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1]此言论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左翼对这一时期上海市民文学的态度,凸现了对市民文学的排斥,影响可谓深远。而实际上,海派文学的多重面相被遮蔽了,从大众文化、都市文学等生产环境加以观照,可以逐渐看清海派话剧的真实面貌。

大众文化是和现代都市相生相伴的现象,在本质上属于都市文化。话剧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移植成功,绝非偶然。从开埠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化都市发展成型,“成为了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工商业中心,积累了成为现代型商业消费城市的物质基础”^[2]。以商业消费取向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兴起,为娱乐业的繁盛提供了土壤。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商业消费日渐兴盛,大新公司和中国银行大楼于同年落成,百老汇大厦与号称“远东第一楼”的24层四行储蓄会大楼开始屹立在外滩和南京路上。1933年

收稿日期:2023-0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报刊媒介中的现代上海话剧研究”(2021BWX038);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支持项目“上海现代话剧接受史”(2021-CX-047)。

作者简介:尹诗,女,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44)。

革新后的“大光明”开张,配备美国 RCA 实音式有声放映机和空调设施,有 1900 个沙发软座,其豪华魅力首屈一指。“跳舞场以 1932 年开办的百乐门为代表,地处静安寺,有远东第一乐府的美称。”^[3]此外,还有跑狗场、回力球场、现代剧院等现代娱乐场所的兴建,以及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文化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话剧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娱乐形式,正是在上海都市的土壤中滋生和成长起来的。

“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口味,即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4]市场经济是大众文化兴起的前提,话剧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成熟的话剧市场。沪上的话剧为何迟迟走不进一般市民阶层呢? 主要因为话剧市场薄弱,成熟比较晚。1936 年,《雷雨》在卡尔登剧院上演成功,标志着中上层市民观众对话剧的接受(愿意买票进剧场观看)。话剧最初作为文明思想的代名词由外国引进过来,但其只说不唱不舞的表演方式不符合中国大众观戏的习惯,以至于在“文明戏”阶段需要以加唱加舞的方式来吸引市民。为了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剧场,话剧历经了多次改良,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尝试。文明戏、新剧、白话新剧、改良新剧、男女新剧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名字变化,实则折射出话剧的荣辱兴衰。此外,编演剧人才的缺乏,也制约着话剧艺术的发展,使得文明戏不得不频频向传统戏剧求援,但一味追求通俗甚至低俗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而像春柳社那样追求话剧的纯粹的做法,终不免在风雨飘摇中宣告失败。但这些做法都不失为话剧市场化进程中的有益探索。

历经起伏变迁的海派话剧在商业大潮中逐渐完善自身的生产体制,到 1941 年前后,在人才、资金、场地、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基本保障。“大约从 1941 年起,‘演剧职业化’运动在上海和大后方同时开花结果,四五年间先后有 20 多个职业剧团问世。剧本创作、舞台艺术、演剧活动持续高涨,达到空前的活跃与协调。”^[5]这一时期,除了姚克、顾仲彝等一批剧作家留沪之外,众多话剧专门人才积聚于上海,为海派话剧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话剧演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批有着较高学识水平的导演,如黄佐临、吴仞之、胡导等,为观众奉献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市民作品。上海话剧演员基本上都接受过中等教育,相当一部分是经过招考成为职业话剧演员的。剧坛繁荣背后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这是

沦陷时期特殊形势下的经济行为。评论称一批“有投资眼光的‘后台老板’们,认定这事业在现阶段有抬头发展的机会,而且说不定会和电影事业争一日之短长,所以纷纷投资,向话剧新市场发展”^②。此外,版权意识的增强、演出税等制度的形成,亦保证了话剧的良好从业环境。从报刊新闻史料可以看到,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经常演出话剧的剧场已有“卡尔登、金都、巴黎、金城、兰心、美华、绿宝、丽华等八家”^③。

报纸、杂志和书籍见证了海派话剧的繁盛景象,形成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多样的新媒介,但笔者能查阅到的涉及话剧的大众报刊不下百种。其中既有专业刊物《戏剧杂志》《剧艺》《话剧界》《舞台艺术》,也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如《申报》《万象》《半月影剧》《大众影讯》《良友》《杂志》《天下》,还包括众多的都市小报如《社会日报》《力报》《海报》《大上海报》《平报》《中国艺坛日报》《娱乐》《铁报》等。市民阶层的兴起为话剧接受传播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评剧者往往是话剧爱好者、报刊编辑,或是话剧活动的实践者,多重身份使得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融入媒介传播活动中,产生消息、报道、演出手记、广告、座谈会纪要等各种形式的剧评。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6]28}。海派话剧利用大众传媒牢牢地把握住观众的审美趣味,商业化的功利性的文学观念要求它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消费者趣味为目标。正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参与,使海派话剧实现文化、艺术与商业消费的合流,发展成为批量化、商品化和标准化的娱乐消费品。

为了吸引观众,每个剧团也都格外注重宣传效应。他们经常会在话剧首演前夕组织招待会,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充分运用媒介的力量来宣传剧目。海派话剧的宣传花招多种多样、层出不穷,当时常见的话剧宣传刊物即“演出特刊”。各剧场频频推出“演出特刊”,刊印内容除了应有的本事与演员表外,还可载入编剧人的意见、导演的自白、演员演技的研究,以及一切有关剧目的各项问题。这如同今日大片上映之前的宣传花絮,将作品的亮点优势集中展现。另外,还有“剧透”预告类报道、话剧内幕和演出花絮、演出广告、明星选举的新闻等娱乐化的宣传方式,像有些剧团的“道歉声明”被评论界认为是广告手段。费穆导演《梅花梦》时,报上刊登了原

作者谭正璧保留著者权利的抗议广告,这被人看穿了把戏:其实这是上艺的宣传手法^④。话剧在报刊的推动下,表现为一种社会化、媒介化的文化生产形态。如果忽略话剧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忽略报刊印刷媒介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无法真正认识市民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法触摸到话剧发展的生动脉络。

二、海派话剧的大众文化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通常被认为“彻底摆脱了传统贵族社会的文化认同,自寻目标地发展起独自の近乎当时世界标准的大众文化”^[7]。这和今天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不谋而合: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8]。海派话剧以明星制、打对台、流行风、娱乐化等表征书写了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

高额的演剧报酬使得一批话剧明星应运而生,成为大众文化的象征。中国旅行剧团的唐若青实行“包销前十排”^⑤的做法,李绮年在绿宝上演《潘金莲》,实行每座抽一元的办法,花样不一而足。主角与明星制相连,这是商业化演剧的必由之路。每个剧团都会注重用明星的公众影响力提高产品的号召力,分级别的演剧报酬制度也在客观上具有“造星”的效用。报刊是现代上海明星文化滋生的温床,通过媒体的大肆宣传,孙景路、上官云珠、沈敏、石挥、陆露明等明星成为公众追捧的对象。明星的演艺活动、兴趣爱好甚至饮食起居都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如《拉角风潮》一文曾言:“乔奇的退出‘上艺’加入‘光明’,也是拉角家乘他和石挥闹意见的当儿,从中拉拢所得。石挥似乎已成了‘红伶’,更多的拉角家企图重金礼聘。”^⑥关于明星的各种消息和流言成为都市里最有声有色的风景。通俗期刊里各种夸张性的批评与褒奖共存,它所带来的休闲趣味是单纯阅读纯文学评论很难体会到的。媒体在诸如此类的报道中扮演了“捧角”“造星”的角色,将演员、明星以更加立体生动的形象展露出来,满足了社会大众以明星为谈资的窥视欲。为了扩大影戏、吸引观众,各剧团还会在剧本的分量或名演员、名导演的号召力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形成“对垒”之势,评论界将此类现象称为“打对台”。1942年12月24日卡尔登推出《秋海棠》之时,艺光剧团公演《甜姐儿》(魏于

潜编剧,胡导演),中中剧团上演叫座戏《欲魔》,由话剧卖座明星孙景路主演。三部作品制作阵容强大,各有所长,由此可见当时剧坛竞争的激烈态势。海派话剧努力将观众视为上帝,在追逐时代潮流的同时,亦能变换不同的风格适应观众多变的口味。

海派话剧具有释放都市生活快节奏的功能,将娱乐的消遣休憩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符合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捕获’大量受众、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9]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大众文化的运作核心。海派话剧中,夸张性的闹剧如《八仙过海》旨在给人们带来放松和愉悦,《梁上君子》在演出时,观众始终不停地开怀大笑。外国改编作品则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适应了上海观众追新逐异的欣赏需求。才子佳人之类的民间题材剧目,则赚足了旧式观众的眼泪。历史剧如《杨贵妃》布景壮观华丽,配以古典优雅的音乐,使得观众沉浸在缠绵悱恻的帝妃恋里。《倾城之恋》《清宫怨》等表现爱情情感的剧作,满足了观众追求热闹好看的心理需求。悬疑破案剧如《天罗地网》也是百姓爱看的一类剧作,破案的趣味性很能吸引民众的好奇心。20世纪40年代,在国破家碎的沦陷区上海,话剧工作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愁米愁煤愁得太苦”的上海人带来了笑声,使他们在对娱乐的追求中使生命紧张之后的倦怠与失落得到暂时的放松和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派话剧为观众打造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发挥了建立民族认同、慰藉精神的巨大能量。

由市民观众和都市媒介共同参与形成的潮流风是海派话剧的另一表征。“潮流风”即某个剧目的卖座会引发此类作品的流行。1942年上半年恋爱剧《香笺泪》《茶花女》《水仙花》《红楼梦》《花花世界》走红沪上,随着年底《秋海棠》的轰动演出,现代通俗派剧作争相出炉;1943年古装戏流行一时,7月《武则天》开启风气,8月《杨贵妃》《清宫怨》紧随其后,《香妃》《钗头凤》《浮生六记》《李香君》等持续上演到岁尾;《潘金莲》的上演引起一波民间剧的热潮,《梁山伯与祝英台》紧随其后;到了1944年,闹剧又成了上海剧坛一条主要的线路^⑦。潮流风的形成标志着话剧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是之前的话剧所不具有的。

海派话剧、左翼话剧以及电影、戏剧、通俗小说在媒介营造的公共空间互相影响。在世俗大众中占

主流的市民剧评,以大众趣味的培养和满足为基本导向,以鲜明的商业娱乐性凸显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市民剧评之外的左翼剧评、自由派剧评,以坚守政治立场和艺术性为主要特征。但无一例外,它们也都处于大众文化的浸染之中,并且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市场化在推动左翼话剧扩张观众市场、促进演剧职业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商业竞争在促进剧团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精英思想的引领能有效避免话剧误入过度商业化的泥淖。左翼剧评提出话剧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服务的目标,阿英的《碧血花》、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将抗战与民主的现实要求寓含其中,对剧坛商业化起到了一定的纠偏、制衡作用。此外,“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是否有利于改进人生理应成为评价作品艺术的标准”^⑧之类的言论,对于防止话剧低俗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各种流派的文学观念在话剧里交汇融合,带来话剧现代意义的演变和审美艺术的革新。

三、大众文化对于话剧 审美经验的特殊开发

海派话剧以民间性的坚守开辟了广阔的演剧市场,逐步赢得了市民大众的喜爱。传统文化不会创建大众文化,但却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土壤。“通俗性到了现代,常常要由民间文学与旧文学这样两方面来输送营养。”^[10]作为都市文化日常生活的参与者,世俗大众为自己发声,从某个程度而言,这确实翻转了传统主流社会“由上而下”的规训文化。而民众发声最常用的工具就是民间文化,经过改良创新的民间戏剧或者小说与话剧实现了有机结合,在戏剧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效。直到1944年的话剧舞台上,还有传统戏曲改编剧《春阿氏》。至于20世纪30年代的舞台上,《赵五娘》《珍珠塔》《玉堂春》等剧目就更为常见了。名剧《秋海棠》更是离不开京戏的功劳。话剧导演费穆跟周信芳、梅兰芳都是很好的朋友,石挥为演好名伶“秋海棠”,专门拜访黄桂秋、梅兰芳、程砚秋等演员^[11]¹²。

大众文化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加以改良创造,使其更为现代化、更富于美感。如《秋海棠》开头和结尾以“戏中戏”的手法将京戏《苏三起解》穿插到话剧舞台上,这成为该剧的最大看点。深受海派京戏影响的导演、演员亦将戏曲的唱念做打手法运用到

话剧中。胡导在《陈圆圆》中出演算命先生时,运用“老鼠胡须、弯腰驼背”^[11]⁸等京剧丑角的表现手法,强化了人物的喜剧效果。

传统戏曲、通俗小说在与话剧的交融中,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美感。话剧中的“伶人戏”可以看作青楼文学的延续,但表现范围已从妓女扩展到了歌舞明星、舞女、京戏名角儿,由此联结起娱乐业、商界、家庭之间的情感利益纠葛。这不仅投合了市民喜好明星的独特心理,而且使剧作的主旨指向对艺术从业者的同情,以人物最终难逃灭亡的悲剧命运控诉社会。由此可见,海派话剧内容社会涉及面之广、批判性之深刻,显然不是以往的通俗小说所能达到的。

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出现了历史剧演出热潮,《文天祥》《明末遗恨》《岳飞》《葛嫩娘》《杨娥传》等剧传达了上海市民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气节,隐晦曲折地表达了抗议外族侵略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大众文化理解为“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6]⁶⁸。一方面,历史改编剧的盛行适应了大众喜爱谈古论今的心态;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孤岛时期,直接谈论抗战是不行的,历史剧搬出古代衣冠较易避开当局检查。因此,这种历史改编剧是对时代主题回应的爱国剧,剧场成为观众曲折表达爱国情怀的特殊空间,亡国之痛和爱国情怀在观剧过程中得以释放和表露。面对日本侵略者入侵、国土分裂的现实,民众对统一国家的期盼与想象不只包含在对历史传奇的向往中,更是通过历史剧对“中国文化”的强调,表达对侵略者反抗的心声。这样,历史被赋予了舒缓焦虑、抒发民族大义的拯救性意义。无论是英雄传奇人物剧目《文天祥》《李香君》,还是传唱至今的爱情剧目《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涂抹上了“精神性家园”的虚化色彩。李香君、葛嫩娘更是成为抗战历史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她们都具有聪明果敢、率真纯情、蔑视权贵的性格特征,以及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不惜献身的崇高精神。

家国情怀历来是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在这一点上,海派话剧和当时进步的左翼话剧是相通的。“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6]⁶⁸,但却是“日复一日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6]⁶⁸。海派话剧在写实和想象交

织中构建的家国形象,不断激荡、影响着市民的爱国情怀,在异族统治的孤岛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这不啻一剂殖民地子民心灵疗伤的良药。民间爱国热情裹挟着反抗侵略的快感,使得历史剧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力量。

海派话剧对民间文学的创新式传承体现了改良的功用。改良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生产方式,贯穿海派话剧的发展历程。话剧能够克服传入初期的“水土不服”而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下来,归功于不断的改良。改良使其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调适,兼容并蓄,有了不断更新、持续精进的机会。无论是话剧初期与通俗小说和传统戏曲的联姻,还是电影兴起后大量电影改编剧的出现,都体现了话剧向传统和创新双面出击的能力——改良。在改编外来剧时,海派话剧十分注意题材的择取。黄宗英主演的《甜姐儿》等“流线型喜剧”成为首选,因为与悲剧相比,喜剧能够减少审美距离带给观众的陌生感。顾仲彝改编《简爱》时,特意将剧名改为《水仙花》,故事中的地名和人名也都进行中国化处理,这些本土化的改编方式使得外国剧作逐渐收获了更多的中国观众。

改良还包括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动交流。话剧和电影、京戏、越剧等艺术形式之间的改编比比皆是,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曾演过朱端钧导演的《雷雨》里的一场戏^[11]⁸⁷。在海派话剧中,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开放交流异常活跃,这固然离不开商业利益的驱使,但较为成熟的、市场化的演出环境更是基本保证。话剧在20世纪40年代兴盛时期,夏佩珍、宣景琳、王雪朋、白虹、顾梦鹤等人都曾登上话剧舞台。1941年,天风剧团在推出姚克编剧的《清宫怨》时,邀电影明星舒适参演,增加不少票房。费穆创造性地把电影手法引入话剧舞台艺术,使话剧的场面调度更具视觉冲击力。如《浮生六记》最后一场,芸娘说完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春天不远了”之后,病榻后面的绿幔掀起,露出窗外暮春三月的景象^⑨,这种画面切入的手法显然来自电影。

海派话剧在不断的改良中汲取各种艺术的精华,在上海话剧舞台上始终占据重要一席。在与左翼话剧共存的时代,左翼注重社会意义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等艺术特性在海派话剧里都有体现。海派话剧曾演出左翼剧作《龙凤花烛》(改编自《一年间》)。海派话剧的经营者深谙人们的观剧心理,通过改良使不同流派风格的剧目适应观众多样的欣赏口味。在成熟的话剧市场上,呈现的是雅俗结合、

新旧交融、中西结合的图景。各流派的互动共生不仅促使精英文化、意识形态文化成为市民大众文化的构成要素,而且使大众文化的品位获得空前的提高。话剧艺术在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提升,呈现出市场与审美、政治与商业、抗战与娱乐之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海派话剧注重变换风格保持演剧的“新鲜感”,悲剧和喜剧、古装戏和现代剧、闹剧和抒情剧、改编剧和国产剧等各种名目的剧目次第上演。这种做法适应了观众不同欣赏心理的需求,是趋新求变的市民品性使然。

海派话剧参与建构了城市生活的公众休闲与流行风尚,这是大众文化在都市日常生活层面的显现。演剧及观剧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方式,话剧中现代生活理念传输渗透也变得无处不在。在海派话剧中,推崇物质文明、多元生活方式的现代思想理念和价值立场,多以旅游、出国留学、蜜月旅行等现代生活方式加以展现。而其中诸如女性意识的觉醒、新型家庭关系等也成为引领现代都市生活的重要面向。各种刊登在戏剧专业期刊、休闲杂志、都市小报上的剧评不拘一格、蔚为大观。观众体验都市的欢乐喧哗和悲欢离合,借助现代媒体发声评戏,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种流行风尚,话剧由此成为大众文化蔓延至整个都市生活中的重要艺术形式。

“受众同文化工业一起,成为大众文化的共同创造者。”^[12]有剧作者和演员以及观众的参与,才能成就作为观演艺术的话剧。观众推动着话剧前行,话剧影响大众生活,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建构。受市民关注的影星也会被写进剧本,以拉近剧作与观众的距离。《春闺风月》里,编剧王兆墀加进了许多现代生活的例子,“例如二加二等于五,杨梅冰淇淋,桃拉塞拉摩之类”^⑩,桃拉塞拉摩即为当时的国际影星。话剧剧场作为传输新型价值的空间,折射了人们对于都市、现代生活的理解与想象。

结 语

对于海派话剧的大众文化生产,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商业化、娱乐化的特征,更要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大环境来看待。“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城市文学不能算作主流,都市文学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将观察话剧的目光从传统的立场转向“市民观众”的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以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的视角考察海派话剧,揭示商业、都市对文学的渗透以

及都市文学呈现的特色,可以为话剧史发展经验提供有益的补充。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视多元、立体的都市文学景观,而且能够发现市民通俗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多重脉络。对于文学和商业的关系,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划分阵营,下个对错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文学自身的生存环境,来理解文化市场、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生产场域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除了海派话剧,海派小说、海派散文、都市期刊也都是大众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它们与此前、此后文学史上的作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派话剧对于当今剧坛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海派话剧”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产生的带有商业性的、以市民观念为主的通俗大众剧。“海派话剧”的说法由来已久,最常见的理解是泛指在上海演出的所有海味话剧,包括当今正在上海演出的海味话剧。这成了一个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现象。而实际上,先厘清现代文学中的“海派话剧”,然后再用历史的眼光来打量今日上海话剧的情况,才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态度。详情可参看尹诗的文章《文明戏改良和海派话剧的产生》与《1940年代海派话剧的璀璨绽放》,分别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第12期。②⑥参见雷诺:《剧坛秘话》,《太平洋周报》1943年第55期。③参见慧星、王林:《剧坛崩溃的秘密:蓬勃也,衰落也》,《剧艺》1944年9月4日第4期。④参见重逢:《费穆的梅花梦》,《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23期。⑤参见洛西:《上海各剧团经营内幕》,《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44期。⑦参见《申

报》1942—1944年的部分话剧广告。⑧参见万里浪:《剧评及其他》,《剧艺》1944年第1卷第2期。⑨参见王希尧:《浮生六记观感》,《太平》1943年第2卷第12期。⑩参见春理:《观“春闺风月”》,《中华周报》1943年第32期。

参考文献

- [1]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M]//徐俊西,杨扬.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43 茅盾卷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994.
- [2]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15.
- [3] 吴福辉.游走双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96.
- [4]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82.
- [5] 马俊山.论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以“演剧职业化”运动为支点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1):114-123.
- [6]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7] 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9.
- [8] 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7.
- [9] 王一川.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0.
- [10]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80.
- [11] 邵迎建.当我们年轻时:抗战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
- [12] 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35-136.

The Picture of Shanghai Style Dr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ulture

Yin Shi

Abstract: The mass culture environment gradually took shape in Shanghai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der its influence, Shanghai style drama was characterized with popular culture such as star system and trend, which contained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e for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drama,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Shanghai style drama promot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olk culture and drama art with the adherence of the people. The upsurge of historical drama made the theater a unique space to convey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the people against the enemy. Shanghai style drama 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appearance compatibl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rt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improvement. Drama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eisure and popular fashion of urban life. Mass culture promote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modern character of citizens, and wa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urban literature.

Key words: mass culture; Shanghai style drama; citize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绿 叶

试析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阮梅

摘要: 吴冠中和朱德群是我国油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领导人物,他们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实现了东方山水意趣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巧妙融合。他们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水精神。吴冠中强调写生的实景画面构图与山水油画的诗意表现,善于运用圆点作画的表现形式,在对景色画面的组合和突破中,通过静态的诗意境界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在含义,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精神意境表达。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意蕴和精神的自我感悟,追求神似的抽象表现形式,以大小不同的色块点作为构图要素,通过抽象的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身对自然山水法则的体察和想象,在朦胧和抽象的画面中展现山水精神和景色气韵,在对山水精神的表现中透露出浓厚的东方审美意蕴。

关键词: 山水精神;油画;吴冠中;朱德群

中图分类号: J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8-0160-05

近代以来,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在中国山水油画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艺术家努力将传统山水国画与西方油画表现形式相结合,探索油画与传统山水精神的融合,吴冠中和朱德群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在油画艺术创作的技法和理念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将山水精神和传统文化融于油画创作中,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水精神^[1]。因此,以山水精神为切入点,探讨吴冠中和朱德群油画创作的艺术特色,分析二人油画创作中山水精神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油画艺术的发展进行深入的反思,对于新时代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绘画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水精神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山水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融合了中国儒家、道家、佛教禅宗

等多家哲学理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情,在与大自然斗争和共处的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建立起深层的精神联系,饱含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2]。孔子将山水“比德”,通过拟人化的方式将山水与人的感情相结合,赋予自然山水深厚的内在含义,将自然山水作为理想人格品质和情怀的载体。庄子将自然山水与人类的思维相结合,表达对理想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思想境界。从本质上讲,山水精神是一种虚无的精神概念,“虽然有丰富的内涵,但没有形象去承载,总会给人一种抽象虚空、无法捉摸的印象,而山水作为具体的形态,需要被赋予精神的内涵,自魏晋以后‘山水精神’通过山水画论以及山水画体现出来”^{[3]8}。

中国古代画家将山水精神与绘画创作相结合,以绘画作为艺术载体,通过艺术语言将山水精神表达出来,利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用色、构图、笔墨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气韵和意境。古代画家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游历和观察,将自然山水

收稿日期:2023-05-20

作者简介:阮梅,女,美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三级美术师(北京 100029)。

的景色进行艺术创造,将山水精神与自我情感相联系,把山水精神和山水景色作为情感依托,并用绘画的语言形式展现出来。随着时代绘画艺术特点的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家在表达自然山水时,虽然采用不同的绘画语言进行呈现,但都追求对山水精神的内涵表达,强调山水景色与精神的形神兼具^[4]。中国传统绘画强调以山水精神为主体的自由联想,注重山水本体带来的自然主观感受,同时强调山水精神与笔墨情趣的深度结合,通过不同的笔墨和绘画表现形式传达内在的山水精神。

近代油画艺术形式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山水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西方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的引入,也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体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中寄情山水的山水画走向了转型之路,许多山水画家在坚持传统山水画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强调对西方绘画思想和精华的吸收,寻求中国山水画与西方油画绘画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林风眠、刘海粟等诸多画家在油画作品中融入传统山水精神,将西方油画表现形式与中国国画的背景、构图等技巧相结合,推动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在西方油画表现形式中的现代转型,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油画表现手法和绘画风格,为推动中国特色油画绘画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5]。

二、山水精神与吴冠中、朱德群 油画创作的渊源

吴冠中出生于农村家庭,出于报效祖国的期望和自我谋生的需求,他承载着家庭的期盼进入浙江大学电机科学习。在暑假期间,吴冠中受到朱德群的邀请,参观了朱德群就读的杭州艺专。在此次参观中,吴冠中被杭州艺专浓厚的艺术氛围所感染,深深震撼于艺术之美。此后,吴冠中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艺术学习的道路。朱德群出生于医学世家,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他在幼年时期就接触了许多传统名画真迹,在父亲的引导和讲解下开始进行绘画练习。这些艺术实践与艺术素养为其未来的艺术发展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审美基础。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杭州艺专求学的过程中,受到校长林风眠的深刻影响。在杭州艺专中西艺术融合的学习氛围下,二人接受了吴大羽、潘天寿等艺术家的中西绘画技法的教学。在此背景下,二人开始探索传统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思想的结合创新之

路。后来,吴冠中去往巴黎留学,受到苏弗尔皮教授的艺术影响。苏弗尔皮教授注重对艺术对象灵魂的捕捉,强调对创作者主观感知的刻画,在造型、色彩等方面启发了吴冠中的艺术创作,帮助吴冠中建立对西方艺术的基础性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吴冠中后来的绘画创作和艺术发展^[6]。而同期朱德群也来到巴黎,进行人体速写学习。他受到马蒂斯绘画技巧和风格的影响,注重对线条的运用和把控。后期他在斯塔埃尔画展中认识到了抽象绘画在情感表达中的作用,受到斯塔埃尔抽象化风格的影响,走向中国写意绘画与西方抽象画作的融合。此外,朱德群还学习了伦勃朗的光影运用手法,将光影明暗的变化处理引入自己的绘画创作中。

学成归国后,吴冠中进入中国美院任教,他致力于将西方艺术与中国绘画相结合,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和经验融入教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对西方艺术的排斥,吴冠中的这一艺术尝试进展得并不顺利。他开始转向风景画创作,坚持探索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艺术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寻求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发展。他在油画创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以中国传统国画为基础,将国画的构图和笔墨应用在其风景油画的创作中,并通过水墨画感悟中国传统国画的水墨底蕴^[7]。与吴冠中类似,朱德群在油画创作过程中也尝试通过水墨画来感悟中国传统笔墨的创作技巧和精神,并将其应用在自身的油画创作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朱德群的油画作品中已经体现出浓厚的中国山水文化的底蕴,他的笔墨运用、色彩搭配和构图留白中,都透露出中国传统国画的风格。

尽管吴冠中与朱德群二人的生活 and 创作背景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选择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作为艺术发展的养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和笔墨技巧,始终坚持将中国传统国画与西方油画形式相结合,山水精神成为其油画创作一致的精神追求。

三、山水精神在吴冠中与朱德群 油画创作中的不同体现

吴冠中与朱德群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将山水精神和传统文化融于油画创作中,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水精神。山水精神在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创作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吴冠中将写生手法与油画创作相结合,追求山

水油画的半抽象形式,强调油画艺术的视觉张力美和中国传统山水意蕴美的结合,利用油画的形式美和表现力创作出具有东方意境和特色的山水油画。吴冠中强调利用油画的视觉形式展现山水景色和精神,在构图和布局上,其早期作品受到北宋郭熙“三远”画法的影响,多通过仰视的画面视角表现出山水景色层层叠叠的深远崇高之意,通过平远的绘画视角体现山水的缥缈意境。吴冠中将山水油画创作与现实写生相结合,通过写生式的山水景色描绘展现画面的幽深意境。他常常通过平原的全景山水构图对山前山后的不同景色进行重组创作,利用主观创作将山水景色画面进行拆解和组合,从而构建出内涵丰富、视野开阔的全景式山水油画。在山水油画布局中,吴冠中强调写生的实景画面构图,注重对山水景色真实形式美的展示。

相较于吴冠中的写生式绘画,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意蕴和精神的表达,追求神似的抽象表现形式,将记忆中的山水景色与自我情感和山水精神相结合,将水墨式的国画笔墨表现形式与油画丰富的绘画色彩相结合,形成色彩浓厚的东方特色山水油画^[8]。虽然朱德群在油画构图上也吸收了郭熙的“三远”画法,但他更加强调画面的整体和谐和意境美。朱德群在山水油画创作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思想,以传统山水国画的布局和构图方式展现自然山水景色的朦胧特点和精神,体现出了浓厚的东方审美情怀。相较于吴冠中的宛如身临其境的油画表现形式,朱德群更强调以油画画面展现山水景色的朦胧之感,强调对山水精神和景色气韵的展现。

2. 笔墨形式与色彩运用上的差异

笔墨手法和线条的应用是绘画创作的重要技法,吴冠中和朱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点与线的组合技巧与油画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了带有独特中国意味的油画笔墨形式,利用点与线、点与面的虚实结合体现画面与色彩下的山水精神,利用不同的笔墨表现形式展现山水油画的韵律美^[9]。在绘画创作中,吴冠中更善于用圆点的具体表现形式建构画作的场景画面,通过以点作画的方式将中国传统书法和山水画的笔墨意味与西方油画相结合,体现山水景色下的山水精神。他通过深浅不一、疏密有致的圆点,构成油画画面的层次空间,增强画面的丰富感和灵动感。丰富的色彩表达是油画视觉表现的特色,吴冠中在色彩应用上更偏向于采用朴素的水墨色作为画面主要色调,通过沉静的黑白色调展

现山水景色的幽深重远之意。吴冠中采用黑白灰为主色调的传统山水画水墨绘画方式,利用深层的水墨色增强画面的平稳感,并辅以红、黄等鲜艳色调的点缀,增强画面的灵动之意。

在笔墨运用上,朱德群与吴冠中均喜欢采用点的绘画组合,营造不同的山水油画视觉景象,但是朱德群通常采用大小不同的色块点作为画面构图要素,通过色块的疏密安排表现山水景色的不同特征。他通过大小和长短不一的色块增强画面的动感和形态美,将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轻重和方圆变化与油画创作相结合,在山水精神的表现中透露出了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书法意蕴。在色彩运用上,不同于吴冠中的水墨色调,朱德群更倾向于采用鲜艳的油画色彩进行画面铺染,并结合水墨色的背景渲染,营造出一种混沌融合的绘画美感。

3. 作品气韵和意境上的差异

气韵是山水油画创作中山水精神的艺术展示,中国传统山水画强调气韵生动,通过创作者的不同展现表达出艺术画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内在气韵。气韵和意境的生动刻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有特色,是西方油画所不具备的内在深层表达。吴冠中和朱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利用油画的表现形式,展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内在精神特征,将油画的丰富外在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内在气韵和意境相结合,在油画表现技巧中融入对山水精神的气韵和意境把握。吴冠中强调通过写生的表现手法,将大自然山水景色的生命力用油画的形式美展现出来,通过油画的笔墨和色彩组合表达自然山水的气韵和内在精神。吴冠中在对山水景色特点的刻画中,强调对山水精神的主观感受,在山水特点的真切描画中,融合自身对自然山水背后内在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强调将自身的情感体悟和山水精神融入在山水油画的形式美感中。

意境是绘画创作中创作者个人情感与绘画形式的审美结合,山水油画中山水精神的体现就在于不同绘画技巧和方法下,创作者对山水精神意境的感悟和转化。吴冠中在山水油画创作中强调对意境的探索,他将自然山水的写实形式与自然山水美感相结合,以山水油画的意境为导向,通过对景色画面的组合和突破,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精神意境表达。在意境表现上,吴冠中强调山水油画的诗意表现,通过静态的诗意境界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在含义。

从山水气韵的表现上看,朱德群借鉴西方油画

对光色的技巧应用,通过画面中色彩和光影的调和,展现山水景色的气韵和神采。朱德群强调山水油画的抽象表现形式,利用色彩和光影的若有若无展现山水景色的内在生命力,将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调和与山水油画的光影变幻相结合,通过明亮与阴暗的光影变幻增强山水油画画面的生机,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生命力。相较于吴冠中的写实绘画,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景色的自我感悟,通过抽象的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身对自然山水法则的体察和想象,在朦胧和抽象的画面中融合山水精神和自然生命的律动美。

朱德群强调山水油画创作的诗词意境表现,将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美与山水油画相结合。他从中国传统诗词中汲取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的意境之美融入油画创作的笔墨变化中,利用抽象的西方油画表现形式,展示中国山水精神和传统诗词中的深层意境,透露出浓厚的山水诗意之美。朱德群将西方油画浪漫奔放的抽象表现形式,与诗意的山水风景相结合,在固化的绘画规则之外探索自由的山水意境表现。与吴冠中的静态诗意美不同,朱德群更强调利用洒脱的动态笔法表现山水景色的特点,通过写意的笔触描绘自身对山水精神的感悟,将山水精神的诗意境界与油画创作相结合。

四、吴冠中与朱德群山水油画创作对当代油画艺术的启示

吴冠中和朱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实现了东方山水意趣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巧妙融合,开启了融合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油画艺术新征程。他们“以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为根基,借助西方绘画形式与油画的精湛技巧去表达自己内心感受”^{[4]38}，“用油画作为载体去弘扬中国传统‘山水精神’,在保持油画特有的视觉张力下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味道的油画作品”^{[4]38}。吴冠中与朱德群在山水油画创作中的艺术探索对新时代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1. 油画艺术创作需要与自然山水相结合

自然山水景色和精神与绘画创作的有机融合,是吴冠中和朱德群的共同追求。他们强调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中的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们以自然山水景色为创作对象,将山水精神融入艺术创作,强调以自然和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追求道法自然,提取自然山水景色作为油画创

作的素材,利用油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吴冠中和朱德群的油画作品都是在他们观察和体悟自然风光之后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他们以道法自然为导向,抓住山水景色背后的深层内涵和精神追求,将油画艺术创作与精神情感相结合,实现创作艺术内涵的升华。山水油画的创作不是对自然景色的简单直接描绘,而是创作者在对自然景物进行观察和感悟后,将自然景物与内心情感相融合,实现油画创作与自然素材的天人合一。油画艺术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创作者的绘画技法和内在精神统一的基础上,强调客观事物描绘和主观情感处理的平衡,抓住所描绘对象的本质特征,并通过创作者的艺术渲染呈现在绘画作品中。

2. 油画艺术发展需要交流与融合

中国油画艺术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油画艺术家不断尝试将西方写实性和表现性的油画创作方式与中国以写意为主的传统绘画相结合,在油画艺术语言中不断融入传统文化和民族色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体系。山水油画是中国写意绘画艺术与西方油画特点相结合的重要载体,继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的内涵和本质,吸纳了传统山水国画的写意表现方式,在传统艺术文化的根基上引入西方油画艺术的表现技巧和理念,是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的典型实践。在吴冠中和朱德群的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织和融合。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山水油画的创作过程中,将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在油画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引入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山水风貌和内在精神,是中西方文化在油画艺术形式上的融合实践。在未来的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艺术家应该借鉴吴冠中和朱德群山水油画创作的思想理念,充分运用西方油画的绘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精神和艺术理念,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为根基的油画体系。

3. 油画艺术需要坚持本土化、民族化发展方向

吴冠中和朱德群的山水油画融合了西方油画形式和中国传统山水精神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绘画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现代中国油画风格。他们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与油画相结合,推动油画民族化的发展,形成中国式的油画绘画语言,在中国油画发展和开拓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尝试和突破。他们以深厚的民族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感悟进行油画创

作,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提取和改造,融合自身情感和体悟,实现对山水精神的内化吸收和外放创作。

他们在油画创作过程中,以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和精神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底蕴,吸纳西方艺术文化的精髓,不断以时代为背景进行创新和开拓,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油画风格。中国油画艺术的未来发展也应该坚持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道路,在坚持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艺术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油画艺术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结 语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油画艺术创作中,以自然山水景物为艺术创作对象,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与西方油画形式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油画作品。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学习经历使得二人的山水油画在形式、手法和内在气韵等方面存在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他们都将中西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油画民族化发展作为自己的创作和探索方向,在中国油画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上存在一致性。当代中国的油画艺术也应该抓住传统

山水精神的内涵,强调描绘对象外在特质与内在精神的协调统一,不断融合中西优秀艺术思想和技巧,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和民族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胡明强.吴冠中油画的民族化探索:献给吴冠中先生诞辰百年[J].美术,2019(11):64-70.
- [2]蔡劲松.中国山水画及山水精神的哲学阐发[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8-83.
- [3]周昱杉.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创作中“山水精神”的差异体现[D].延吉: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22.
- [4]任济东.中国油画风景“民族化”的根基和探索方向[J].美术观察,2015(7):86-87.
- [5]武定宇,姚珊珊,苏典娜.不止是山水:当代山水精神的传承与创新[J].美术观察,2019(12):55-58.
- [6]王伟欣.自由与解放:波洛克与吴冠中作品溯源及比较[J].美苑,2021(1):24-26.
- [7]张熙.笔墨为何等于零:从语境研究视角浅析吴冠中的笔墨观[J].美术,2020(7):136-137.
- [8]李新昌.流散画家浅议:以朱德群、赵无极为例[J].文艺争鸣,2016(9):201-204.
- [9]汪臻.艺术地理学视阈下的江南绘画审美形态之源[J].学术界,2020(7):154-159.

Study on the Spiri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the Oil Paintings of Wu Guanzhong and Chu Teh-chun

Ruan Mei

Abstract: Wu Guanzhong and Chu Teh-chun were important lead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il painting art in China. They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spirit of China into oil painting creation, realizing the ingenious integration of Oriental admiration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western painting art. They took natural landscape as their creative source, and conveyed the consistent spirit of landscape in different artistic expressions. Wu Guanzhong emphasize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eal-life picture of sketch and the poetic expression of landscape oil painting, and was good at using dots to paint. In the combin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landscape pictures, he showed the inner meaning of Chinese landscape spirit through the static poetic realm, forming a unique expression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andscape spirit. Chu Teh-chun put more emphasis on his self-perception of the meaning and spiri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pursued an abstract form of expression, taking color blocks of different sizes as composition elements, expressing his own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laws of natural mountains and rivers through abstract painting art forms, showing the spiri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 charm of scenery in hazy and abstract pictures, and revealing a strong oriental aesthetic implic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piri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oil painting; Wu Guanzhong; Chu Teh-chun

责任编辑:绿叶

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价值、指标及流程

刘永红

摘要：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有利于提高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塑造与维护学术出版机构的品牌，打造学术出版强国。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建设，包括制定选题评审指标和规范选题论证流程。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指标应该紧紧围绕意识形态阵地要求、产业属性以及学术属性来进行设计，主要包括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学术含金量、作者学术背景以及出版效益。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论证流程是选题论证主体按照选题评审指标对选题进行评审与论证的程序。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选题机制的重要价值，严格按照选题评审指标做好选题评审工作，严格遵守选题论证流程规范，才能实现学术著作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

关键词：学术著作；学术出版；选题机制；选题评审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165-06

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通常是指学术著作出版机构对学术著作选题进行评审的指标与流程等一系列制度与规范。“编辑出版大计在选题。因为任何出版物的面世过程，当作一年四季来看，选题就是播种培育的春季，随后便是夏耘、秋收和入冬的销售了。”^[1]选题工作规定了编辑工作的内容，是通往内容行业的方向；编辑工作是对选题工作的落实，是通往内容行业的手段。选题与选题工作的重要性，注定了选题机制的重要性。本文拟从价值、指标以及流程几个方面，谈谈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

一、学术著作出版选题机制的价值

学术著作出版选题机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高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行业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与完备的选题评审机制，由于能够集中反映出出版行业、学术共同体以及广大读者的需求，它实质上成为

学术著作稿件优劣的评判标准。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就是采用这套选题评审机制对学术著作选题进行审核、把关以及优化，经过层层筛选后的学术著作选题才可以列入正式出版计划。对于学术著作出版而言，选题机制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学术期刊中的审稿环节。学术期刊中的审稿环节需要对学术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审核与把关，遴选出优秀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也需要对学术著作稿件的内容质量进行审核与把关，从而遴选出优秀的学术著作稿件。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是出版机构对学术著作稿件在正式出版前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内容评价，其初衷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学术著作稿件的内容质量与学术水平。实行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选题机制，等于提高了学术著作出版的门槛，可以从根本上保障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唯有源源不断地推出质量上乘的优秀学术著作，才能形成学术著作出版的高原与高峰。

2. 塑造与维护学术出版机构的品牌

实行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机制，能够从

收稿日期：202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著作出版机制建设研究”（16BXW033）。

作者简介：刘永红，男，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北京 100706）。

根本上提高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通常,建立有一套高质量的选题机制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其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更加规范,出版的学术著作的质量一般较高。久久为功,这些学术出版机构就能成功塑造自己的学术出版品牌,也就能够吸引到高质量的书稿。知名度越大、权威度越高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往往对学术著作选题的评审标准更为严格,通常也会对科研工作者的学术成果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一些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的科研部门常常会对各级各类出版机构进行等级认定,据此给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学术著作划分相应的等级。对于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与学者来讲,这是一种良性互动,能够相互成就,实现双赢。

3. 打造学术出版强国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魏玉山指出,出版强国有许多的指标可以衡量,比如出版业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能力、满足人民学习阅读需求的能力、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等,其中出版产业的规模、竞争力等也是出版强国的核心指标^[2]。以此类推,学术出版强国的衡量指标,则应该突出体现在学术出版产业的规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高低、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强弱。

现代出版业的基本分类主要以出版业的功能为尺度。按照国际惯例,现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三大类型^[3]。中国人民大学周蔚华认为,对于出版业类型新的划分,当代中国出版业应扩充为五大板块,即主题出版、大型出版工程、教育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大众出版^[4]。无论是“三分说”,还是“五分说”,学术出版都是出版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出版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在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学术出版占整个出版的经济份额已超过30%^[5]。这充分体现了学术出版在出版业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

在学术出版强国建设过程中,高水平的学术内容是基础与根本,完备的出版传播组织与强大的出版传播能力是保障与支撑。完善的学术著作出版选题机制,有利于学术著作内容质量的提高。学术著作内容质量的提高,学术出版机构品牌的塑造与维护,将有助于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可持续性出版,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传播,让世界更好地知道“学术中的中国”,从而不断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与国际学术影响力,促进学术出版的繁荣,打造学术出版强国。

二、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指标

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指标设计,既要遵循出版业的普遍规定与通常做法,又要反映学术著作出版的独特功能、作用以及价值。出版业属于内容产业,内容属性决定了出版业必须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相关要求,产业属性决定了出版业需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规律。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指标,应该紧紧围绕意识形态阵地要求、产业属性以及学术属性来进行设计。

1. 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指的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政治内容及其发展目标,是政治立场、政治品质、政治信念等的综合表现。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我国出版事业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把准正确政治方向。作为学术著作出版的方向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政治方向是选题评审的首要问题。是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事关学术著作出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学术著作出版活动尤其需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政治导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此,在学术著作出版活动中,我们需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承担起出版工作者必须担当的政治责任,把准选题的政治方向。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意味着在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过程中,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既不能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或者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也不能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更不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简单对待学术问题。

2. 出版导向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出版导向。我国

《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这是我国对出版导向作出的总体要求。《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具体列举了出版物不得出现的十种内容,第二十六条具体列举了未成年人出版物不得出现的两种内容。这是我国以禁止性条款的形式对出版导向作出的限制性规定。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出版导向的内容被进一步丰富。

2018年12月31日,中宣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其中,第三条强调“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第七条强调“‘出版质量’指标主要考核图书出版单位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情况”,第十条规定“图书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我国对出版导向的管理不断加强。

学术著作出版作为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出版导向。坚持出版导向,反映到学术著作稿件方面,即是要求学术著作稿件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学术含金量

学术著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某一学科或某一知识领域较专门、较系统、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学术著作出版具有显著的学术性与专业性特点,集中体现了—个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以及精神向度。因此,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之下,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必须深入考察学术著作稿件的学术含金量。学术著作稿件的学术含金量,即学术著作的实际学术价值,是学术著作出版选题评审的重要指标之一。

学术著作出版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对学术的无比

敬畏与孜孜以求。出版业属于内容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应该做到宁缺毋滥,只有坚持学术著作稿件必须具有较高学术含金量的标准,我们才能将人类的优秀学术成果与智慧结晶遴选出来,通过倾力打造学术精品与传世力作,实现既有学术著作出版高原,又有学术著作出版高峰的学术著作出版壮观图景。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学术著作稿件来讲,唯有学术创新,才能提高学术含金量。学术含金量的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重点考察学术著作稿件的学术创新成果。中国科学院李醒民将学术创新视为学术的生命,认为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6]。从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方面来看,作为一项成就,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7]237},包括信念、价值、技巧等^{[7]174};作为共有的范例,范式也是规定未来做法的一种特殊方式^{[7]21},是公认的模型或模式^{[7]72}。可见,范式既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也是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研究方法则是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手段与途径。是否发明出新范式与新方法,对于任何—门学科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意味着随着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演进,人们对学科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方面来讲,主要看是否通过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实现了文化积累;是否通过科学实验得到了新的发明,阐明了新的科学道理,揭示了新的客观规律,或者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从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方面来讲,新材料和新证据,通常意味着学术新发现或者学术证伪。例如,对于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学科来讲,是否发掘出新的材料意义极其重大。

其二,全面考察学术著作稿件的成果来源及其获奖情况。从成果来源来看,主要考察成果是否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的阶段性或者最终研究成果,是否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出版项目,等等。从成果获奖情况来看,主要考察成

果是否获得国家级奖项与荣誉。一般来讲,如果学术著作稿件是重要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或者最终成果、重要基金项目入选者或者重大奖项获得者,由于已经经受了国家相关部门最为严格的检验,其学术含金量通常比较高。

4. 作者学术背景

作者学术背景包括作者的教育经历、知识结构、行业经历以及学术影响力,这四个方面与作者学术水平息息相关,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作者本人及其学术水平,是选题评审的重要内容,对选题评审往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学术背景通常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衡量。

其一,教育背景。教育背景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能力。教育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层次,也称为培养层次。教育层次指的是受教育后拿到的学历的层次,通常包括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等层次。其中,研究生培养层次又分为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有些学科专业的研究生层次,还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不同的培养层次。二是毕业院校类型。我国的高校通常分为“双一流”建设院校、985院校、211院校、省重点高校、普通本科、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等多种类型。总体上来看,不同的教育层次和毕业院校类型,通常会对受教育者有着不同的培养要求,尤其是在学术研究能力训练与学术研究规范培养方面。

其二,学科背景。学科背景反映了受教育者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良好的学科背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对口。所谓“术业有专攻”,学术作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者通常应当是受过相关学科教育、具备一定学术素养的专业人士。因此,学术著作选题的作者应该具有对口的专业背景。专业背景不对口,容易出现“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二是研究方向对口。随着学科的细分化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化开展,即使是同一个学科专业,也会细分为多个研究方向。越是成熟的学科,研究方向越细分化。因此,学术著作稿件作者还应该具有对口的研究方向。

其三,行业背景。行业背景体现了作者的从业经历与实践资历,行业经历越丰富,作者的体验与感触越深刻,学术研究往往更有的放矢,更加深入,对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越有利。良好的行业背景,既要看法行业经历的丰富性,更要看法作者的专业与行业是否对口。如果专业与行业对口,那么丰富的行业经历将会让作者的学术研究如虎添翼。

其四,学术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的专业水平与学术研究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掌握与充分了解该学者的学术地位。当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成果。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从学术论文来看,主要考察学者已经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收录情况以及被引次数等。就学者所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来看,主要是从量的角度来反映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情况。就期刊影响因子来看,主要是从质的角度来反映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期刊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反映的是学术期刊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计算方法通常是采用学术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当年的被引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可引论文数。就收录情况来看,主要统计学者的学术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CSCD(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以及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收录情况,反映的是对学者学术成果的高度认可。从被引次数来看,主要是统计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即学术论文发表后被其他学术论文引用的次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论文的学术贡献。从学术著作来看,主要考察学者已经出版的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情况,包括学界影响与获奖情况。学界影响和获奖情况能够集中反映学术同行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综合评价情况。二是学术成就。学术成就包括职称、学术称号以及所获奖项。关于职称,职称越高,通常代表着学者的研究资历、学术积淀以及实务经验相对来说更为丰富。关于学术称号,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万人计划”),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等。关于所获奖项,包括诺贝尔奖、美国计算机协会设立的图灵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持评定的菲尔茨奖、国际数学联合会的陈省身奖、世界文化理事会设立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等国际性奖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国内奖项。职称、学术称号以及所获奖项,通常源于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努力拼搏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集中体现了学者的研究资历与专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职称、学术称号以及所获奖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并

判断作者在相应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需要注意的是,当学术著作稿件与作者擅长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关联度时,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对我们判断学者的学术水平、衡量学术著作稿件的学术质量将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5. 出版效益

学术著作稿件的出版效益主要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们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学术著作稿件的社会效益,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一是能否促进学科发展与学术交流。学术著作稿件应该加大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力度,紧密跟踪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与前瞻话题探讨,及时推动相关学科最新研究动态与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能否推动行业发展与行业进步。学术著作来源于行业实践,反映行业的现实需求,也必须在行业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与发展。三是能否服务国家战略与国家中心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8]。学术著作出版应该切实发挥服务国家战略与国家中心工作的作用。

学术著作稿件的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市场销售来实现。一般来讲,学术著作稿件的专业性通常较强,对读者具有专业知识方面的特殊要求,因而,受众群体相对较小,市场销售量普遍偏小,经济效益通常不太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出版补贴资助对于学术著作稿件的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论证流程

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论证流程是选题论证主体按照选题评审指标对选题进行评审与论证的程序。选题评审指标前面已经论述过,此处仅对选题论证主体进行叙述。

选题论证主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初审、二审、三审、编委会人员评审以及终审人员等。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通常也采取分级论证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初审、二审、三审、编委会人员评审以及终审等多个层级的选题论证。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采取分级论证原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兼顾初审、二审、三审、编委会人员评审以及终审人员等的不同

考虑点与关注的侧重点,能够从最大程度上保证选题评审程序的规范性,保证选题评审结果的科学性。二是专家学者。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评审通常采取专家评审的形式。学术著作选题评审坚持专家评审原则,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评审专家的把关作用。在学术著作出版实践中,选题评审通常是由各个出版机构的选题论证委员会来完成的。选题论证委员会人员通常来自出版机构各层面、各部门、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这套传统的选题论证制度多年来一直有效地发挥着选题评审的重要作用。随着出版业编辑学者化的进程,选题论证委员会中不乏大量的学者型编辑、专家型编辑,对于知名学者专家的学术著作稿件以及非知名学者专家的优秀学术著作稿件,能够很好地发挥着专家评审的作用。当然,对于那些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著作稿件进行选题评审,出版机构也可以邀请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宽广的学术情怀的同行专家学者担任评审专家,严格评审学术同行的学术成果。

不同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其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论证流程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别,但是,总体来看,选题论证流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初审人员根据选题评审指标体系对学术著作出版的选题进行严格的初步评审,作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初步判断。作出通过判断的选题需要认真填写好选题申报表,通过选题申报系统提交给二审人员进行复审。初审人员通常为责任编辑。

第二步:二审人员需要对初审人员提交的选题申报表进行综合评价,作出不通过、退回修改或者通过的决定。退回修改的选题需要初审人员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再次提交。二审人员同意通过的选题,需要填写二审意见,并且将会通过选题申报系统进一步提交给三审人员进行三审。如果二审人员对选题存疑,也可以召开编辑室会议讨论。一般来讲,二审人员通常为具有复审权的相关人员。

第三步:三审人员审核、评价由二审人员提交过来的选题,作出不通过、退回修改或者通过的决定。退回修改的选题,既可以直接退回二审人员修改二审意见后再次提交,也可以直接退回初审人员修改完善后再次提交。三审人员同意通过的选题,将会再进一步发送给编委会全体成员进行匿名评审。三审人员通常为出版机构具有三审权的有关人员。

第四步:编委会全体成员需要定期对从选题系统发送过来的选题进行认真评审,通过选题系统进

行在线匿名投票。合格的选题必须达到一定比例的票数。没有达到合格比例票数的选题,将需要在下一次选题论证会召开的时候,由全体编委们充分讨论是否应该通过评审。经编委们充分讨论通过评审的选题和编委们全体成员匿名投票达到一定比例票数的选题,将会自动提交给终审人员来确认是否最终通过选题评审,终审人员可以选择通过,也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终审人员作出通过决定的选题,可以正式列入出版计划。当然,也有一些出版机构可能由于选题论证传统的原因,或者ERP信息化程度不够、尚没有编委会对选题进行在线匿名投票的功能,采取了直接在选题论证会上对选题进行充分讨论,决定是否通过评审的做法。

第五步:对于那些在编委会成员在线匿名投票环节淘汰或者选题论证会环节被否定的选题,如果初审人员坚持选题非常有意义,应该允许初审人员提出选题申诉。毕竟,初审人员非常了解选题,选题的一些重要信息可能无法通过选题单全面呈现出来,再加上出版政策的调整或者出版市场的动态发展,一些选题的出版价值发生了巨大的正向改变。在选题论证会召开的时候,可以给予初审人员申诉的机会,现场的编委们再次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评审;也可以专门组成一个选题应诉小组,由相关人员或者专家学者做成员,给予初审人员申诉机会,现场的评委们再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评审。申诉成功的选题,同样需要提交给终审人员来确认是否最终通过选题评审,终审人员作出通过决定的选题,可以正式列入出版计划。

第六步:正式列入出版计划的学术著作选题,如

果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还必须在出版前做好重大选题备案工作。我国《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第三条详细规定了当前需要进行重大选题备案的十二个方面。因此,如果学术著作选题属于上述范围的,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履行重大选题备案手续。

学术著作出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9]。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选题机制的重要价值,严格按照选题评审指标做好选题评审工作,严格遵守选题论证流程规范,实现学术著作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贡献中国式学术著作出版现代化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戴文葆.选题策划是创造性思维活动[M]//赵航.选题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序言1.
- [2]魏玉山.产业强是出版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J].出版发行研究,2023(1):1.
- [3]程三国.理解现代出版业[N].中国图书商报,2002-10-11(1).
- [4]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J].出版发行研究,2020(1):5-15.
- [5]郭书林.加强学术出版 打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识根基[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08-16(1).
- [6]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N].光明日报,2005-11-01(5).
- [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译精装版[M].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5-19(1).
- [9]刘永红.中国学术著作出版高质量发展:逻辑与进路[J].现代出版,2020(6):21-28.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Value, Index and Process

Liu Yonghong

Abstract: The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ntent quality of academic works, shaping and maintaining the brand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building a strong academic publishing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pic selection evaluation index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opic selection for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should be designed closely around ideological requirements, industrial attributes, and academic attributes, mainly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publishing orientation, academic value, author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publishing efficiency. The process of topic selection and argumentation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subject of the topic selection argumentation evaluates and argues the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topic selection evaluation index. In the new era, we must recognize deeply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e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follow strictly the topic selection evaluation index to do a good job of topic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adhere strictly to the standard of topic selection argument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and serve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power better.

Key words: academic works; academic publishing;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 topic selection argumentation

责任编辑:沐紫

“可视化+出版”：数智时代学术出版发展的新模式

张诗瑶 沈阳

摘要：可视化作为数智时代的技术实现方式，可以为学术出版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赋能。可视化不仅催生了学术出版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趋势，还可以为学术出版的信任建构提供复证基础。同时，作为一种“元语言”，可视化技术促进了学术出版领域的学科融合，避免“学术孤岛”的现象。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可以将可视化技术应用于学术出版领域，采用“可视化+出版”的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像素化”学术出版形态、“社交化”学术出版生态以及“平台化”学术出版业态。

关键词：数智时代；深度融合；学术出版；可视化出版；知识像素化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8-0171-06

随着传播技术与视觉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倾向于高度视觉化，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正在从文字形式转向图像文化，这引发对于“读图”和“知识视觉表征”的内在需求。这种转变给学术出版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学术出版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传统学术出版面临的困境

学术出版是指对学术作品进行评审、选择、编辑加工、印刷复制等专业出版活动，并将其传播给同行和公众的行为^[1]。它是学术奖励制度所依赖的主要评价和认证机制，是学者和研究人员分享和发表其研究成果的过程和手段。学术出版能够反映特定领域最前沿的理论观点、实验发现和实践创新。学术出版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2]。我们在探讨可视化技术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时，需要研究传统学术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以突出可视化出版的优势，并进一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 学术出版生产中的信任危机

学术出版的信任问题分别表现在出版前、出版中以及出版后三个阶段，涉及作者研究中的诚信危机、同行评议中的权威危机以及学术评价与成果互证的公信力危机^[2]。出版前的信任问题集中体现在由作者失范行为导致的诚信危机。近年来，学术失范行为频现，引发公众对学术圈的关注与担忧。不少期刊曝光了由学术不端导致的论文撤稿事件，这对学术出版的信任造成了冲击。同时，随着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对学术创作版权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加。Retraction Watch 和 Pub Peer 是专门发布撤销论文的网站，旨在跟踪和暴露科学研究的问题。2000 年至 2018 年，共有 9314 篇学术文章被撤稿，2015 年以来，被撤稿的论文数量稳定在每年 300—400 篇左右。撤稿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一稿多投、数据错误、捏造数据、虚假同行评议等，这些行为都为学术界所不容。此类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有时会呈现为抄袭、一稿多投等显性问题，有时体现在篡改数据、选择性引用等诸多隐性的“灰色地带”，后者使得学术不端行为更难以查实。

收稿日期：2023-04-10

作者简介：张诗瑶，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0）。沈阳，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当前对于学术信任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事后的应对与惩罚,忽略学术出版的内容变革这一更为本质的因素,对预防与把关的讨论甚少。为了有效地治理各类学术不端现象,当前国内的研究分别从责任编辑的审核、区块链技术^[3]等角度提出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策略。国内各大数据库纷纷推出各自的论文查重检测系统,在为编辑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不端行为起到了震慑与遏制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有不可避免的机械性。

在学术出版领域,“把关”环节包括对学术论文的审查、评估和验证,以确保其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合法性。其目标是确保学术品质和促进学术创新和进步。同时,它还致力于规范学术行为,例如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诚信等。因此,这一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在讨论学术出版信任问题时,应将焦点从“应对与惩罚”转向“预防与审查”,建立有效的学术信任机制。

(二) 学术出版合作中的专业壁垒

学术出版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为科研人员提供多种学科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高效的间接对话模式促进交流。然而,目前不同学术领域之间以及学术与非学术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壁垒。学科间存在着抽象、晦涩的跨专业符号和语言,人为地构建了学科之间的隔阂。这不免使编辑产生隔行如隔山之感,同时也使论文的可读性不强,从而导致信息传递失效^[4]。有学者指出,学术出版本质上具有天然的“高冷气质”和“象牙塔属性”^[5]。笔者认为学术出版中不同专业和学科间的界限与壁垒的产生是结构性的,并不认同学术出版不面向大众、不用考虑对大众的传播效果之类的受众定位。学术出版应该寻求方法来打破学科之间的隔阂,促进其交流与传播。

科研人员发表成果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获利,而是希望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同时,他们也渴望获取同行和非同行的意见,以深化自己的研究。随着科研领域的不断拓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导致不同学科在解决问题时面临新的困境和机遇。在这种情境下,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变得至关重要,多学科的合作变得必不可少,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在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跨学科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打破学科间的专业壁垒,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 and 对话。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是一种

跨学科知识的传递和共享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不同学科之间可以展开学术对话,实现相互融合,促进学术创新,打破“学科孤岛”。

二、可视化技术： 一种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可视化作为数智时代的一种技术实现方式,在破解学术出版困境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可视化”一词源于英文“visualization”,在学术出版中,“可视化”最基本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内容转化为可见形式^[6]。可视化技术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将阅读从简单的浏览行为转变为涵盖多种感官交互的视听活动,将现代技术与出版业相结合。因此,“可视化出版”是指利用一系列图示技术来构建和传达复杂知识的图解手段。它通过视觉表征的方式,赋予传统的“白纸黑字”可见和具象的形式,使抽象的知识和思维可视化,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可视化出版强调生产过程中的可视化表达,增强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为知识获取提供更多可能性。知识图谱、思维导图等形式都是可视化出版的技术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可视化只是一种策略和出版技术手段,并非只强调视觉、排斥语言,它是学术出版的一种新型陈述方式。

(一) 信任构建:可视化技术作为一种复证基础

传统学术出版领域面临信任危机,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学术成果以静态的文字形式呈现,导致无法重新验证和获取某些过程性的信息,进而引发对其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思考如何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传统学术出版中隐蔽的研究过程外显化,以促进外部对其进行监督。

可视化技术中图像的过程性与数据的透明性为解决学术出版的复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数据出版能够有效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当内部监督机制无效或不完善时,数据出版提供了一种新的外部监督机制^[7]。通过可视化技术,研究人员、科研管理部门、研究资助者和出版商可以记录每一次实验步骤,并向学者公开实验过程和每个阶段的实验结果,确保记录的可复现性。这种技术为学术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可视化出版使学术出版从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从描述性向展示性过渡。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期刊已经开始可视化技术的实践和探索。例如,北京大学的可视化与可视分析研究组和《IEEE 可视化与计算机图形汇刊》,《柳叶

刀》和《自然》等期刊也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分享学术视频。通过这些案例实践,学术内容中隐藏的过程被外显化,促进了学术的可视化呈现。

(二) 学科融合:可视化技术作为一种“元语言”

学科融合基于对学科差异的充分认知,鼓励不同学科之间交互渗透和交叉活动,在当前学术和创新领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学科融合不仅为不同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員创造了跨界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为创新生态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动力,更为解决复杂难题、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在多学科交叉领域中,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然而,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演进脉络与关键节点并非易事,不同学科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独立的理论体系往往导致认知的排他性。为了实现交叉学科的协同创新,可以考虑引入可视化技术,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和优势互补。

视觉语言可以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或者通过视觉符号为学术出版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中性元语言。在学术出版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可视化技术的核心是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建立一个后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例如,Citespace的可视化技术在学科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可视化呈现方式不仅揭示了不同研究领域知识演化的关键路径,而且揭示出重要知识拐点,并通过可视化图谱探索领域的前沿和潜在动力机制^[8]。这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理解途径。

为了说明知识的存在地位,卡尔·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世界1是由物质客体、地球和宏观天体、植物、动物等构成的物质世界;世界2是由人的意识状态、心理认知、主观经验和情感等构成的主观世界;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包括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人类所创造的语言、科学技术等文化知识世界及机器、建筑等物化知识世界^[9]。它们具有独立自主性,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在学术出版领域,可视化的应用理念旨在通过第二世界的视觉思维方式,分析和加工第三世界的抽象信息与知识,从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三、“可视化+出版”:学术出版的未来趋势

在探讨学术出版的未来发展趋势中,笔者提出“可视化+出版”的概念,从学术出版的知识形态、学

术生态和出版业态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学术出版“形态-生态-业态”呈现三位一体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学术出版的综合体系。知识形态是学术出版的基础,学术生态提供了支持和发展的环境,出版业态则为知识的传播和商业化提供了平台和机制。它们相互作用,推动学术出版实现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笔者认为,当下学术出版的发展呈现出像素化、社交化和平台化三大趋势。

(一) 像素化:学术出版新形态

生产、传播与接受是学术出版的三个关键环节,这三个环节相互影响与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学术出版内容流通系统。在学术出版可视化过程中,像素化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像素化采用类似于像素点组成图像的方式,将复杂的知识内容分解为精细、离散的单元,使知识转化为更小、更可操作的部分。它的目的是提高学术出版中内容的可视化表达,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1. 生产环节:从结果到过程的显性表达

知识像素化在学术出版的生产环节具有重要作用。它将知识内容分解为更小的单元,使作者可以更清晰地呈现研究的步骤、方法和结果。这种转化使得知识更具有可视化特征,实现了从结果到过程的显性表达。

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10]。隐性知识是个体主观意义上的知识,具有无序、非线性和不规则等特点。由于其知识熵较高,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被具体化与共同化。知识像素化的引入可以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学术出版属于知识生产,具有缄默性和隐蔽性^[11]。学者的劳动实践往往难以被观察到,学术活动中的数据分析、算法操作常被描述为封闭的黑匣子。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指世界对人类来说,从一个充满迷魅和巫术的存在转变为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机制,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过程^[12]。学术出版也同样需要“祛魅”,即去除知识传播的神秘化和神圣化,让知识从神坛走下来。这一过程可以借助知识像素化技术实现。

2. 传播环节:从文字到图像的惯习转向

知识像素化通过运用交互式 and 多媒体技术,如可视化图谱、虚拟实境、动态模拟等,能够增强学术出版物的传播力。通过将知识内容分解为精细的单元,并结合图表、图像、动画等视觉表达手段,学术内容变得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读者可以通过视觉化

的形式更快速地获取信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此外,知识像素化还有助于提升学术出版物的吸引力和互动性。

可视化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利用视觉表达来传递知识,从而提高阅读效果。知识的传播与转移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涉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群体、组织之间的交流。可视化作为一个中介,不仅连接着思想,而且将知识共同体与非知识共同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可视化构建和传递的知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机构生产的系统性信息或精英观点,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性知识^[13]。可视化促进了跨界知识交流,使只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内容变得通俗化与大众化。

3.接受环节:从单向到互通的对话体验

接受活动是学术出版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学术出版内容需要通过接受环节进入社会,这赋予了学术生产以意义。另一方面,接受活动以再创造的方式参与学术生产,直接影响学术出版内容的现实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形成了生产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

知识像素化通过单元标识和关联建立,有助于构建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些关联可以是概念之间的关系、数据之间的关联等,使知识更具有结构性和逻辑性,进而可以促进学术出版中的合作、共享与对话。通过将知识分解为离散的单元,并将其与其他研究者的知识进行关联,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网络。这样的网络有助于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激发创新和跨学科的研究。

(二)社交化:学术出版新生态

现代学术出版的交互活动具有虚拟性、展示性、沉浸性与动态性等特征,通过多种感官的交互活动,使信息接收变得更加丰富^[11]。学术出版平台可以整合数字孪生技术,搭建开放的学术交互生态系统,促进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共同推动学术知识的进步和发展。数字孪生技术以其交互性与融合性为特点,突破了时空限制,精准地满足用户需求,通过打造虚实互通的沉浸式环境,使用户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来体验出版物所呈现的独特世界,获得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14]。

1.“文章+视频”:学术表达新方式

数字孪生技术是一种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相连接的技术,通过数字模型对真实对象或系统进行仿真和可视化呈现。在学术表达中,数字孪生技术

可以将学术文章与视频内容结合起来,为读者创造多维的学术体验。视频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被视为符号中的王冠。随着研究工作的复杂化,科研人员难以通过语言完整阐述其研究思路。数字孪生技术可以通过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之类的可视化表达方式展示复杂的研究过程、思路和应用效果,不仅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还可以提升研究工作的质量并使其透明化。现今许多期刊要求作者提交图像或视觉摘要作为文章的结尾图,要求以简洁、图形化和直观的方式总结文章的主要发现,这也为编辑、审稿人和读者快速了解论文思路和基本内容提供了重要途径。比如,作为全球首例实验视频期刊 JoVE,其中每篇文章都附有相应的视频,展示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过程与成果。2021年4月1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关于转录起始的视频研究论文。学术出版内容正在发生着从“结果化”到“过程化”的转变,这有利于促进跨学科研究,使学者能够还原学术过程,并受到外界对学术结果的监督。

学术视频的发展与短视频的流行趋势一致,短视频能够在短时间内传递丰富的信息。随着整个社会短视频浪潮来袭,科研内容的表现形式也将更加生动和多样。除了与论文同步发表之外,科研视频还可以应用于成果介绍、项目申报、学术讲座等不同场景,并适合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传播,使研究内容变得生动、富有表现力。学术可视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表达,而且可以利用技术以更形象的方式展示研究成果的精华。

2.“科普+网红”:学术推广新路径

在社交媒体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平台的背景下,科普网红已成为学术出版领域的新兴力量。据统计,2021年B站^①“科学科普类内容增长了19倍,居全站所有分区之首,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达到80亿次,点赞数达到3亿”^[15]。为了扩大学术成果的受众群体,实现更有效的学术传播效果,持续推进科普事业和科普工作变得至关重要。现代社交媒体平台为大众科普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红人则成为连接学术界与受众之间的重要桥梁。“网红”通过多种媒介表达思想、观点和情感,分享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解读与思考,与粉丝建立交流互动。这种推广模式不仅可以使学术走出象牙塔,而且可以实现学术交流的共话融合。

3.“社群+直播”:学术交流新场域

学术出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不应将

其仅视为单向直线的传播模式。在学术出版领域,为其提供反馈渠道至关重要。基于互联网的直播分享能够超越时空限制,建立读者与内容之间的共时关系,使读者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交流互动。读者的实时评论出现在学术视频中,网友可以按照评论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回帖互动。这种方式不仅创造了学术出版领域“天涯共此时”的社交互动情境,而且为学术监督提供了新路径。

2023年6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首款头显产品 VisionPro。该头显配备的显示屏能够消除常见的“纱窗效应”,从而提供更加逼真的3D直播体验。这项技术的问世为“社群+直播”的媒介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更新了学术出版内容的传递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学术传播的“神秘化”窠臼。国内的几大门户网站为弹幕视频的观看模式打开了新局面。弹幕作为一种强开放性的动态交流媒介逐渐变得大众化和常态化,它代表了“参与性文化”的新形式^[16]。作为一种特殊的评论方式,弹幕允许受众在观看视频时实时发表评论。弹幕视频这种高度互动的模式应用于学术出版领域,可以为学术互动、反馈、监督与治理提供新的方法。通过可视化的“可见性”与弹幕的“互动性”,为学术内容赋予“真实、透明、交互”之能。

(三) 平台化:学术出版新业态

平台化是学术出版业态发展的趋势,其核心在于构建多方参与、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的学术出版平台,从而改变传统出版业态的结构和运营方式。平台化是指将多种垂直应用联结成为生态级平台,引发社会资源连接方式的结构和制度变革,形成多边优势互补和多元价值交换的平台经济。^[17]出版业态的平台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由纸质媒介转向数字媒介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出版与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密切相关。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学术交流不再局限于点对点,纸质出版物成为传播学术思想的大众化媒介,扩大了学术思想的传播范围,促进了学术的兴盛繁荣。尽管印刷技术不断升级完善,但传统的纸质媒介仍是主要传播媒介,学术出版长期处于“纸本时代”,受到物理时空和实体介质的限制。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全新的虚拟呈现和数据传输技术,彻底改变了纸质媒介的传播方式,使得信息传递能够突破物理时空的束缚,降低了传播成本和传播门槛^[18]。

受到数字媒介技术的冲击,传统出版业正面临

转型,朝着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的全新出版模式发展。相较于传统模式,这种新兴的出版模式在编辑、发行、盈利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具备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和传播范围广泛等诸多优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在未来的出版产业中,数字内容精品化趋势日益明显,出版媒体不断融合且向纵深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也日益多元化。同时,随着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出版业的数智融合创新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由机构势力转向平台势力

起初,非营利组织如大学、科研机构和专业学会负责学术出版工作,但由于读者规模和发行量的限制,出版销售收入无法覆盖出版成本。因此,学术出版一直依赖财政补贴或会员费来维持。后来,商业出版机构进入学术出版行业,凭借更为完善和高效的出版业务流程、全球化的营销网络和资本运作模式,逐渐成为学术出版领域的主导者。在学术出版中,商业出版机构的投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并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长期以来,学术出版机构在整个学术出版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形成了机构势力。然而,学术新媒体如学术资源平台的崛起对传统机构势力构成了挑战^[19]。尤其是以学术平台数据商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势力成为学术出版的重要渠道,在整个学术传播链条中占据核心位置,并收取高额的平台使用费和资源服务费。数字内容产业的业态复合化趋势渐显,平台竞争加剧,大型平台垄断的格局逐渐形成,形成了平台势力^[20]。换言之,过去实体出版机构主导了出版过程,而现在大型数字平台削弱了出版机构的垄断势力,成为新的中介环节。由于学术平台在学术资源整合以及学术资源获取方面存在着天然优势,众多出版机构不得不从与学术平台合作逐渐变为依附于学术平台。

3. 由发行思维转向传播思维

学术成果的推广宣传是学术出版的重要环节。传统学术出版机构都设置有特定的发行业务部门,负责挖掘目标客户,拓展消费市场和维系发行渠道。总的来看,由于传统的出版业还是以实体机构为主,且发行渠道相对固定,所以发行业务在整个出版产业链中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然而,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作用,发行渠道向虚拟网络时空延伸成为可能。如今,营销传播部门在出版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良好的营销策划不仅可以提升学术产品的传播力和市场价值,还能传播产品内容、构建

品牌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开始由原来的实体发行思维转变为虚拟传播思维,更加强调从全产业链传播的角度来重塑整个出版过程,实现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渠道^[21]。这种转变由传统的单一媒介经营发展到对不同媒介的经营,实现了从经营产品到经营内容、从被动到主动、从事后到事前的转变。

综上所述,学术出版作为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的重要环节,正面临着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巨大变革和挑战。“可视化出版”具有突破困境的可能性,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巨大潜力,不仅可以摆脱学术生产过程中极强的隐蔽性,还可以规制并有效解决学术出版中的隐性问题。同时,它还能够促进学科融合,避免“学术孤岛”效应的发生。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可视化技术作为数字媒介传播的新兴形式,实现了“像素化”“社交化”与“平台化”的未来发展格局。学术出版与可视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B站是哔哩哔哩(bilibili.com)的简称,这是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是视频播放的平台和交流的社区。

参考文献

[1] 谢曙光. 学术出版研究: 中国学术图书质量与学术出版能力评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
 [2] 许洁, 王嘉响.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术出版信任建设[J]. 出版科学, 2017(6): 19-24.
 [3] 刘一鸣, 蒋欣羽.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术出版版权屏障研究[J]. 编辑之友, 2018(8): 95-99.
 [4] 吴彬, 贾建敏, 丁敏娇, 等. 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科技期刊建设[J]. 编辑学报, 2015(1): 64-66.

[5] 许洁, 汪琨禹, 马青青. 基于三大出版领域的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探索[J]. 科技与出版, 2019(10): 104-111.
 [6] 曾军. 从“视觉”到“视觉化”: 重新理解视觉文化[J]. 社会科学, 2009(8): 109-114.
 [7] 盛艳燕. 数据出版影响科研不端行为的实证研究: 以问卷调查数据处理过程为例[J]. 中国出版, 2018(10): 49-53.
 [8]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2): 242-253.
 [9] 波普尔. 客观知识: 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 舒炜光,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14.
 [10] 波兰尼. 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M]. 许泽民,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32.
 [11] 薛翔, 夏宁. 可视化的劳动: 数字经济中图书出版类短视频的知识生产[J]. 编辑之友, 2020(12): 25-30.
 [12] 王泽应. 祛魅的意义与危机: 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J]. 湖南社会科学, 2009(4): 1-8.
 [13] 崔迪. 媒介知识: 传播学视野下的知识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184.
 [14] 袁小群, 关灵爽. 虚实共生: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出版及融合发展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22(2): 29-34.
 [15] B站助力科学“冷”知识迅速“出圈”[EB/OL]. (2022-10-28) [2023-05-19]. 新华社客户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891346409381722&wfr=spider&for=pc>.
 [16] 戴颖洁. 弹幕: 狂欢时代的伦理反思[J]. 编辑之友, 2016(2): 62-64.
 [17] 宋建武, 黄淼, 陈璐颖. 平台化: 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基石[J]. 新闻与写作, 2017(10): 5-14.
 [18] 朱剑. 学术新媒体: 缘何难以脱颖而出: 兼及学术传播领域媒体融合发展[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7-17.
 [19] 张耀铭. 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的关键与进路[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5-23.
 [20] 郭小平, 杨洁茹. 传播在云端: 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J]. 现代出版, 2021(6): 30-37.
 [21] 韩筠. 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出版的发展策略[J]. 科技与出版, 2018(10): 35-41.

Visualization+Publishing: A New Model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Era

Zhang Shiyao Shen Yang

Abstract: Visualization, as a technological implement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empower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publishing. Visualization not only gives rise to the trend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provides an evidential foundation for trust-building in academic publishing. Moreover, as a “meta-languag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field, avoiding the occurrence of “academic isolation”. Looking at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we can apply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to academic publishing, advocating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visualization+publishing”, exploring the “pixelated” form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ecology, and the “platform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models.

Key words: digital era; deep integration; academic publishing; visualization publishing; knowledge pixelation

责任编辑: 一鸣

《中州学刊》启事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中州学刊》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提倡原创、打造精品”为办刊理念,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广集百家睿智,编发精品力作,弘扬中原文化,关注学术前沿,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推出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

《中州学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河南省社科二十佳期刊、一级期刊。

一、投稿须知

《中州学刊》目前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当代政治、党建热点、经济理论与实践、三农问题聚焦、法学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伦理与道德、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新闻与传播。各栏目的近期选题请参阅年初发布的“《中州学刊》2022年度重点选题”。

1.《中州学刊》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作者来稿时请提供文章篇名、作者姓名、关键词(3~5个)、摘要(400字左右)、作者简介、注释与参考文献等信息,并请提供英文篇名、摘要与关键词,若文章有课题(项目)背景,请标明课题(项目)名称及批准文号等。

2.请随文稿附上作者的相关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学位、职务职称、专业及研究方向、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箱)及详细通联地址。

3.注释用①②③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

4.参考文献用[1][2][3]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书写格式请参阅《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5.文章10000字以上,优稿优酬。文责自负,禁止剽窃抄袭。请勿一稿多投,凡投稿三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6.来稿正式采用后,本刊向作者支付稿酬。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本刊没有在外设立任何分支机构,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

7.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被以上数据库收录,或不同意被本刊微信公众号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8.本刊编辑尊重文中作者的观点,但有权对文章进行技术处理。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以上要求。

二、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451464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州学刊杂志社

联系电话:(0371)63836785

在线投稿系统网址:<https://www.zzxk1979.com/>

各编辑室联系信箱:

zzxkzz@126.com(政治) zzxkjs@126.com(经济) zzxklaw@126.com(法学)

zzxksh@126.com(社会) zzxkll@126.com(伦理) zzxkzx@126.com(哲学)

zzxkls@126.com(历史) zzxkwxs@126.com(文学) zzxkbw@126.com(新闻传播)

中州学刊

(月刊 1979年创刊)

主管主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中州学刊杂志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邮政编码 451464
电 话 0371-63836785
网 址 <https://www.zzxk1979.com/> (可在线投稿)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河南省邮政发行局
邮发代号 36-118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M82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075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1006/C
国内定价 15.00元

装帧设计: 韩青

各学科编辑室电子信箱:

政 治 zzxkzz@126.com
经 济 zzxkjjs@126.com
法 学 zzxklaw@126.com
社 会 zzxksh@126.com
伦 理 zzxkll@126.com
哲 学 zzxkzx@126.com
历 史 zzxkls@126.com
文 学 zzxkwxs@126.com
新闻传播 zzxkbw@126.com



微信公众号

ISSN 1003-0751



9 771003 07523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